

ISSN 1016-05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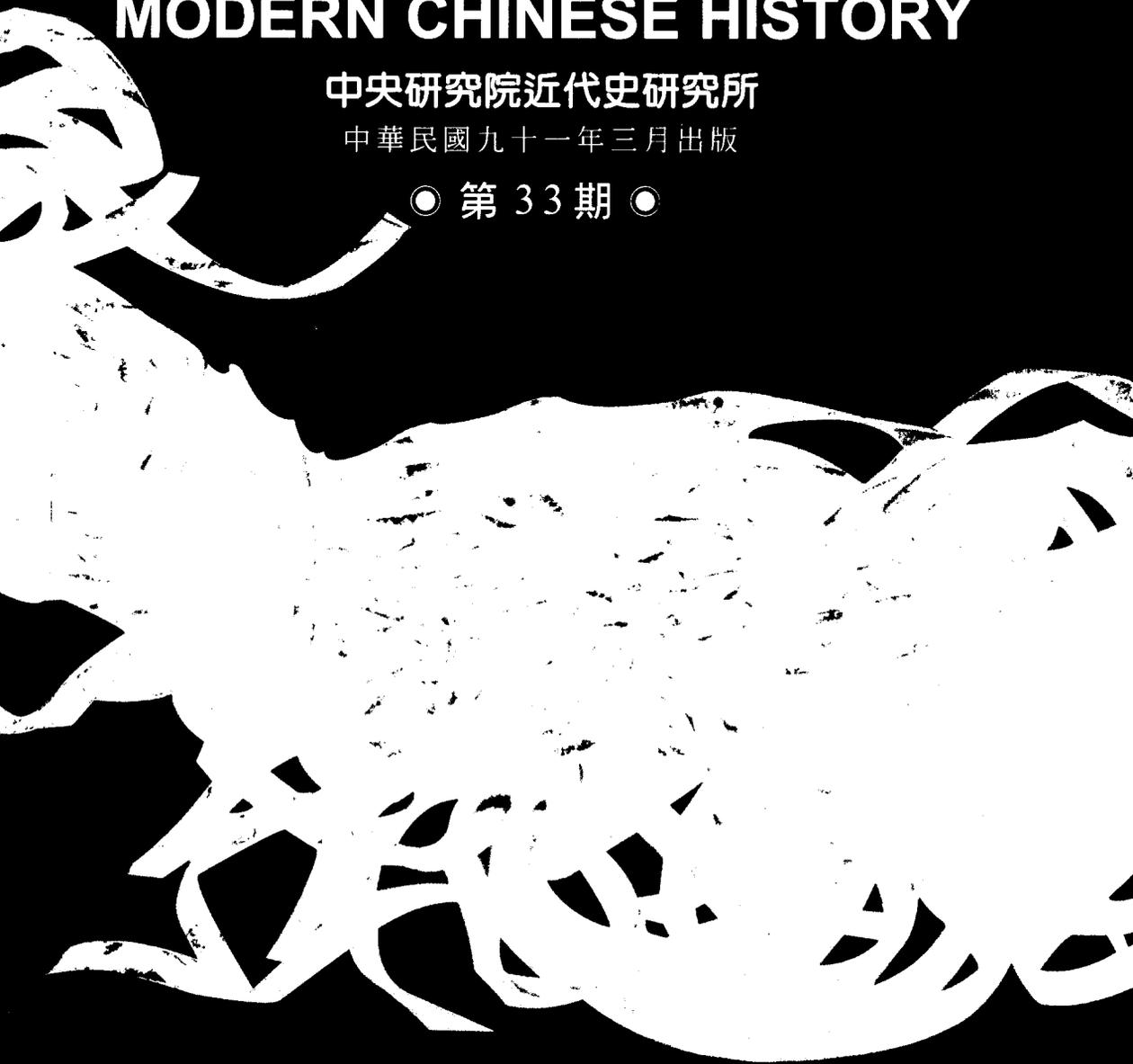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三月出版

● 第 33 期 ●





張玉法先生在榮退演講會中演講



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
先生近照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目錄 第三十三期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三月出版

學術會議	「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紀要.....高純淑	1
	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述要.....魏文享	17
	「辛亥革命、孫中山與廿一世紀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侯勵英·范永聰	28
	「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紀要.....李盈慧	46
學術演講	我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些回憶.....張玉法	53
學人簡介	張玉法教授的史學人生.....黃自進·潘光哲	63
研究概況	關於大陸中蘇（俄）關係和蘇聯、俄羅斯問題研究的介紹李嘉谷·張盛發	89
	史料介紹	《莊農雜字》所反映的農民生業生活.....王爾敏
	有關近代西南地區鴉片史料的種類與存藏情況介紹.....秦和平	106
舊學新思	敘事、論述與歷史：胡適與近代中國知識結構的轉型沈松橋	119
	中國大陸批判胡適運動勝說.....黎漢基	126
	胡適的「整理國故」在20-30年代學術界的反響.....陳以愛	132
新書評介	王家儉，《李鴻章與北洋艦隊——近代中國創建海軍 的失敗與教訓》.....姜鳴	136
	石泉，《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林文仁	144
	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紀中國觀念變遷與社會發展》張維屏	152
	黃自進，《北一輝的革命情結：在中日兩國從事革命的歷程》李朝津	160
	評介翟新《東亞同文會與中國：近代日本的對外理念 及其實踐》.....林志宏	166

任育德，〈雷震與臺灣民主憲政的發展〉.....蘇瑞鏘 172

構建中華兩岸秩序：全球化現象與本土化發展之省思
.....朱景鵬 181

大事紀要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2001.10-2002.3).....張珍琳輯 185

封面設計：黃憲鐘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呂芳上

編輯委員 呂芳上 陳三井 魏秀梅 張瑞德

張啓雄 黃自進 胡國台 陳儀深

翟志成 許文堂 葉其忠 潘光哲

張秋雯

執行編輯 魏秀梅

助理編輯 張珍琳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半年刊 第33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區

電話：27824166

郵撥帳號1034172-5

印刷者 辰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定價 新臺幣100元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三月出版

GPN 2007500014

ISSN 1016-0566



學術會議

「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紀要

高純淑*

辛亥革命為二十世紀的中國開啓從專制王朝走向民權伸張的新紀元，並為亞洲樹立民主共和之典範。此一劃時代的意義與成就，垂諸久遠，永世不朽。民國九十年(2001)為辛亥革命九十周年，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近代史學會、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聯合籌辦「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學術討論會」，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對九十年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程，以公正客觀之論述，作歷史性之回顧，彰明其發展脈絡。

初步決定邀請學者就「辛亥革命的再省思」、「政府與政黨及社會變遷」、「經濟建設與文教科科技」、「國際社會的參與」、「戰爭與社會動員」、「臺灣經驗的創造與檢討」、「兩岸關係的回顧」等七項主題撰寫論文。籌備會的邀稿，得到海內外學者的熱烈回響，經過半年的積極籌備，陸續收到相關論文 60 餘篇，討論會於是成形。

民國九十年(2001)十月六日至九日，討論會假臺北市圓山大飯店國際會議廳舉行。共有來自海內外，包括美國、德國、俄羅斯、日本、韓國、香港、大陸等國家及地區的兩百多位學者專家，經由 62 篇論文，對辛亥革命以後九十年的中華民國歷史進行為期三天的討論。民國七十年的「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會」與民國八十年的「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會」都是在圓山飯店舉行，主辦單位選定同一場地，實具有延續傳統的歷史意義。

討論會分為 A、B 兩組進行討論，每組有十個場次，共分「辛亥革命的意義」、「辛亥革命不同面向的發展」、「辛亥革命前後的政治」、「辛

*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專門委員

亥革命前後的外交」、「辛亥革命前後的文化發展」、「辛亥革命與外國」、「辛亥革命與社會轉型」、「三〇年代的中日問題」、「戰前政治」、「戰前軍事與外交」、「抗戰時期的傀儡組織」、「戰時文教」、「戰時經濟與軍事」、「戰時中國」、「戰後中國政治經濟」、「戰後國共關係」、「臺灣經驗的創造」、「臺灣經驗——內政」、「臺灣經驗——外交」、「兩岸關係」等二十個子題進行討論。以下試以辛亥革命（23篇）、戰前中國（11篇）、戰時中國（10篇）、戰後中國（6篇）、臺灣經驗（12篇）為區分，摘要介紹62篇發表的論文。

一、辛亥革命

在「辛亥革命的意義」這一子題小組中，共有3篇論文發表。中國史學會會長金沖及先生在〈辛亥革命和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一文指出，孫中山先生對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貢獻在於：把民族主義同民主主義、民生主義緊密聯繫，而且強調民族平等的觀念，提倡各民族之間的相互尊重、相互合作。他的民族平等思想，愈到後來愈加明確而完整，不僅對中國以後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而且在世界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朱泂源先生在〈辛亥革命的制度性意義重觀〉一文中，從制度面，特別是國體與政體結構的內涵，以及其運作功能的研究著手，分從四時期五段落做比較，以彰顯辛亥革命的意義。通過國體、元首、政體三項的比較，他認為辛亥革命共和制度的創作，最重要的轉捩點是在清末光宣之際，其次是在北伐統一中國以後三年的民國二十年，而不是在辛亥革命武裝行動爆發之後的民國元年。

北京辛亥革命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章長炳先生的〈辛亥革命與中國〉指出，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和清朝政府長期積怨的結果，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統治，出現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給人民帶來希望，使社會各方面都發生極大的變化，此即為辛亥革命偉大意義的所在。

「辛亥革命不同面向的發展」主要討論3篇文章：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鄭梓先生的〈辛亥革命對日據臺灣反抗運動及其路線影響的再省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鄭會欣先生的〈辛亥革命與中國的經濟轉型——兼論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原因〉，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劉鳳翰先生的〈二次革命後袁世凱軍政改制與全國軍事部署（民國二年九月至四年十二月）〉。鄭梓先生的論文討論辛亥革命究竟對已是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反抗運動（涵蓋前期武裝與後期非武裝抗日）及其路線產生何種具體的衝擊或影響，亦即運用新舊史料，針對「辛亥革命與日據臺灣反抗運動及其路線之關連性」此一主題，進行初步的再省思和再評估。

鄭會欣先生的大作則以大量的資料顯示辛亥革命後中國出現經濟轉型的具體表現，並從六個方面對於民國初年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原因進行深入的分析。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確實為形成中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帶來重大的契機，但是若要尋找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真正原因，還必須從中國內部的深層結構去分析和研究。

劉鳳翰先生的論文係就袁世凱全盛時期，有關中央軍政改革與大量擴軍，及全國軍事部署，作一詳細論述。袁世凱用盡心機全國部署，滿以為萬無一失，但當宣布接受帝制時，整個袁政府，包括中央與地方，眾叛親離，土崩瓦解，最後羞憤而死。

辛亥革命前後的政治、外交和文化發展，都是學者們關注的對象。在「辛亥革命前後的政治」小組中，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章開沅先生的〈張湯交誼與辛亥革命〉，以張謇、湯壽潛自洋務運動以來三十年的交誼為新的視角，試圖對辛亥革命作某些較為深層的解讀。文中指出，以張、湯為代表的立憲派，在社會、經濟、文化各項革新事業中的貢獻，特別是在立憲運動中宣傳鼓吹政治制度的變革，對於國民政治覺醒起了推波助瀾作用。

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兼院長朱英先生的〈清政府與辛亥革命前的地方自治運動〉指出，清末地方自治在 1909 年以後，已發展為政府與民間共同推動的重要舉措，也可以說是國家與社會的一種新型互動模式。清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的主要目的並非完全是欺騙輿論和抵制革命，而是為學習西方國家的社會制度，以自強救亡；為實行君主立憲奠創基礎；使官民上下相通，補官治之不足。清政府自上而下地大力推行地方自治，在當時產生值得肯定的積極影響。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呂實強先生的〈四川保路運動的本質及其演進〉一文，從民族意識的高漲和立憲派與革命派對此一運動的貢獻這兩個方面，對作為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前奏的四川保路運動進行釋

論，同時對大陸學者的有關「資產階級革命」的論斷，提出辨析。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張憲文先生的〈中國歷史的新紀元——南京臨時政府評析〉認為，南京臨時政府是近代中國人民奮鬥成果的集中體現，開闢中國歷史的新紀元，展示一個現代國家的美好圖景。在七大問題上的成就都是史無前例的，同時它實施的各種制度和法令，也體現了現代社會的一些根本原則，應充分肯定其歷史地位和作用。

在「辛亥革命前後的外交」的子題下，共討論 3 篇論文。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王綱領先生的〈辛亥革命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特殊」與「不特殊」〉一文，指出美國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對華政策上，既有平常（不特殊）的一面（如同其他列強在華尋求私利），但也有其「特殊」面，即在其追逐利益過程中，也要兼顧道德理想的一面。辛亥革命前後，美國塔虎脫政府企圖在國際合作策劃中引導各國共同改造中國；威爾遜總統率先承認民國，皆構成美國對華政策的特殊面。

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唐啓華先生發表〈辛亥革命前後中國國際化的努力——以清末民初對「保和會」的參與為例〉一文，係 1899 至 1917 年中國參與海牙「保和會」的個案研究，由外交官在「保和會」中的表現，以及政府對各項海牙公約簽署、批准的經過，考察近代中國國際化的歷程，提供理解辛亥革命前後中國外交史一個新的視角。唐文指出，在這段期間，中國外交官在國際論壇上初露頭角，建立全球觀，尋求中國自處之道，可視為近代中國國際化進程中，難能可貴的初始階段。

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陳鴻瑜先生在〈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國家建立使領館關係之比較〉一文中，分別敘述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泰國、越南、緬甸等東南亞國家設領之經過，並比較分析。陳文在結論中指出，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國家發展外交關係，初期以華僑問題交涉為主，甚少就雙邊合作問題進行協商；直至民國六十四年邦交完全中斷，方以臺灣的經濟實力為後盾，建立雙方互蒙利益的實質關係。

「辛亥革命前後的文化發展」的子題也是學者們的興趣所在。五四以後中國民族主義的流行語中，「反對文化侵略」可能是少數幾個有長時效的說法之一，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陶飛亞先生的〈「反對文化侵略」中的文化因素與非文化因素：二、三十年代的國民黨與基督教〉考證了這一口號的起源，著重討論國民黨人與「反對文化侵略」口號的關係，觀察國民黨在處理在華基督教及其文化事業上政策演變的根源和動力，由此來分析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中的多重因素。

國史館纂修洪喜美女士的〈辛亥革命前語文大衆化的發展〉一文，指出「語言是表現思想的器具，文字又是表現語言的器具」，近代中國受西力的衝擊，朝野亟思禦侮圖強，其中籲求政治變革運動與新文化思想運動交織，互相激盪，在啓迪民衆愛國思想的教育要求下，也呼籲改革語言文字。辛亥革命前夕，知識界一方面從事文學的創新，要求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強調啓迪的作用；一方面從事切音運動，以注讀漢字，甚至主張以萬國新語取代漢字，加速新知教育。

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周惠民先生和該校歷史系博士班研究生蕭道中先生兩人合著的〈辛亥以來中學「歷史學科」的發展——以課程標準為中心的探討〉，從清末的壬午學制出發，檢討九十年來中學歷史教學的演變。文中提出，民國以後歷史教學被設定為「公民訓練」的工具之一，特別強調「愛國心」及「民族精神教育」。五四運動之後，比較著重「培養學生世界觀」。但由於日本侵略日亟，於是又恢復到強調民族精神的舊路線。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之後，強調「反共抗俄」的基本國策，中學歷史教學對此也多加著墨，直到近年來才稍有調整。

韓國新羅大學史學系教授裴京漢先生的〈韓人參與辛亥革命的史實——安昌浩書簡資料中的幾個事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三井先生的〈再論孫中山革命與法國〉和日本北海道大學副教授川島真先生的〈中國外交界的辛亥革命——組織、人事、政策面的考察〉3篇文章，探討「辛亥革命與外國」這一子題。裴文運用最近公開刊行的韓國獨立運動領導者安昌浩的書簡資料，深入研究發現：從1911年至1918年，流亡到上海、南京等關內地區的韓人，相當數量對武昌起義抱有莫大的期待，並積極參加了學生軍及討袁運動等革命運動。這些事實正說明當時辛亥革命的國際影響巨大，說明辛亥革命不僅僅是中國一個國家的革命，具有作為整個亞洲共和革命的意義。

陳文以時間為座標，以東京、安南、巴黎三個地點為活動中心，重新建構1900年起孫中山先生與法國軍事、政治、外交、新聞各界的接觸聯繫、折衝樽俎，為革命奮鬥的一段辛酸歷程，從而窺知法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並進一步探討法國在辛亥革命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川島真的文章則將辛亥革命發生、民國成立一事，視為一政治外交過程，從外交當局的「同時代感」來理解，希望藉此重新思考辛亥革命的外

交意義。他認為，從辛亥革命到民國的成立，是以連續性為基調，再加上新動向的一個契機。中華民國以近代性為目標，採用共和政體而成立國家本身，當然推進近代的體制，但是當時外交官僚體認到「時代變了」這種時代觀也是推進變革的原動力。

「辛亥革命與社會轉型」討論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人、陳煥章與《孔教會雜誌》和「超賢妻良母」觀。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國強先生的〈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人〉指出，自戊戌變法經十年新政，是傳統士人向近代知識份子蛻變的時期。這些蛻變中的知識人兼有舊學新知，以思想掀動時潮，又各為時潮所裹，在晚清最後十年裏成為革命的自覺者和呼應者。譚嗣同、徐錫麟、吳樾、汪兆銘、陳天華和楊篤生的事蹟，都表現了知識份子的近代化與志士化俱進於同一個過程之中。由此催生的輕死剽急成為彼時知識人的一種典型與風氣。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侯杰先生和濟南大學蔡偉紅先生合著的〈陳煥章與《孔教會雜誌》評析〉一文則在系統闡述陳煥章提倡孔教的生平事蹟，並借助於對《孔教會雜誌》的解讀，剖析其在辛亥革命後宣揚孔教的具體思想主張，進而探討產生這些思想的社會歷史原因，加深學術界對於辛亥革命後中國社會文化思想的認識。

清末民初，中國近代思想發生巨變中最堪注意的變化之一，是中國婦女由「傳統典範」向「新典範」的嬗變。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黃媽梨女士的〈革新時期的中國婦女新典範之建構——簡論「超賢妻良母」觀〉一文，指出清末的維新派思想家不斷更新重塑「賢妻良母」的形象，加入了女子「強國保種」的作用，譜出了中國婦女作為人妻人母的新標準。然而，其新標準始終植根在中國幾千年來男尊女卑的倫理道德上，仍然存在著許多明顯的侷限，沒有走出「傳統典範」。民初，孫中山一方面發揚了維新派男女平權的初步主張，一方面積極提倡女子教育，創導了一種「超賢妻良母」的中國婦女觀，亦可以說是建構中國婦女的「新典範」。

二、戰前中國

中外學者對二十世紀的三〇年代的戰前中國，分別就「戰前政治」、「戰前軍事與外交」和「三〇年代的中日問題」三個主題，發表了 11 篇的研究心得。

在「戰前政治」之下的諸多大作，既有抽象的理論問題的探討，又有實質性個案問題的研究。近代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與政治制度的變遷過程是一個理論問題，日本中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深町英夫先生的〈近代中國政治體制論——認同意識的分形／群自結構〉一文，試圖引用「群自(holarchy)」及「分形(fractal)」的概念來提出一個新的假說。文章認為，在清代末期的王朝專制主義(dynastic despotism)下，國家政府的組織機構是一個「群自」結構，而社會人民的認同意識則是一個「分形」結構。辛亥革命是社會分贓國家而國家崩落到社會裏的一次事件。民國採用議會民主主義(parliamentary democracy)，社會雖已掠取國家，但政府未能馴化人民，因此認同意識的「分形」結構得以留存，而新體制的「群自」結構並不安定。於是，革命精英提出黨國極權主義(party-state totalitarianism)的構想，即前衛革命政黨在壟斷「群自」的各級國家政府的同時，將其「群自」的政黨組織浸透於「分形」的社會結構，使各層人民在其認同意識的層次上參與政治，以編組他們成為認同民族共和國的國民。這一構想雖由國民黨在廣東省實行，但未能充分擴大到全國，而後中國共產黨將此繼承、發展和實現。

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教授西村成雄先生的〈試論第二個四分之一世紀中國政黨國家形成特點〉，更是從一個廣闊的視野分析了中國政黨國家的特點。他開宗明義地引用了 1928 年 7 月 18 日蔣中正的一段談話和 1980 年 8 月 18 日鄧小平的一段講話，說明這兩位中國歷史上的領袖人物一致認為，如果缺少「中心思想」、「中心組織」這二個不可缺少的要素，那麼中國就會產生四分五裂的危機。由此作者認定，中國並無因 1949 年革命而分裂為二，相反地中國社會試圖將原本即存在且延續著的特有政治形態，再次形成新的政治體制。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王奇生先生的〈黨的派系化與派系的黨化：CC 系的組織形態與政治理念(1933-1938)〉，在原始檔案和憶述資料相結合的基礎上，試圖進一步瞭解 1949 年以前國民黨中最具影響力的派系之一——CC 系。1933 年初，陳果夫、立夫兄弟奉蔣中正之命，以地方黨務人員為基礎的政治派系勢力正式組建為一個多層級的金字塔形組織：頂層「青白團」是其領導核心，中層「中國國民黨忠實黨員同盟會」乃其組織活動主體，底層由「幹社」、「誠社」等一批秘密「活動集社」組成，在「活動集社」之下，是一批公開的外圍團體。「青白團」的

組織宗旨、組織體制與運作模式，與力行社極其相似。兩個組織的建立，是蔣中正為克服三〇年代初期內外交困的危局以及樹立其個人領袖權威所採取的措施。然而此種雙軌競進的組織體制，造成國民黨莫大困擾。在此過程中，國民黨黨機器蛻化為 CC 系一派所壟斷的權力工具。與此同時，CC 系又在黨機器之外另立一套獨立自主的準政黨組織系統，因而兼具「黨的派系化」，與「派系黨化」的特徵。

國史館協修王正華女士的〈寧漢分裂前中國國民黨的黨務會談〉一文，則從二個部分研究了國民黨寧漢分裂前夕，反共的黨員和軍方將領，如何在中央監察委員的主導下，擁護蔣介石清黨反共的過程。

美國新澤西州立 Montclair 大學歷史系教授賀欽賢 (John K. Olenik) 先生的〈北伐時期群眾動員的軍事局面(1926-1927)〉探究北伐戰爭中軍事與政治勢力的互動。在 1927 年 5 月間進入河南省的所謂第二期北伐，或許可以看成是兩種重要性轉型勢力的匯集。動盪的中國於短暫卻激烈的諸戰役間，經歷了現代化科技戰與革命性政治戰爭的衝突，兩者都是史無前例的，對於革命歷史的結果具有關鍵性影響。

國史館協修陳進金先生的〈中原大戰期間國民政府軍費的籌措與運用〉一文指出，國民政府主要是以發行公債來挹注軍費，發行的公債，大都由上海金融界所承購，蔣中正就運用這些軍費來拉攏地方實力派、籠絡收買敵方將領和犒賞己方部隊。在蔣中正籌措軍費的過程中，財政部長宋子文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南京時期的國民政府雖然結束了軍閥統治時期，但仍面對複雜的政治環境。表面上，國府已於 1928 年統一全國，但其初期有效控制區域有限，如自民國成立以來即與中央政府關係疏離的西南諸省，仍然保持其半獨立的狀態。及至 1935 年，中央勢力隨著剿共軍事的轉移進入西南，與地方勢力的關係開始有了變化。國民政府強行改組貴州省政府事件即為最好的說明。中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楊維真先生的〈剿共與統一——論 1935 年中央改組貴州省政府事件〉就是以貴州省政府改組事件作一觀察，剖析中央改組貴州省政府的動機與經緯，並探討此事件對嗣後政局的影響。

戰前的外交問題也是與會學者的研究對象。在撤廢治外法權方面，國民政府的外長王正廷於 1931 年 6 月與英國駐華公使藍浦生簽訂一項草約，並著手經由正常條約審議批准手續，俾使其成為正約。可惜這項中英廢除治外法權的草約，因稍後九一八事變的突然爆發，未能順利地成為正

約，因此也未受到外交史研究者的適當重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李恩涵先生的〈1931年6月南京國府在撤廢治外法權交涉上的重要成就〉一文，針對此項草約簽訂的背景與其談判過程的史實，予以全面性的探索與重建，並進而就此事件作一檢討。

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的中日問題亦為學者關注的焦點。在中正文教基金會的資助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黃自進先生等學者近年來赴日本地毯式地收集了大量的資料，此次會議上黃先生在題為〈蔣介石與九一八事變：不抵抗責任的探討〉的文章中，就蔣中正與「九一八事變」這一敏感問題提出了一些新觀點，引起了與會學者的熱烈討論。文中指出，九一八事變前夕蔣中正對中日局勢的判斷是，認定日本政府不致於干冒破壞九國公約之大不韙而侵略中國。基於此一認知，他以反共為號召，與日本陸軍總部建立起戰略夥伴關係，實施不抵抗政策，以降低東北的緊張局勢。「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是蔣中正的對日戰略四大原則。東北原非國民政府直接管轄地，因而東北的不抵抗，不能歸罪於國民政府，但是蔣中正至少有未盡督促的責任。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是人類歷史上極為罕見的軍隊施加於平民的暴行事件，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副教授張連紅先生的〈日軍攻佔南京前夕南京市民的社會心理〉一文，以戰爭受害者南京市民作為考察對象，探討日軍佔領南京前夕南京市民應對戰爭暴行的社會心理。文章認為，在日軍佔領南京前夕，由於市民對日本侵略戰爭的殘暴性認識不足，再加上地方政府（包括軍隊）和民間救濟機構在組織和疏導等方面也存在缺陷，南京市民對即將來臨的戰爭與日軍暴行在社會心理上的準備顯然不足。

三民主義力行社是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國民黨內極端秘密的政治組織，是上海東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徐有威先生的〈三〇年代國民黨之日本觀——以《前途》雜誌為例〉一文的研究主題。《前途》係力行社最主要的出版品之一，編輯和作者是抗日政策的積極支持者和宣傳者，運用各種方法（包括漫畫），同步地介紹日本的內政和外交，批判日本的對華侵略，評論日本所處的國際環境，預測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它斷言日本必定要發動侵華戰爭，中國人民只有自救才能獲救，而戰爭的勝利同時會使中華民族獲得新生。這一本日本觀是其作者對日本問題長期關注和研究的結果，不失為三〇年代國民黨內值得關注的中日關係的理論之一，同時它也

充份體現了這一組織擁蔣抗日反共的宗旨。

三、戰時中國

學者們針對戰時的傀儡組織、文教、經濟和軍事等問題發表了 10 篇的高論。

在抗戰結束已經過半個世紀的今日，汪精衛被視為漢奸的觀念並沒有被去除。日本早稻田大學亞細亞太平洋研究中心教授小林英夫先生的〈汪精衛政權與日本佔領下的中國〉一文，就是沿著汪精衛的足跡，考察汪精衛如何走向「漢奸」之路，以及此一過程中與日本的關係。此文探究以往著作所採取分析方法的演進過程，過去的研究多以汪精衛是否是「傀儡」還是「愛國者」進行評價，而最近開始使用分期，針對當時其所扮演的角色進行詳細的檢討。文章認為，對於汪精衛的思想及性格，學術界採取了各式各樣的觀點來加以檢討，可說是尖銳地捕捉到汪精衛為人的另一面。

此次會議中有關汪精衛的具體個案研究，就是對抗戰時期頗為流行的「蔣汪雙簧論」進行了詳盡的研究，這就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羅久蓉女士的〈中日戰爭時期蔣汪雙簧論再探〉一文。它從文化論述與政治權力這兩個角度探討了雙簧論和雙簧論述形成和發展的完整過程。此文首先探討雙簧論述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的轉折，以及構成雙簧論述原型的幾個要件：中國知識份子與社會大眾如何經由《左傳》、《史記》等經典閱讀，與《趙氏孤兒》、《搜孤救孤》一系列戲劇表演，接受雙簧論述及其結構性的限制。其次，從汪精衛個人參與革命的角度，看「趙氏孤兒」歷史敘事所包含的若干元素如何在不同時期以不同方式出現在他的思維中，影響他對政治情勢的判斷與抉擇，以及為什麼從他離開重慶片面言和那天起，雙簧論就失去合法性。第三探討了雙簧論述與民族主義論述之間的關係。抗戰時期中共譴責國民政府玩弄表面抗日，實際反共的「兩面手法」，在影射重慶與南京汪政權互通款曲時，充分利用雙簧論述內外歧異的結構特徵。因為它知道作這種指責，不需要直接證據，只要幾件事情並列陳述，即可達到宣傳目的，傳達所要傳達的訊息。最後文章還討論了雙簧論在通敵、策反與社會道德方面所產生的諸般效應。

抗戰時期的中日雙方的特務工作素為人們所津津樂道。其中的「宋子良工作」（日方稱呼「桐工作」，中方稱之為「張治平工作」）就是一例。

這是日本在 1939 年秋對於國民政府關於停戰與和平之交涉，最後結局並未成立的一次謀略，亦為中日兩國在戰爭中實行諜報戰交手的重要案例。東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許育銘先生的〈由「宋子良工作」看抗日戰爭期間「和平工作」與「特務工作」之交錯〉，根據蔣中正總統檔案關於「宋子良工作」的一手史料，作較為深入地考證。文章提出，日本軍部對覓求中日和平會談的線索，極須開闢與重慶聯絡管道的焦慮下，視「桐工作」宛如溺水者的救生圈，寄予厚望而進行。而在國民政府方面，軍統局人員進行「張治平工作」之目的是為欺敵，以擾亂日本扶助汪精衛政權工作。以往將「宋子良工作」當成所謂中日戰爭時期「和平工作」代表例之一，但就其內容及性質來看，明顯偏向「特務工作」。亦可謂日本進行的「桐工作」是歸類為「和平工作」，而中國進行的「張治平工作」為「特務工作」，兩者的交錯同是戰爭下的謀略。

戰時文教的主題也為學者所關注。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李道緝先生在〈抗戰時期華僑青年回國從軍運動〉一文指出，海外華僑青年回國從軍，不僅是保衛祖國，更參與同盟國在東南亞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為他們的「第二故鄉」貢獻心力。海外華僑青年回國從軍運動，既是戰前中國國族建構的成果，也開啓戰後海外華人國族意識重構的契機。

「蘆溝橋事變」爆發後，數量龐大的中小學教師，或紛紛逃離戰區，追隨政府，湧入西南地區；或因家累，或因經濟能力不足而受困家鄉。遷入大後方的中小學教師，面臨最基本的日常生計，可能引發潛在的嚴重社會問題。於是「救濟與策反」遂成為國民政府解決這些問題的策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胡國台先生的〈救濟與策反：抗戰時期中小學教師服務團與戰區教育工作隊〉一文，認為國民政府採取救濟策略，以申請登記方式，分發由淪陷區而來的中小學教師，就任相等教職，以此穩定中小學教師的日常生計與流落異鄉的不安定感，適時化解潛在的社會問題，同時也削弱了敵偽的教育人力資源，增長我方教育師資。「中小學教師服務團」就是這一救濟政策的結果。而對於留在淪陷區的中小學教師，國民政府則採取敵後秘密策反、教育反攻策略，「戰區教育工作隊」的努力，不但延伸影響力，遠至國民政府勢力無法正式觸及之處，提振了淪陷區人心士氣，更彌補了國民政府原有空間的損失。

有關抗戰時期日本掠奪中國圖書文物的研究，在中國大陸，臺灣和日本歷史學家和圖書館史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已有豐碩的成果。但是這些

研究忽略日方組織「掠奪」的部門、目的以及書籍雜誌被「掠奪」後的去向等問題。而且有些研究在論述此問題時，出現一些關鍵性偏誤，即認為一系列「掠奪」活動的實施者是日本「特工」，同時還認為數量龐大的書籍雜誌被帶回日本藏於國內的圖書館中。日本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副教授金丸裕一先生的〈戰時日方掠奪圖書問題述評〉，以當時的報刊雜誌以及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檔案等為主要依據，就這些問題展開了具體詳實的分析論證。

有 2 篇文章論及戰時的經濟問題。東北地區是中國鋼鐵工業的重鎮之一，萌芽與初步發展於中日戰爭時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慈玉女士的〈抗戰時期東北的鋼鐵業〉一文指出「滿洲國」成立後，東北和日本的鋼鐵業逐步形成了原料、半成品供給與成品接受的殖民地式的生產結構。到 1943 年，此一殖民地式生產結構，因為外在大環境劇變所引起的東北生鐵、粗鋼輸出與鋼材輸入數量的劇減，而內蘊解構的命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林美莉女士的〈抗戰後期國民政府的「特券」發行活動〉一文，則以檔案史料為基礎，論述抗戰後期國民政府藉由印製淪陷區政權貨幣，運用這些特殊的貨幣搶購物資的決策與執行過程，呈現戰時國民政府因應戰爭財經困境，一方面避免後方境內通貨膨脹，一方面由敵區獲取物資的一段罕為人知的歷史經驗。

衆所周知，蔣中正身邊有軍事委員會侍從室幕僚人員為他出謀劃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瑞德先生的〈無聲的要角——侍從室的幕僚人員(1936-1945)〉一文描述這群「無聲的要角」。侍從室和其他國民政府各機構相較，人員精簡，效率較高，紀律嚴明，官僚機構的弊病也較不嚴重，主要是蔣中正威權式領導，加上幾位模範主管潛移默化的緣故；但也造成了幕僚拘謹守成，開展不足的性格。侍從室在無意中成為蔣中正培養其個人班底的重要機構。侍從室的幕僚人員，忠貞可靠，素質高，加以年齡較輕，可塑性大，於工作中得以充份瞭解蔣中正的意圖和施政方向，以及政策執行時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一旦外調，受到重用的機會也較一般人為大，久而久之，「侍從室派」於是形成，其影響所及直至二十世紀五〇年代的臺灣。

抗戰時期的中美關係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齊錫生先生長期關注的課題，在其〈中美關係的認知形象與事實真相——1941年新四軍事件再探〉一文中，探討了這一事件的原因和過程，顯示出國共兩黨在政

治、宣傳和外交競爭的危機，各有截然不同的反應。他認為，國民黨贏得重大軍事勝利，卻失利於政治戰場；共產黨重創於軍事，卻在政治上獲取令人刮目相看的高分，它在塑造民意方面，比國民黨要機智靈活得多。

四、戰後中國

有 4 篇文章論及戰後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問題。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主任兼研究員章百家先生的〈重慶談判國共決策分析〉，依據中共近年披露的檔案資料，說明抗戰結束前後，中共對國際國內形勢看法轉變，策略也相應調整。抗戰行將結束時，中共的基本判斷是內戰不可避免；而在抗戰結束後，多方面的原因促使中共轉而認為爭取一個和平民主的階段還是可能的。儘管毛澤東本人對國共談判的前景始終充滿疑慮，但他還是極力說服黨內的同志贊成他親自到重慶與蔣中正會面。國共談判達成的「雙十協定」實際是妥協的產物。但是，這個暫時的妥協始終是不穩定，未能成為戰後中國走向和平的保證，國人所期待的和平轉瞬即逝。重慶談判對戰後中國的走向沒有產生長遠的重大影響，

馬歇爾在二次戰後奉使來華調處國共內戰，成為中國近代史與中美關係史上的重要轉捩點。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成勉先生的〈烽火下的調處：對馬歇爾使華調處第三階段的評估(1946年7月-1947年1月)〉，主要參考美國的官方檔案，以及臺灣及中國大陸一些新出版與開放的史料，希望藉由馬歇爾第三階段調處的研究，能對於馬歇爾及其調處有一較完全的評價。

日本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姬田光義先生的〈東北內戰與衛立煌——為武器彈藥補給苦惱的東北剿匪總司令部〉一文，係以實證研究的方法，意圖澄清武器彈藥補給之不足、蔣中正等中央領導對其認識不足，與支援體制的欠缺，是衛立煌指揮的東北剿匪總司令部在遼瀋戰役敗退的因素。

美國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郭岱君女士、資深研究員兼東亞檔案館館長馬若孟先生和研究員蔡玲女士合著的〈臺灣政經大危機：國民黨執政下的指令經濟(1945-1952)〉是跨越 1949 年的一項研究。文中指出，1945 至 1952 年，中華民國政府施行指令經濟，將政治權力完全集中於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並將絕大部分的產權劃歸於公營企業。所有公營企業均受

到國家所屬銀行資助，控制著商品的生產與行銷，甚至具備警察的權力。這種指令經濟主控著臺灣四分之三的經濟活動，造成貪污與浪費，減低服務業的質量，與物資的匱乏。通貨膨脹的現象日益嚴重，經濟復甦停滯，加深了社會的不安，終於導致 1947 年 2、3 月間的「二二八事件」。時至 1952 至 1953 年間，指令經濟在臺灣仍然佔有絕對的優勢。直到 1950 年代中期，政府才將許多公營企業開放給私人經營。1960 年以後，臺灣迅速地脫離了指令經濟並進入現代市場經濟。

五、臺灣經驗

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到臺灣之後，迄今已有五十多年，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有諸多值得探討的問題，在此次會議中呈現出來。

在「臺灣經驗的創造」，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前主任委員李雲漢先生〈中國國民黨在臺灣(1945-2001)〉一文，以「光復初期的臺灣」、「中華民國政府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遷臺後之奮鬥」、「中國國民黨組織發展、執政政績政風，及今後趨勢」等三項主題，論述自臺灣光復迄今(1945-2001)五十餘年間，中國國民黨在臺灣之生存發展概況。

孫中山先生所著的「實業計畫」，是發展中國富源、促成中國現代化的具體計劃。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喬寶泰先生在〈「實業計畫」在臺灣的實踐——以十項工程建設為例〉一文指出，臺灣推行十項工程建設，與「實業計畫」的四大原則相符，與五點精義相合，亦與十大綱領相通，可說是「實業計畫」的縮影和延伸。

國史館纂修卓遵宏先生的〈李國鼎與賦稅改革(1968-1976)〉，以李國鼎先生為主軸，研究六〇年代臺灣的賦稅改革。該項改革的規劃與設計，以賦稅改革委員會為主導，財政部負責實際之推行。1968 年 3 月，賦改會成立時，李國鼎即參與籌劃；1969 年 7 月，李氏出任財政部長後，更負起協助賦改會爭取立法院支持立法之責，並執行徵收、稽查逃漏稅、革新稅務行政、引進自動化稅務處理等任務。至 1976 年 6 月李氏辭卸財政部長職務，賦改工作的成效已相當顯著，全國賦稅總額成長超過三點七倍，順利達成九年國教改制，推展十大建設，促成臺灣經濟奇蹟的出現。

在臺灣經驗的內政方面，共有 3 篇論文發表。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薛化元先生以王雲五的政治主張為主題，提出〈王雲五的政治改革主張初探

——以總統府臨時行政改革委員會的地方自治建議為中心）一文，試圖說明 1950、60 年代官方內部有關政治（憲政）體制改革的內涵及其意義。當時官方進行的改革，主要是以行政革新、行政效率為著眼點，相對地不重視政府施政與憲政體制規定牴觸的問題。

有關「臺灣經驗」的研究，大都偏向政治、社會等社會科學範疇，並凸顯政經、社會、文教等各方面的建設成果。臺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所長黃人傑先生的〈臺灣經驗之創造與檢討——以人文觀點為例〉一文，則從變遷與發展研究的觀點來看「臺灣經驗」。首先敘明臺灣經驗的創造與潛在危機，偏重在潛在危機的討論說明，其次從人性、人倫、人道與人權四個層次交錯的人文觀點來分析與檢討。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廖達琪女士基於民主必須基於地方的信念，提出〈臺灣地方政治變遷初探——民國八十二年與九十年地方精英背景及觀點的比較〉一文，嘗試探討在臺灣快速民主化過程中，地方政治的變遷。文中分析民國八十二年及九十年地方菁英的背景及觀點，以政治變遷的領導、政策、團體、結構五成分，都顯現了邁向民主化的跡象。

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高永光先生發表〈中山先生地方自治理念在臺灣的實踐〉一文，從孫中山先生地方自治的理念中，萃取了自主性的主要概念，用來檢驗臺灣地方自治發展過程中對於孫先生自治理念的實踐。

在臺灣經驗的外交方面，共有 2 篇論文發表。德國慕尼黑大學教授金德曼先生發表〈美國對華政策中蔣中立的角色和認知(1949-1972)〉一文，討論華府對蔣中立的角色認知與對其對華政策的影響。在韓戰前，對中華民國和蔣中正本人的外交政策，充滿懷疑、不信任，有隨時背棄友邦的心念；韓戰爆發後，美國雖然保護臺灣，提供物質援助，卻仍然迴避承諾，蔣中立的地位因中日條約的簽訂而得到認可；艾森豪政府和蔣中正為沿海諸島的防衛，存在矛盾；最後尼克森政府為了在華府、莫斯科和北京的三角結構中，創造出自己有利的形勢和立場，成功終結了與大陸的冷戰，部分放棄臺灣。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陳立文女士的〈從世亞盟的蛻變看臺灣在亞洲地位的轉型〉一文，透過世亞盟的組織變化，配合民國四〇至六〇、六〇至八〇，乃至八〇年代以後的國際情勢與臺灣發展，試圖為臺灣在亞洲地位的轉型尋找一個探討的基礎。

在「兩岸關係」議題，有 3 篇論文引發學者討論。國共內戰之後，中國由「一個政府」分裂成「兩個政權」，乃造成雙方在任何國際組織或活動中，都卯足全力，務必爭取「唯一合法」=「正統」之中國代表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東華大學歷史系主任張力先生的〈國際紅十字會的中國代表權之爭〉一文，就是針對 1950 與 60 年代國際紅十字會召開的三次會議作一考察，探討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爭取恢復會籍的努力。張文發現，在爭取恢復會籍的過程中，排拒中共代表權固然是一個重要目標，但在未獲大會同意的情況下，若是國號受到尊重，政府並不排斥與中共代表同時參加會議。而中華民國能否達到目的，也與美國是否強力支持有關。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啓雄先生的〈1952 年赫爾辛基國際奧運會中國代表權之爭——名分秩序論觀點的分析〉，則是從名分秩序論觀點來分析 1952 年赫爾辛基國際奧運會前後兩岸首度交手的過程，並闡釋海峽兩岸爭奪名分秩序的意義。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副執行長兼大陸事務部主任張榮恭先生以〈兩岸關係的回顧與現況的評析〉為題，回顧海峽兩岸從隔絕到互動的歷程，並分析國民黨與民進黨關於九二共識、「一個中國」、中國人認同、大陸政策的方向等問題上的差異，指出「危機暫緩、僵局持續」是一年來臺海局勢的寫照，呈現政冷經熱、官冷民熱，政經關係質變，及相對穩定與相對僵持並存的詭譎複雜的情況。認為中國國民黨執政時期主張的「對等分治、和平競賽、民主統一」，應是最有助於維持兩岸關係的現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五期

- | | | |
|---|-------|----------|
| 論 文 | 272 頁 | 平裝 250 元 |
| 金觀濤：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 | | |
| 劉青峰：遷的思想史研究 | | |
| 葉其忠：張東蓀是何意義的「唯心主義者」？——張東蓀的「唯心主義者」標籤及其自評析論 | | |
| 張朋園：國民黨控制下的國會選舉(1947-1948) | | |
| 呂妙芬：明代吉安府的陽明講會活動 | | |

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 述要

魏文享*

2001年10月16日至20日，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武漢東湖南山新村隆重舉行。這一學術盛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史學會、湖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與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聯合主辦。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中國大陸學者87人，中國旅日旅美學者3人，港、澳學者3人，澳大利亞、法國、韓國、日本、俄羅斯、美國等6個國家的學者22人，臺灣學者12人，共提交論文102篇。真可謂群賢畢至，佳作紛呈。與會期間，國內外學者圍繞辛亥革命的各個方面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討，下文就以討論主題為中心，對會議情況作一簡介。

一、辛亥革命與中國現代化及辛亥時期的政局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的歷史事件，它影響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相當大。在此次會議上，有不少學者繼續對這一重大課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中國人民大學的李文海在〈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一文中對辛亥革命與現代化的關係作了深刻解析。他認為，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的艱難和挫折成為呼喚辛亥革命到來的強大推動力和社會要求，而早期現代化的最初成果則為辛亥革命準備了必要的物質和精神基礎。同時，革命也是為現代化創造必要的政治前提，辛亥革命雖然未能改變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境遇，卻絕不能因此而低估了這場革命對中國現代化的促進作用。中國社科院近史所虞和平的〈辛亥革命與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啓動〉認為辛亥革命及其所締造的中華民國提出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綱領，以暴力革命的有效手段完成了資本主義性質的制度變革和權力轉換，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社會力

* 華中師範大學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量整合，它使中國的早期現代化進入啓動階段。臺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朱泮源從資訊的角度分析了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的定位問題，他認為傳統中國囿於資訊流通的不足，限制了孔子等人的規劃，將政治活動侷限在統治上層。中華世界的政治結構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紀透過政治制度的新規劃，成功地以政策帶動政府的再造，主要的原因應在資訊傳輸的速度、深度、廣度均有重大進展。由於資訊傳輸的能力的快速提升，1912年建立的中華民國以及1949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二十世紀裏「已明顯走出過去深受交通不便限制的舊制度」。

辛亥時期的政局一直是辛亥革命研究的重要領域，在此次會議上又有新的進展，這主要體現在對地方勢力與中央關係的研究上。華中師大的劉偉分析了地方官制改革與辛亥革命的關係，她認為地方官制改革中形成的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既有利於革命的取勝，也是勝利成果得而復失的重要原因之一。臺灣政治大學胡春惠除討論了清末地方主義興起的過程外，也分析了地方主義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及對民初政治的影響。首都師大的遲雲飛對清末不滿漢畛域政策出臺的原因、措施及實施情況作了分析，認為清廷雖逐步取消了一般滿人的特權，但是親貴對權力核心的壟斷仍極為嚴重，「皇族內閣」即是突出表現，這加劇了社會的不滿。臺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劉鳳翰在〈辛亥革命前後全國軍事蛻變〉一文中對清末民初全國的軍事蛻變情況作了分析。認為辛亥革命後，全國軍事有兩次蛻變，第一次是在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第二次是在袁世凱時期，袁逐步接管了清中央陸海軍和各省地方軍隊，所以在他的手中軍隊蛻變是成功的。但他建立的龐大的軍隊給國家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

政治集團研究也受到與會者重視。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的馬平安對北洋集團的興起與清末中央和地方權力之爭的關係作了進一步分析。認為清政府建立新建陸軍、設立練兵處本是為了收回在鎮壓太平天國過程中流失地方的軍政權力，結果中央集權的成果反而為袁世凱所奪取，這使北洋集團在辛亥革命中實現從地方走向中央的過程。中南民族學院的許憲隆則對以往忽視的西北諸馬軍閥進行了研究。認為在辛亥革命前後，甘甯青諸馬軍閥逐步完成了由封建時代擁兵自重的地方實力派向民國時代資產階級新軍閥的過渡。廣東社科院的劉路生在分析了袁世凱養痾彰德與辛亥復出的過程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看法。認為袁世凱在武昌起義後應詔復出所提條件是為對付革命風潮，是保存清室的最佳善策，挾革命黨以自重，不是袁

世凱出山時的本意。

在辛亥革命運動與起義方面，武漢大學吳劍傑對辛亥前同盟會內部孫中山與湖北革命黨人的兩種不同的起義戰略作了詳細分析。海軍工程大學的熊志勇在〈試論辛亥革命之新軍角色〉一文中分析了新軍在辛亥革命中的特殊角色。認為就清末政局而言，新軍是惟一能夠向現存政制提出挑戰的社會集團，革命黨人在新軍中的成功滲透最終化為辛亥發難的內鑠之源。但這種以軍人為主角的社會革命亦使軍界強人得以左右政治，造成了「軍焰熏天」的民初政局。深圳大學莫世祥在〈「兩廣獨立」與三洲田起義研究〉一文中認為，三洲田起義是孫中山與興中會的革命事業最終從密謀策劃走向公開鬥爭的轉捩點，是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首次戰爭實踐，該役也為此後的民主革命提供了經驗和範式。

二、辛亥革命時期的相關人物研究

在辛亥革命人物研究中，孫中山先生一直處於焦點地位。從提交論文來看，此次集中討論的是孫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廣東社科院張磊在〈孫中山文化思想取向與「理想國」〉一文中認為孫中山文化取向的主要內涵和特點是：以中國的基本國情和實際需要為出發點和歸宿，從西方吸取先進思想。他的民主主義理論與政綱具有比較完全的意義，他的社會主義觀念則帶有民粹主義色彩。孫中山的文化取向最終凝聚為他竭畢生精力以締造的「理想國」。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的黃宇和則結合文獻探索、文物探源與實地考察，分析了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最初起源，他認為，三民主義完成於倫敦。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瑪瑪耶娃(Mamaeva Natalir Leonidovna)則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國民黨一大〉一文中對新三民主義與舊三民主義的關係作了更詳細的分析。除三民主義外，也有學者對孫中山先生的倫理觀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湖北大學的陳鈞在〈論孫中山的倫理觀〉一文中認為孫中山的倫理觀是在批判繼承中國傳統倫理與擷取吸納西方資產階級倫理觀念的基礎上形成的，其核心和真諦主要體現在公與私、生與死、奉獻與索取、利他與利己四個方面，其人格魅力源自於其道德實踐。

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孫中山研究已取得了重大成果，一些學者於是將研究視野投向其他辛亥人物。著名史學家章開沅在〈張湯交誼與辛亥革命〉一文中以張湯交誼為新的視角，對辛亥革命作了更為深刻的解讀。他認

為，辛亥革命是歷史合力的產物，革命派的英勇鬥爭是導致君主專制制度崩潰的最重要的衝擊力量。然而以張謇、湯壽潛為代表的立憲派在社會經濟、文化各項革新事業中的貢獻，特別是在立憲運動中對於政治體制制度變革的廣泛宣傳，對於國民政治覺醒也起了一定推波助瀾作用。清朝皇室集團妄想憲政外衣下謀求集中權力，導致了立憲派和地方督撫的離心離德。在這次會議中，以往缺乏研究的章士釗、何啟等也受到與會學者的關注。中國人民大學的郭雙林則討論了武昌起義前後章士釗政治思想的演變，認為章士釗所闡述的各種政治理論及學說在當時的中國是最新穎、最完整、最系統的，其中雖有許多不切實際成份，但其平民國家精英政府、責任內閣制和政黨學說等思想給宋教仁、黃興以相當影響。香港大學的趙令揚在〈辛亥革命時期之何啟〉一文中對何啟的成長背景及其支援革命的過程進行分析，認為何啟雖然一直都接受英國的正統教育，但在整個辛亥革命發展過程中，何啟始終和孫中山的理想聯在一起。聊城師院張禮恒在〈論辛亥革命時期伍廷芳與革命黨人的關係〉一文中對伍廷芳與革命黨人由合作至疏遠的原因進行探索，認為他在辛亥革命期間加入資產階級革命的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統一。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政治信念和清政府的愚頑不化導致伍廷芳投向革命，但在實施治國方案上的分歧則導致了他與革命黨人的疏遠。臺灣中興大學的唐啓華從陸徵祥的角度探討了職業外交官與辛亥革命之關係，他認為陸徵祥辦外交，忍辱負重，可謂清末民初「弱國外交」的代表性人物。中山大學段雲章在〈陳炯明與辛亥革命〉一文中分析了陳炯明在辛亥時期的活動，認為陳炯明既非投機革命，也非蓄意圖謀民主革命，而是依據其生活的特殊社會歷史環境和個人特性，有一個從立憲改革到致力於民主革命的漸進過程，形成了不同於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民主激進派的某些特徵。並進一步認為，陳炯明對廣東辛亥革命作出了積極貢獻，這是主要的。

三、辛亥革命時期的思想與文化

辛亥革命時期是社會的急劇變動時期，也是許多近代觀念產生的醞釀與形成期。在本次討論會中，關於近代民族主義及國家、國民概念的產生及其特徵成為討論熱點。

金沖及討論了辛亥革命與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興起的關係，認為孫中山

先生對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貢獻在於不僅把民族主義同民主、民生聯繫起來，而且突出強調民族平等觀念，這不僅對中國以後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在〈辛亥革命與二十世紀的中國民族國家〉一文中探討了「中華民國」一詞在民國初期的概念內涵，並認為在近代中國，民族國家為民族和民族主義的種族內涵大力幫忙，其歷史根源就在於辛亥革命，而種族思想在本質上始終構成對民族國家整合運作的威脅。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的黃興濤考察了清末民初「中華民族」觀念及其主題詞的出現、傳播、內涵演變的有關歷史，認為此詞完全在現代意義上的使用是在辛亥革命之後。文章還從「立憲」和「革命」思想的角度論述了辛亥革命對於現代中華民族認同的影響。華中師大的許小青集中探討了 1903 年前後新式知識份子的主權意識與民族國家認同問題，認為 20 世紀初年的新式知識份子不僅認識到主權為國家的最高屬性，而且還認識到主權的內外雙重內涵。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普萊斯(Don C. Price)在〈宋教仁與民族認同意識〉一文中探討了民族認同意識作為國家觀念的一個組成要素在宋教仁早期思想中的發展。日本京都大學的石川禎浩分析了西方人類學傳入中國的過程、戊戌時期的種族觀念，並進一步認為清末革命運動時期包含社會進化論的西方人類學理論與知識為革命派的「排滿」主張提供了根據。日本京都大學的狹間直樹和武漢大學的馮天瑜則分別探討了「民主」、「共和」、「革命」等近代政治中堅概念的形成的淵源。馮天瑜認為辛亥革命造成的近代中國政治話語系統的深刻變更，最典型的表現是「共和」、「革命」兩詞從古典義向現代義的轉換。華中師大近代史所的嚴昌洪在對 1903 年上海國民公會的名稱變更及發展過程進行了分析後認為，國民公會的出現反映了中國社會各階層民衆國家觀念和國民意識的增強，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結構的鬆動。

辛亥革命時期，各種社會思潮縱橫激盪，對中國近代的發展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清華大學張豈之在〈辛亥革命時期的人文主義思想及其特點〉一文中認為，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人文思潮的首次高潮，不僅為中國的傳統科學向現代科學的轉化奠定了基礎，同時也開啓了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過渡的帷幕。胡繩武對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思想解放意義作了高度評價，認為辛亥革命時期的思想解放實為「五四」前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也是「五四」前新文化運動的淵源。北師大的龔書鐸在〈辛亥時

期文化四題》一文中也肯定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認為在近代文化發展過程中，辛亥革命處於承上啓下的階段。中山大學林家有討論了辛亥革命與中國近代的教育近代化的關係，認為沒有教育近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國社會的轉型和中國社會的近代化，而沒有辛亥革命又不可能實現中國教育的近代化和政治變革。日本明治大學的高田幸男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教育與塑造國民〉一文中認為，教育是塑造「國民」的最重要手段之一，辛亥革命時期的國民教育對灌輸新生民國的國家觀念有重要作用，但沒有養成政治主體，也沒有改變清末教育的框架。中山大學桑兵立足於廣闊的社會背景，對壬寅濤溪公學第二次風潮進行了獨到的剖析，認為這一看似同一營壘中內耗的衝突所產生的強烈衝擊力是革命形勢成熟的動因，間接與直接起到動員民衆的作用。這一事件也是影響蔡元培、龐青城、杜亞泉等名噪一時人物思維行爲的關鍵。臺北中國文化大學的李朝津對康有爲的早期史學思想作了探討，他認為康有爲在與西學接觸過程中敏銳察覺到近代西方史學中進步及主體性等命題，因此爲中國鋪陳出近代第一個民族敘事方式，以爲中國在近代世界中定位。康有爲在傳統思想的影響下，更著意尋找一個包容性更廣的世界史觀，因此在 1888 年以前近代民族史觀及世界史觀均可以交彙在康有爲身上。文章進一步認為康有爲選擇世界史作爲其發展方向，也是他轉向今文經學的關鍵。

在過去的辛亥革命研究中，大多關注於精英階層的思想與行爲，而忽視下層民衆。在這次學術討論會上，不少學者對下層民衆給予了關注。美國德克薩斯 A&M 大學的王笛研究辛亥革命前後成都的街頭政治，考察這一時期下層民衆、改良精英與城市政治文化之間的關係。他指出，在辛亥革命中，下層民衆和改良精英以公共空間爲舞臺、以街頭文化爲背景、以大衆宗教爲工具、以政治反抗爲目的，演出了一齣悲壯的「街頭政治戲劇」。在政治和社會動盪之中，下層民衆的街頭生活受到極大干擾，同時，街頭也被下層民衆當作政治反抗的舞臺。不過，社會轉型擴大了政治空間，下層民衆的日常生活卻相對縮小了。文章進一步認為，對大多普通民衆來講，「他們失去了一個舊世界，但並沒有得到一個新世界。」中國人民大學的張鳴在〈民意與天意——辛亥革命的民衆回應散論〉一文中認為，民衆對辛亥革命的正面回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人們認爲清朝的氣數已盡，下層社會基本上將革命視爲「反清復明」的改朝換代，其實並不明白革命的真實方向。雖然一些地區的民衆期望革命能帶給他們某些惠政，但

由於革命黨在減輕民衆負擔這個關鍵問題上的無所作為，導致了民衆的不滿與背離。這些觀點爲我們更深入地瞭解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提供了進一步的參考。

四、辛亥革命時期的國家和社會

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是學界討論的熱點問題，對於辛亥革命史來講，它不僅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其本身也是一個極爲重要的課題。復旦大學的姜義華在〈論辛亥以來的近代國家與近代社會非同步發展的政治整合〉一文中認爲，辛亥革命使近代國家形態取代了已延續兩千多年的傳統國家形態，但憲法虛文化、議會邊緣化、政府全能化，表明近代國家形態並未真正負擔起社會政治整合的歷史使命。在近代國家與近代社會非同步發展的情況下，政治重心的構建與政治整合便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問題的核心就是將現代化與廣大農民如何恰當地連接起來。日本中央大學的深町英夫在〈國家——社會之間的「分奪」與「崩落」〉一文中認爲，辛亥革命可視爲近代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的一次宏觀轉換，他援用「分形(fractal)」及「群自(holarchy)」的概念對此進行分析，認爲在辛亥革命爆發時，國家的「群自」結構被社會的「分形」結構所「分奪」，於是國家「崩落」到社會裏。是故，議會民主體制雖得以取代王朝專制體制，但難以確立鞏固，最終以失敗告終。中山大學歷史系邱捷對清末民初廣州地區地方政府與社會控制關係進行了研究，認爲，在清末，清王朝在廣州地區社會控制的日漸衰落，造成了革命黨人在革命高潮時的「不戰而勝」局面。而革命黨人在掌握政權後，因重建新的控制系統失敗，導致了「二次革命」的失敗。山東師大的田海林、張志勇在〈禁煙新政與清王朝的覆亡〉一文中認爲，禁煙雖是清王朝在覆亡前夕銳意圖強的一大「善政」，但由於數十年來對鴉片採取名爲「寓禁於徵」實則弛禁的政策，造成對洋土藥稅厘的財政依賴，禁煙反而導致了嚴重的社會矛盾和財政危機，結果是「清末禁煙新政搞得越好，清王朝就覆亡得越快」。

不少學者運用社會學的方法對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變遷狀況進行考察，獲得新的突破。浙江大學的汪林茂分析了浙北的市鎮變遷，認爲在辛亥革命中市鎮是比較成熟的社會、政治、思想條件，市民們是比較自覺、理性而積極的態度進行了光復和建立城市自治政權的活動。從而對長期以

來認為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基本上只在大中城市中得以開展的偏見有所糾正。復旦大學戴鞍鋼、楊立強分析辛亥革命後上海農村的變化，認為辛亥革命對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社會發展進步有著重要的推動力。南開大學的李喜所在〈「辮子問題」與辛亥革命〉一文中認為，在辛亥革命期間，「辮子問題」成為革命黨人推進民主革命的有力武器。與清初留辮運動相比，民初剪辮的最大特點是相對自由。日本橫濱國立大學的飯島涉以獨到的眼光分析了傳染病與辛亥革命的關係，指出傳染病的流行以及由此引起的諸問題使中國的民族主義日益高漲，它也是中國導入近代國家制度的動力之一。

五、辛亥革命涉外問題與國際社會

辛亥革命時期，西方列強為維護在華利益相應調整了對華政策，這對國內政局及革命進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的楊天石在〈在華經濟利益與辛亥革命時期的英國對華政策〉一文分析了在武昌起義後，上海英商李德立干預中國內政的稀有現象。認為英國既不願中國陷於長期內亂，又要培植有利於自己的統治者，這是英國在辛亥革命時期全部對華政策的出發點，也是英商李德立在南北雙方積極調停的根本原因。臺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黃自進對辛亥革命時期的日本對華政策進行了探討。認為在辛亥革命前協助康有為回國執政是日本的主要對華政策，在辛亥期間的外交則主要受制於「英日同盟」的外交框架，保皇外交及辛亥後期的利權外交均告失敗。日本千葉商科大學的趙軍則依據日本現存的部分外交檔案，論述辛亥時期「民間外交」活動的主要內容、特點及其與正規外交的關係，指出除個別真正同情中國革命的民間人士之外，大部分日本軍人、浪人及名流的「民間外交」實質不過是對大陸政策更為隱蔽也更具欺騙性的實踐。一些國外學者利用其國內資料對所在國對辛亥革命的反映作了細緻分析。美國亞歷桑拿大學歷史系麥金農(Stephen R. Mackinnon)的〈報導中國——西方媒體與辛亥革命〉一文認為1911年的美國媒體在總體上支援革命者的同時，也流露出對中國能否建立一個穩定有力的共和政府的懷疑。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拉林(Aleksander Georgievich Larin)則探討俄羅斯輿論對辛亥革命的態度，認為革命派馬克思主義者是同情贊同革命的，保守派則預測中國將變成一個軍事強國。並指出在新聞材料中贊

許革命的明顯占多數。此外，華中師大近代史所的羅福惠分析了清末民初國人對「黃禍」論的反應，認為當時輿論界已經認識到「黃禍」論對中國的危害，並提出有力的反駁。文章認為孫中山對「黃禍」的回應是這個時期中國人對這一誣言認識的最佳代表。

六、辛亥革命時期的經濟發展與商界活動

經過國內外學者的長期努力，辛亥革命在政治、社會及文化層面的研究已取得相當成就，但對辛亥革命與經濟發展的內在關係的探討略嫌不足。令人可喜的是，此次會議上有不少學者關注到這一問題。

華中師大近代史所的朱英在〈辛亥革命與商界的發展變化及其影響〉一文中認為，在思想觀念層面，辛亥革命後商界對商會的社會地位、獨立性、自治自立等問題的認識有了明顯提高；在組織程度方面，辛亥革命後的商界透過正式成立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也顯著加強。日本神戶學院中村哲夫在〈辛亥革命與金融制度〉一文中討論了清末及辛亥時期的改革金融體系及改革財經問題，認為 19 世紀末地方政府已經成功協調財政、銀行及通貨的金融體系三大要素。文章進一步認為孫中山對於穩定民初的國際金融市場有著特別功績，經由孫中山到袁世凱時期，中國第一次金融體系改革是初步成功的。華中師大近代史所的馬敏則討論了辛亥前後商人司法意識的變遷，認為爭取商法修訂參與權和商事裁判權是主導清末民初商人法律意識的兩條主線，從政治意義上看，這也是新興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重要主張和要求。華中師大近代史所的鄭成林對清末民初商事裁判制度進行了考察，認為清末民初的商事仲裁還沒有完全脫出中國王朝法律系統的窠臼，但從仲裁機構的設置、原則的變異、範圍的擴大等方面加以觀察，則已比較接近現代的商事仲裁制度。中國社科院汪敬虞提交的〈中國現代化黎明期西方科技的民間引進〉一文與其在紀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時撰寫的〈發揚中國產業革命精神〉為姊妹篇。文章認為，發端於 19 世紀中葉的西方科技引進有官方和民間兩個並進的途徑，民間活動的主角主要是廣東行商、洋行買辦及和洋行有交往的中國商人、鴉片戰爭前後出洋的華僑商人。民間活動多是試探性質，不具有洋務派官方活動的聲勢和規模。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陳爭平以盛宣懷和張謇的企業活動為案例，認為辛亥前中國產業民營化有兩條途徑，一條是以張謇為代表的新式產業民營化

主流途徑，一條是以盛宣懷為代表的舊的官辦、官商合辦轉為商辦的支流途徑。

在經濟組織方面，日本神戶商科大學的陳來幸在〈辛亥革命時期華商會網絡的起點與其作用〉一文中以〈華商聯合報〉為資料主體，對海外商會和國內商會代表初次在 1907 年因討論商法草案問題接觸而創立了華商聯合會進行分析，認為是歷史上第一次由海內外華商共同組成的網絡機制。她進一步認為，華商會網絡和華僑民族意識的高揚形成互動關係，不過，除南洋地區外，日本在這網絡中也佔有重要地位。中山大學的敖光旭對辛亥革命時期的廣東商團進行了考察，認為它的出現與發展是治安失控與政治職能弱化的直接結果，它的發展則是商人公眾意識及自我認同意識增強的表現。它與革命黨的關係實際上是廣東商界與現行政權關係的縮影。

七、辛亥革命學術史研究與會議小結

歷經九十年的探索與努力，辛亥革命史研究取得了累累果實，其本身也成為史學學術史領域的一朵奇葩。每十年一次的紀念辛亥革命學術盛會不僅是國內外學者研究成果的展示會，也是學術傳承與創新的結晶與起點。不少學者對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這一歷程進行了回顧與總結。

在資料研究方面，中華書局的陳錚在〈近二十年辛亥革命史研究著作和資料出版概述〉一文中介紹 300 餘種辛亥革命史研究著作和資料圖書，從一個重要側面展示近 20 年大陸辛亥革命史研究蓬勃發展的景象。他認為，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肯定成績又要看到不足，要不斷充實研究和著作隊伍，只有這樣才能保持辛亥革命研究的持續發展。日本女子大學文學部久保田文次費多年心血對萱野長知在 1940 年出版的《中華民國革命秘笈》進行研究，辨明了許多重要史實，對進一步理解辛亥革命史及中國革命史提供了很大幫助。臺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陳三井在〈故宮清檔中所見的辛亥革命〉一文中利用臺北故宮博物院未刊的〈收發電檔〉等檔案，力圖從另一隻眼看辛亥革命。臺灣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劉維開就中國國民黨對於辛亥革命史料的徵集與運用作了詳細介紹，這無疑有利於兩岸學者的資料共用與研究交流。

在研究動態的總結方面，華中師大近代史所的嚴昌洪回顧了 20 世紀

90年代中國大陸辛亥革命研究的新進展：研究成果豐碩，學術研討比較活躍，研究層面有所擴大，若干問題的研究有所深化。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張玉法對1950年到2000年間臺灣地區學者的辛亥革命研究狀況進行了考察，分別就專著、論文、學位論文的主題與數量作了評介。澳門大學霍啓昌剖析港澳史與辛亥革命研究的關係，他認為香港、澳門與辛亥革命運動的關係是兩地與中國近代史密切關係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必須具備一定的專業技能和熟悉近代港、澳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情況才能作深入研究，發掘新的史料，取得新的突破。

從1961年到2001年，其間除1971年因歷史原因未能舉行外，紀念辛亥革命國際學術討論會共舉辦了四次，而這一次無論在規模和水平上都有了新的突破。章開沅教授在會議閉幕式上表示，本次與會的大多數論文體現出以下幾個特色：一是時空的延展，不侷限於辛亥革命本身，而是從長時段來深入考察影響辛亥革命的各個方面的因素；不侷限於中國，而是擴大到國際範圍，把歐洲等其他地區的民族問題與中國的民族問題作為參照，進行綜合比較研究。二是視角的轉換，過去多從革命角度解析歷史，現在更注重從不同角度來審視辛亥革命。三是深入社會生活，關注街頭政治，民衆生活，鄉鎮變遷，「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這使辛亥革命研究開拓新的天地。章教授還強調要繼續加強實證研究。他說，實證是歷史學的基礎，不論歷史哲學、史學觀念、研究方法如何更新，實證總歸是史學論著必要的支撐。在學風日趨浮躁的現今，強調實證更顯重要。總體而言，這次大會是一次成功的國際學術盛會，必將對21世紀的辛亥革命研究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正如章先生所言，「新的課題正在深入，一批新人正在成長，更大的突破正在醞釀中。」（由於篇幅限制，與會論文並未一一論及。）

本通訊歡迎世界各地學者，撰文介紹各該地區近代中國史研究情形、出版狀況、會議消息，及傑出學人之貢獻，以廣學術交流。

「辛亥革命、孫中山與廿一世紀中國」 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侯勵英·范永聰*

2001年正值辛亥革命九十周年，也是孫中山誕辰一百三十五周年，故今年紀念辛亥革命的活動很多，國內外如夏威夷、北京、武漢、上海等地紛紛舉辦大型的學術研討會。香港與孫中山的關係甚為密切，在辛亥革命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香港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及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於2001年11月12-13日在香港浸會大學聯合舉辦「辛亥革命、孫中山與廿一世紀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並邀請了章開沅教授主講〈珍惜辛亥革命歷史遺產——以世紀意識為例〉、蔣永敬教授主講〈從三個名詞的微觀角度透視辛亥革命〉，以及顏清滄教授主講〈孫中山與廿一世紀中國〉為開幕的主題演講。這次學術活動匯集了日本、臺灣、歐美以及中國大陸各地約八十多位專家學者，發表論文達70多篇，從不同的角度重新檢視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的歷史意義。會議採取雙軌制，議程非常緊湊，茲將參與這次學術研討會的學者和論文的内容，簡述如下：

一、研究述評(一)

陳福霖的“Sun Yat-sen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A 21st Century Perspective”一文主要提出孫中山是一位真正的愛國者，他從沒有放棄救國的理念，而最難得的是他勇於承認自己的失敗，是故直至今天，研究孫中山及辛亥革命仍然可以喚醒國民對國家的認知，對現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江澤民、朱鎔基，以及中華臺北的李登輝、陳水扁等領導層，也有啓示作用。楊振亞的〈孫中山先生的歷史評價〉一文，指出孫中山基於對西方文明的了解及對清政府腐敗的體察，進而舉起革命的旗幟，踏上救國的路

* 侯勵英、范永聰，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研究生

途；孫中山的思想和學說均來自中國和世界，他從中國實情出發，一方面吸取世界上的先進方法，一方面繼承中國的優秀文化，開創出一套獨特的學說與思想。喬還田在〈辛亥革命的現代意義〉一文中則強調辛亥革命雖已成為歷史，但它依然影響著現實的生活，並且預示著國家的未來。文中特別指出要讓新一代國人清楚認識孫中山的功績；同時更要學習辛亥烈士的高潔理想和獻身的偉大情操。杜繼東在〈中國大陸地區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綜述〉文中，以「孫中山的對日觀」、「『滿洲租借』問題」、「二次革命時期的孫中山與日本」、「孫中山與『中日盟約』」、「孫中山 1924 年訪日」、「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及「孫中山與日本人士」這七個課題來檢視中國大陸五十年來有關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的研究成果。內文進一步指出現時大陸學人對孫中山的研究已一改以往概念化、公式化的傾向，而轉為著重專題研究和實證研究，而且重視史料的發掘和運用，尤其是中、日文的檔案資料，得見在這一個研究領域上已有長足的發展。

二、研究述評(二)

嚴昌洪的〈20 世紀 90 年代中國大陸辛亥革命研究綜述〉，以「清末新政與預備立憲」、「革命思潮與革命運動」、「辛亥時期的思想文化」、「民國初年政局」、「辛亥革命與早期現代化」、「辛亥革命的歷史結局的再認識」、「『革命否定論』與『辛亥革命應該避免論』」、「辛亥時期的人物」八個課題來說明研究成果的豐碩、學術研討的踴躍以及研究層面的擴大和深化，藉此總述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辛亥革命研究的進展情況。朱育和在〈關於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中提到研究辛亥革命要注意幾個方向，首先要留意辛亥話語的形成，其次要關注辛亥革命時期改良與革命的互動關係，再者要留心辛亥革命期間的社會變遷，最後就是要注意民國初年的國民心理。這樣，才能夠從多角度、多層次地對辛亥革命作一個全面的討論。林慶元的〈辛亥革命散論〉主要討論中國近代化的問題，還引用英國的環境作為對照。指出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份子參照西方的民主制度，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國。但由於國民缺乏民主意識，故封建勢力仍然強大，形成「沒有君主的專制政治」依然存在。曾濟群在〈從政治發展看中山先生建國三階段說〉的文中指出孫中山的建國三個階段，即是軍政時期、訓政時期和憲政時期，而最重要的是在第二個階段。因為

訓政階段使人民行使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四個權利，並認識民權，以便實行民主憲政，所以訓政本身不是一個目的，而是一種手段，最終以促使國家走上現代化的民主政治體制為宗旨。

三、教育與學術

方駿、羅天佑的〈孫中山的公民教育思想〉，說出教育思想是孫中山政治社會理論的一個重要環節，文中以文獻分析法，集中闡述孫中山的公民教育思想，以說明其教育思想的特色、問題和時代意義。黎志剛在〈辛亥革命前後的辮髮風潮〉一文中指出髮型是近代中國營造國族的象徵。作者著眼於近代中國人對變髮易服的想像、革命黨人對新髮式的倡議、報章的討論、群眾參與的剪髮大會等課題來闡述中國近代革命和現代化過程中「髮式」如何演變成識別革命和非革命的標記。黃焯鈞的〈孫中山知難行易學說與杜威實用主義哲學之關係〉係運用哲學的角度，從「對傳統信念表示懷疑」、「用事實證明假設正確」和「從實踐之中增進知識」三個重點來說明孫中山知難行易學說與杜威實用主義哲學兩者思想共通之處。區志堅的〈「通溫故知新之妙用，謹邪說暴行之大防」——晚清辦學要旨與「審定」中國通史教科書內容的考察〉一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介紹官方辦學及籌辦中國史學科課程的目標，並說明審定教科書的標準；第二個部分是以柳詒徵《歷代史略》、夏曾佑《中國古代史》、陳慶年《中國歷史》，以及翻譯自日本桑原鷺藏的《中等東洋史要》和《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這兩本書籍來檢視官方的辦學要旨。

四、宗教、文化與教育

梁元生在〈基督教與中國革命之再思〉論文中，說明基督教與辛亥革命運動的關係。內文首先重評「基督教與辛亥革命」這個課題的研究情況，說明學界一直忽視分析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跟著從「橫向思考」的角度，即基督教與革命運動的互動關係，和從「縱向思考」的角度，即基督教自晚清至民國初期的作用與影響，來對基督教和中國革命作一個全面的評價。李喜所在〈辛亥革命時期學術文化的變遷〉中指出，雖然辛亥革命過程中因社會動盪而缺少較長時間的學術累積，但在這段時期確實出現不少

學術經典，如孫中山、章太炎等的哲學著作，梁啟超、夏曾佑等的史學論著，出現了「史學革命」和「文學改良」的氣候，還有新型學科的出現，都能為辛亥時期開創新的學術局面。彭淑敏在〈清末民初中國婦女的醫療教育：廣東夏葛女子醫學院(1899-1916)〉一文中介紹了夏葛女子醫學院這間中國第一所女子醫學教育學院的創校緣由、1899年至1916年的發展及其貢獻情況，還說出有關檔案資料的收藏和分佈情形。馬軍於〈辛亥時期中國文化事業的一大遺憾——莫理循圖書館遷日述略〉一文裡指出，1897年至1917年設於北京的莫理循圖書館是英國人莫理循的私人圖書館，收藏大量以「中國學」為題的中外文著述，後以35,000英鎊把館內藏書賣給日人岩崎男爵，成為日本東京的東洋文庫。該文還說明了莫氏圖書館的藏量、建設脈絡及出售經過的情況。

五、政治與社會(一)

Korehito Hata的“Market Towns Surrounding Ningbo and Likin Tax of the Late Qing Period—On the Ningbo Anti-Likin Tax Movements of 1878”一文指出厘金制度是一種對零星商品的貿易而徵稅的商稅制度。文章中主要說明晚清時期寧波地區的集市和厘金，並研究1878年寧波的抗捐運動，藉此一方面展示厘金在地區和農村的真實情況；另一方面反映浙江省的厘金制度。Ryan Dunch在“Protestant Revolutionaries in Fujian, 1901-1911”文中以1901年至1911年的福建為研究對象，討論西方傳教士對中國革命的影響，並說明中國基督徒對革命的觀點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從而指出傳教士有助推動社會的變革，使中國走向現代化。David Pong的“Industrial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1911 Revolution”文中指出1895年時工人的數量只有107,500至111,500，但到了1913年時，其數量已達到900,000之多。本文主要是以幾個不同地區中，在不同工業或商業性質裡工作的工人，來探討他們的政治意識有甚麼分別，藉此闡述工人在辛亥革命運動的角色。Yip Ka-che的“Missions, Education and Medicine: Reflections on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一文重新評估二十世紀的傳教活動、教育和醫療的情形，從而指出西方思想的輸入、近代教育的發展以至專業階層的出現如何影響自1911年至1949年以來的革命事業。Greg de Cure和Felix Patrikeeff的“Sun Yat-sen and a United States of

China?”一文主要從「孫中山是革命的標誌」、「孫中山的近代政經觀點」和「如何應用孫氏的觀點」三個課題來指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依然適合現時的中國形勢，尤其是在中國大陸與臺灣統一的問題上，孫氏的學說是有其建設性和必要性的。

六、政治思想

李酉潭的〈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的民主思想〉一文首先介紹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民主思想的主要內容，包括「提倡主權在民」、「強調自由與人權」和「主張政黨政治」三個方面。接著把這段辛亥時期孫氏的民主政治的觀點與其晚年三民主義的觀點作一個比較分析，從而闡述孫中山於辛亥革命前後的民主觀。許雅棠在〈高調與低調——孫中山民主思想的一種回顧〉的內文中指出，從 1840 年至今的百年以來關於中國民主思考的特質，可分為兩個線索，一是高調與低調之爭，即對民主高度期望與低度期望之爭；二是同調與異調之爭，即西方的民主與非西方的民主之爭。而本文旨在探討「高調與低調之爭」的問題，說明近代中國以至當代臺灣學界如何回應西方民主思想，並指出孫中山的民主思想的一些啓示。王憲明在〈知識、習俗、政治——民國成立後孫中山與嚴復對建國問題的反思與探索〉文中從孫中山的《孫文學說》和嚴復的《導揚中華民國立國精神》等著述來整理孫氏和嚴氏關於知識、習俗及政治之間相互關係的見解，從而得出兩人都是希望從知識、習俗和文化方面來為政權和政治制度取得合法性。張勇在〈再議「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一文裡指出章太炎提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口號對辛亥局面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是跟當時「革命黨非政黨」的觀點和政黨政治的實行有密切的關係。本文除了討論章太炎的思想外，還探討時人如孫中山等對這一口號的理解的情況。林啓彥的〈辛亥革命時期的章士釗——由激進到穩健的政論家〉一文從章士釗主編《蘇報》，參加華興會，赴洋留學，擔任《民立報》主筆等幾個階段的政治活動和政治思想來評價章氏在辛亥革命期間的貢獻，得見章氏如何從一個激進的排滿民族主義者轉變為一個穩健的民主主義者的過程。

七、港澳臺與海外華僑(一)

范啓龍的〈辛亥革命與福建華僑〉一文中指出福建華僑是在辛亥革命

過程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力量。辛亥時期，新加坡等地的福建華僑捐款二百多萬元給福建，解決了財政的困難。又在辛亥革命成功後，閩籍華僑紛紛返回福建，大量投資實業，建設家鄉，可見福建華僑對辛亥革命的貢獻。湯熙勇在〈革命派與保皇會的競爭對夏威夷華僑的影響〉的論文中主要引用了藏於夏威夷州檔案館的文件、當地的中西文報紙及有關的田野訪談紀錄等資料，旨在探討革命派和保皇派在夏威夷的競爭情況以至其對夏威夷華僑的影響。郭偉川在〈星洲潮僑對孫中山領導國民革命的貢獻〉一文中運用一手史料來說明新加坡潮僑如張永福、陳楚楠、林義順等如何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並指出晚晴園是辛亥前孫氏領導國民革命的大本營，藉此顯示星洲潮人在中國近代史上的貢獻。馬楚堅的〈辛亥革命文字功臣之宣傳家：黃世仲行實考〉一文中表揚黃世仲能夠配合孫中山的思想，大力從事著述工作，宣傳革命大義，開啓民智，喚醒國民，對推動革命事業很有幫助。

八、政治與社會(二)

曾田三郎在〈清末的預備立憲和日本人〉一文中指出，透過大隈重信、服部宇之吉、有賀長雄、青柳篤恆等日人對中國立憲政體轉變的言論（這些見解多刊載於《國家學會雜誌》、《外交時報》、《太陽》、《日本及日本人》等日文雜誌），可以了解日本對中國的政治變動的關注情況。楠瀨正明的〈論國會速開請願運動〉一文以在直隸省和奉天省舉行的國會速開請願運動為中心，來討論國會速開請願運動的性質。文中更進一步提出以上兩省的國會速開請願運動之所以能夠開展是與清朝的地方自治機關的創立有密切的關係，而這場運動不僅宣傳了國會的意義，還開啓了民智。金子肇在〈袁世凱政權與民初的中央地方關係〉一文裡主要說明袁世凱的地方財政機構改革和知事任用制度的改革這兩項措置的內容，而這些改革都是為了瓦解各省政府的地盤而推行的。文中更以江蘇省為個案來評價知事任用制度的改革成效。水羽信男的〈辛亥革命與新文化運動〉一文主要以《新青年》來討論新文化運動的知識份子如何理解「辛亥革命」和「建國初期的中華民國」的性質及作出評價，從而窺探「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的成立」的歷史意義。

九、地方政治

胡春惠的〈再論地方主義與辛亥革命〉文中強調辛亥革命前地方主義的形成加速清朝的覆亡；而辛亥革命後的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又造成政局不穩。由是本文重點討論清末地方主義興起的過程、其對辛亥革命的作用以至對民初政治的影響。李金強在〈辛亥革命時期福建地方改制之改革，1906-1911〉一文中運用清季福建地方官員的奏摺，說明在 1906 年至 1911 年期間福建在行政制度、立法制度和司法制度三者的改革情形，從而顯示清季福建地方改制的改革是吸取了西方的先進體制，為「現代化」的起步。廖大偉的〈辛亥革命與上海政治地位的大幅提升〉文中指出辛亥革命為上海政治地位大幅提升創造了條件。內文從城市發展史的角度出發，運用歷史學和社會學的觀點，來討論辛亥革命時期上海政治地位大幅提升的原因、具體表現、其對辛亥革命的貢獻及歷史意義。

十、中外關係

Cindy Yik-yi Chu 的“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文中主要說明 1900 年至 1919 年中美關係的發展情況，並討論美國開放門戶政策的成效及美國對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看法。Ricardo K.S. Mak 在“Germany and the 1911 Revolution”文章裡說出中德的官式關係於 1861 年天津條約後開始發展。文中指出在辛亥革命爆發後，德國文化界對中國文化能否成功轉化抱著存疑態度，政界則忙於歐陸問題而無暇對中國政局作出反應，只有商界依然繼續發展中國的業務。許育銘的〈孫中山與二十世紀中日關係的回顧〉一文從近年日本有關孫中山的研究成果入手，以說明孫中山的形象在日本成立及其演變的情況；並討論日本的孫中山觀，孫中山的對日觀及其在中日關係中的歷史意義。

十一、革命活動與民族主義

Henry Y.S. Chan 的“Political Assassination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文中指出戴學稷、嚴昌洪和 Edward Krebs 都是在 1900 年和 1912 年的暗殺活動中的代表者。內文更把中國和蘇俄兩國的革

命性暗殺活動作一個比較，從而說明蘇俄的恐怖主義影響了中國文化傳統的內含、學說的形成、團體組織的情況以至政治和社會的特質，這些皆有助於暗殺活動的發展。Danny S.L. Paaui 的“Cultivating a N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1911 Revolution”一文裡旨在探討革命黨人如何把中國建構成一個近代國家，使國民認識一套新的國民觀念，即國族化觀念，也使中國政治走向民主、統一和有效的體系。Tze-ki Hon 在“Make Revolution by Invoking the Past: A Comparison of the Use of History in *GuocuiXuebao* and *Minbao*”文中主要比較《民報》和《國粹學報》的性質，並討論這兩份期刊對當時學術、政治和社會的影響，藉此顯示它們如何推動革命事業。Wong Man Kong 在“Articulating Revolutionary Ideas at Popular Level in Hong Kong: A Study of the Editorial Comments from the *Zhongguo Ribao*”一文中旨在以《中國日報》為研究對象，考察其對辛亥革命的報導情況，並試圖了解《中國日報》的編輯對革命事業的評價。

十二、金融與經濟

周勇軍在《孫中山與中國經濟現代化》一文中檢視了孫中山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效，指出孫中山為了發展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推動工業化、工業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而採取對外開放的態度，吸引了不少外商投資，使中國經濟發展得以走上現代化的道路。趙雨樂在《黃顯芝的廣東米業與民國革命》一文中以黃顯芝的廣東米業為個案研究，來說明黃氏往往能夠接濟地方財政的危機，甚至致力協調僱傭的衝突問題，藉此探討商人對民國革命事業的貢獻。劉慧宇的《辛亥革命與中國金融近代化》文裡提出辛亥革命後，中國金融業近代化產生的緣由及其具體情況。文中說出新式銀行紛紛成立，保險公司、信託公司、交易所等金融機構相繼出現，而舊式的銀號、錢庄亦漸漸「資本化」，而且新的金融管理制度以至新的金融資產階級逐步形成，此乃是辛亥革命促進了中國金融近代化發展的結果。周子峰在《辛亥革命時期的廈門商務總會(1904-1913)》一文中以廈門商務總會為個案研究，並運用外國駐廈領事報告、報紙及近年廈門出版的史料專集來討論辛亥前夕廈門地區商人組織的發展緣由、過程及其在辛亥革命運動中的作用，並總結廈門商務發展的特色。

十三、港澳臺與海外華僑(二)

周佳榮的〈香港各界對辛亥革命的響應〉文中指出香港政府在辛亥革命時期處於「尷尬」的位置，既無法控制華人響應辛亥革命，又不能以行動表示支持。是故本文旨在探討當時香港市民對辛亥革命響應的態度與實際情況，藉此揭示一些被忽視的問題，進一步顯示香港在近代中國發展史上的貢獻。李志剛在〈孫中山之革命運動與老師區鳳墀長老之關係〉一文裡指出香港通濟會堂區鳳墀長老是香港基督徒中影響和支持孫中山最深的一人。區氏不僅是孫中山的老師，亦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追隨者。本文主要說明孫中山信奉耶穌基督的情形，其與區鳳墀長老的關係以及區氏加入興中會的情況。夏誠華的〈孫中山先生與華僑〉文中指出華僑並非一開始就支持革命事業，惟是經過革命黨在海外的大力宣傳及國內起義所引發的風潮等因素，華僑才漸漸支持革命。本文介紹華僑參與革命組織、參加革命起義、辦報宣傳革命、籌募起義經費等情況，並說明孫中山對華僑的態度。高純淑在〈《臺灣民報》中的孫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臺灣民報》是日據時期唯一代表臺灣的言論報紙，而對孫中山的活動及其學說常有報導。本文以《臺灣民報》的資料，說明孫中山與臺灣的關係，介紹了有關《臺灣民報》對孫氏報導的內容，並對這些內容作出分析，從而窺探出當時臺灣知識份子對孫中山的看法。

十四、香港與辛亥革命

邱捷在〈《香港華字日報》對研究辛亥革命的史料價值〉一文中強調《香港華字日報》是目前唯一一份保存較好而且較為完整的近代香港中文報紙，對於研究華南地區，尤其是廣東地區很有幫助。認為要研究辛亥革命時期的廣東社會、經濟，甚至是內地與香港居民對革命的態度，《香港華字日報》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史料。李谷城的〈香港《中國日報》社址變遷與辛亥革命〉提出孫中山在1900年派陳少白於香港創辦《中國日報》，歷經十三年，先在香港辦十一年，然後在廣州再辦二年才告結束。本文以報社創立經過及四次搬遷的情況，來說明該報對辛亥革命的貢獻。桑兵的〈庚子孫中山上書港督卜力述論〉一文中指出致書港督卜力和提出平治章程是一項秘密行動，學界對此皆有不同的意見。本文旨在釐清孫中山上書

港督卜力一事的動機和經過，有助說明孫氏的宗旨與策略。吳志華在〈「香港總督的美意」與孫中山的革命運動〉文中提出「香港總督的美意」是港粵兩地之間互動的政治產物。內文討論卜力(Sir Henry A. Blake)和司徒拔(Sir Reginald E. Stubbs)兩位港督於任內對孫中山革命事業的態度，藉此說明在港英政府眼中，這所謂「香港總督的美意」只不過是為了協調中國整體利益與香港局部利益的一個合理選擇而已。

十五、軍事與政治

老冠祥在〈薩鎮冰和清政府海軍的動向對辛亥革命之影響〉一文中分析了海軍提督薩鎮冰和其他海軍官兵對辛亥革命的態度以至參與革命活動的表現，從而了解這些海軍對推動革命事業的貢獻。尙明軒在〈宋慶齡政治思想的新起點——重讀〈20世紀最偉大的事件〉〉文中主要以討論宋慶齡的〈20世紀最偉大的事件〉這一篇僅有一千八百多字的短文，來窺視宋慶齡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民主主義思想。謝蔭明的〈革命與建設：孫中山的抉擇〉文中旨在檢視孫中山身為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革命家如何為中國建設一個現代國家的藍圖，討論了孫氏在革命與建設中的兩難抉擇。徐萬民在〈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的俄國觀〉一文中提出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對俄國的認識影響了他晚年的政治取向，為聯俄和防俄兩種政策埋下了伏線。文中說明了孫中山如何認識俄國革命黨人、如何評點沙俄侵華的歷史來激勵國人的革命精神、如何把俄國的威脅促成了由「排滿革命」到「五族共和」的轉變，藉此指出孫中山的俄國觀如何影響了辛亥革命的發展。

十六、孫中山之晚年

歐陽軍喜在〈蘇俄及共產國際對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一文中指出蘇俄和共產國際對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是有限的，但大致可分為三方面：一是孫中山重組國民黨和重新解釋三民主義；二是借鑒俄國革命的經驗來調整革命方略；三是促進廣東實行政治、教育和軍事的改革。得見孫中山只是吸取了蘇俄革命的經驗、組織和方法而已。曾成貴的〈孫中山與鮑羅廷的關係及其對國民革命的影響〉文裡指出孫中山與鮑羅廷相識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從兩人的交往可以進一步了解辛亥革命的成敗之處，

故本文旨在解說孫氏和鮑氏的關係及其對辛亥革命的影響。舒文的〈1927-1930年國民黨主要派別對孫中山建國思想的解釋〉指出1927年至1930年期間，國民黨內部出現派系分裂的局面，其中以蔣介石集團和汪精衛集團為主。文中旨在分析這兩個集團如何對孫中山的建國思想有各自不同的解釋，但綜觀兩者只集中解說孫氏的政治理念而忽視了其他如文化、經濟、外交、國防等思想。徐莉君在〈孫中山的《建國方略》與武漢的現代經濟建設〉文中指出孫中山撰寫的《建國方略》一書中，曾對武漢的現代經濟建設有所規劃和論述。並即以檢視武漢的現代化建設來說明孫中山高瞻遠矚的眼光。

十七、孫中山思想與當代中國(一)

劉桂生的〈歷史「大變局」中的文化思考——孫中山對民族自信心與文化創造力的論述〉文中就孫中山有關「民族自信心」和「文化創造力」的言論來說明孫氏如何博取中西文化的精髓，促使民族文化的創新以至提升中華民族的地位。葉國洪在〈孫中山先生的文化教育思想在廿一世紀的時代意義：自由、平等、進化與道德教育〉文中主以評價孫中山對「有關教育平等問題」、「有關進化理論與科學教育」、「有關自由與規範的問題」和「道德教育與民族教育」這幾個方面的主張，藉此作為現今香港的教育發展的借鑒。樂正的〈孫中山的經濟現代化理想與深圳經濟特區的現代化實踐〉文中首先說明孫中山的經濟現代化思想，然後以現今深圳經濟發展的成果來顯示兩者之間有不少相通之處。如孫氏提出開放引進來縮小中國和西方列強在經濟上的差距是與現時深圳成為對外開放的經濟特區是共通的。黃彥在〈試論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一文裡指出孫中山是社會主義的熱誠追求者。文中詳細說明孫中山怎樣批判資本主義、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實行國家社會主義及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表現，藉此申明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史炳奇的〈繼承孫中山遺願，致力祖國和平統一〉認為踏入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中國最迫切解決的問題是「國家的完全統一」。是故本文對臺灣作出歷史的回顧，並討論了臺灣當局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等問題，從而希望早日實現孫中山的「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的遺志。

十八、孫中山思想與當代中國(二)

王杰在〈辛亥前孫中山文明理念論略〉文中指出孫中山的文明理念是近世中西文明融匯的先河。內文集中說明辛亥革命前期孫氏的文明理念的內容，闡述文明理念的特殊性、實踐性和世界性。亦進一步指出思想上批判專制與實踐上批判改良的關係，並強調西方文明兼具先進性和野蠻性。蔡樂蘇的〈彈性的符號——抗戰時期中共言說中的孫中山與三民主義〉一文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入手，通過「時空定位和言說與境況的互動」，加上運用中共的檔案資料及評鑑前人的研究成果上，來對抗日時期中言說孫中山與三民主義的關係加以說明。並進一步指出 1940 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發表後，共產黨在理論上得到主導的地位，而國民黨在理論上則失去領導權。莫世祥在〈歐美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的回響——以三民主義的後期發展為例〉文中認為歐美主義影響了三民主義的後期發展，而後期的三民主義成爲國共合作的「旗幟」，也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底線」。故本文分析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在華的影響，以至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後期發展。彭南生的〈孫中山的經濟現代化構思與中西部發展戰略〉一文以孫中山的「實業計劃」爲宗，強調孫氏發展中西部的重要性，提出孫氏發展中西部的策略構思，從而說明孫中山的「實業計劃」中發展中西部是整項計劃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並藉此爲當前中西部經濟發展作出啓示。田子渝在〈「爲統一中國而鬥爭」——孫中山三次北伐述論〉一文中主要說明孫中山 1917 年 7 月的第一次北伐，1920 年 11 月的第二次北伐和 1923 年 3 月的第三次北伐的軍事行動的情況，並指出這三次北伐所顯現的革命精神及其歷史侷限。

結語

這次會議以「辛亥革命、孫中山與廿一世紀中國」爲主題，吸引了來自不同地區的專家學者，不僅從研究述評、政治史、經濟史、軍事史、外交史、教育史、思想史的角度來進行討論，還特別從「港澳臺與海外華僑」、「香港與辛亥革命」、「孫中山之晚年」及「孫中山思想與當代中國」的研究領域來重新檢視孫中山的成就與貢獻。不僅給予孫中山肯定的評價，彰顯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並重申孫中山的學說和辛亥革命的

意義皆有現實的時代性。值得一提的是大會安排一個名為「孫中山與近代中國」的圖片展覽，並於會議結束後，帶領各與會者於 11 月 14 日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和香港海防博物館，讓學者對香港歷史的發展有所認識。

「辛亥革命、孫中山與廿一世紀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一）

~ 2:00-3:20 ~

❖ 第 1 節（A） 邵逸夫大樓九樓會議室（RRS 905） [研究述評（一）]

主席：胡春惠（珠海書院）

陳福霖 香港大學

Sun Yat-sen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A 21st Century Perspective

楊振亞 南京大學

孫中山先生的歷史評價

喬選田 北京人民出版社

辛亥革命的現代意義

杜繼東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中國大陸地區孫中山與日本關係

研究綜述

❖ 第 1 節（B） 邵逸夫大樓九樓會議室（RRS 901, Rm. B） [研究述評（二）]

主席：桑兵（中山大學）

嚴昌洪 華中師範大學

20 世紀 90 年代中國大陸辛亥革命

研究綜述

朱育和 清華大學

關於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幾個問題

林慶元 福建師範大學

辛亥革命數論

曾濟群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

從政治發展看中山先生建國三階

段說

~ 3:30-4:50 ~

❖ 第 2 節（A） 邵逸夫大樓九樓會議室（RRS 905） [教育與學術]

主席：曾濟群（法鼓人文社會學院）

羅天佑、方駿 香港教育學院

孫中山的公民教育思想

黎志剛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辛亥革命前後的辦髮風潮

黃焯鈞 中山大學

孫中山知難行易學說與杜威實用

主義哲學之關係

區志堅 香港理工大學

「通溫故知新之妙用，謹邪說暴

行之大防」——晚清辦學要旨與

「審定」中國通史教科書內容
的考察

❖ 第2節(B) 邵逸夫大樓九樓會議室(RRS 901, Rm. B) [宗教、文化與教育]

主持：邱捷(中山大學)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學

李喜所 南開大學

彭淑敏 香港城市大學

馬 軍 上海社會科學院

基督教與中國革命之再思

辛亥革命時期學術文化的變遷

清末民初中國婦女的醫療教育：廣
東夏葛女子醫學院(1899-1916)

辛亥時期中國文化事業的一大遺憾
——某理循圖書館遺日述略

~ 5:00-6:50 ~

❖ 第3節(A) 邵逸夫大樓九樓會議室(RRS 905) [政治與社會(一)]

Chairperson: Gilbert Cha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Korehito Hata Chikushi Jogakuen University

Market Towns Surrounding Ningbo and Likin
Tax of the Late Qing Period – On the
Ningbo Anti-Likin Tax Movements of
1878

Ryan Dunch University of Alberta

Protestant Revolutionaries in Fujian,
1901-1911

David Pong University of Delaware

Industrial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1911 Revolution

Yip Ka-c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

Missions, Education, and Medicine:
Reflections on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Greg de Cure & Adelaide University
Felix Patrikeeff

Sun Yat-sen and a United States of
China?

❖ 第3節(B) 邵逸夫大樓九樓會議室(RRS 901, Rm. B) [政治思想]

主席：莫世祥(深圳大學)

李西潭 國立政治大學

許雅棠 東吳大學

王憲明 清華大學

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的民主思想

高調與低調——孫中山民主思想的
一種回顧

知識、習俗、政治——民國成立後

孫中山與嚴復對建國問題的反
思與探索

張 勇 清華大學
林啟彥 香港浸會大學

再議「革命軍起、革命黨消」
辛亥革命時期的章士釗——由激進
到穩健的政論家

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二）

~ 9:00-10:20 ~

◆ 第 4 節 (A) 邵逸夫大樓九樓會議室 (RRS 905) [港澳臺與海外華僑(一)]

主席：顏清煌 (阿德雷德大學)

范啟龍 福建師範大學
湯熙勇 中央研究院

辛亥革命與福建華僑
革命派與保皇會的競爭對夏威夷華
僑的影響

郭偉川 泰國崇聖大學

星洲潮僑對孫中山領導國民革命的
貢獻

馬楚堅 香港大學

辛亥革命文字功臣之宣傳家：黃世
仲行實考

◆ 第 4 節 (B) 邵逸夫大樓九樓會議室 (RRS 901, Rm. B) [政治與社會 (二)]

主席：趙兩樂 (香港公開大學)

翻譯：林學忠 (香港城市大學)

曾田三郎 廣島大學
楠瀬正明 廣島大學
金子肇 下關市立大學
水羽信男 廣島大學

清末的預備立憲和日本人
論國會速開請願運動
袁世凱政權與民初的中央地方關係
辛亥革命與新文化運動

~ 10:30-11:30 ~

◆ 第 5 節 (A) 邵逸夫大樓九樓會議室 (RRS 905) [地方政治]

主席：黃媽梨 (香港浸會大學)

胡春惠 珠海書院
李金強 香港浸會大學

再論地方主義與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時期福建地方政制之改
革, 1906-1911

廖大偉 上海社會科學院

辛亥革命與上海政治地位的大幅提
升

◆ 第 5 節 (B) 邵逸夫大樓九樓會議室 (RRS 901, Rm. B) [中外關係]

主席：劉義章 (香港中文大學)

- | | | |
|--|---|--|
| Cindy Yik-yi Chu |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
| Ricardo K.S. Mak |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 Germany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
| 許育銘 | 國立東華大學 | 孫中山與二十世紀中日關係的回顧 |
| ~ 11:40-1:00 ~ | | |
| ❖ 第 6 節 (A) 邵逸夫大樓九樓會議室 (RRS 905) | | [革命活動與民族主義] |
| Chairperson: Yip Ka-c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 |
| Henry Y.S. Chan | 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 Moorhead | Political Assassination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 Danny S. L. Paau |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 Cultivating a N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1911 Revolution |
| Tze-ki Hon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Geneseo | Make Revolution by Invoking the Past: A Comparison of the Use of History in <i>Guocui Xuebao</i> and <i>Minbao</i> |
| Wong Man Kong |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 Articulating Revolutionary Ideas at Popular Level in Hong Kong: A Study of the Editorial Comments from the <i>Zhongguo Ribao</i> |
| ❖ 第 6 節 (B) 邵逸夫大樓九樓會議室 (RRS 901, Rm. B) | | [金融與經濟] |
| 主席：李培德 (香港大學) | | |
| 周勇軍 | 福建師範大學 | 孫中山與中國經濟現代化 |
| 趙兩樂 | 香港公開大學 | 黃顯芝的廣東米業與民國革命 |
| 劉慧宇 | 福建師範大學 | 辛亥革命與中國金融近代化 |
| 周子峰 | 香港浸會大學 | 辛亥革命時期的廈門商務總會 (1904-1913) |

~ 2:00-3:20 ~

◇ 第 7 節 (A) 邵逸夫大樓九樓會議室 (RRS 905) [港澳臺與海外華僑(二)]

主席：葉漢明 (香港中文大學)

- | | | |
|-----|----------|---------------------|
| 周佳榮 | 香港浸會大學 | 香港各界對辛亥革命的響應 |
| 李志剛 | 香港聖經公會 | 孫中山之革命運動與老師區鳳墀長老之關係 |
| 夏誠華 |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 | 孫中山先生與華僑 |
| 高純淑 | 輔仁大學 | 《臺灣民報》中的孫中山先生 |

◇ 第 7 節 (B) 邵逸夫大樓九樓會議室 (RRS 901, Rm. B) [香港與辛亥革命]

主席：蘇維初 (香港公開大學)

- | | | |
|-----|---------|----------------------|
| 邱捷 | 中山大學 | 《香港華字日報》對研究辛亥革命的史料價值 |
| 李谷城 | 珠海書院 | 香港《中國日報》社址變遷與辛亥革命 |
| 桑兵 | 中山大學 | 庚子孫中山上書港督卜力述論 |
| 吳志華 | 香港歷史博物館 | 「香港總督的美意」與孫中山的革命運動 |

~ 3:30-4:50 ~

◇ 第 8 節 (A) 邵逸夫大樓九樓會議室 (RRS 905) [軍事與政治]

主席：嚴昌洪 (華中師範大學)

- | | | |
|-----|----------|-----------------------------|
| 老冠祥 | 珠海書院 | 薩鎮冰和清政府海軍的動向對辛亥革命之影響 |
| 尚明軒 | 中國社會科學院 | 宋慶齡政治思想的新起點——重讀〈20世紀最偉大的事件〉 |
| 謝蔭明 | 北京市黨史研究室 | 革命與建設：孫中山的抉擇 |
| 徐萬民 | 北京大學 | 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的俄國觀 |

◇ 第 8 節 (B) 邵逸夫大樓九樓會議室 (RRS 901, Rm. B) [孫中山之晚年]

主席：朱育和 (清華大學)

- | | | |
|------|-------------|-------------------------------|
| 歐陽軍喜 | 清華大學 | 蘇俄及共產國際對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 |
| 曾成貴 |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 | 孫中山與鮑羅廷的關係及其對國民革命的影響 |
| 舒文 | 清華大學 | 1927-1930 年國民黨主要派別對孫中山建國思想的解釋 |
| 徐莉君 | 武漢國民政府舊址紀念館 | 孫中山的《建國方略》與武漢的現代經濟建設 |

~ 5:00-6:40 ~

◇ 第9節(A) 邵逸夫大樓九樓會議室(RRS 905) [孫中山思想與當代中國(一)]

主席：章開沅(華中師範大學)

- | | | |
|-----|---------------------|--------------------------------------|
| 劉桂生 | 清華大學 | 歷史「大變局」中的文化思考——孫中山對民族自信心與文化創造力的論述 |
| 葉國洪 | 香港浸會大學 | 孫中山先生的文化教育思想在廿一世紀的時代意義：自由、平等、進化與道德教育 |
| 樂正 | 深圳市社會科學院 | 孫中山的經濟現代化理想與深圳經濟特區的現代化實踐 |
| 黃彥 |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 試論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 |
| 史炳奇 |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福建省委會 | 繼承孫中山遺願，致力祖國和平統一 |

◇ 第9節(B) 邵逸夫大樓九樓會議室(RRS 901, Rm. B) [孫中山思想與當代中國(二)]

主席：蔣永敬(國立政治大學)

- | | | |
|-----|----------|------------------------------|
| 王杰 |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 辛亥前孫中山文明理念論略 |
| 蔡樂蘇 | 清華大學 | 彈性的符號——抗戰時期中共言說中的孫中山和三民主義 |
| 莫世祥 | 深圳大學 | 歐美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的回響——以三民主義的後期發展為例 |
| 彭南生 | 華中師範大學 | 孫中山的經濟現代化構思與中西部發展戰略 |
| 田子渝 | 湖北大學 | 「為統一中國而鬥爭」——孫中山三次北伐述論 |

「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 會議紀要^{*}

李盈慧^{**}

2001年（民國九十年）適逢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在亞洲各地都有紀念辛亥革命的學術活動，如中國大陸的武漢、南京、北京、廣州，臺灣的臺北，而日本的神戶也於12月13日至16日召開了「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成爲這一系列紀念活動的壓軸戲。

在神戶召開的這次學術會議，由12月13日晚間張憲文教授的紀念演講〈對辛亥革命的幾點思考〉拉開序幕，從14日至16日爲期三天，共有2篇主題演講、17篇論文、1篇開幕致詞、1篇閉幕致詞。以三天的時間討論17篇論文，似乎是不夠緊湊，不過由於有中日對譯的翻譯時間，加上每一篇文章都進行充分的討論，日本、美國、大陸、臺灣的學者從不同觀點出發，交互攻錯，因此會議的進行其實是高潮迭起的。下文簡述此次會議的精彩片段。

一、推陳出新、左右和解

本次會議最主要的特色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推陳出新、左右和解」。所謂推陳出新，是指討論的主題而言，所謂左右和解，是指參與的學者而言。

關於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早已成果豐碩，必須另闢蹊徑，才能更加突顯其歷史內涵。本次會議的各篇論文頗能呈現這種推陳出新的風貌，一方面是研究視野的不斷拓寬拓展，另一方面是研究主題的不斷加深加細。17篇論文當中，在政治軍事議題上，研究格局是視野的擴大，不再詳細描寫

* 本文的完成特別要感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自進教授、日本孫中山紀念會蔣海波研究員、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濱島敦俊教授。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革命的過程和進展，而是討論辛亥革命的實質、革命在時間脈絡中的歷史意義、其成敗所牽涉到的民主或集權的潮流；而在社會經濟文化思想議題上，研究格局則是主題的加深，過去對清末革命時期的社會經濟文化思想議題的討論較少，這次會議的若干論文在這些方面有所發揮。

會議的開幕致詞和閉幕致詞呈現了日本學界的另一種氣氛。致開幕詞者為傳統學派大師衛藤瀋吉教授，而致閉幕詞者為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經典大家野澤豐教授，這兩位立場迥然不同的學者竟會在同一會議中出現，是空前的盛舉。這種左右和解的現象似乎預告我們，二十一世紀的日本學界將以另一種風格再出發。

本次會議的 17 篇論文大抵包括幾個面相：（一）著重社會經濟文化思想研究，（二）政治軍事方面著重歷史解釋，（三）強調中日文化交流和相互影響，（四）突出中國境外的研究。

在社會經濟文化思想方面，Douglas R. Reynolds 的主題演講、樽本照雄、謝俊美、虞和平、嵯峨隆、吉澤誠一郎等學者的文章都可歸於此類。（請參照後附議程）Douglas R. Reynolds 教授的主題演講，說明作為基督徒的孫文，隨著其革命活動的展開，其基督徒的色彩漸淡，但是終其一生仍是基督徒，臨終前特別要求舉行教徒喪禮。謝俊美教授從信息傳遞來討論革命黨人利用電報展開反清革命，的確是一個新的討論角度。他還表示，在八國聯軍時，清廷經由電報電話獲得準確消息，才能作出相應對策而逃過劫難，遂得苟延殘喘了十年。虞和平教授介紹清末民初中國商業界從國外引入的商事仲裁制度。他自己還提出一個尚未解答的問題：為何引入這項制度的是四川商人而不是上海商人？吉澤誠一郎教授的報告是現今最為流行的影像史，從肖像、地圖、體育活動來理解清末社會的愛國主義和個人自我意識。

在政治軍事方面，包括張海鵬的主題演講、Edward A. McCord、橫山宏章、嵯峨隆、郭世佑等學者的文章。張海鵬教授的主題演講，回顧數十年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概況，尤其武漢每十年舉行一次的學術會議，其議題的加深和擴展。最有趣的討論是由 Edward A. McCord 教授所引爆的，他重新為袁世凱的政府作一解釋，主張袁世凱是為了建立國家的權威、統一而必須集權，不能因袁世凱後來的帝制和他死後有軍閥，而認為袁是軍閥。這意見當然引來熱烈的辯論。無獨有偶地，橫山宏章教授也把孫中山、袁世凱和梁啟超思想並列，認為他們三人都主張過渡時期應該集權。基本

上，與會學者還是對袁世凱持較負面的看法，不過仍肯定 Edward A. McCord 和橫山宏章從國家建構理論和思想層面重新研究袁世凱。

強調中日文化交流和相互影響的，則有衛藤瀋吉的開幕致詞、野澤豐的閉幕致詞、曾田三郎、黃自進、波多野勝、狹間直樹等教授的文章。這些學者主要的關注焦點都是日本對清末改革的看法、日本對中國革命的態度、日本人的亞細亞主義如何運用到支持中國革命，以及亞細亞主義的變調。其中黃自進教授和狹間直樹教授的文章頗能相互呼應，他們的觀點是：某些日本志士早年極力贊助和支持中國的革命，其亞細亞主義是對中國友好的，但是中國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奪取後，繼以民初中國的亂象，以及中日間的種種不友好關係，使得原本支持中國革命的一部分日本志士感到希望的幻滅，轉為主張日本應對中國進行侵略，此時日本的亞細亞主義顯然已經變調，不過仍有一些日本人對中國始終維持友好關心的態度。

突出中國境外的研究，包括本野英一、李盈慧、陳來幸、帆刈浩之、蔣海波等學者的報告。這一主題涉及東南亞、日本和香港華僑。陳來幸教授的文章以中華總商會與日本的關係為焦點，透過中國駐日領事館對大阪、神戶兩地華僑的觀察，來比較大阪和神戶華僑在民國初年的政治經濟活動，以及兩地華僑與日本、中國的商務關係，是具有開創性的研究課題。帆刈浩之教授討論香港東華醫院引進西方醫學，卻迴避政治活動，究竟其在科學發展與中國的民族主義之間何去何從呢？蔣海波教授則利用「王敬祥文書」來描寫中華革命黨時期神戶華僑的政治動態及其財務狀況。我個人的文章討論華僑在清末革命中的作用、中國革命對東南亞各國的影響，以及華僑在東南亞各國獨立運動中的角色。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無論是衛藤瀋吉的開幕致詞、野澤豐的閉幕致詞或與會日本學者的發言，都表現出對中日友好文化交流的期許。衛藤教授的演講認為近代中日關係史上，每每友善交流和親華意見都不是主流，而是支流，故而有日本的侵華行動，他期望日本不要再重蹈覆轍。野澤豐教授則感性地期望自己能終老於中日的友好交流之際。兩位教授都垂垂老矣，他們所領軍的日本中國通或日本中國史學界，是比較友好和友善的，這種精神能否持續，是吾人應密切注意的。

本次會議的翻譯群也都是專家學者，臨時插花演出的黃自進教授的即席口譯，有別於其他的翻譯。一般口譯都是逐句照翻，但是黃教授是自行消化後再解說大意，省略一些細節的敘述，卻更能使聽者理出脈絡。

會議期間的討論相當熱烈，尤其關於袁世凱的歷史定位更是發言踴躍。本野英一、狹間直樹、中村哲夫、張海鵬是較常發言的幾位。其中狹間直樹教授被稱為最佳守門員和防衛者，據說他是不敗的，因為他讀書極廣，任何問題和責難都會被他引經據典反駁回去。

二、孫中山與移情閣^{***}

會議中的一項重要節目是參觀近在咫尺的孫中山紀念館——移情閣。此次開會的地點是昔日的日本有棲川宮親王別墅改建的旅館，步行約五分鐘即可抵達移情閣。孫中山先生前後十多次東遊日本，往往由日本朋友和旅日華僑接待，1913年初孫先生訪問日本，神戶華僑和日本友人即在移情閣的現址舉行歡迎午餐會。移情閣的前身是日本僑商吳錦堂（即吳作鏞）的別墅「松海山莊」，吳錦堂是清末民初旅日的重要僑領，也是著名實業家。

松海山莊於十九世紀末開始修建，逐步擴增，1915年春在松海山莊的東側修建一座八角三層的樓閣「移情閣」。在吳錦堂學家遷回中國後，其別墅改為神戶中華青年會會所，其後幾經變遷，由神戶華僑總會代為管理。1980年代在神戶華僑與相關人士的奔走努力下，由日本兵庫縣政府進行修復，成為孫中山紀念館，並於1984年11月12日開放。1994年為了配合明石海峽大橋的建設，暫時拆遷，1998年開始復原工事，在原址的西南處重建，2000年竣工。

移情閣是日本唯一紀念孫中山的博物館，目前，該館的展覽以孫中山、神戶和清末民初的中國為主，詳細地介紹孫中山、吳錦堂的生平和事蹟、宋慶齡、與孫中山同時代的人物、神戶華僑、移情閣的重建等。這座博物館的作用不只是展覽而已，該館由財團法人孫中山紀念會管理，而孫中山紀念會與日本孫文研究會、神戶華僑華人研究會時相往還，致力於有關孫中山的研究、中日交流、神戶華僑研究等。此次會議的召開，就是孫中山紀念會促成的，能夠史無前例地把日本左右兩派學者齊聚一堂，就已顯出該會的用心。目前孫中山紀念館的館長是狹間直樹教授，副館長是民

^{***} 本節有關移情閣的說明，參考財團法人孫中山紀念會編，《孫中山紀念館（移情閣）概要》（神戶：編者自印，2001年6月30日）。

初著名旅日僑領王敬祥的孫子王柏林先生。這兩位先生對於促進日本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和日本華僑研究非常熱心，因此該館的未來將不只是一座博物館，假以時日，必可發展成爲一個學術重鎮。

議程：

12月13日（週四）序幕（開會前夕）

紀念演講 張憲文：〈辛亥革命に関するいくつかの思考〉（對辛亥革命的幾點思考）

第一天 12月14日（週五）

主辦單位致歡迎詞 大庭浩

第一場 主題演講（衛藤瀋吉主持、陳來幸翻譯）

開幕致詞 衛藤瀋吉

主題演講一 張海鵬：〈辛亥革命紀念的政治與學術意義〉

主題演講二 Douglas R. Reynolds：〈辛亥革命前後の孫文とキリスト教〉（辛亥革命前後的孫文與基督教）

第二場 辛亥革命與初期情報媒體（中村哲夫主持、張憲文評論、陳天璽翻譯）

報告一 榎本照雄：〈辛亥革命前後における商務印書館と金港堂の合併〉（辛亥革命前後期的商務印書館與金港堂的合併）

報告二 謝俊美：〈信息傳遞與辛亥革命：兼論盛宣懷與中國電報局〉
討論

報告三 虞和平：〈清末民初的商事仲裁制度建設〉

報告四 本野英一：〈香港會社法令を利用する中國人とギリス政府—「ゴム株式恐慌」前後を中心に〉（游走香港公司法邊緣的中國人與英國政府：以橡膠產業衰退期爲例的探討）
討論

第二天 12月15日（週六）

第三場 辛亥革命的民主與集權（山田辰雄主持、野村浩一評論、高嶋航翻譯）

報告一 Edward A. McCord: "A Reappraisal of Warlordism: Military Force and the Problem of State-Building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對軍閥的再省思：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軍事武力與國家建構問題）

報告二 嵯峨隆：〈辛亥革命と國家否定の論理：近代中國におけるアナキズムの可能性と界限〉（辛亥革命與國家否定論：近代中國無政府主義的展望與局限）

報告三 横山宏章：〈辛亥革命「挫折」の原因—「民主」それとも「集權」〉（辛亥革命挫敗の原因：民主或是集權）

討論

第四場 辛亥革命與華僑（安井三吉主持、菊池一隆評論、過放翻譯）

報告一 李盈慧：〈清末革命、東南亞各國獨立運動與華僑〉

報告二 陳來幸：〈中華民國成立後中華總商會秩序の再編と日本：阪神華商に關する領事報告を中心として〉（中華民國成立後中華總商會與日本關係的再建構：駐日領事對阪神華商的觀察報告）

討論

報告三 帆刈浩之：〈「裡」の華僑近代史：香港東華醫院の「近代性」への對應〉（華僑近代史的另一頁：香港東華醫院近代化的腳步）

報告四 蔣海波：〈神戸華僑と中華革命黨—「王敬祥關係文書」を中心に〉（神戸華僑與中華革命黨：以「王敬祥文書」爲例的探討）

討論

第三天 12月16日（週日）

第五場 清末民初的社會（久保田文次主持、田中比呂志評論、川尻文彦翻譯）

報告一 郭世佑：〈辛亥革命的歷史結局及其實質〉

報告二 曾田三郎：〈清末の立憲準備と日本での官制改革論〉（清末的預備立憲與日本對清廷官僚制度改革的論述）

報告三 吉澤誠一郎：〈清末社會意識の變遷と愛國主義〉（清末社會意識的變遷與愛國主義）

討論

第六場 辛亥革命時期日本對華的認識（狹間直樹主持、江田憲治評論、翻譯）

報告一 黃自進：〈辛亥革命に對する日本人の反應：理想像とその消滅〉（日本人對辛亥革命的反應：理想的實踐與幻滅）

報告二 波多野勝：〈辛亥革命と第二次西園寺内閣〉（辛亥革命與第二次西園寺内閣）

報告三 狹間直樹：〈辛亥革命期における日本の對華認識—アジア主義との関連において〉（辛亥革命時期日本對華的認識：以亞洲主義爲例的探討）

討論

閉幕式（司儀：王柏林）

閉幕致詞 野澤豐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47)

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

萬麗鵬編註 潘光哲校閱

287頁 平裝 300元

胡適、雷震與《自由中國》半月刊，可說是影響民國四十年代臺灣自由民主運動發展的三個重要關鍵因素。設若沒有胡適這塊招牌，《自由中國》的起步勢將更爲艱辛；同樣的，若無雷震不計個人毀譽的全力投入，《自由中國》也難撐起中華民國在臺灣仍有相當程度言論自由的局面。是以，忠實反映這三個相互關連因素的書信，就更顯得重要而可貴了。而《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的出版，除了爲胡適、雷震與《自由中國》研究提供線索外，對 1950 年代的臺灣政經社會情形，亦提供了重要的佐證資料。當然，也是吾人觀察當代政治，與不同類型知識分子特質的最佳材料。這批書信主要收錄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與檔案館的書信史料，有胡適給雷震等人的信 35 件，雷震等人給胡適的信 112 件，與附錄資料 4 件，總計 151 件。



學術演講

我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些回憶

張玉法*

最近幾年，呂芳上所長主持過好幾場「退休講演會」。呂所長把「退休」叫做「畢業」，我覺得很好，因為「退休」代表沒有希望，「畢業」代表希望無窮。我在中央研究院研讀了三十七年半，今天終於「畢業」，感謝各位來參加我的畢業典禮。

今天是近史所四十七歲暖壽的日子，我是在近史所成立後的第十年來近史所的。近史所成立的時候，即 1955 年 2 月，那時我還在讀高三，並不知道有個近史所。讀師大史地系期間，因為教中國近代史的郭廷以先生是近史所的所長，才知道有個近史所，那時雖有志研究學問，主要的興趣是研究唐代的歷史，對近史所也沒有什麼好奇。1959 年夏天師大史地系畢業後，要教學實習一年，因一時找不到教書的工作，請系主任沙學浚先生介紹我來近史所，那時近史所的主要工作是整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沙先生不贊同我來，說「整理檔案，沒有出息」，介紹我去基隆中學教書。教中學也非我所願，那時曾經報考臺大歷史研究所，沒有考上。記得有個考題叫「說亳」，我只知道亳曾是商朝的都城，李宗侗先生在臺大歷史系上課時，發過一份油印的講義，題目就叫「說亳」。我沒讀過。

在基隆中學教書期間，覺得一個課本要在九個班級重來重去地講，有如留聲機，決心再考研究所。當時臺灣只有一個臺大歷史研究所，未再去考。因為在讀中學時，長年參與校刊編輯，讀大學時在班裡負責學術文化活動，請名人講演、辦壁報，對新聞有些興趣，但到考取政大新聞研究所以後，發覺課程安排以編輯、採訪、新聞寫作等實用技術為主，覺得沒有什麼興趣，決定在新聞史的範圍內撰寫碩士論文。初時想研究現代新聞史，那是 1962 年，有些老師說現代史不要研究，動輒得咎，有危險。最

* 中央研究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本文是張院士於榮退演講會上所發表的演講。

後我找到一個古代新聞史的題目，對「先秦時代的傳播活動」作了初步的研究。

政大新聞研究所畢業後，想留在學校繼續研究新聞史，沒有機會，想去師大史地系教書也沒有機會，使我又想到來近史所。但如何拿「先秦時代的傳播活動」的論文來敲近史所的大門，使我有些躊躇，最後還是把論文寄給郭廷以先生。我雖跟郭先生上過課，郭先生並不認識我，論文寄出一個禮拜，郭先生就約我來近史所做臨時人員，那是在1964年7月初，說也湊巧，陶英惠先生同時也被約來做臨時人員，我們同時報到上班。當時，近史所只有一棟二層大樓，式樣與呂實強先生所在的那棟大樓同，地點在現在的研究大樓。記得那時近史所只有二十多人，包括正式人員、臨時人員、工友在內，同仁相處大體和樂，每人都對郭先生非常敬畏。

我做臨時人員兩年零四個月，主要的工作有四：(1)標點四國新檔，標好後提供給黃福慶先生編輯，黃先生上面有李毓澍先生，李先生上面有郭廷以先生。(2)在口述歷史訪問中做記錄，帶訪的有沈雲龍先生、李毓澍先生。我整理口述史記錄，不如陳存恭先生整理出的字數多，郭先生不高興。(3)管理剪報室，由我挑選富有歷史意義的新聞材料，由黃傳鑫先生剪貼後，再由我分類編輯，裝訂成冊。這個工作後來李孝悌先生、藍旭男先生都做過。(4)開始研究「民國初年的政黨」，先做溯源工作，從「清季的立憲團體」研究起。我進近史所開始研究二十世紀中國史，是出於郭廷以先生的交待。郭先生說：老同事大都做十九世紀中國史，新來的要做二十世紀中國史；當時新來的有亓冰峰、陶英惠和我。《清季的立憲團體》、《清季的革命團體》、《民國初年的政黨》這三本書是我在近史所的第一部分研究成果。這三本書的主要材料，在國內那時只有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有，在國外則零星地藏於美、日等國的圖書館。我能充分利用這些材料有兩個機運，一是在1966年春，那時我已做助理研究員，美國各重要大學與近史所合作，調查臺灣地區所藏的「中國現代史料」，我被派去南投縣草屯鎮半年，每天到黨史會史料庫抄錄資料目錄，並調借部分檔案，對目錄中的有關題目加以說明，一同工作的有嚴錦先生、藍旭男先生。在黨史會史料庫做研究工作的有蔣永敬先生、李雲漢先生，當時與他們還不熟，只看到他們很用功。管檔案的是張大軍先生，後來以研究新疆史著名。第二個看材料的機運是當時近史所受福特基金會資助，我在1968年10月被派去哥倫比亞大學進修，為時一年零九個月，期間曾到美國各重要圖書館搜集

資料。

我在完成《清季的立憲團體》、《清季的革命團體》二書後，即開始做「民國初年的政黨」的研究。1973年，李國祁先生和張朋園先生組織跨所際的「中國近代化區域研究計劃」，研究1860至1916年間中國沿海沿江各省區的現代化發展，山東省區的研究找我參加。雖然我是山東人，對山東的史事所知甚少，也沒有任何省籍情結，但參加之後，就對山東的歷史文物有了興趣。1975年請求我高中時代的校長、時任國大代表的楊展雲先生倡辦《山東文獻》，楊校長又找到屈萬里先生、孔德成先生等共同發起，辦了《山東文獻》季刊，實際的編輯工作則由陶英惠先生、張存武先生和我輪流負責，現已進入第二十七年。《山東文獻》辦理期間，于宗先先生發起編印《山東人在臺灣叢書》，希望告訴山東來臺的第二代，第一代做了些什麼。該叢書共出版十五種，其中教育、黨政、學術三種由我主稿。另外，《山東文獻》創刊時，提出了重修山東通志的目標。當時的想法是：清朝的《山東通志》已修得很完整，國民黨丟失大陸後，國史還有政府專設的機構關懷，地方志則政府全然不關心，我找過國史館、內政部、國科會中的朋友，都無結果，只好由民間的力量來推動。1980年代以後，山東省的文史機構修《山東省志》，題目繁多，巨細靡遺，現在已出版好幾十大本，尚未完成，但史事偏重於1949年以後，民國時期的山東史事大部缺如，修《民國山東通志》刻不容緩。在六、七年前，由于宗先先生向商界找到一些錢，由我和南京大學的張憲文先生，分別連絡到臺海兩岸的學者二十多人，共同完成了《民國山東通志》的撰稿工作，全書約三百五十萬字，正在排印中，本所同仁參加撰稿的有張存武先生、陶英惠先生、陳慈玉小姐、沈懷玉小姐、隋皓昀先生，另外還有呂實強先生、王樹槐先生、李恩涵先生、熊秉真小姐、魏秀梅小姐等幫助審稿，在此特別向他們致謝。現在陶英惠先生正協助本書的出版。陶英惠先生是五十多年的老朋友，常常因為幫助我，耽誤了自己的正事，在退休之日，特別對他表示感謝。

現在再回頭談「中國近代化的區域研究」，那個計劃在李國祁先生主持下，十位同仁參加，做了三年，初稿完成。接著再提新計劃，做1916至1937年，各人所負責的地區同前。當時李國祁先生在師大歷史研究所開中國近代史研究，我開中國現代史研究。李國祁先生說1916至1937年是現代史的範圍，向大家提議，推我做主持人，大家沒有反對。我說近代

化應該正名為現代化，也沒有人反對，於是我們就做「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計劃」，預計第一年做政治，第二年做經濟，第三年做社會。計劃做了一年，完成了「政治現代化」，海外院士有了審查意見，謂前此的計劃以省區為單位，做得太細，國外學者不易了解，建議選題應以全國為範圍。國科會把「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計劃」中途停掉，給了我們半年時間，要我們把第一個三年計劃的區域研究成果綜合成全國性的題目。因為我們所做的只有沿江沿海十三個省市，而各省市的歷史發展又不盡相同，綜合起來非常困難，乃向國科會重新申請為期兩年的「中國現代化的專題研究計劃」，研究的時限仍是 1860 至 1916 年，參加的仍然是十位同仁，每人一個題目。記得在專題研究計劃中，張朋園先生研究政治參與，我研究工業化。我參加集體研究計劃六年半的時間，完成了兩本專書：一本是《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1860-1916)：山東省》，一本是《近代中國工業發展史》。另外還留下《山東省政治現代化的研究(1916-1937)》初稿，有二十多萬字，只有一份手抄稿，現正在找助理輸入電腦，還不到出版的程度。做了六年半的集體研究計劃，深感彼此協調困難，最大的收穫是把近代史的研究範圍擴及政治、經濟、社會、傳統中國和外力影響各方面。

就我個人來說，做了六年半的集體研究計劃非常累，老花眼就是在那個時候形成的。集體計劃結束之後，再也不敢向國科會申請計劃，繼續自己做「民國初年的政黨」的研究。但外務來了，首先，在 1980 年前後，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主委秦孝儀先生約請學者撰寫中華民國政治發展史、經濟發展史、社會發展史、文化發展史。我個人參與「經濟發展史」的撰稿工作，在「民國初年的經濟」一章寫了「工業發展」、「礦業開發」、「農業與糧食問題」、「國際收支與對外貿易」等節，總計有十多萬字。《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史》在 1983 年出版。此期間，又有新外務。報紙報導，北京的近代史研究所在李欣的主持下，要修「中華民國史」，當時臺海兩岸史學界對立，臺灣的史學界非常警覺：要修中華民國史也要由中華民國的學者來修。經輿論呼籲，政府很快撥錢，由教育部出面，實際上由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國史館和近史所來主持中華民國建國史的修纂工作。近史所由呂實強所長主持，負責民初時期，即 1912 至 1928 年的北京政府時期，我當時任副所長，協助約稿、找人審稿。本所同仁參加撰稿的十餘人。《中華民國建國史》共分五篇，我在第一篇「革命開國時期」寫了第一章「革命與宣傳」；在第二篇「民初時期」寫了第二章中的「內閣的遞嬗」、「國

會與選舉」、「政黨的分合」三節，在第六章中寫了「教育發展」、「近代思潮」二節，總計有四、五十萬字。《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二篇「民初時期」，1987年出版。嚴格說來，中華民國發展史也好，中華民國建國史也好，是編書寫史的性質，與專題研究不同。雖然如此，那幾年在呂實強所長領導下，與黨史會和國史館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使近史所受到黨史會和國史館許多幫助，當然近史所也對黨史會和國史館作了不少學術服務。這期間有兩個插曲：一個是呂實強所長說服了黨史會主委秦孝儀先生，請他讓呂芳上先生轉到近史所來，後來呂芳上先生成了本所的重要財富；一個是我說服了秦孝儀先生，請他不要找人刪改《中華民國建國史》的文稿，並保留每個作者的署名，讓每個作者對他的文稿負責，使該書維持了它的學術形式。秦孝儀先生是很肯做事的人，也肯接納學者的意見，我一直很敬重他。在《中華民國建國史》修纂期間，我完成了《民國初年的政黨》一書的撰寫，並於1985年出版，最近正擬再版，作業還未完成，感謝魏秀梅小姐幫我校對，她曾經幫我做了很多事，我對她十分感謝。

對我個人來說，我研究歷史，喜歡大題大作，這不是中央研究院的主流，中央研究院的主流是小題小作，這是受科學家的影響。科學家中的吳大猷先生鼓勵史學家大題大作，我做所長期間，吳先生曾不止一次要求我率同仁們寫中國近代史，我怕干擾同仁們的專題研究，也曾不止一次地反對吳先生，其實我私心很贊同。記得我剛來近史所的時候，郭廷以所長草六年計劃，希望在六年中率同仁寫一部中國近代史。回想起來，近史所那時並沒有這個條件，現在近史所已有力量寫一部中國近代史，不過同仁們都忙於專題研究，不一定能分身做這件事。前些年在我卸任所長之後，私下接受了吳大猷先生的號召，與劉廣京先生、陳永發先生，共同撰寫近二百年中國史，我寫的「民國篇」，陳永發先生寫的「中共篇」，都出版了，也再版了，吳大猷先生未能在生前看到劉廣京先生的「晚清篇」出版，引為憾事。「民國篇」以《中華民國史稿》為書名，單獨出版。在《中華民國史稿》還沒出版的時候，一位在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做事的長輩，要我約學者撰寫《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史》，我覺得很有意義，即加以推動，承本所同事楊翠華小姐、許雪姬小姐、張力先生、張建球先生，以及師範大學陳惠芬小姐，湖南師範大學周秋光先生協助，完成初稿，去年又加增補，全書約有八十萬字，現紅十字會正委專人審稿中。這是我退休以前完成的最後一個集體研究計劃。

前面是我在近史所的一些研究工作的回憶，由於在座的同仁和朋友不少也在大學教書，我也談談我的教書工作。前面說過，教中學我覺得很單調，教大學部也是一樣，我比較喜歡教研究所，因為研究所是選課的，有興趣的學生才來聽；而研究所人少，大家坐著討論問題，師生間的互動比較多。我正式到歷史研究所開課是在 1971 年秋天，我是在 1970 年夏天從哥倫比亞大學進修回來。李國祁先生當時主持師大歷史研究所，並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課，擬加強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與教學，就要我去開中國現代史研究。我那時只對辛亥革命時期做過一些研究，在哥大修過韋慕庭先生的中國現代史和唐德剛先生的中國現代史料介紹；修課期間，讀過一些有關著作。到研究所開課，實在是濫竽充數。想不到這個課還有不少學生來選修，開了二十多年，直到五、六年前才停掉。開課期間，李雲漢先生在師大歷史所開「中國現代內亂史研究」，內容與我的課有重疊處，部分學生兩個課都選。李雲漢先生告訴我，學生說有些地方我講的與他不一樣，他說他真想來聽聽我怎麼講。其實李先生講課很開明，有時且超過了當時的言論尺度。他告訴學生蔣中正是士兵出身，一個學生畢業後去師大附中教書，在課堂上說蔣中正是士兵出身，被職業學生告了狀。後來治安機關調查，教書的學生說是李雲漢老師講的，李老師當時是黨史會副主委，壓得住陣，事情沒有鬧出來。我在師大歷史研究所教書二十多年，除了與一些學生共同研究了一些現代史的問題以外，最大的收穫是寫了兩本通論性的書：一本是《中國現代史》，一本是《中國現代政治史論》，都是由講義整理而成，第一本書幾乎使我有牢獄之災，該書也因此暢銷了二十多年。這本書被指出的問題有三：(1)用公元紀年，不用民國紀年。(2)稱孫中山不稱國父，稱蔣中正不稱蔣公。(3)把國民黨與共產黨放在同等地位來比較。當時一本書被認為有問題，常與國家安全連在一起，國家到現在還活著，證明我的書沒有問題。去年《中國現代史》出了增訂版，將 1950 至 2000 年的史事補了起來。教研究所所寫的第二本書是《中國現代政治史論》，銷路尚好，有韓文譯本，我不懂韓文，譯的好壞我不清楚。附帶一提的，參加「中國現代史事件」處理的，據我側面了解有秦孝儀先生、李雲漢先生、蔣永敬先生、宋楚瑜先生等等，感謝他們保護我。我特別感謝宋楚瑜先生，在「中國現代史事件」討論時，一位許先生主張嚴辦，時任新聞局長的宋楚瑜說：「學術界的事，我們最好少管。」風波就靜了下來。後來在 1990 年，我與蔣永敬、李國祁等三十多位教授要去廣東開

「孫中山與亞洲學術研討會」，那時政府只開放探親，不開放開會，我們有二十多人聯名向教育部寫信，教育部不答應，我們還是以探親的名義去開會了，而且與大陸學者討論融洽。治安機關爲此甚爲生氣，想以「十大吳三桂」的名義找出一些人來批判，被時任國民黨秘書長的宋楚瑜壓下來了。當時推動兩岸學術交流，是冒著「叛國」的危險。

在中國現代史風波平息以後，主持政大歷史研究所的蔣永敬先生要我去開課，課名「中國現代史史料分析」。這個課只是分門別類介紹史料，分析不多。學生的學期報告，是就選定的碩、博士論文題目作史料調查，看能否完成論文，調查不到史料，就得另換論文題目。因爲對寫學位論文有幫助，選課的學生很多。後來電腦發達，圖書網路資料愈來愈普遍，課就停開了。前兩年，我還是找書局將講義出版了，一卷在手，查起來比較方便。政大歷史研究所學風開放，師生相處融洽，常在一起餐敘，有時也鬧酒。在政大課餘之暇，跟蔣永敬先生學會了打牌，退休以後，可消磨一些時間。

我在師大、政大歷史研究所教書期間，許多大學歷史研究所或其他研究所都對中國現代史的教學與研究發生了興趣。臺灣大學繆全吉先生受聘爲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主任，要我去開「中國革命史」，這個課後來在我的建議下改名「國民革命史」。學生多爲尉、校級軍官，有的學生思想保守，常提出一些尖銳的問題，有時訓導長也來聽課，我只好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教了幾年，全身而退。任卓宣先生是該系的臺柱，被學生告，說他「以共產主義理論講三民主義」，任先生被調查了很久。繆全吉先生在課堂中說：「孫中山沒有什麼學問。」第二年就沒有續聘了。接任的中興大學謝延庚先生聲言要把「政治研究所」辦得像文學校一樣，王昇先生在紀念週大會上公開指責，說有人要把政戰學校辦得像文學校一樣，如果一樣，政戰學校可以關門。謝先生一聽風頭不對，第二年也辭職了。兩個來自文學校的老闆走了，我又教了一、二年，也走了。政戰學校性質特殊，在思想上要求滴水不漏，但對來自文學校的老師們非常敬重。上課都是派車接送，指導一篇碩士論文，算一個學分，一年完成，可有一萬多元的報酬，那時文學校只有二千元。

約與去政戰學校開課同時，由蔣孝瑀先生主持的臺大歷史研究所要我去開中國現代化研究的課，那時近史所的現代化研究計劃已告一段落，在國內外各大學都很有名。這個課本來想請張朋園先生去開的，據說一位老

先生不同意，才要我去。我在臺大開的課不很成功，因為現代化的理論像一陣風一樣，很快就過去了，而且我也不大懂得什麼理論，只好改開「中國現代史史料分析」，不久臺大歷史研究所將近代史組取消了，選課的學生不多，我就不開了。但臺大歷史系有一個規定，指導學生一定要專任或兼任教授，為方便學生找指導教授，不開課之後又拿了好幾年聘書。曾與李守孔先生聯合指導一個學生，指導費兩千元，每人一千元。臺大會計室將一千元分成十二個月，每月通知我去領八十多元指導費，我說：不要了。會計室的先生說不行，他說他要作報表。三天兩頭打電話來，後來我一聽是臺大會計室的電話就掛掉。不知他們的報表怎麼報的。

教書的故事比做研究工作的故事多，這期間，也曾去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開課，也都有故事，今天就不說了。教書最大的樂趣，是發現英才，有說不出的喜悅。教過的學生，有的時常見面，有的散在四方，皆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向上，心中甚感安慰。

研究、教書以外，編書、編雜誌也花了我不少時間。編雜誌的第一個念頭起於 1968-1970 年在美國進修時，那時所見的美國，確比臺灣進步，曾聯絡國內外的朋友，想傳播一些想法，回國以後，創刊《新知雜誌》，出版第一期就受到挫折，因為國內外的朋友想法雖然差不多，做法有很大不同。國內的朋友怕出事，不敢登思想太新的文章，勉強介紹了節育、環保等觀念，鼓吹了政治改革，指導了留學，介紹了國外見聞，大部分都登載歷史性的文章。出版四年停刊。後來因為參加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計劃，研究山東，就與陶英惠先生等編輯《山東文獻》季刊，直到現在。《山東文獻》季刊中材料最多的是抗戰期間敵後游擊戰，許多游擊司令寫回憶錄在上面發表。游擊司令甲謂游擊司令乙到 1943 年就投降日偽了。游擊司令乙已過世，他的太太委律師告游擊司令甲誹謗，並以 1939 年因戰功得過的勳章為憑，結果法官竟然判決游擊司令甲誹謗，判賠名譽損失數萬元。乙方的律師據此，要求銷毀該期雜誌。我寫了一封信給該律師，謂 1939 年有戰功，並不能證明 1943 年沒有投降，我還有人證，要與他打官司，該律師沒有再來信，就算了。

除了編雜誌以外，我還做了一些編書和譯書的工作，都是與教育和學術有關的。第一種書是聯經公司出版的《中國現代史論集》，共 10 冊，主要為大學中的「中國現代史」一課，編點基本讀物。對那時的大學生來

說，確是很有用。第二種書是劍橋中國近代史，是找博、碩士班的學生分章翻譯，請不同專長的學者分章校訂，請李國祁先生總校閱，後來我又校閱出版了劍橋中國現代史上冊。第三種是《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和兩集《中國婦女史論文集》，是在李又寧教授動員下編成的。第四種是《中國現代自傳叢書》，出版四集 47 種，第五集因出版社周轉不靈，未能出版，這套書完全是張瑞德先生的工作，我只最後校閱一遍。第五種是《中國現代史叢書》，共出版 15 種，現已關閉。第六種是《山東人在臺灣叢書》，共出版 15 種，其中我主編三種。第七種為《中國歷代傳記叢書》，共六集 32 冊，是由大陸版改編而來，每冊皆委請專家審查，將唯物史觀、階級史觀、政治口號刪除，僅存史實；史實有誤，不負責考訂。上面所列編譯的書籍，每編譯一套書都有很長的故事，譬如翻譯劍橋中國近代史，一個不知名的小書店要做，我找人翻譯了，翻譯完成，書店倒了，我付不出翻譯費；後來另一個不知名的小書店要接辦，我把翻譯的稿子請人校閱，那個小書店又倒了，翻譯費加校閱費，我更付不起了，好在最後由南天書局接下來。

還有一件事，想在這裡向各位報告，在最近的十多年間，我主持過四年的中國近代史學會，也主持過兩年的中國歷史學會。兩個學會開過四、五次大型學術會議。中國近代史學會的秘書處設在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感謝兩位兼任學會秘書長的系主任張哲郎先生、林能士先生、以及政大歷史系同學的協助。中國歷史學會的秘書處設在國史館，感謝館長潘振球先生、副館長朱重聖先生、以及兼任學會秘書長的纂修胡健國先生的協助。每次開大型學術會議，除向黨史會申請一些資助外，潘館長也在各基金會為學會籌款。潘館長熱心助人，愛護後學，我非常敬重他。

故事講得太拉雜，耽誤大家的時間。說到這裡，覺得很對不起中央研究院，也很對不起本所，我雖然每天工作的時間很長，大概有一半以上的時間做了「專題研究」以外的事，特別是 1985 年以後的這十多年。

退休前後，前面所說的一些外務絕大部分都先後結束了，現在剩下的唯一外務是與陶英惠先生共同負責的《山東文獻》季刊的編輯和《民國山東通志》的出版。預計一年之內，將《民國山東通志》出版完成。同時與山東文獻社的同仁商議，把《山東文獻》季刊停掉。剩下來的時間，也許可以做專題研究了。

退休前的研究計劃，還有兩個未完成：一個是以山東省區為例，研究

民國時期地方與中央的關係；一個是以山東省區為例，研究戰後國共勢力的消長。除此之外，我還有一個心願，我在讀大學期間曾經研究過漢史、唐史、南明史；在讀新聞研究所期間曾經做過先秦史研究。後來因為做了將近四十年的近代史研究，把近代以前的歷史研究都荒廢了，希望利用餘暇的時間，回頭看看以前理解的中國歷史，是否還是那個樣子？特別是近五十餘年來，一方面由於考古的發現，使中國古代文明有了新的輪廓；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史學，把中國歷史扭曲了許多，也開拓了許多。在後馬克思主義時代，希望能借用各種新舊史料，與一些關心中國歷史走向的學者，共同從事中國歷史的重建工作。這聽起來是說大話，我深深感覺到，近代以來，利用歷史的人較多，關心歷史的人較少；把研究歷史作為一種嗜好者較多，把研究歷史作為一種責任者較少。個人退休以後，可以更自由地，無牽無掛地，與各位常相左右，繼續關心歷史，做自己想做一些事情。

我最後要說的，將近四十年來，我在近史所做過學徒，也兼過行政，在退休之際，特別感謝在研究上幫助過我的許多同事和朋友，也特別感謝在行政上幫助過我的許多同事和朋友。在為近史所四十七週年暖壽前夕，祝福近史所同仁繼續與國內外研究近代史的同好，共同開拓近代史研究。記得在 1992 年 9 月，我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有一天下午專程去看郭師母李心顏女士——就是本所創所人郭廷以先生的夫人。郭師母問我：「來北京做什麼？」我說：「應邀來北京近史所訪問。」郭師母說：「我們能贏他們嗎？」（郭師母的意思是說：臺北的近史所能贏北京的近史所嗎？）我說：「應該能贏他們。」郭師母非常高興。時間一晃就是十年，郭師母已經不在人間，臺北的近史所已經與北京的近史所成為共同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夥伴。不管政治的演變如何，我們與世界上所有研究近代史的學者都走在一條路上。雖然不一定能走在別人的前面，也決不要走在別人的後面。今天就說到這裡，謝謝各位！

2002 年 1 月 31 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講



張玉法教授的史學人生

黃自進·潘光哲*

1992年7月29日夜晚的北京，和平常時候沒什麼不同，街上人來人往，熙熙攘攘的。對李心顏女士來講，這卻是一個開心的晚上。來自臺北的佳賓，老伴郭廷以的入門弟子之一：張玉法，捎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同仁的無數關懷與情誼，讓她激動地不能自己。結禱近半個世紀的老伴，早在十七年前就已經告別人間了；他當年播下的種子，精心呵護的幼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近史所），於今則綠樹成蔭，儼然國際學術重鎮。但是，她還是期盼殷殷，對著十幾年沒見面的學生，方始卸下近史所所長重擔的張玉法，她問道：「和北京的近代史研究所比較比較，我們能贏嗎？」張玉法恭敬而自信地回答道：「師母，您放心，我們能贏。」這一番話，逗得老人家笑逐顏開。

張玉法先生的這番話，不是爲了討老人家歡心的門面話，而是篤誠懇切的自信許諾。當時在近史所工作已將三十年的張玉法先生，一步一腳印，早就繳出可觀的學術成績；他在近史所的同仁們，亦復如是，敬業勤進，無時無已，爲描摹中國近現代的歷史圖象，各獻智力。就在這一年，張玉法先生榮膺中央研究院第十九屆院士的學術桂冠，成爲在臺灣本土的學院裡工作不懈，必然獲得肯定的指標人物之一。在2002年方甫開春的時分，張玉法先生從近史所專任研究員的工作職位上退休；他的史學人生，卻遠遠還沒有達到退休的時候。

張玉法先生是在戰亂裡成長和鍛鍊出來的史學家。1935年2月1日，

* 黃自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潘光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張玉法先生誕生於山東嶧縣臺兒莊附近的農村，這處老家，是片饑寒和恐怖交織成的土地，壓迫著他從童年起，就得嚐受戰火動盪的苦澀滋味。方始僥倖進入中學之門，內戰的砲火，就逼促他走上流亡萬里的道路。1949年的夏天，少年張玉法的飄泊步伐來到了澎湖，緊接著到了員林，在員林實驗中學的校園裡，他找到了好像可以暫時喘口氣的地方。在中臺灣的一隅，張玉法勤學苦讀，想要為自己的生命尋找一條出路。¹

1955年，懷著可以通曉「古今中外」的憧憬，張玉法以第一志願考進了臺北的臺灣師範大學的史地系。在史地系龐雜而多樣的課程裡，張玉法逐漸伸出了知識的觸角。王德昭和張貴永教授的系列西洋史課程，讓他眼界大開；李樹桐、朱雲影與曾祥和三位老師平易近人的風範，以及他們對於學生的關懷，也使他念念不忘。郭廷以先生的「中國近代史」課程，更是一絕，長相威嚴的郭先生，讓學生望而生畏，上課的時候，沒有學生敢坐在前三排。不過，郭先生的特殊作風，卻讓張玉法由衷地佩服。有一回考試，郭先生出了四道考題，他只答完一個半題，下課鐘響，只好交卷，張玉法心想，這一科一定不及格。沒想到成績出來，竟然得了八十六分。張玉法主動向老師查問原因，郭先生居然答覆道：「我是依程度打分數，只要有見解，就算答一題也可以拿滿分。」郭先生獨特的學術標準，深切地刻鏤在張玉法的知識心靈上。

年輕的張玉法已經有心於研究工作，在寬廣的知識世界裡，探索著自己的未來道路。但是，他還不曾步入中國現代史的無涯領域；東漢史、唐史和以鄭成功為中心的南明史，都一度是他的研討主題。1959年，張玉法以史地系歷史組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畢業。在戴上學士方帽子的前夕，為報考臺大歷史研究所，陳寅恪的幾部名著成了張玉法的案頭書，他更苦心完成了三萬多字的〈唐代藩鎮論〉，編了十萬多字的藩鎮年表。可惜，他失敗了，無緣進入杜鵑花城。始終心繫於研究，不願在中學「誤人子弟」的張玉法，自以為對新聞有興趣，轉而以政大新聞研究所為目標，一戰成功，他的身影，也就開始出入在指南山畔，道南橋頭。

進入新聞研究所之後，張玉法的知識興趣和研究熱情，卻無法從當時偏重於新聞實務技術層域的課程裡得到滿足，幾經思量，他決定還是回到

¹ 張玉法，〈走上研究中國現代史的道路〉，收入《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我的探索》（臺北：《中國論壇》雜誌社，1985），頁233-237。

歷史研究的本行，要以新聞史領域作為碩士論文的題目。他原本打算研究近代新聞史，指導老師趙鐵寒教授則認為，在當時的環境與氣氛下研究近代史難免動輒得咎，他只好以傳播學的觀念來整理中國古代傳播史，在1964年完成了題名為〈先秦時代的傳播活動及其對文化與政治的影響〉的碩士論文。²取得碩士學位後，張玉法仍然面臨著志業未竟，何去何從的問題。百般無奈之下，得到朱雲影老師的指點，他決定「毛遂自薦」，大膽地寫信給郭廷以先生，表明自己的研究志趣，想要到近史所工作。幾經曲折，他的治學心願，終於得到郭先生的肯定，而告實現。從1964年7月起，近史所的殿堂，成為張玉法先生此後的安身立命之地；集結在這座殿堂裡的研究隊伍，也多了一位生力軍。在近史所工作期間，和其他同輩同仁一樣，張玉法先生也得到福特基金會的贊助出國進修，遠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經」的歷練，師從韋慕廷（C. Martin Wilbur）和唐德剛等先生的經驗，使他的治史視野愈加寬闊，並完成了〈西方社會主義對辛亥革命的影響〉“The Effects of Western Socialism on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為題的論文，再取得另一個碩士學位（1970年）。

二

身為近史所的「新鮮人」，張玉法先生初時承擔的工作相當瑣碎，既標點整理檔案，也跟著沈雲龍先生做口述歷史訪問，還奉命「遠征」到是時仍位居南投草屯的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的史料庫調查近代史資料。就像方始入門的小沙彌一般，白天灑掃應對，夜裡念佛頌經，近史所的研究室天天都是不夜城。所裡那群新進的年輕研究人員，都嚐過這一段「蹲馬步」的滋味。

在郭廷以先生的指點下，中國現代史開始成為張玉法先生上下求索的知識領域。畢竟，時代的變動，是他的親歷經驗，追溯這場變動的歷史根源，正是為自己的生命歷程與時代動盪找尋答案。何況，向這個領域進軍，「有報紙可讀、有檔案可查、有當事人可資尋訪」，未及而立之年的張玉

² 張玉法，《先秦時代的傳播活動及其對文化與政治的影響》（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研究論文第43種，1966）；現易書名為《先秦的傳播活動及其影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法先生，更覺得信心滿滿。只是，在他蓄勢待發的 1960 年代中期，中國現代史這個研究領域還不是臺灣史學界的「顯學」；即使到了 1970 年代中期，在政治禁忌的壓力之下，這個領域的學術意義還需要深切呼喚，即如張玉法先生當時的述說：

從世界的史學眼光來看，現代中國史的研究已無需提倡，但從國內的史學界來看，仍然需要大聲疾呼：請正在從事現代中國史研究的學者設法提高水準，請在門外徘徊不決的學者勇敢地走進來。說簡單一點，現代中國史的研究需要量的增加和質的提高。……³

然而，「初生之犢不畏虎」，張玉法先生還是毅然地投身其間，百折無悔。身為開拓深化中國現代史研究領域的先行者之一，他以身作則，以自己豐實的研究成績作為示範，為提升中國現代史研究成果的質與量，猛進無已。在整理和纂輯中國現代史領域的文獻資料方面，張先生奉獻了無數的心力。他領導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10 大冊，與張瑞德教授合編《中國現代自傳叢書》這套大部頭的叢書系列，推動《清末民初期刊彙編》的影印出版等等，都是厚植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基礎資料；他與陶英惠教授等合編《山東文獻》，又與同鄉通力合作編纂《山東人在臺灣》系列，也是為刊佈與流傳家鄉文獻的壯舉。張玉法先生投注的心血，是現今中國現代史研究顯現一片璀璨局面的主要動力來源之一。

三

在研究中國現代史領域的漫長征途上，張玉法先生的工作起點是現代政治史這個課題，出於對政治史的興趣，他決定先展開「民國初年的政黨」的研究。但是，張玉法先生意識到，民初政黨作為政治現象的一幕，更有著長遠的歷史脈絡，是「鴉片戰後數十年中西洋文化衝擊與感受的結果」，如果僅僅切取民國初年的片段來理解，並不能全面掌握這個來自中國域外的制度的「移殖和成長的過程」。⁴因是，為了深化這個主題的歷史脈絡

³ 張玉法，〈拓展國內現代中國史研究的途徑〉，原刊《人與社會》，卷 2 期 5（1974 年 12 月），收入氏著，《歷史學的新領域》（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8），頁 183。

⁴ 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自序。

和意義，張先生追本溯源，從更寬廣的歷史背景入手，先後完成了《清季的立憲團體》（1971年）和《清季的革命團體》（1975年）兩本巨型專刊，為描摹「革命黨」和「立憲派」的歷史圖象，建立了比較全面而紮實的基礎。歷經二十年的苦心經營，至1985年，連附錄合計，全書厚達560餘頁的《民國初年的政黨》始告竣工，才為這個研究主題畫下句點。

《清季的立憲團體》、《清季的革命團體》和《民國初年的政黨》三部大書合為一璧，是學界研討清末民初政治史的必讀經典。張先生寫作這三部書的基本理念，以大規模而全面性地自清末民初的報刊文獻或是檔案裡調查材料、積累資料為起點，⁵持精密細緻的「史實重建」為原則，不尚空談，更不以轉販或依傍某種社會科學理論為鵠的；從「革命黨」與「立憲派」的對立爭鬥，又如何轉折為民初政黨分合不已的詭譎局勢，描摹出逼近於歷史原來場景的多彩圖象。因此，這三部大書實如各個主題的「百科全書」，資料性強，可信度高。舉例而言，《清季的立憲團體》裡對於「戊戌」前後中國境內風起雲湧的學會活動，除了參考既有的成果之外，並且另外依據調查到的新資料，表列出63個學會的成立時間、地點、主持人、宗旨及活動等內容，⁶為當時的士人結社風氣增添了有力的註腳。⁷又如，興中會作為革命的第一把火炬，整體的情況究竟何若，史家眾說紛紜。張先生則就所能掌握的史料，企圖勾勒全貌，對於興中會時期參與革命活動的眾多先驅，即一一臚列籍貫、出身與活動、入會地點與年代等資料，得出綜合結論：「以興中會為結合中心的人物，來自社會各階層」，「革命的事業是全民的，沒有什麼階級之分」；他亦將自己的成果和其他研究者（如薛君度等）的調查述說比較，以示獨樹新意之所在。⁸《民國初年的政黨》的附錄一〈民初黨會調查表〉，則依政治、軍事等11大類為序，分別註明各黨會的成立時間、地點、重要人物、宗旨及活動等內容。⁹在

⁵ 從張先生的〈近代中國書報錄，1811-1913〉（文刊《新聞學研究》，期7-9〔臺北：政大新聞研究所，1971〕），即可想見他涉獵的廣泛程度。

⁶ 張先生的調查，係以王爾敏和湯志鈞的成果為基礎，另從《浙江潮》、《南社紀略》等材料裡搜得溫州農學會、吳江雪恥學會等等資料，參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第4章第2節註9，頁220。

⁷ 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頁199-206。

⁸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頁181-202。

⁹ 張玉法，《民國初年的政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頁461-530。

這樣詳密資料的基礎上，有心探索清末民初歷史的後繼學人，自可依據己身獨特的關懷所在以及新近挖掘開發的史料，提出進一步的補充與討論。¹⁰

張先生在專題研究裡顯現的治史功力，猶如繡花功夫，精細綿密。例如，《天壇憲草》問世之前，袁世凱唆動地方封疆大吏「聲討」，一般憲法史家對此一局面大都一筆帶過，¹¹張先生則以為事關重大，非但列表說明，並仔細分析各方意見趨向，如「明指憲草謬誤、箝行政權過甚者二十四次」等等，¹²足可具體顯現當時的政治風波。張先生在這個表裡，更展現了治史的基本工夫，如護理熱河都統舒和鈞等人的意見，在原據史料《憲法新聞》裡有錯漏，他即據《時報》的資料補入，¹³以見原貌。史學工作者都知道，史料未必能夠還原歷史的本來樣貌，史料有它的侷限所在；可是，在研究的實踐過程裡，我們卻很容易忘記了據以寫史的史料，也得經過一道批判審查的程序，張先生史學實踐的成果，足式永代。

張先生的史學實踐，從史料的批判到史實的重建，即使有類於乾嘉考據的實證學風，卻不是為考據而考據，而是以歷史實相的還原，作為理解歷史脈絡的個別意涵與總體意義的基礎。所以，如《清季的革命團體》既涉入「辛亥革命史」的領域，與立場有別的學者（特別是中國大陸的學者）之間發生論爭，自是難以避免。從1982年4月兩岸學者在美國芝加哥的亞洲學會年會上，關於這個問題首度「交手」¹⁴以來，張先生始終強調「僅靠意識形態，無法了解辛亥革命」，¹⁵對於大陸方面以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立論，絕無正面的肯認。¹⁶大陸學者，當然提出針鋒相

¹⁰ 例如：關於「戊戌」前後時段的學會，後繼學人即可依據新開發的史料，有所補充。參見閔杰，〈戊戌學會考〉，《近代史研究》，期3（北京：1995年6月），頁39-76；閔小波，〈變法維新時期學會、社團補遺〉，《文獻》，期1（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1月13日），頁126-131（不過，閔杰徵引過《清季的立憲團體》，而閔小波則無）；餘不詳舉。

¹¹ 例如：荆知仁，《中國立憲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頁279，以不到一頁的篇幅進行描寫。

¹² 張玉法，《民國初年的政黨》，頁428-434。

¹³ 張玉法，《民國初年的政黨》，第5章第2節註162，頁429。

¹⁴ 關於當時的情況，章開沅有所憶述，參見章開沅，〈芝加哥會議：兩岸中國學者第一次正式會晤〉，收入氏著，《實齋筆記》（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頁106-110；當然，這篇文章的述說，偏向於肯定中國大陸方面的立場。

¹⁵ 張玉法，〈辛亥革命的性質與意義〉，收入氏著，《辛亥革命史論》，頁3-24。

¹⁶ 張玉法，〈大陸學者對辛亥革命的看法——評介章開沅、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收入

對的觀點，¹⁷雙方之間的學術立場，沒有交集可言。在這場很難有共同語言的「文字戰爭」裡，張先生幾乎是孤軍出征，以一人之力企圖描寫辛亥革命的歷史過程，並對其性質與意義，提出個人的見解。相對地，大陸學界打的是「群眾戰」，為營構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命題而群策群力。¹⁸以一人敵一軍，張先生的「勇氣」不言可喻。事實上，張先生的「勇氣」來自於他在堅實的資料基礎上，全面性地考察辛亥史事的經脈，他的《辛亥革命史論》一書，就是例證之一。這部書收錄辛亥革命時期的相關論文 18 篇，¹⁹觀照的課題相當多元而深入，例如〈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自由主義運動〉與〈民國初年的中國社會黨〉兩文，就精彩地展現出辛亥革命時期的多彩面相；〈民國初年的中國社會黨〉另附有「中國社會黨支分部一覽表」，更是從大量的報刊史料裡披沙揀金的成果；²⁰以此為例，正提醒我們研究辛亥革命時，應該拓寬視野，不要只注意居主流位置的同盟會或「立憲派」。

專題研究是現代史學的趨向，透過一個又一個的專題研究，歷史多元而複雜的本來面貌，逐漸浮現在人類的知識領域裡。身為專業史學工作者，張玉法先生在中國現代政治史這個課題方面的成績，是史學「專業化」的表率，也是後來者意欲更上層樓的基石。

四

然而，史學「專業化」的結果，也潛伏著讓史學著作與大眾讀者脫節的危機，史學工作者的學術成就愈高，學術成果的閱讀群體就愈小，中外皆然。在 1960、70 年代的臺灣，更還由於現實政權的壓制同意識形態的

氏著，《辛亥革命史論》，頁 24-47。

¹⁷ 章開沅，〈關於辛亥革命性質問題——答臺北學者〉，收入氏著，《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頁 167-202。

¹⁸ 例如：金沖及、胡繩武，《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章開沅、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與林家有主編，《辛亥革命運動史》（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等書，都是集體完稿的作品。

¹⁹ 張玉法，《辛亥革命史論》（臺北：三民書局，1993），全書收錄相關論文 18 篇，計 617 頁。

²⁰ 張玉法，〈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自由主義運動〉、〈民國初年的中國社會黨〉，《辛亥革命史論》，頁 409-430、431-469。

禁忌纏攪在一起，中國現代史領域的研究和寫作，存在著不少「禁區」，以求真存實為目標的史學研究，一旦還原歷史的真相，很難不被聯想為「以古諷今」。在「成王敗寇」這等深層歷史意識的支配下，意識形態更已成為人們理解思索歷史的桎梏，非僅以「革命」為「正統」，而且，「正統」必需定於一尊，所謂的歷史著作其實是神話匯編。因是，中國現代史研究，不僅在專業和普及之間徘徊，也在學術和意識形態之間徬徨。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張先生的《中國現代史》於 1977 年問世之際，便有著獨特的意義；這部書的問世，也是張先生以個人的學養識見，用一己之力寫作中國現代史通史的濫觴。

張先生謙稱，《中國現代史》這部書是以教學講義為基礎而完成的。究其實際，那還是中國現代史的研究成果依舊相當匱乏的時代，既然欠缺可資依傍的寫作根據，張先生只好親自投入史料的浩瀚海洋裡，開展寫作。例如，關於「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國民黨人的進退出處，即引徵《革命文獻》為據。²¹在戒嚴體制之下問世的這部書，依據嚴謹的學術規範，詳註出處，述事也儘可能地跳脫意識形態的牢籠，絕不編造歷史神話；每章末更附有堪稱詳縝的參考書目，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不識之無的後生小子而言，實無異於知識的海洋裡可以導引路向的燈塔，深受好評與歡迎。也正因為不隨波逐流的關係，這部書被有心人士一狀告到警備總部去，差一點被列入「儒以文亂法」的禁書書目裡。所幸，大江東流，勢不可擋，黨國威權體制終於被迫崩解；而《中國現代史》這部書的生命力，則長存永續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張先生不以這部書的廣受歡迎而自滿，精益求精，添寫了 1949 年之後的臺海兩岸發展史，於 2001 年推出了新版，以更精緻豐富的面貌，與讀者見面。

全帙將近七百頁的《中華民國史稿》，問世於 1998 年（已有 2001 年修訂版），是張先生的另一部中國現代史通史。這部大書，是前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催生的《最近兩百年中國史》的一部分。在原先的構想裡，這部《最近兩百年中國史》由三冊構成，上冊是「晚清篇」，由中研院院士劉廣京撰寫；下冊是「中共篇」，由近史所同仁陳永發執筆；中冊「民國篇」即是本書。

寫出一部讓兩岸的國民與學者都能接受的《最近兩百年中國史》，是

²¹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1977 年版），第 3 章，註 105-108（2001 年版同）。

吳大猷院長和三位執筆者設定的寫作目標，立意雖佳，實踐起來，卻是高難度的學術工程。隨著時代的改變，政治干預和忌諱不再，學術自由的空氣清新而芬芳，張先生動筆之際，自是如意自在。然則，兩岸研究中國現代史的成果已是燦爛彰著，如何吸收眾家考辨史事的精華，凸顯自己縱橫史海多年的獨到見解，又能突破前著的業績，大為不易。單從張先生徵引大量原始及二手材料來述說中華民國國旗、國歌的起源和演變，²²這等深具創意的寫法，便可想見他的巧思所在。

在中國現代歷史舞臺上的演員，不知凡幾，一同粉墨登場，好比繁花齊飄；他們賣力地演出大大小小的事件，此來彼落，猶如山頭起伏。面對這麼繁複雜亂而又眾聲喧譁的史事，以一人之力要勾勒出一幅歷史圖象的好山好水，確實耗費張先生無窮的心力神智。在《中國現代史》裡，張先生採取專題的寫作形式，如在第四章「軍閥的興衰」裡，將國民政府建立之後的各路「諸侯」發動諸如「擴大會議」之類的作為，視為「軍閥之反動的末路」；因而，在第七章「十年建國」的篇幅裡，他全意述說的是國民政府推動的建設事業，通篇不再敘及各式各樣的政治動盪。張先生在《中華民國史稿》裡，則又另闢蹊徑，採取依照時間序列，將史事「概念化」的寫作手法，像是自民國建立之後，到袁世凱告別人間（1912-1916年）的這段歷程，他以「政權競逐與外交難題」為總綱，分目敘說諸種政治勢力角逐政府權力的歷程，以及中國所面臨的諸多外交困局（第二章）；1916年到1928年間的軍閥混戰局面，則是以「國家由分裂走向統一」為總綱的第三章述說的對象。「史無定法」，關於中國現代史通史的寫作，也並不存在著典範式的作品。張先生在這兩部大書裡截然不同的寫作方式，無疑提供了後繼者思索玩味的榜樣。

中國現代史的領域涵括廣泛，舉凡政治、社會、經濟等等各個主題都可以自成單元，各有通史。在政治史通史方面，《中國現代政治史論》和《近代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就是張玉法先生貢獻給史學界的重要成果。《中國現代政治史論》以概念化的取徑，敘論中國現代政治發展史裡的七種「政治形態」：「君憲政治論」、「政黨政治論」、「復辟政治論」、「軍閥政治論」、「訓政政治論」、「憲政政治論」、「派系政治論」，自成一說。以時間序列先後，分期述說自辛亥革命以降，到1990年代海

²²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39-42（2001年修訂版同）。

峽兩岸為爭取實現「德先生」而奮鬥的血淚史，是《近代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的主要內容。雖然，張先生是在參照許多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寫成這兩部書的，其中亦頗有足可顯示張先生個人獨特見解之處。像是《中國現代政治史論》裡對於民初政黨的基本立場，即分別提出「官權黨」（即政府黨；但非執政黨，因政權由袁世凱掌握）與「民權黨」（即反對黨）的概念；²³在《近代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裡，對於1908至1928年間的民主政治的實際成就，則分成八個階段，依據民主化的六項指標，逐一列表計分，並提出「行政權獨高的趨勢」的論斷。²⁴讀者可以不同意張先生的論說，但是不能不承認他努力自成一家言所耗費的心血。

在現代史學的發展脈絡裡，寫作任何形式的通史，總是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事。十九世紀的英國名史家阿克頓爵士(Lord John Emerich Dalberg Acton, 1834-1902)想要撰作《自由的歷史》(History of Liberty)這部大書的雄圖，始終沒辦法實現。阿克頓爵士自己批評德林格爾(Döllinger)的話，則正可以解釋原因所在：

他不願依據不完備的資料來寫作，可是，對他而言，資料總是不夠完備。²⁵

時代的禁忌和資料的限制，並沒有阻止張玉法先生寫作中國現代史通史的雄心壯志，他繳出了一分可觀的成績。不過，在這個「上帝不存在，萬事皆可為」價值多元的時代，他絕不認為自己寫下的這些大部頭通史，就是「最後的歷史」(the ultimate history)，百代不易。然而，寫出有深度的通史性著作，讓比較逼近於實相的歷史知識得以普及於大眾，應當是史學工作者務求盡其本分的努力之一。張先生的業績，正是「不容青史俱成灰」的明證。

五

在個人全心積極投入研究中國現代政治史與寫作通史著述的漫漫長途上，因緣際會，張玉法先生也參與了相關的集體研究隊伍，在廣袤的史

²³ 張玉法，《中國現代政治史論》，頁58-59。

²⁴ 張玉法，《近代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頁25-28。

²⁵ 引自：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oston: Beacon Press, 1959 [paperback ed.]), p. 359。

學領域裡，又打下了另一方多嬌江山。

張先生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經」期間，結識了李又寧教授，問學相契，於是通力合作，在婦女史研究領域裡稍有駐足，共同編出了《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以及《中國婦女史論文集》各兩大冊，成為開展研究基礎與積累研究成果的入門之書。就當下方興未艾的婦女史研究而言，張先生無疑也占有倡導風氣的先驅者的一席之地。²⁶

「現代化研究」則是耗費張玉法先生許多學術精力的另一項主題。在李國祁與張朋園兩位教授的倡議下，近史所和師大的一時俊彥，共組集體研究隊伍，要以「區域研究」和「專題研究」的取向，探索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軌跡。在這項曾經激起臺灣史學界千層堆雪般回應的研究計畫裡，張先生承擔的課題有兩項：第一、以老家山東曲折的現代化歷程為對象，完成了《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山東省，1860-1916》這部厚逾 800 頁的專刊，是同一計畫裡最具「分量」的一部。其次，他探討了作為工業化後來者的中國，在發展現代工業的歷程裡，出現了什麼樣的狀況，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分別就「外資工業」、「官辦工業」、「官督商辦工業」與「民營資工業」進行專題研究，各自發表論文，最後集結為《近代中國工業發展史（1860-1916）》一書出版。

「現代化研究」的理論基礎，當然借鏡於西方社會科學的果實。但是，張先生不囿於既有的理論，他依據大量的山東地方志為素材，詳盡地描述山東一隅如何跌跌撞撞地走上現代化的道路。「現代化研究」雖是集體研究的課題，也容許個人自有創意，張先生以 1916 年為定點，為傳統社會裡的「現代性」評分，政治部分 41%、經濟部分 24%、社會部分 34%，²⁷即是同一群研究隊伍裡的其他學者沒有的估價。²⁸於今，「現代化研究」的取向已若強弩之末，它在臺灣脈絡下的學術史意義也待闡揚總結；但是，當中國大陸正也號召開展現代化研究的時分，²⁹張先生參與這群研究

²⁶ 後來，張先生撰有〈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的回顧〉一文，收入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

²⁷ 張玉法，《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山東省，1860-1916》，頁 845-846。

²⁸ 張朋園，〈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架構與發現〉，《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頁 866。

²⁹ 最明顯的例證，是已故北京大學教授羅榮渠的號召，參見羅榮渠，《現代化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餘例不詳引。

隊伍的既有業績，應有相當的借鑒意義。

身為曾經「出洋取經」的史學研究者，張玉法先生也嘗試恰如其分扮演好引介新知、激盪觀念的角色，參與《人與社會》、《新知雜誌》和《中國論壇》等雜誌的編務，是他努力於結合學術和社會關懷的展現；而他在1970年代推出的《歷史學的新領域》一書涵括的若干論文，更是具體的例證。舉凡「史學量化」、「心理史學」或「比較歷史」等等一度相當新鮮的研討取向，張先生都「野人獻曝」，意欲有所引介。³⁰雖然，他自己承認，涉獵所及的相關作品大都「淺嚐即止」，這些文章也大都停留在「蜻蜓點水」的層次。然而，張先生的這些文字，扮演的毋寧是幫助史學界打開窗子的角色，也有相當的學術史意義；至於窗戶洞開視野大增之後，如何深化積累，就有待於接棒者的用心了。

從西方史學的新成果裡找尋靈感，一直是臺灣史學的主流趨勢，「現代化研究」與張先生引介的史學「新知」，則是一波時代趨勢的表徵之一。已經涉足於更為廣闊天地的後繼者，當然可以大言不慚地宣稱自己的認知視野，已然超越前行先賢。可是，「那有一筆畫成龍」，不要忘記了，人類的知識板塊的厚實，都仰賴於前輩學人的心靈結晶。在學術的殿堂裡，只有保持對先行者智慧的謙卑之心，才有超越他們的可能性。

六

作為開拓中國現代史研究領域的先行者，張玉法先生的學術領導與行政能力，亦稱卓越群倫。在近史所的成长和發展歷程裡，先後擔任過副所長（1982-1985年）、所長（1985-1991年）的他，是促使這方學術殿堂更上層樓的主要領航者；諸如推動國際學術合作，發起《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的創刊，《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編纂等等事業，都讓近史所的學術地位，持續保持領導和開創性的優勢。

身為學術工作者，張玉法先生也以化育天下英才為任，先後在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與臺灣大學等校兼任教職，講授中國現代史的相關課程。新近問世的《中國現代史史料指引》一書，就是他的教學心得之一。執此一編，無緣親聆先生警欸的晚輩學子，也有在中國現代史領域裡漫

³⁰ 均收入張玉法，《歷史學的新領域》；不詳引。

步，知其宮室之美富的機會。張先生也投注了大量的時間指導學生撰寫博、碩士論文，使得臺灣的中國現代史研究隊伍，增添了一批又一批的生力軍。張先生指導學生，從不吝於將自己獨特的見解傾囊以授，他也往往提示珍貴的原始資料，讓學生得到可以逕入寶山的鑰匙。張先生要求學生在研究某個問題時，最好有地毯式的搜索準備工夫，見樹也見林，如此，既能加添知識的廣度，也厚植學術功力的基礎。他也認為，以人物為研究主題，在檢閱資料之始，不要以經過編輯加工程序的個人文集為起點，最好從期刊來看，這樣才能瞭解他的言論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脈絡下出現的，他著論立說的具體背景和對象是什麼，如此才能深化對於時代變易趨向的具體感受。如今，「張門」弟子之數，猶勝於孔門七十二賢，各在學術研究或歷史教學的工作崗位上，稟承師教，默默耕耘。「張門」師徒共同為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寫下燦爛的篇章，必然蔚為學術佳話。

七

中國現代史的研究，漸次成為一門學科（discipline），是在二十世紀中葉才起步的。在這個學科的形成歷程裡，篤實的前輩學人筆路藍縷，為這個學術領域發凡起例，各盡其分，張玉法先生則是走在這列學人隊伍最前面的領先者之一。現下已經是政治黨派與意識形態的藩籬不再的時代，人們可以貪婪地閱讀各種文獻，窺探中國現代史這個領域之源流根脈，自由自在地開展知識探險的歷程。無限的天地，正等待後繼學人施展身手，好讓前行者的栽植，長青永茂。不過，想要扮演知識的創造者是艱鉅的任務，任何有價值的研究成果，都必需投注無數的心力，張玉法先生的諸多著作，正為後生小子開展求知問學的路程，提供了無盡珍貴的示範。

在暫時揮別近史所的專職位置之後，張玉法先生仍將繼續完成以山東為主要對象的幾個專題，諸如以山東為例，探討民國時期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戰後國共在山東的軍事勢力消長等等。退休，絕對不是張先生悠遊歲月的開始。青年時期曾經涉足過的中國古代史領域，即使已經放下近四十年了，張先生仍未忘情。畢竟，他曾在那兒貫注過許多心血，那是他的生命不能拋卻的一部分；所以，未來他也可能進行如《中國通史》這樣更具規模的歷史寫作工程。史學界的朋友和後生小子都誠摯地祝禱張先生永遠福壽康樂，能夠實現他的心願。對歷史的認識和沉思，可以幫助我們理解

自己與自己的存在處境。張玉法先生的史學人生，正提供給我們這樣的無限智慧。

附錄：張玉法教授著作目錄

專書

- 《先秦時代的傳播活動及其對文化與政治的影響》，臺北：嘉新基金會，民國 55 年，206 頁；《先秦的傳播活動及其影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82 年，272 頁。
- 《清季的立憲團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28)，民國 60 年，554 頁。
- 《清季的革命團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32)，民國 64 年，746 頁。
- 《中國現代史》，臺北：東華書局，民國 67 年，769 頁。增訂版，民國 90 年，882 頁。
- 《中國近代現代史》，臺北：東華書局，民國 67 年，469 頁。
- 《中國現代史略》，臺北：東華書局，民國 67 年，300 頁。增訂版，民國 90 年，508 頁。
- 《歷史學的新領域》，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 68 年，228 頁。
- 《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山東省，1860-191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43)，民國 71 年，885 頁。
- 《民國初年的政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49)，民國 74 年，584 頁。
- 《中國現代政治史論》，臺北：東華書局，民國 77 年，309 頁。
- 《歷史講演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 80 年，446 頁。
- 《近代中國工業發展史》，臺北：桂冠圖書公司，民國 81 年，298 頁。
- 《辛亥革命史論》，臺北：三民書局，民國 82 年，617 頁。
- 《中華民國史稿》，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 87 年，679 頁。修訂版，民國 90 年，685 頁。
- 《近代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 88 年，597 頁。

《中國現代史史料指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 89 年，442 頁。

論文

〈從北伐到抗戰的報業〉，曾虛白編，《中國新聞史》，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民國 55 年 4 月，133 頁。

“The Effects of Western Socialism on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MA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70, 166p.

〈福州船廠的開創及其初期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民國 60 年 6 月），49 頁。

〈清季革命運動的背景〉，《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輯 1），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民國 60 年 12 月，40 頁。

〈蘇曼殊的生平及其譯著〉，《新知雜誌》，1 年 6 期（民國 60 年 12 月），21 頁。

〈關於辛亥革命的一些統計研究〉，《新知雜誌》，2 年 1 期（民國 61 年 2 月），9 頁。

〈外人與辛亥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上）（民國 61 年 7 月），28 頁。

〈洪門及其反滿活動〉，《女師專學報》，期 2（民國 61 年 8 月），16 頁。

〈民國初年對政黨移植問題的爭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民國 62 年 5 月），23 頁。

〈同盟會時代的革命宣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2（民國 63 年 3 月），42 頁。

〈興中會時期的革命宣傳〉，《女師專學報》，期 4（民國 63 年 3 月），20 頁。

〈現代中國史研究的趨勢〉，《人與社會》，卷 2 期 2（民國 63 年 12 月），12 頁。

〈清末民初山東的工業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4（民國 65 年 4 月），48 頁。

〈民國初年的內閣〉，《復興崗學報》，期 14（民國 65 年 4 月），27 頁。

〈民初政黨的調查與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民國 65 年 6 月），67 頁。

〈清末民初山東的教育改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5（民

- 國 66 年 4 月)，38 頁。
- 〈清末民初山東的地方自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6（民國 66 年 6 月），26 頁。
- 〈清末民初山東的礦業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6（民國 67 年 5 月），38 頁。
- 〈清末民初山東的社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民國 67 年 6 月），46 頁。
- 〈章炳麟〉，《中國歷代思想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67 年 6 月，63 頁。
- 〈民初政局與五四〉，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 68 年 17 頁。
- 〈清代山東的災荒與救濟〉，《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十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 68 年，72 頁。
- “China’s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 1901-1916: Regional Studies on Thirteen Provinces,” Chi-ming Hou and Tsong-shian Yu, eds.,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1979, 22p.
- 〈民初國會中的激進派政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7（民國 68 年 5 月），32 頁。
- 〈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農業改良，1901-1916：沿海沿江十三個省區的比較研究〉，《史學評論》，期 1（民國 68 年 7 月），48 頁。
- 〈民初國會中的保守派政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8（民國 68 年 10 月），43 頁。
- “Region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Regional Comparisons,” *Chinese Republican Newsletter*, Vol. 5, No. 1 (October 1979), 8p.
- 〈清末民初外人在山東的文化與社會事業〉，《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期 12（民國 69 年 5 月），48 頁。
- 〈清末民初外人在山東的經濟活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8（民國 69 年 6 月），14 頁。
- 〈清季山東地區的中外交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9（民國 69 年 7 月），25 頁。
- 〈會黨與辛亥革命〉，《傳記文學》，卷 38 期 2（民國 70 年 2 月），7 頁。

- 〈辛亥革命時期的南北問題〉，《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期 13（民國 70 年 5 月），30 頁。
- 〈國民黨與進步黨的比較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0（民國 70 年 7 月），80 頁。
- 〈一次大戰期間中國棉紡織業的發展〉，《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國 70 年 10 月，16 頁。
- 〈光復會與辛亥革命〉，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臺北，民國 70 年，24 頁。
- 〈學者對清季立憲運動之評估〉，《中國近代的維新運動——變法與立憲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1 年 4 月，26 頁。
-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 Retrospective after 70 Years,”《辛亥革命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2 年 6 月，21p。
- 〈民初對制憲問題的論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2（民國 72 年 6 月），30 頁。
- 〈民初經濟發展的條件〉，《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 72 年，第二章第一節，32 頁。
- 〈工業的發展〉，同上，第二章第四節，53 頁。
- 〈礦產的開發〉，同上，第二章第五節，25 頁。
- 〈農業與糧食〉，同上，第二章第六節，35 頁。
- 〈國際收支與對外貿易〉，同上，第二章第七節，24 頁。
- 〈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自由主義運動〉，《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3 年 4 月，18 頁。
- 〈民國初年的國會，1912-191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3（民國 73 年 6 月），113 頁。
- 〈山東省的政治領導階層，1928-1937〉，《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3 年 12 月，17 頁。
- 〈晚清的歷史動向及其與小說發展的關係〉，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中研所主編，《漢學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73 年 12 月，第三集，30 頁。
- 〈興中會時期的理論與宣傳〉，教育部主編，《中華民國建國史》，臺北：國立編譯館，民國 74 年 4 月，第一篇第四章第一節，29 頁。

- 〈同盟會時期的理論與宣傳〉，同上，第一篇第四章第二節，32 頁。
- 〈革命與君憲的論戰〉，同上，第一篇第四章第三節，29 頁。
- “Trends of Modernization in Late Ch’ing China, 1860-1911,” Yu-ming Shaw ed., *Chinese Modernization*. San Francisco, 1985, 16p.
- 〈抗戰時期山東省的行政督察專員〉，《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4 年 12 月，43 頁。
- 〈二次革命的根源〉，《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臺北：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民國 74 年 12 月，17 頁。
- 〈二次革命：國民黨與袁世凱的軍事對抗，1911-191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5（上）（民國 75 年 6 月），57 頁。
- 〈青島的勢力圈，1898-1937〉，《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5 年 12 月，38 頁。
- 〈北伐時期的山東戰場〉，《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臺北：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民國 75 年 12 月，35 頁。
- 〈內閣的遞嬗〉，教育部主編，《中華民國建國史》，臺北：國立編譯館，民國 76 年 3 月，第二篇第二章第二節，61 頁。
- 〈國會與選舉〉，同上，第二篇第二章第三節，64 頁。
- 〈政黨的分合〉，同上，第二篇第二章第四節，49 頁。
- 〈教育發展〉，同上，第二篇第六章第一節，92 頁。
- 〈近代思潮〉，同上，第二篇第六章第三節，52 頁。
- 〈清末民初的外資工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6（民國 76 年 6 月），82 頁。
- 〈中國近代自然科學的發軔〉，《大陸雜誌》，卷 75 期 6（民國 76 年 12 月），17 頁。
- “The Shantung Battlefield during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Winter 1987-1988, 63p.
- 〈清末民初的官辦工業〉，《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7 年 6 月，74 頁。
- 〈國民中學中外歷史教材混合編製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教育專題研究》（第一輯）。臺北：三民書局，民國 77 年，26 頁。
- 〈中國政黨史研究〉，《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7 年 6 月，15 頁。

- 〈清末民初的官督商辦工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7（下）（民國 77 年 12 月），32 頁。
- 〈近代山東的交通發展，1878-1937〉，《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Taipei: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1989, 42p.。
- 〈清初山東的地方建制，1644-1795〉，《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8 年 4 月，47 頁。
- 〈臺灣における中華民國史研究〉，《近きに在りて》，第十五號（1989 年 5 月），9 頁。
- 〈清末民初的民營工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8（民國 78 年 6 月），246 頁。
- 〈清末民初工業發展的背景分析〉，《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國 78 年 6 月，20 頁。
- 〈吳鳳的歷史地位〉，《國立編譯館館刊》，卷 18 期 1（民國 78 年 6 月），26 頁。
- 〈中國國民黨執政初期的民主困境〉，中國民主前途研討會，臺北：中國時報社辦，民國 78 年 8 月 16-18 日，20 頁。
- 〈中華民國史研究在臺灣〉，《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8（民國 78 年 9 月），12 頁。
- 〈對纂修國史的一些看法〉，《國史館館刊》，復刊期 7（民國 78 年 12 月），8 頁。
- 〈山東的農政與農業，1916-1937〉，《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8 年 12 月，38 頁。
- 〈民初軍系史研究，1916-1928〉，《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8 年，16 頁。
- 〈山東文史資料的內容分析〉，《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9（民國 79 年 3 月），12 頁。
- “Societ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 1890s-1980s,”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9（民國 79 年 6 月），42p.。
- 〈近代中國工業發展中的一些問題〉，《中國現代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0 年 3 月，26 頁。
- 〈民國初年的中國社會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0（民

- 國 80 年 6 月)，26 頁。
- 〈孫中山先生在夏威夷〉，《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 80 年 12 月，18 頁。
- 〈民國初年山東省行政制度的變革，1912-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1（民國 81 年 6 月）。
- 〈新文化運動時期對家庭問題的討論〉，《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1 年 6 月，20 頁。
- 〈孫中山的歐美經驗對中國革命的影響〉，《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期 24（民國 81 年 7 月），25 頁。
- 〈革命洪流中的地方士紳：民國建立前後的譚延闓〉，國史館編印，《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輯 14（民國 81 年 11 月），25 頁。
- 〈國民政府時期山東省的行政人員與行政效率〉，《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民國 81 年，29 頁。
- 〈黃興與孫中山之關係〉，《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討論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民國 82 年 3 月，40 頁。
- 〈中國大陸學者對民國史的研究，1949-1992〉，《興大歷史學報》，期 3（民國 82 年 4 月），23 頁。
- 〈袁世凱的仕宦階梯，1881-1911〉，《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2 年 6 月，35 頁。
- 〈臺海兩岸學者對臺兒莊戰役的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16（民國 82 年 9 月），14 頁。
- 〈民國初年的社會救濟，1912-1937：山東地區的個案研究〉，《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民國 83 年 1 月，24 頁。
- 〈曾國藩的歷史地位〉，《故宮學術季刊》，卷 11 期 2（民國 83 年 1 月），24 頁。
- 〈臺海兩岸史學發展之異同〉，《吳大猷院長榮退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國 83 年，23 頁。
- 〈帝國主義、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的角色〉，劉青峰編，《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 年，27 頁。
- 〈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宣傳：臺灣地區學者研究成果之檢討〉，余也魯、鄭學檬主編，《從零開始：首屆海峽兩岸中國傳統文化中傳的探索座談會論文集》，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 年，9 頁。

- 〈革命與認同：知識青年對孫中山革命運動的反應〉，《國家與認同：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3年6月，23頁。
- 〈胡適的學術生涯〉，《郭廷以先生九秩誕辰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4年2月，16頁。
- 〈抗戰時期中國國民黨在山東的黨務活動〉，《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84年3月，第三冊，28頁。
- 〈甲午戰爭對山東的影響〉，《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所，民國84年3月，15頁。
- 〈民主政治的發展，1945-1992〉，《臺灣近代史》，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4年6月，84頁。
- 〈山東對甲午戰爭的反應〉，戚其章、王如繪主編，《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頁。
- 〈民國初年的歷史教學及相關問題之討論〉，《近代中國》，期113（民國85年6月），14頁。
- 〈抗戰時期的魯蘇戰區〉，《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論文集》，臺北：中國近代史學會，民國85年，45頁。
- 〈北伐前後中國國民黨在山東的黨務活動〉，《中華軍史學會會刊》，期2（民國86年5月），56頁。
- 〈民國初年山東省的司法變革〉，《社會科學戰線》，期3（1997年），7頁。
- 〈晚清的山東新政〉，郝延平、魏秀梅主編，《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7年5月，49頁。
- 〈人民團體〉，國史館編印，《中華民國社會志》，臺北：國史館，民國87年，第七章，214頁。
- 〈一九二〇年代中國的政治思潮〉，《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期7（1998年），20頁。
- 〈戊戌時期的學會運動〉，《歷史研究》，期5（1998年10月），23頁。
- 〈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新聞與言論〉，王洪鈞主編，《新聞理論的中國歷史觀》，臺北：遠流出版公司，民國87年，70頁。
- 〈山東人民對巴黎和會中有關山東問題的反應〉，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編，《五四運動八十週年學術討論集》，臺北，民國88年6月，42頁。

- 〈楊度傳〉，《國史館館刊》，復刊期 26（民國 88 年 6 月），21 頁。
- 〈戰後國共衝突與美國調處：山東地區的個案研究〉，《中華軍史學會會刊》，期 5（民國 88 年 12 月），26 頁。
- 〈德據時期的青島教育：一個中國學者的觀點〉，Hermann J. Hiery and Hans-Martin Hinz, eds., *Alltagsleben und Kulturaustausch: Deutsche und Chinesen in Tsingtau, 1897-1914*, Berlin: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1999, 10p.。
- 〈留美歸國學生與中國領導階層〉，李又寧主編，《華族留美史：150 年的學習與成就》，紐約：天外出版社，1999 年，33 頁。
-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的回顧〉，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 89 年，52 頁。
- 〈戰後國共戰爭在山東的一幕：青島及山東之守備與撤退（1945-1949）〉，國史館編印，《1949 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民國 89 年，74 頁。
- 〈民國初年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山東之例（1912-1916）：對《政府公報》中有關資料的初步分析〉，《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民國 89 年，62 頁。
- 〈中國留日學生的經歷與見聞（1896-1945）：以回憶錄為主體的探討〉，衛藤瀨吉主編，《共生から敵對へ：第四回日中關係史國際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東京：東方書店，2000 年 8 月，28 頁。
- 〈戰後國共勢力在山東地區的軍事對抗：對日受降與接收時期〉，中華軍史學會編印，《二十世紀中國戰爭與政治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民國 89 年 12 月，28 頁。
- 〈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留美學生的經歷與見聞〉，《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論文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90 年 3 月，52 頁。
- 〈對大學歷史教育的一些看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編印，《歷史教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民國 90 年 6 月，11 頁。
- 〈青島的政權轉移與工業發展（1929-1949）〉，《薪火集：傳統與近代變遷中的中國經濟：全漢昇教授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臺北縣板橋市：稻鄉出版社，民國 90 年 6 月，67 頁。
- 〈政權轉移與青島工業發展（1898-1928）〉，《山東文獻》，卷 27 期 2（民國 90 年 9 月），22 頁。

〈東吳大學在近代中國史上的意義〉，東吳大學編印，《東吳大學建校百年校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民國 90 年，16 頁。

編纂

《清季革命運動期刊敘目選輯》（與李又寧、余秉權合編），華盛頓：中國資料研究中心，民國 59 年，168 頁。

〈近代中國書報錄，1811-1913〉，《新聞學研究》，期 7-9（1971 年），131 頁。

〈清季科學期刊敘目選輯〉，《新知雜誌》，2 年 5-6 期；3 年 1-6 期；4 年 4 期（民國 60 年至 63 年），176 頁。

《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與李又寧合編）。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64 年，1545 頁。

《中國現代史論集》（共 10 輯），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 69 年至 70 年。

《中國婦女史論文集》（與李又寧合編），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 70 年，452 頁。

《晚清革命文學》，臺北：經世書局，民國 70 年，264 頁。

〈臺南市和高雄市收藏有關臺灣史料初步調查報告〉（與張瑞德合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2（民國 72 年 6 月），6 頁。

《清末民初期刊彙編》（7 種，26 冊），臺北：經世書局，民國 74 年 9 月。

《中國婦女史論文集》（輯 2）（與李又寧合編），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 77 年，608 頁。

《中國歷史人物》，計名君評傳 6 冊，昏君評傳 6 冊，名臣評傳 6 冊，奸臣評傳 4 冊，名將評傳 6 冊，廉吏評傳 3 冊，臺北：萬象圖書公司，民國 81 年至 82 年。

《中國現代自傳叢書》（與張瑞德合編），臺北：龍文出版社，第一輯，11 種，22 冊，民國 78 年 6 月；第二輯，10 種，17 冊，民國 79 年 5 月；第三輯，12 種，18 冊，民國 82 年 7 月；第四輯，14 種，18 冊，民國 83 年 12 月。

《中國現代史叢書》（15 種），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 83 年至 88 年。

《山東人在臺灣叢書》（15 冊），臺北：吉星福張振芳文教基金會，民國 86 年至 90 年。

《山東人在臺灣：學術篇》，臺北：吉星福張振芳文教基金會，民國 86 年

3月，448頁。

《山東人在臺灣：教育篇》（與井敏珠合編），臺北：吉星福張振芳文教基金會，民國87年6月，665頁。

《山東人在臺灣：黨政篇》（與李雲漢合編），臺北：吉星福張振芳文教基金會，民國88年，599頁。

《中華民國人民團體調查錄》（與李榮泰合編），臺北：國史館，民國88年，684頁。

書評

〈評《中國革命的基石，1905-1906——中國同盟會小史》〉，《新知雜誌》，1年3期（民國60年6月），4頁。

〈《從傳記文學到傳記史學——評介李雲漢先生近著三種》〉，《新知雜誌》，3年6期（民國61年12月），4頁。

〈評介石約翰著《德國在山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3（民國64年2月），10頁。

〈學者對清代傳統思想的思考〉（評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陸寶千《清代思想史》），《出版與研究》半月刊，期27（民國67年8月1日），6頁。

〈重讀《中共興亡史》〉，《中國論壇》，卷6期11（民國67年9月10日），4頁。

〈評介黃著《中國近代學術思想變遷史》〉，《時報周刊》，民國68年2月18日，2頁。

〈評《五四與中國》〉，《中國時報》副刊，民國68年9月11日。

〈評介岩村三千夫著《現代中國的歷史》〉，《中國現代史論集》（輯1），民國69年3月，3頁。

〈評介派氏《軍閥政治》〉，《中國現代史論集》（輯2），民國69年3月，12頁。

〈評吳相湘著《民國史縱橫談》〉，《中國時報》副刊，民國69年8月26日。

〈評介尾笹德司著《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中國現代史論集》（輯6），民國70年3月，3頁。

〈評介兩部有關中日戰爭的日本論著〉，《中國現代史論集》（輯9），民

- 國 69 年 3 月，7 頁。
- 〈評介森下修一著《國共內戰史》〉，《中國現代史論集》（輯 10），民國 71 年 3 月，5 頁。
- 〈評介包德威著《中國城市變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1（民國 71 年 7 月），18 頁。
- 〈《西潮》的史料價值〉，《傳記文學》，卷 41 期 2（民國 71 年 8 月），2 頁。
- 〈章開沅、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一）。臺北：國史館，民國 75 年 6 月，23 頁。
- 〈史卡拉賓諾、于子橋合著《現代中國及其革命進程：對傳統秩序的不斷挑戰，1850-1920》〉，《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3（民國 76 年 3 月），6 頁。
- 〈郭廷以著《近代中國的變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4（民國 76 年 9 月），5 頁。
- 〈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國史館館刊》，復刊期 3（民國 76 年 12 月），9 頁。
- 〈王守中著《德國侵略山東史》〉，《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6（民國 77 年 9 月），3 頁。
- 〈李聯海、馬慶中著《一代天驕：孫中山傳記》〉，《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十）。臺北：國史館，民國 82 年 6 月，18 頁。
- 〈尙明軒著《孫中山的歷程——一個偉人和他的未竟事業》〉，《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輯 24），臺北：國史館，民國 89 年 12 月，30 頁。

主譯

- 林滿紅、朱泮源等合譯，《現代中國史》，臺北：經世書局，民國 69 年 9 月，265 頁。
- 陳曾熹著、陳勤譯，《五四運動在上海》，臺北：經世書局，民國 70 年 5 月，249 頁。
- 洪德先、黃克武、王明珂等譯，《劍橋中國史：晚清篇》，上、下冊，臺北：南天書局，民國 76 年 9 月，上冊 798 頁，下冊 780 頁。
- 劉敬坤、潘君拯等譯，《劍橋中國史：民國篇》，上冊，臺北：南天書局，民國 88 年 6 月，1137 頁。

翻譯

- 〈孫逸仙博士的一篇回憶錄〉，《新知雜誌》，1年1期（民國60年2月1日），10頁。
- 〈麥高邁訪問孫逸仙臨時大總統記〉，《新知雜誌》，1年3期（民國60年6月1日），5頁。
- 〈馬江海戰紀實〉，《新知雜誌》，1年4期（民國60年8月1日），34頁。
- 〈史家借用社會科學從事新探索〉，《新知雜誌》，1年5期（民國60年10月1日），5頁。
- 〈新中國的領袖——孫逸仙〉，《新知雜誌》，1年5期（民國60年10月1日），2頁。
- 〈李漢魂夫人在美國〉，《新知雜誌》，2年1期（民國61年2月1日），2頁。
- 〈臨時大總統孫逸仙的就職和退位〉，《新知雜誌》，2年3期（民國61年6月1日），6頁。
- 〈賽珍珠的一生〉，《新知雜誌》，3年5期（民國62年10月1日），8頁。
- 〈婦女與現代文化〉，《新知雜誌》，4年5期（民國63年10月1日），10頁。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四期

- | | | |
|--|------|--------|
| 論文 | 319頁 | 平裝250元 |
| 曹天忠：國民基礎教育與廣西基層社會建設 | | |
| 余敏玲：蔣介石與聯俄政策之再思 | | |
| 張寧：在華英人間的文化衝突：上海「運動家」對抗「鳥類屠害者」，1890-1920 | | |
| 巫仁恕：節慶、信仰與抗爭——明清城隍信仰與城市群眾的集體抗議行爲 | | |
| 洪秋芬：日治初期葫蘆墩區保甲實施的情形及保正角色的探討（1895-1909） | | |
| 許文堂：十九世紀清越關係之演變 | | |



研究概況

關於大陸中蘇（俄）關係和蘇聯、俄羅斯 問題研究的介紹^{*}

李嘉谷·張盛發^{**}

李嘉谷：

今天就我所知道的大陸中俄、中蘇關係史研究的大致情況說一說，以供參考。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中國共產黨實行「一邊倒」的親蘇政策，中蘇兩國簽訂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蘇聯大力援助中國建設。中國共產黨在宣言上自然強調中蘇友誼，當時有一句鼓舞老百姓的話叫「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一切都向蘇聯學習，連學校給學生判分也改用五分制。爲了宣傳中蘇友好，彭明寫了一本《中蘇友誼史》，自然只講中蘇友好的一面。當時大陸出版物也很少提到沙俄侵占中國大陸領土的事實，1957年反右派鬥爭時，就有人因提出「唐努烏梁海」的領土問題被劃爲「右派」。

但歷史真會捉弄人。時間很快進入20世紀60年代，由於中蘇關係的迅速惡化，從意識形態爭論擴大到了國家關係，中蘇兩國漫長的邊界上糾紛不斷，中蘇兩國開始邊界問題談判。¹爲配合中蘇邊界談判，1964年中

* 編者按：本文係2002年1月14日，北京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李嘉谷先生、東歐中亞所張盛發先生應邀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項關於近代中俄關係史研究的座談會上所發表的引言。李嘉谷與張盛發先生的講演對近年中國大陸中蘇關係史的研究現況頗具參考價值，今徵得二位先生的同意，將座談會講稿刊出，以饗同行。

** 李嘉谷，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盛發，中國社會科學院東歐中亞研究所蘇聯研究室主任。

¹ 關於中蘇兩國邊界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歷史懸案，早在1924年5月31日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時，就規定限期召開中蘇會議，以解決由於沙皇俄國侵略中國造成的兩國懸案，其中邊界問題自然是兩國重大歷史懸案之一。但由於當時北京政府政局不穩，蘇聯同時支持中國

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一個研究中蘇邊界歷史問題的研究組，從各地調集人才，由外交部一位官員與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所長黎澍領導，為中蘇邊界談判提供歷史諮詢。到 20 世紀 70 年代初，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便以這個研究組成員為基礎成立中俄關係史研究室，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承擔了編寫一部沙俄侵華史的任務，這便是數年後完成的，由余繩武主編的《沙俄侵華史》第 1-4 卷。由於清算沙皇俄國侵略中國的歷史，是毛澤東的指示，當時在文化革命中無事可做的許多史學工作者紛紛投入中俄關係史的研究工作，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吉林省師範大學歷史系等都寫了沙俄侵華史，西北地區的史學工作者編寫了《沙俄侵略中國西北邊疆史》，內蒙古的史學工作者編寫了《沙俄侵略我國蒙古地區簡史》，北京師範大學寫了關於中俄尼布楚條約的專著等等，發表了大量關於中俄關係史的研究論文。同時，為了深入研究中俄關係史，還從俄文、英文、日文等外國文翻譯出版（內部發行）了數十種有關中俄關係史的前人著述與史料，在中國大陸掀起了一個空前的研究中俄關係史的熱潮。中國學者以無可辯駁的大量歷史事實證明，沙皇俄國確實侵略了中國，侵占了中國的大片領土，這不僅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甚至早年的史達林都已指出過的事實，蘇聯早期的歷史學者也作過明確的撰述。但自 20 世紀 30 年代中期起，蘇聯領導人與蘇聯史學界便否認這一歷史事實，直至蘇聯解體都未變。但歷史的事實終究是無法改變的。²中國大陸學者對中俄關係史的這一空前的研究熱潮，無疑為這一課題的深入研究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以後，由於文化革命的結束，史學研究領域的拓展，中俄關係史研究逐漸退潮。自然仍有少數人在進一步深入研究。

隨後，一部分史學工作者轉而開始研究中蘇關係的歷史。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從 1979 年起便開始收集中蘇關係史資料，我本人自 1982 年

南方的革命政府，因此蘇聯也無誠意解決兩國歷史懸案，特別是兩國邊界問題。當時北京政府曾提出以 1689 年簽訂的中俄尼布楚條約劃分兩國邊界的方案，遭蘇方拒絕。解決兩國歷史懸案的中蘇會議則於 1926 年 9 月流產。

² 當時中國政府對中蘇邊界歷史問題的態度是：要蘇聯方面承認，19 世紀中葉以後，沙皇俄國與中國簽訂的一系列條約的不平等性質，沙皇俄國侵占了中國的領土。但中國政府以為這是在中俄兩國人民都處於無權的情況下發生的事實，因此中國政府認為，中蘇兩國的邊界可依這些不平等條約為基礎劃定，中國並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國根據這些不平等條約割去的中國領土。但對於違反這些不平等條約侵占的領土，原則上應予歸還。

初參加這一工作，這就是後來編輯出版的薛銜天等合編的《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匯編》(1917-1924)、本人編的《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匯編》(1933-1945)、薛銜天編的《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匯編》(1945-1949)，遺憾的是中間缺了一本，即1925-1932年的一本。本人在編輯資料的基礎上寫了兩本書，即《中蘇關係(1917-1926)》，另一本是《合作與衝突——1931-1945年的中蘇關係》。在此前後，大陸出版了多部中蘇關係史著作，如林軍著《中蘇外交關係，1917-1927》、王真著《動盪中的同盟——抗戰時期的中蘇關係》、羅志剛著《中蘇外交關係研究(1931-1945)》、田保國著《民國時期中蘇關係(1917-1949)》，以及從中國共產黨黨史角度寫的中蘇關係史，如楊奎松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等。同時，大陸學者發表了大量中蘇關係史的研究論文。這些著作與論文一反過去的禁忌，都力求實事求是地論述中蘇兩國關係的歷史。近年黃修榮主編的關於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大型資料集（目前已出了六冊，除翻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俄文資料集外，還另編了中文文件資料）的陸續出版，無疑對中蘇關係史的研究是一個有力的推動。另外，中國社會科學院東歐中亞研究所的中俄（蘇）關係史檔案資料課題組則正在廣泛收集中俄（蘇）關係史的檔案資料，除從俄羅斯收集中蘇外交檔案外，這次又派張盛發先生和我來臺北收集1911-1949年的中俄（蘇）關係檔案資料，得到臺灣檔案部門與學者的大力協助，我們由衷表示感謝。

目前，中國社科院東歐中亞所的這個課題組已完成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清代中俄關係檔案資料的編輯工作。我們希望與臺灣同行不僅在編輯有關資料上合作，而且今後能在中俄（蘇）關係史研究的某些方面進行合作。

張盛發：

李嘉谷先生前面已經介紹了有關中蘇關係研究的歷史情況。所以，我將接著介紹一些中蘇中俄關係研究的現狀，以及蘇聯和俄羅斯問題研究的情況。

一、中蘇關係研究

大陸的中蘇關係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等地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機構。譬如，外交學院、北京大學等；中國社會科學院東歐中亞所、近代史所、當

代史所，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獻研究室等。

中蘇關係研究實際上是在不同的學科領域裏被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研究的。大致是：

第一、在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的範圍裏研究中蘇兩黨和中蘇兩國的關係。中央黨史研究室的章百家先生和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李捷先生，在這方面都有獨到的研究成果。

第二、在中國現代史和當代史的範圍裏，從中外關係史的角度研究中蘇關係。譬如，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薛銜天先生、楊奎松先生（現在北京大學任教）、李嘉谷先生、陳春華先生等，他們既編纂過一些重要的中蘇關係史文獻資料，也寫過很具影響的專著和論文。當代史所李丹慧女士撰寫的有關中蘇關係的論文也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三、在專門的中國外交史範圍裏研究中蘇關係。較有分量的是斐堅章先生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有關中蘇關係的部分；外交學院林軍先生撰寫的有關中蘇和中俄關係的兩本專著，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第四、在國際關係史範圍裏研究中蘇關係。譬如，中國史學會東方歷史研究中心沈志華先生、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牛軍先生、東歐中亞所張盛發先生、國際關係學院戴超武先生等，近年來他們根據新公佈的檔案材料所撰寫的一批專著和論文在史學界產生了重大的反響。

第五、在蘇聯史或者俄國史的範圍裏研究中蘇關係。東歐中亞所蘇聯研究室目前正在進行的蘇聯史專題研究專案中的《蘇聯外交史》和《蘇聯與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史》，都包含著有關中蘇關係的重要內容。

歸納起來說，中蘇關係實際上是在中國史、蘇聯史和國際關係史三個大的學科範圍裏被學者們進行研究的。由此就產生了三個研究對象：中蘇關係、蘇中關係、國際關係史上的中蘇關係或蘇中關係。

在三個不同的學科範圍裏研究中蘇關係，會有什麼區別或差別嗎？我認為是有的，而且有時候是重大差別。

首先是，不同學科的研究者掌握和運用史料的側重點不同。從中國史角度研究中蘇關係的學者，他們掌握中國方面的史料多一些。但另一方面，對外文檔案的掌握則相對薄弱，尤其是俄羅斯新披露的檔案文獻，常常要在翻譯成中文後才能使用。當然，反過來，從國際關係史和蘇聯史角度研究中蘇關係的學者，在挖掘和使用中文檔案材料方面則稍顯薄弱。其次是，因為檔案掌握和使用的側重點不同，對同一個問題的闡述會有一些

重要的差異。再次是，在不同學科範圍裏研究中蘇關係的學者，因為平時的專業研究重點和視點不同，他們的思維方式也有不小的差異。

如何看待這些差別呢？我認為，第一、很正常。第二、不同學科的中蘇關係研究者必須加強學術交流和磋商，首先是資料上互通有無和相互借用。其次是在觀點上經常交流，相互尊重並且取長補短。如果不同學科的研究者們能夠在中蘇關係研究方面通力合作，那對繁榮中蘇關係研究肯定是大有益處的。

1.大陸方面的中蘇關係史料問題。除了中央檔案館和第二檔案館，從學術研究之需搜集中蘇關係檔案文獻的主要單位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東歐中亞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東歐中亞所的「中蘇關係檔案課題組」是由我們所長李靜傑先生主持的。該課題組收藏的中蘇關係檔案文獻，其時間跨度自清朝末期一直到現代；從文字載體來說，既有中文的，也有俄文和英文的。該課題組幾年來一直在搜集和整理有關的檔案文獻，準備最終編纂和出版多卷集的《中蘇關係檔案選編》。此次，張盛發和李嘉谷先生中研院近史所之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搜集臺灣方面所收藏的有關中蘇關係方面的檔案文獻，以使《中蘇關係檔案選編》從內容上講更為充實和完整。

2.大陸中蘇關係研究的成果。前面提到的一些研究單位和學者在中蘇關係研究方面都有可觀的成果展現。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有：沈志華所著的《中蘇關係與朝鮮戰爭研究》等、楊奎松所著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我個人所著的《史達林與冷戰》一書有關中蘇關係的內容。另外，我這幾年撰寫的三篇論文是：〈建國初期中蘇兩國的齟齬和矛盾及其歷史淵源〉、〈從消極冷漠到積極支援——論 1945-1949 年史達林對中國革命的態度和立場〉、〈50 年代初期中蘇共同抵制美國主導的對日媾和〉，它們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3.大陸學者正在進行的中蘇關係研究。據我個人所知，較為重要的研究專案主要是：沈志華和李丹慧正在撰寫的《中蘇關係史》、近代史所已經立項的 4 卷集《中蘇關係史》、東歐中亞所在檔案整理和編纂完畢後將要立項的多卷集《中蘇關係史》。此外，我個人準備在手頭已有的專案完畢後審報《史達林與中國》的課題。該主題的初步設想是：以中文、俄文和西文三方面的史料為基礎，研究和探討史達林有關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史達林模式是如何在中國大地上根植和演變的、史達林主義究竟對中華民族的命運和發展道路產生了什麼影響？

二、俄羅斯問題和中俄關係研究

俄羅斯問題和中俄關係屬於現狀研究，大陸有許多高校和科研機構研究這方面的問題。主要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東歐中亞研究所和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國際關係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俄羅斯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吉林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等等。應當說，東歐中亞所在這方面是一個很重要的研究機構。該所設有俄羅斯政治和文化研究室、俄羅斯經濟研究室、俄羅斯外交研究室。另外，還設有東歐研究室、烏克蘭研究室、中亞研究室等。也就是說，以前的蘇聯東歐盟國和現在的獨聯體國家都是我所的研究對象，其中轉型時期的俄羅斯政治、經濟、外交和文化是我所研究的重點。這方面重要的成果有所長李靜傑先生擔任總主編的5卷本的《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政治卷、經濟卷、軍事卷、外交卷和人物卷）。九一一事件後，隨著中亞戰略地位的突出，中亞研究也是我所的重點研究之一。

在俄羅斯外交研究中，中俄關係是一個重點課題。所長李靜傑先生和俄羅斯外交研究室主任鄭羽先生的研究成果令人矚目。他倆主編的《俄羅斯與當代世界》是一本很有分量的專著。

三、蘇聯史研究

蘇聯問題研究在中國可以說一直是研究熱點。我個人認為，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蘇聯史不是一門簡單的國別史，起碼是半部世界史。如果說歐美文明在整個20世紀代表著人類社會的一個發展方向的話，那麼，十月革命後在蘇俄和蘇聯所發生的一切，則反映了尋求人類社會另一種發展道路的願望和實踐。當然，它最後失敗了，但無論如何，它的實踐對20世紀人類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並且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對蘇聯歷史的研究和總結，實際上也是對20世紀世界歷史的研究和總結，20世紀的世界歷史與蘇聯歷史具有密切的聯繫。最近，我得到的消息說，國際學術界正在醞釀建立一個單獨的蘇聯學。而美國芝加哥大學準備在今年5月下旬召開一個國際學術會議，題目就是“Soviet Global Impact:1945-1991”（1945-1991年蘇聯的全球影響）。這表明，儘管蘇聯已經解體，但國際學術界對它的研究並沒有降溫，相反可以說方興未艾。

其二、因為中國曾經走過和蘇聯相同的道路，並且蘇聯的實踐對中國

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所以，蘇聯問題研究在中國學術界具有它獨特的地位。據統計，從改革開放以來，有關蘇聯史研究的論文約有 400 多篇，專著幾十部。

通史類的著作主要有：

陳之驊主編，《蘇聯史綱》（1917-1937 年）、（1953-1964 年），人民出版社，1991 年、1996 年。

周尙文、葉書宗、王斯德主編，《蘇聯興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陳之驊主編，《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

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5 卷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年。

專題性著作主要有：

劉克明、金暉主編，《蘇聯政治經濟體制 70 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

葉書宗、張盛發，《錘子和鐮刀——蘇維埃文化和蘇維埃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臺灣淑馨出版社，1991 年，繁體版）。

沈志華，《新經濟政策與蘇聯農業集體化道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

馬龍閃，《蘇聯文化體制沿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年。

姜長斌，《史達林政治評傳》，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 年。

鄭異凡，《布哈林論稿》，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 年。

金雁，《蘇俄現代化與改革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 年。

鄭羽，《從對抗到對話——赫魯雪夫執政時期的蘇美關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

張盛發，《史達林與冷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臺灣淑馨出版社，2001 年，繁體版）。

下面我著重講一講蘇聯史檔案的搜集、整理和編纂，以及在此基礎上撰寫新版蘇聯史的準備情況。

蘇聯解體後，隨著蘇聯檔案的公佈，大陸的蘇聯史學界就開始了蘇聯歷史檔案的搜集、整理和編纂工作。90 年代初期，在沈志華先生的倡議和資助下，成立了一個「蘇聯歷史檔案課題組」。其成員基本上為大陸研究蘇聯歷史的一些著名專家和學者。他們是鄭異凡先生、徐天新先生、葉書宗先生、楊存堂先生、沈志華先生、姚海先生、金雁女士，外加一個我。

我是在 1995 年到北京外交學院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參加該課題組工作的。課題組到美國和俄羅斯等國搜集了大量解密的蘇聯歷史檔案。現在，經過差不多十年的時間，蘇聯歷史檔案的搜集、整理、翻譯和編纂工作已經完成。編纂了 34 卷的《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由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去年底和今年 6 月份分兩批出版。蘇聯歷史檔案的出版，相信是大陸蘇聯史研究領域的一件大事，可能會掀起蘇聯問題研究的一個高潮。

在整理檔案的同時，該課題組在前幾年已經開始規劃撰寫新的蘇聯通史。寫作提綱幾易其稿後，於去年最終確定下來。這套《蘇聯通史》共有 9 卷本，從十月革命到戈巴契夫時期，基本上按照年代編寫。其成員除上述作者外，最近又補充了左風榮女士和吳偉先生。

此外，東歐中亞所的蘇聯研究室在去年承擔了院 A 類課題：蘇聯通史。該課題由我主持和主編。與按年代編寫的《蘇聯通史》不同，該課題將以專題的形式編寫蘇聯通史。經設計後該課題的正式名稱為：《蘇聯史專題叢書》（8 卷本）。計有：蘇聯政治史、蘇聯經濟史、蘇聯外交史、蘇聯軍事史、蘇聯文化史、蘇聯民族關係史、蘇共黨的建設史、蘇聯與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史。

承擔上述課題的蘇聯研究室擁有的主要優勢是：第一、研究室人員陣容齊整。五位中青年研究者全為博士，其中一位研究員，三位副研究員，一名助理研究員。第二、擁有的檔案文獻相對齊全。除了將要出版的《蘇聯歷史檔案選編》34 卷可以利用外，該室還擁有俄羅斯雅可夫列夫民主基金會主編的《蘇聯歷史專題檔案》。根據東歐中亞所和該基金會簽訂的版權協定，該基金會將向我們提供所出檔案的複本。原先他們計劃出 40 卷，其中 10 卷已經送給我們。據說最後可能出到 80 個專題，也就是 80 卷。這樣，除了正在出版的《蘇聯歷史檔案選編》，我們蘇聯研究室還擁有俄羅斯正在出版的 80 卷專題檔案和大量的中蘇關係檔案。擁有如此的資料優勢，我們確實很有信心。

《蘇聯史專題叢書》的基本要求是必須使用 80% 以上新公佈的蘇聯檔案文獻，並規定四到五年內完成。我認為，按年代和按專題撰寫的兩套蘇聯通史將會相互補充和相映成輝。

這段時間裏，我們在搜集檔案的同時，也與臺灣一些大學的俄羅斯研究所進行了學術交流並且建立了學術聯繫。我個人認為，在蘇聯和俄羅斯問題研究方面，在中蘇關係研究方面，大陸和臺灣的研究機構之間存在著

很大的合作基礎和合作空間。合作的形式可以有：檔案文獻交流和互換；互派人員進行講學和舉辦學術講座；合作研究某個具體的課題；定期舉行學術研討會等等。

最後，我願借此機會衷心感謝貴所和呂所長本人對我們在這裏逗留期間所給予的各種關照和方便。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86)

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

張壽安著

461頁 精裝400元 平裝350元

本書討論十八世紀的禮學思想，一方面關注清儒禮學思想與宋明天理觀念下禮思想之間的差異，包括原則面與制度面，以觀察十八世紀禮學思想在前近代史脈絡裡所可能出現之突破。一方面更注目十八世紀知識界對宗法秩序和宗法理念所提出的質疑，這些質疑留下極大的開放空間，令回應成為舊知識轉型與新知識援引的多向可能。

本書分別從明清禮學轉型、親親尊尊二系並列、為人後、嫂叔服制和婚禮五個議題，對清代禮學之特質進行討論。撮要而言：「親親尊尊」挑戰的是程朱理學「天理」觀念下的「尊尊」獨尊，然內裡質疑的卻是何謂「君權」？「為人後」訴求的是「親親」價值的提昇，使與尊尊等列；然內裡焦慮的，則是如何維持「政統」之獨立？使宗統不犯君統。「嫂叔服制」質疑的是「兄公弟妻」之間的情義表達？底子裡挑戰的則是「男女別嫌」觀念界域之重新界定。「成婦？成妻？」解答了無合體即無夫婦、無夫婦即無婚姻，反對「室女守貞」；然內裡攻擊的卻是視「成婦重於成妻」的家族式婚姻觀念，為男女人倫之情欲求得伸張。

清代禮學復興，對儒學思想而言，不只是理學轉型，更是禮學轉型。禮學成為十八世紀以降儒學思想的主軸，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揭示了儒學思想的另一種型態：經驗界的秩序。這種直指經驗世界之秩序安排的思想，因其兼具理念與形式，故在展開時，與理學產生必然之歧異。禮與理對話，成為儒學思想的另類交鋒。此一儒學型態的開拓，不僅能解答學界極為關切的「禮教議題」，更能呈現禮經（經典詮釋）、禮制（歷代律令）、和禮俗（各地風俗）三度空間在歷史時間脈絡裡交互影響的複雜互動，從而為儒學思想史展開人倫日用經驗面向的另一章。

本刊「研究概況」欄，歡迎讀者撰文介紹各學術機構有關中國近現代史之研究情況，以及對各個研究領域進行回顧與檢討。



史料介紹

《莊農雜字》所反映的農民生業生活

王爾敏*

我今時要介紹一本清代人記錄的農村耕稼生活細節的傳抄小冊，是流傳在山東鄉村的一種傳統農業知識的重要教材，是五言體一韻到底的記誦之詩歌。換言之，是使農人便於記憶，所有農村中大大小小知識，都便於熟習。反過來看，這正是飽富農村生產知識經驗的老農可以一一順口指畫的具體法則。我們學界一心發掘研究中國傳統農業的學者，若果漏了這些農人最親身最直接累積的經驗，所做研究豈不錯失了重要論證。

本人七歲入學，在開始的兩週啓蒙階段，也讀誦完一種《四言雜字》。起頭一句是：「油鹽醬醋，蒸酒燒黃。」其實這是我們一個地區的通行本，其他地方本子，並不相同，如《常用雜字》開首一句是：「人生世間，耕讀當先。」（此書近十餘年間重刊問世，收入《蒙學全書》64-71頁。）其實雜字之書早創生於南北朝時代，南宋陸游詩的自注提到童蒙誦讀《雜字》之事。不過明清時代童蒙記誦的《雜字》各種讀本文字全不相同，但內容則大多雷同。實集中提供平民日常生活中種種知識，可以擴及於士農工商各類社群日常需用的器物品類與文字表達。一般做小商販者恃此知識，便於記帳，便於辦事，利於應世。故其內涵包羅十分龐雜多樣。

中國記誦之學的韻語安排，包括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者多有，而表達語意俱能鮮明清澈，各逞其一定聲調抑揚。宗旨俱在於長期記誦而不忘，故廣為啓蒙幼教使用，亦可見出中國文字表達之重大特色。

我得到《莊農雜字》一書，是門人宋秉仁博士在大陸家鄉代我搜集而來。其第一個特色，是向未刊布，只流行於山東沂水地區的一個抄本，自是學界向未經見。第二個特色最重要，這本小冊是純粹屬於農人知識經驗的記錄，比之一般性的「四言雜字」要專門而唯農為宗。第三個特色，是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全書二千三百七十字，一韻到底，表現五言一韻長篇詩章。第四個特色是最精華所在，就是一律粗俗鄙俚土話，比之《四言雜字》、《常用雜字》更爲鄙俚粗糙。其中自有不少難倒學者的文詞名號，要大費訓解，方能理清。

本人才疏學淺，閱讀此冊，面對這樣前代少人理會的小書，決不敢冒充真懂，現在可以大致略舉解例，以就教於海內方家。

例一：

開凍先出糞，製下鐵合楸。

試解：春來解凍之時，要把糞肥出放田中。首先要做好鐵製的爬鐵，並木製大木楸（這是民間土用字），以利爬糞灑糞。

例二：

二人齊上鞞，推了十幾天。

一個撒著糞，一個就擰鞭。

撒繩皮抓口，籠嘴荆條編。

拖車載犁耙，鏡頭犁子按。

試解：此係農田耙地翻土撒糞肥工作。「擰鞭」是揮皮鞭趕牛驢的姿勢。「撒繩」駕控牛馬，套住牛馬頭口，以使就範。「籠嘴」係硬荆編成的牛頭套口，並不緊箍牛口而使之不能隨意食草，另有「馬口嚼子」是專門拴在馬口中一條橫鐵塊，亦使之不能隨地食草。紀元前四世紀，《莊子》書中講到絡馬首穿牛鼻，就是古人已有駕馭牛馬之法。耙地之犁子，是用鏡頭裝在犁子頭上，以利翻地皮。

例三：

帶著打桑斧，梯几抗在肩。

捎桑把蠶喂，省把工夫耽。

枝子俱繩細，葉子鈔刀刪。

蠶盛多打箔，葦席須要寬。

老眠要做繭，簇了用密苫。

鹽須早駝下，入瓮把繭淹。

試解：這是採桑、取葉、芟枝並餵蠶，上鋪葦席，使之生長並上簇結繭，然後鹽淹入瓮，便於繅絲的一套養蠶煮繭取絲之法，是農家副業。

例四：

急趕到北嶺，綿花白番番。
 豆角正該摘，穉(豇)豆角子乾。
 割谷(穀)鏟查子，藟秫(黍)又中刊。
 黍子鑿苕苗，菜豆緊用搬。
 黃黑豆鋪子，好上盡心看。
 惟有蕎麥晚，打來褶子圈。

試解：此是秋收雜糧種種名色，包括高粱、黍子、蕎麥、棉花以及黃豆、黑豆、菜豆、豇豆各樣豆類。有一個重要詞句須解，就是「褶子圈」。褶，音穴，ㄊㄩㄝˊ，是中國民間以及官府倉困普遍使用的囤糧工具。一般係由蘆葦枝或高粱桿外皮編成粗糙蓆片，寬八吋左右而長達五、六丈。多不用竹篾，因用竹太貴。此可見中國所創最省錢而有成效的囤糧之法，凡倉困或露天囤糧，其最下可用粗重的大小不同的荆條編筐，下鋪草蓆，即可將麥穀傾入，不待其滿，即加圈褶子。隨糧穀增多而一一加圈褶子，隨之升高，可達屋樑之下。如為露天若中國東北大豆困倉，為向來最大，上搭天柵防雨，取糧須登梯上下。即民房糧倉褶子亦必須登梯取糧。大抵自秦始皇統一起，京畿須靠關東輸糧，故在滎陽黃河岸設穀倉囤糧，再運關中，其時或即已用褶子。

關於囤糧褶子這一種事物，近世農學史家以及經濟物產史家未嘗有一毫提及。此在中國農產與儲存技術而言，是一種古老的最優越之發創與長期傳承，直迄於抗日戰爭前後，一向為農家以至官方倉儲的便宜工具。甚至今時東北大豆儲倉，其屯困十分龐大，仍然是用褶子圍圈。大批官家倉困，其巨量與持久，當始自秦統一後之漕轉關東梁黍。漕則水運，轉則陸運，在入關中之道，除利用渭河，尚須一段陸運，因是在漕船終點之黃河南岸須置倉囤，以備陸轉。其中最著名者即是敖倉。褶子圈成困囤，可大可小，可高積一二丈。既有此方便，並且其費用低廉，編製易並可重複使用。入西漢時代，《史記》所謂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自是以褶子儲糧的散裝倉儲寫照。明清兩代年年漕運四百萬石，船抵通州即將漕糧分存通州倉及京倉，其

囤儲之法，當仍用褶子。故願在此略作說明，以使學者知其重要。

舉例只是略事提示其一二重點，而此冊雖小，卻包羅農家生產全面活動。收麥、收秋，各樣菜蔬水果，進而更概述其生活飲食，婚娶穿戴，過冬過年，種種物用。內容豐富，各樣齊備。此在昔時少人過問，更嫌其鄙俚淺俗，自然向受冷落，本人特願介紹，以其純為農家實錄，凡若研究農民生活，此類直接史料最缺，抑且其純出自實況描寫，豈有任何粉飾。故而知其有用。起首句開宗明義：「人生天地間，莊農最為先。要記日用賬，先把雜字觀。」真是一派上智大師口氣，毫不自我鄙薄，豈畏文人舞文弄墨，諷喻嘲笑？此冊雖小，亦可當一門獨創之作，正是草野英華，遺棄當世。

全書最大特色，是錯字別字俗字大排長龍。我想凡用者必能辨識，我不必一一改正，以免失真。細審此書文句，當草作於清代中後期，山東移民頻繁出入於中國東北地區之時，故其中有「綿鞋滿洲襪」、「滿洲饅似拳」和「板橙滿洲杙（几）」等句。此是我個人推斷的說法，願負學術之責。想想作者出於鄉鄙農夫之手，向來文家豈會顧視！惟待學界識家，用其智慧進而採擇，這纔是真正出於芻蕘，草野之逸獻。

這是一本傳統農村中生活教材，文字雖少，內容包羅甚廣，一一皆為生活上所應需，自無一毫虛言。似此教材，海內所存極稀，高人原不顧視，眼見其化為腐塵，不忍令之滅絕，特陳示於學界，以供採擇。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五日

寫於善刀書屋

莊農雜字

人生天地間，莊農最為先。要記日用賬，先把雜字觀。
你若待知道，聽我講一篇。開凍先出糞，製下鋤合楸。
扁担槐木解，牛筐草繩拴。抬在南場裡，倒碎使車搬。
糞箕太也大，春天地又暄。祇得把牛套，拉繩丈二三。
肚帶省背鞅，搭腰四指寬。二人齊上鞵，推了十幾天。
一個撒著糞，一個就擰鞭。撇繩皮抓口，籠嘴荊條編。
拖車載犁耙，鏡頭犁子按。耨條溼的好，索頭連橫杆。

蓑衣防備雨，筆笠釘上圈。驢將轡頭帶，牛把韉繩拴。
領墒黑罩角，先去耕河灘。耩子拾掇就，種金尖又尖。
耩（漏）斗錘拴好，耩倉板休偏。下首種葛秫，早穀省的翻。
黍子共稭稻，打砵不怕乾。綿花嚴塘耩，芝麻種須攬。
行說立了夏，家家把苗剗。帶著打桑斧，梯几抗在肩。
捎桑把蠶喂，省把工夫耽。枝子具繩細，葉子鈔刀刪。
蠶盛多打箔，筆席須要寬。老眠要做繭，簇了用密苫。
鹽須早駝下，入瓮把繭淹。絲還沒斷拐，麥子黃了尖。
場圍結實壓，苫子釋草編。市上領短工，連割帶著擔。
鏟開麥個曬，勤使蠟杖翻。下晌朵了穗，早晨再另攤。
明日把場打，麩料牲口冷。套上騾合馬，不禁碌碌顛。
扒先起了略，刮板聚堆尖。掃帚掃淨粒，伺候好上楸。
迎風摔簸箕，揚的蛾眉彎。若遇風不順，再加扇車搗。
布袋往家抗，旁裡記著籤。晒晒才入囤，省的招虫眼。
一時貪麥忙，地荒草似毡。快著尋工夫，市價百二三。
晴天上崖做，陰雨鋤河灘。急赶到北嶺，綿花白番番。
豆角正該摘，穉豆角子乾。割穀鏟查子，葛秫又中刊。
黍子鑿苕苗，菜豆緊用搬。黃黑豆鋪子，好上盡心看。
惟有蕎麥晚，打來褶子圈。讀麻才穀來，還沒把頭刪。
好麻幾揀子，也得下水淹。待去摘方瓜，月工來要煙。
來家取火紙，又早晌午天。飯鍋才燒滾，整子支上磚。
和麵速趕餅，菜蔬盛幾盤。盆碗刷洗淨，磁罐將鼻拴。
筐裡放杓子，拿過擔杖擔。忘了拾上箸，挺子使不番。
看坡領著狗，黑夜省糊窠。一時貪秋忙，沒到菜園邊。
蔥蒜芥菜韭，捲心白都乾。秦椒茄子瓠，王瓜老了酸。
生菜曲曲芽，著蓄不希罕。蘿白菜哇脊，茼蒿最怕乾。
片菜得早種，辣菜喜晚天。菠菜共芫荽，審著過年冷。
扁豆爬箔棹，蓖麻在園邊。金針續根菜，椿芽年年板。
蔓菁秋肯長，苔菜春裡鮮。園邊栽些菊，黃白不一般。
挪在盆子裡，開來色色鮮。擺列條几上，屋裡也壯觀。
貪講園中話，月工來要錢。謝据就種麥，那得一時間。
行說寒風至，身上一掛單。夏貨全無用，換些袂的穿。

布績紡成線，速叫机匠牽。把拮織成布，不要疼染錢。
染青做外套，藍的做袍穿。褲襪俱綿厚，大鞋底用毡。
羊皮煖帽子，那怕大雪天。閑在家裡坐，小袄套布衫。
袍子套大袄，綳子靴捲尖。觀音兜一箇，蒙頭並護肩。
有這幾件子，冷點不相干。小小在學裡，穿的怕單寒。
押風套著袄，煖袖凍不番。綿鞋滿洲襪，腦袋遮了肩。
烘子盛炭火，念書也心安。煤砑爐雖好，生火大冒煙。
小妮在懷裡，抱著還叫喚。單布帷裙子，尿下晒背乾。
花布涎圍圍，袄是螞蟥鞍。緞子虎頭帽，狗皮做襪穿。
支盤火龍炕，面子鋪方磚。去了藤糜枕，涼席捲一邊。
豆枕印花布，被子褥子毡。冷熱都不怕，實在是好山。
若不好上過，如何能這般。生財由大道，勤人不肯閒。
山繭買下此，蛾口煉成綿。棉花壓去種，速叫大弓彈。
男女齊下手，不要坐著玩。織成紬子布，不穿現成錢。
先要把糧納，餘錢把身翻。買上群麻落，冬天好踹欄。
待買百麻山，十月纔省錢。養豬圖攢糞，睨掙是枉然。
打張鐵糞杈，買個荆條籃。早起拾狗屎，春季種莊田。
牛棚早塘了，秫稽排箇嚴。不漏雨合雪，可以避風寒。
草根堆成堆，預備好墊欄。穀穰合穀稊，喂牛不甚甜。
角皮攬麥稈，吃個肚兒圓。得空拾柴火，起早磨下鏝。
覓漢領幾個，車運似早船。不管乾合溼，一總往家搬。
製下好幾朵（垛），留供灶底煙。黏粥小豆腐，煎餅隨時攤。
蒸些蕎麵角，蘸著蒜泥冷。麵湯泡乾飯，熇餅也休嫌。
趕餅大犒賞，豆腐小解饑。說的咱家話，財主卻不然。
弱人服參湯，肚壯吃黃連。清晨用點心，晚晌吃湯圓。
夏天雞鹵麵，雞蛋帶肉丸。麻汁調涼粉，各樣材料全。
冬天肥羊肉，燒黃酒數罈。狗肉常常用，牛肉蘸醋鹽。
血腸膩腥氣，肝肺買一連。芥末調肚子，蛋是醃半鹹。
南湖金色鯉，鱗劔愛嘗鮮。對蝦並蠔子，貴些不疼錢。
圍心肉一塊，鵝鴨雞相連。金華腿好吃，肘蹄爛纔黏。
奶豬奶羊羔，燒烤盛大盤。解手刀子片，蘸著醬油冷。
鹿筋沙魚翅，參鮑肉絲糝。駝蹄與熊掌，猴頭燕窩全。

那怕天鵝肉，說要不也難。野雞兔子炸，拿著不希罕。
烹茶須好葉，第一數六安。松蘿合武夷，假的不直錢。
南果爲茶佐，橘餅共香元。瓜餞麥門冬，荔芰合福圓。
青梅南葡萄，閩薑辣又甜。榧子長生果，糖饅佛手柑。
山查桃杏李，紅黑棗二般。石榴霜柿餅，榛栗核桃圓。
白果名銀杏，莊麗天下傳。油果千張餅，滿洲糖似拳。
糖培芙蓉棗，薄粹（脆）月餅圓。酥錠梅雲桂，碎果有長圓。
樣數多不過，一霎難說完。明日去趕會，件件製辦全。
棹櫂（簾簾）院子有，策籬桑條編。酒筵分大小，篩子不一般。
削刀鐵匠打，泥板把兒彎。窑匠買了去，掙錢糶糧冷。
鑄鑿鋸斧磋，木匠有往還。鋤扛合鋤刃，酌量鋤鉤安。
熨斗大的好，烙鐵不用寬。剪子京式樣，廣針鼻頭尖。
有這幾片子，省把裁縫搬。頭髻稱幾兩，家下整容顏。
木梳忌安齒，篦子仔細參。貪買零碎物，無剩盤費錢。
來到木貨市，牙床列兩邊。門窗隨人意，梁廩分直彎。
抽頭香几樣，箱子喜鰲粘。板橙滿洲杌，椅子柳木圈。
大的是柅櫃，小匣盛火煙。食盒許多用，佃戶倩賞錢。
案板買一頁，樹根也休嫌。矮桌腳檯子，家常日用間。
捎著賦櫛子，家去把机牽。這邊尋常事，嫁娶倆費錢。
娶親賃花轎，五彩色色鮮。轎夫穿皂布，個個正當年。
宮燈與高照，挑在半空懸。旗幟頭裡走，傘扇在後邊。
噴夫用一隊，吹手僱兩班。管家十數個，撒袋弓上弦。
幾個把刀勒，標子用長杆。看馬被鞍籠，蓋路挾紅毡。
前擁後護的，像個八品官。新郎穿綢緞，靴帽好新鮮。
宮花頭上帶，身披紅蓋藍。媳婦著綾錦，浮衣泥子毡。
頭帶珍珠翠，髻髻妙常冠。圍花金銀打，簪子鸞鳳懸。
響鈴雲肩上，飄帶是八仙。挑牌索子繫，釵環鳳頭簪。
不論貧合富，難以湊辦全。首飾無多用，假的就省錢。
男婚小登科，不是瞎弄暄。冠婚安八品，原是理當然。
新人坐蘆帳，官客到席前。方才讓了坐，管家裝上煙。
茶罷換上酒，菜蔬往上端。鮮魚第一品，一連四大盤。
大小十二碗，飯須兩三盞。席終官客散，嫁娶兩周全。

人生喜幸事，這是第一番。貪講人家話，大事上心間。
早晨二十二，辭灶在眼前。糖光稱幾兩，黃麵烙几盤。
燒香供神馬，疊鏹化銀錢。奠酒辭了灶，拾掇製辦年。
蒸糕用黃米，加棗助味甜。發麵蒸饅饅，多多揣幾拳。
諸般供養菜，少嘎趕七賢。量上把糧食，糶來好使錢。
花椒茴香有，就是少粉團。海蜇麒麟菜，蝦米大的甜。
香蕈與竹筍，魯耳稱幾錢。想著請門神，畫子捎幾聯。
先買對子紙，丹紅砂綠全。花箋共黃表，錫箔不用言。
蠟燭稱幾斤，爆仗買兩盤。茂陵盅一塊，碟子要花藍。
湯匙不要緊，壺要扎裹全。硝黃砂捎點，好對花藥玩。
將把新年過，衣服要周全。囑咐裁（裁）紫綳，要把靴口緣。
首帕烏綾好，漆褲寶石藍。帶子紅綢綢，官粉四五錢。
梭有七八寸，銅扣買連環。妮要墜子帶，小要核桃玩。
一陣胡吵鬧，令人不耐煩。好歹湊混罷，那的乜些錢。
總有幾千吊，也是買不全。几句俗言語，休當戲言觀。
專心記此字，落筆不犯難。

中研院近史所、臺史所合出臺灣史料叢刊(1)

灌園先生日記(一)~(四)

作者：林獻堂	(一) 243 頁	精裝 300 元	平裝 250 元
編者：許雪姬等 8 人	(二) 366 頁	精裝 450 元	平裝 350 元
	(三) 434 頁	精裝 500 元	平裝 400 元
	(四) 412 頁	精裝 500 元	平裝 400 元

林獻堂先生的《灌園先生日記》是臺灣最珍貴的私人資料，它起自 1927 年，止於 1955 年，中缺 1928、1936 年，前後長達 27 年，跨越日治、戰後兩個時代。

日記中除了家族歷史外，有豐富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活動的資料：尤其是以作者為中心所展開的活動，如臺灣文化協會、臺灣地方自治聯盟、一新會等，故本日記不僅是林獻堂一生最重要的見證，亦可補充官方資料的不足，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本日記目前出版到 1931 年。

有關近代西南地區鴉片史料的種類 與存藏情況介紹

秦和平*

一、有關西南地區鴉片史料的類別及存藏情況

(一) 檔案

西南地區的鴉片檔案分清代及民國兩部分。僅我所知，清代鴉片檔案數量不多，當中雲南及貴州的數量較少，四川稍多一些。四川鴉片檔案一存藏於四川省檔案館（全宗號清6）及四川大學歷史系，¹涉及清季民初巴縣等地的稅釐及煙館罰金的徵收、局卡人員構成、總督衙門等禁令、公文等；一存藏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道光年間禁煙資料及趙爾巽檔案。前者歸於硃批奏摺及錄副奏摺類中，後者列有趙爾巽檔案。在有關檔案中，以趙爾巽檔案價值最大。因趙氏統治四川時，正值開展禁煙運動，其檔案保存大量的調查材料、禁煙布告、稅釐徵收、禁政措施，以及作物替代等資料。

民國年間，軍閥割據混戰，政權轉移不定，尤其是四川及貴州。時局混亂影響資料的撰寫與保存；加上軍閥們不瞭解現代文書制度，隨意性較強，命令、要求等撰寫不合規範，隻言片語比比皆是；也不想保留存檔，視資料為賤物，只要東西勒索到手，隨即銷毀。30年代中葉，國民政府控制了西南地區，著手開展禁煙運動，並規定文告的撰寫格式、審批程式和保存要求，這些資料構成今天四川、雲南等省存藏的民國鴉片檔案部分。

雲南：民國鴉片檔案已整理完畢，歸於民政廳檔案（全宗號11、106），

* 四川成都西南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

¹ 四川大學歷史系存藏的巴縣檔案係五六十年代的部分抄件，原件被四川省檔案館提調存於該館。

數量約 2000 餘卷（包），每卷約一兩百頁，按照行政區劃及事件分門別類，儘量考慮時間聯繫。雲南檔案的特點有：1.時間跨度較長，從 1915 年到 1947 年，尤以 20 年代的檔案數量較多；2.內容比較豐富，包括禁煙史料、煙畝罰金、外銷情況和稅收徵收，以及部分縣屬的歷年煙畝數量等等；3.文書撰寫不規範。雲南因其統治相對地獨立，文書撰寫格式多未按照國民政府的規定，而往往沿襲傳統的格式，極不規範。

四川：鴉片檔案歸於禁煙督察處檔案（全宗號 58），卷數 2700 餘卷，每卷頁數不等，從數頁至一兩百頁。其特點是：1.時間跨度較短，集中於 1939-1949 年，以 40 年代前期的數量多。2.撰寫規範。在張群擔任省長期間，按照國民政府的飭令，強制推行文書的規範格式，諸如提由、擬稿、審稿、批示等列於封面上，重點突出，一目了然。3.內容比較單一，基本上是禁煙的材料。

貴州的檔案情況，我不瞭解，但從貴州省社科院研究者輯錄的資料及文章引證的材料來看，²該省檔案館存藏的資料極少；即使有，數量也不會很多，內容仍集中禁政。究其原因，估計與當年貴州的禁煙運動開展較為順利有關。

（二）奏牘

奏牘包括奏摺、公牘等。前者侷限於清代，後者則是清代、民國均有。

按照清政府規定：各地將軍、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及提督等都有奏事的權力。事實上，除謝恩或重大事件外，巡撫以下各官員基本上不單獨奏事，只有將軍、總督及巡撫等隨時奏請，反映情況。還有，各大吏於年終須將全部奏摺呈繳，本人不能存留。這兩項規定一直延至清朝結束。

這些上繳的奏摺構成今天清代檔案的硃批奏摺。³不過，清季地方大吏實力增強，奏摺雖然上繳，自己或門生故吏卻將奏摺底稿刊刻成集，廣泛散發，彰揚政績。是故，一些奏摺的內容得以披露，可補充硃批和錄副奏摺的不足。僅我所見，涉及西南禁政的奏摺集有：《蜀江奏稿》（鄂山）、

² 蔣德學，《貴州近代經濟史資料選輯》（四川：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卷 1。

³ 錄副是奏摺奏請後軍機處章京抄錄存檔部分。硃批奏摺與錄副奏摺內容有相同的，但更多是不相同。

《耐庵奏稿》（賀長齡）、《丁文誠公奏稿》（丁寶楨）、《劉文莊公奏稿》（劉秉璋）、《岑襄勤公奏牘》（岑毓英）、《劉武慎公奏稿》（劉長佑）、《林文直公奏稿》（林紹年）、《譚中丞奏稿》（譚鈞培），以及《錫良遺稿》。其中，以《錫良遺稿》的資料較多。

還有，清末諸如《政治官報》、《內閣官報》、《四川官報》、《廣益叢報》等報刊先後創辦。這些傳媒刊載各地大吏的一些奏摺，其中不乏禁政材料，如趙爾巽、沈秉坤、龐鴻書等人奏摺。這些大吏既無文集傳世，⁴第一歷史檔案館等亦保留不多（趙爾巽除外），這部分奏摺，能夠彌補檔案、奏摺集中的缺陷。

就公牘而言，限於篇幅，清代部分存而不論，僅就民國情況粗略言之。30年代中葉，在國民政府的督促下，西南地區先後開展禁煙運動。為指導或總結禁政工作，確保其沿著規定的軌道運行，川滇黔有關部門彙集了相關命令、告示、表冊、具結、講演等，印刷出版。雲南有《雲南禁煙紀實》初編、《雲南禁煙紀實》二編、《雲南行政紀實》、《雲南六三紀念特刊》、《雲南肅清煙毒實施方案》等等；四川有《四川禁煙彙報》、《四川禁煙專刊》、《六三禁煙節紀念特刊》、《四川禁煙月刊》、《禁政特刊》以及稍後出版的《禁煙通訊》；貴州除吳鼎昌《花溪閑筆》外，還有《貴州經濟概況》、《貴州農業概況》等資料。

據我查閱的情況看，這些公牘比較真實地記載禁煙的要求、過程、重點及成果，也是認識歷史上鴉片危害及禁煙運動的第一手材料，具有無可替代的權威性，尤其體現在《雲南禁煙紀實》初編及二編，以及《四川禁煙彙刊》等資料。

除奏牘之外，若干文集的重要性也非同一般。文集作者接觸基層，瞭解實際，見解深刻，切合時弊。如《漁舟叢談》，其作者彭崧毓在道光年間任保山知府，曾主持禁煙事務。在實際操作中，他對偷種鴉片，產生他人難以感受的深刻認識。「滇人以煙為命，即不能不以煙為糧。使其境內不栽，必仰給於他境；內地不種，必轉購於外夷。余嘗勸民以種煙之田易而種穀，而民怨以為不通民情。蓋滇南之穀不便轉輸，懸遷有無，惟此煙土，長民者不為之開利源，而反欲塞之，勢必不可能。然而年終出結，必

⁴ 沈秉坤，《敬慎堂公牘》，僅收錄他在四川部分州縣任職時的部分公牘。

曰『境內無栽種者』。州縣以之欺大吏，人吏以之欺朝廷」。⁵這段言語的第一句，會被學者引用，藉以論證鴉片對雲南的危害。事實上，這段言語的重點在後部分。說明前面滇人以煙為命的緣由，概括鴉片與山區物資流通間的關係，解釋偷種鴉片既有較高的回報，更解決了山貨運輸不便、費用高昂等難題，「懋遷有無，惟此煙土」；揭示欲根治毒品危害，須從經濟上尋找解決方法，尤其是為山貨尋找銷售市場和方便運輸。

另外，文集還能驗證檔案、奏摺內容的真實性。如光緒二十二年(1896)雲南大吏彙報全年煙稅收入是3.4萬兩。⁶但是賀宗章《幻影談》卻記載「奉藩司裕方伯手書云：本年迤西各局通計長收一十二萬有奇，實該稽收得力之效，業已由司存記，會局詳院奏獎，正資整率，勿再堅辭」。兩兩對照，僅迤西各局卡的徵收數便是其彙報數的3倍，揭露滇省部分官員仍然沿襲煙稅多徵少報的作法，其彙報數極不真實。

近年來，隨著對毒品問題研究的升溫，少量資料集也有所出現。僅我所見，馬模貞主編《中國禁毒史資料》是當中比較好的一部。⁷它集中大陸部分省市圖書館的相關人員，利用當地檔案、報刊等資料編輯而成。該書涉及西南地區的資料數量雖不多，但都比較珍貴，能彌補前述檔案、奏牘、文集等的不足。昆明志編纂委員會《昆明歷史資料長編草稿》，以及陸復初等人《昆明市志長編》的質量也不錯，⁸對於研究雲南鴉片問題極有幫助。另外，魯子健《清代四川財政史料》下冊，⁹收錄了重慶海關的相關資料，丁寶楨、劉秉璋、錫良等大吏的部分奏摺，以及一些報刊、文集、方志等資料，是研究四川鴉片問題的重要參考書。

(三)報刊雜誌

1915年前，西南諸省的政局相對安定，禁煙運動能深入地開展，故檔案及報刊保留的資料較多，除巴縣檔案外，《四川政報》、《蜀風報》、《閑娛錄》等報刊也多有反映。

⁵ 彭崧毓，《漁舟叢談》，同治二年刻本，卷上。

⁶ 譚鈞培，《譚中丞奏稿》，光緒三十年刻本，卷12。

⁷ 馬模貞主編，《中國禁毒資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⁸ 《昆明歷史資料長編草稿》，印刷於1963年；《昆明市志長編》，印刷於1983年，均為內部出版物，但後者基本上是前者的重複，尤其是清代部分。

⁹ 此書由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於1988年出版。

護國運動後，大小軍閥崛起，對外以鄰為壑，相互爭鬥；對內殘暴統治，壓制民眾，堵塞輿論。在此期間，西南諸省少有報刊雜誌；即使有之，撰稿者也噤若寒蟬，對鴉片等社會弊病不敢過多地揭露。

20年代末，南京政府建立後，著手開展禁煙運動。影響所致，諸如《西南評論》、《川事評論》等雜誌相繼創辦，製造輿論，揭露軍紳政權的弊政，並猛烈地抨擊與之伴隨的鴉片危害。¹⁰其時，一些在外就學的學生也創辦雜誌，揭露本省鴉片的危害，形成壓力，影響當政者，迫使其考慮禁煙。如《雲南旅平學會會刊》刊載的〈鴉片與鴉片問題研究〉、《武漢大學四川同鄉會會刊》上的〈涪陵的鴉片問題〉（段仲榕）等文章，均係當時有影響的作品。

進入30年代，雲南政局基本安定，四川及貴州也呈現統一趨勢，政治上壓制有所緩解。一些報刊也紛紛創辦，並敢於正視鴉片等弊病，有所揭露與批判，如《川報》、《新新新聞》、《四川經濟季刊》等。其中，以《四川經濟季刊》刊載的〈六年來二十一軍財政之回顧與今後之展望〉（興隆）一文，分析廿一軍（劉湘）軍費的來源及支出，透露煙稅的數量及比例，揭示毒品泛濫與軍閥政治的不解之緣。

此時，中國銀行在重慶設立分行，創辦《四川月報》、《川邊季刊》等雜誌，認識和研究西南地區社會及經濟等情況。由於銀行家辦雜誌，視角有所不同，眼界表現更高。概括而言，一是習慣從經濟視角分析鴉片問題；二是注重社會調查，落實到具體的點。故其文章立論深刻、資料較為準確。

可以這樣說，如欲研究四川（含雲南）的毒品問題，應該查閱《新新新聞》、《四川經濟季刊》、《四川月報》等報刊，當中以《四川月報》的價值更為突出。

30年代中葉，蔣介石藉追趕紅軍之機，將中央軍開進西南諸省，呈現軍事的強勢，隨之而來便開展禁煙運動，切斷地方軍閥的大宗財源，萎縮其力量，迫其聽命中央。為指導禁煙工作，派駐各省的禁煙機構也創辦報刊，公佈禁令、反映進展、交流經驗、檢討問題。如四川省禁煙委員會之《四川禁煙月刊》、《禁政特刊》、《禁煙通訊》，重慶勞工戒煙所之《工

¹⁰ 如段仲榕，〈川滇黔禁煙問題之檢討〉，《西南評論》，卷3期2；李琛琦，〈貴州鴉片問題的過去、現在與今後〉，《滇黔月刊》，卷2期2等等。

作月刊》，以及《一年來之雲陽》、《峨邊縣政半年刊》、《屏山縣政》、《合江縣政年刊》等政報。其中，《工作月刊》概述重慶勞工戒煙所的施戒要求、方式和癮民構成等等；《一年來之雲陽》重點介紹 1937 年該縣開展禁煙的情況。它們以細緻、全面為特點，彌為珍貴。

其時，國民政府積極經營川滇黔諸省，將其建設為抗戰的大後方。從時間上而言，西南地區禁煙運動與抗戰基本上同步進行；從內容上來看，抗戰需要的壯丁、糧食等只有依靠禁煙才能獲得。因而，一些報刊主動刊載與禁煙有關的文章，呼籲民眾重視，積極配合禁煙運動。如《西南導報》的《四川禁政之檢討》（關吉玉）、《西南實業通訊》的《中央協助西南各省農業工作之檢討》（沈宗翰）、《新四川》的《四川政治之回顧與前瞻》（賀國光）等等。由於這些報刊雜誌帶有較強的時間性和地域性，多存藏於四川省圖書館、重慶圖書館和四川大學圖書館（東區文理分館）內，只要付一定的資料費，都能夠查閱。

（四）地方誌書

咸同以前，多數志書將罌粟列入物產志花卉類，對其危害認識不足，甚而吟詩唱頌。茲舉數首，概見一斑：「鑿盡桑麻盡種煙，阿學農學泰西傳；自從海禁開粵東，忙煞鄉村四月天。」「煙花處處夕陽佳，笑語檀郎妾與偕；妒煞新田情似石，低頭轉側弄弓鞋。」「手槍銅刀一葉輕，深深淺淺劃分明；勸郎割半還留半，大約來朝又不晴。」「割煙容易收煙難，取次輕揩鶴頂丹；郎欲饑特儂欲去，茅簷日午辦朝餐。」¹¹

清季，鴉片危害日趨嚴重，引起纂修者的重視，多數志書中宣傳危害，形成輿論，影響觀念，教化民眾，落實行動。其內容集中以下方面：

1. 概括鴉片的危害。「鴉片煙……道光間，邑中吸食者十數人，聞初購於興義，曾有因吸煙充軍至湖南者。煙禁弛後，種者吸者逐漸加多，光緒初年，幾乎無地不種，無人不吸。本地商人之販運出關，與楚商之擁重資而來者，壘壘然，相望於道，年納釐金約數拾萬兩。光宣間，與英人訂禁煙條約，甫行而遜國。入民國初，政府繼續實行禁絕，邑中以私種故被槍斃者十數人。民七得開煙禁，而種者還原，吸者更多青年子弟及閩中婦

¹¹ 汪承烈等，《宜漢縣誌》，1931年石印本，卷15，禮俗。

女，此誠凶於家而害於國矣。」¹²並通過癮民的變化，反映其惡劣後果。「有清末葉，煙禁開放，邑中因病吸食成癮者，百人中五六人。迨光緒間普遍種煙，以自產之便，無論城鄉僻壤，士農工商均多嗜吸，且視為應酬之具、消遣之物。百人中幾有十四五人，女子千人中亦有一二人。」¹³

2.反映煙畝數量、罰金徵收情況。其中，川滇黔各有區別。雲南因政治統治比較穩定，罰金能按額定的畝數徵收，故在該省志書中，比較清楚地記載歷年的額定煙畝數量，以及追加情況。我曾將方志中的煙畝資料與存藏的檔案相互比較，出入不大，基本可信。¹⁴根據各屬的煙畝數量，就能估算當年雲南的煙土產量。其中，個別志書還羅列煙土的流向，反映當地的貿易狀況。如清末羅平「羅邑僻處極邊萬山之中，民瘠民貧，向無繁盛巨鎮，以通商賈。本境所產以土藥為大宗，每歲約產六七十萬兩，除本境銷行者約二十萬兩，運蒙自銷行者約十五兩（陸運計八日程），運貴州興義縣銷行者約二十萬兩（陸運計三日程），運省城銷行者約十萬兩（陸運計七日程）」。¹⁵再如《昭通縣志》，除記載煙稅、煙捐徵收情況外，還概括煙土的大致消費。「然日用所需，城中一日略計數千兩，消耗恆仰給鎮雄、威寧之煙，計每年所入不下百萬，故近時昭通適為一大銷場耳。」並由種植罌粟聯繫地價上升的現象。「查昭城田地之價，在昔甚低，自種煙後，良田俱改為地。在光緒中年，上則田之價，一工不過銀十兩，下則只二三兩。自民元來，有力者加價奪買，逐使上田者致一百餘十元一工，下者價高數倍……」¹⁶揭露鴉片的危害並非單一，是全面的。

四川、貴州則實施防區制統治，各軍閥徵收煙稅相當隨意，於是這兩省的志書更多地表現軍閥的橫徵暴斂作法與無止境的徵收數量。因內容太多，姑從略。

還有，修志者生活在底層社會，觀察細緻，能發現一些重要現象。茲舉一例加以說明。

有關罌粟傳入西南地區的時間，學術界定論至少早於明代；既有《徐

¹² 李世祚等，《桐梓縣誌》，1929年鉛印本，卷9，食貨志。

¹³ 由雲龍等，《姚安縣誌》，1948年鉛印本，卷15。

¹⁴ 秦和平，《雲南鴉片問題與禁煙運動》（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頁339-361。

¹⁵ 羅鳳章，《羅平州鄉土志》，光緒抄本，卷12，商務。

¹⁶ 盧金錫等，《昭通縣志稿》，1937年鉛印本，卷3，禁煙；卷5，農政。

霞客遊記》的描述，更有嘉靖《洪雅縣誌》的記載。但是，罌粟品種較多，不是任何種類都能生產鴉片；加之當鴉片視為產業對待時，不能不講究效益。一般而言，只有鴉片罌粟(*P.somniferum*)和苞鱗罌粟(*P.bracteatum*)才能具備生產鴉片的條件。面對眾多的罌粟品種，究竟是哪種呢？一些編纂者不禁產生疑問，「罌粟，全郡皆產，……《群芳譜》云，有大紅、桃紅、紅紫、純紫、純白；又有千葉、單葉兩類。中秋重陽，月下下子，畢以帚掃勻，花乃千葉，雙手交換撒子，則花重臺。《學圃雜疏》云，罌粟花妍好千態，有作黃色、綠色者。今郡人藝植極多，只有單葉之紅白兩種。」¹⁷現有的史料反映，西南地區收取漿汁製作鴉片始於清嘉慶年間。然而，這收漿的罌粟究竟係原有的品種，還是外來的品種？「華種攢瓣，如芍藥；惟夷種單瓣，故結實尤大。」¹⁸這段記載極為珍貴，它辨析了傳統品種（華種）與引進品種（夷種）的區別。這裏的「夷」既涵蓋了西南部分民族地區，更包括了外國，印證鴉片罌粟是從外國傳入民族地區，逐漸地蔓延漢區，並擴散開來。「罌粟，昔年僅知以花入藥。自海禁一開，取汁為食。」¹⁹這記載道出了這一轉化的過程。

(五)文史資料

文史資料始於 50 年代後期，本著「三親」（親見、親歷和親聞）原則來撰寫，該資料有較大的可信度和特殊的權威性。如宋光燾〈鴉片流毒雲南概述〉、李子輝〈雲南禁煙概況〉、施次魯〈雲南鴉片統運內幕片斷〉、²⁰謝根梅等〈貴州煙毒回憶錄〉、伍效高〈我販賣黔土外銷經過〉、²¹曾俊臣〈經營特業五年紀略〉、周介眉〈劉湘、蔣介石在四川的鴉片禁政〉、²²胡次威〈辛亥以後四川的煙禍〉等等。²³這些撰寫者或曾主持某省「禁煙」事務，或操縱壟斷鴉片的販運等，親歷其間，陷得太深，其回憶文章的價值非同一般。

¹⁷ 張瑛等，·《興義府志》，咸豐刻本，卷 13。

¹⁸ 劉顯世等，《貴州通志》，1948 年鉛印本，風土志四，頁 42。

¹⁹ 佚名，《新寧縣鄉土志》，光緒末年抄本，物產。

²⁰ 此三文分別載於《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 1、3 和 18 輯。

²¹ 此兩文分別載於《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 7、3 輯。

²² 此兩文分別載於《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 7、19 輯。

²³ 此文載於《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 18 輯。

除全國及省文史資料外，各縣甚至部分區鎮也有文史資料。它們反映某一局部的鴉片問題及禁煙運動，具有特殊的價值。若與全國、某省對照閱讀，既能相得益彰，擴展對毒品危害的認識，亦可彌補其不足之處，深化對毒品的研究。

據我所知，目前全國文史資料已出版 142 期；雲貴川三省文史資料各出版 40 餘期；各縣文史資料出版數量在 10-30 期之間。刊載鴉片問題的文章，全國文史資料集中於 34 輯，各省、縣基本上在前 10 輯內。

當然，受諸多因素的制約，文史資料也存在不足之處，甚至說些違心的話，我在《四川鴉片問題與禁煙運動》前言中曾有評述，²⁴恕不重複。

(六)調查資料

有關清末民初四川的調查資料，數量不多，集中在趙爾巽檔案、《四川官報》及《四川政報》內。雲南的調查資料重在煙土販運和銷售，係該省商務總會進行的，收錄在《昆明歷史資料長編草稿》內。

二三十年代，有關的調查材料以涪陵為多。僅我所見，有陳望毅〈建築在鴉片煙上的涪陵農村〉、平漢鐵路經濟調查組《涪陵經濟調查》特貨部分；段仲榕〈涪陵的鴉片問題〉、李珩〈涪陵大柏鎮的鴉片經營〉等等。²⁵另外，馮和法《中國農村經濟資料》收錄雲南、貴州部分地方的調查材料；行政院對雲南五縣的調查、費孝通《祿村農田》等，以及《四川月報》對簡陽、涪陵等地的調查。

當時有一本重要的調查材料不能不提及，它就是《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視察團報告書》，其內容觸及四川禁煙的現狀及存在問題。與之配套的《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期成會報告》，更多地反映四川民族地區的鴉片問題。

至於當年種植鴉片最廣泛的滇西民族地區，實地調查的材料相對少。僅見方國瑜〈滇西邊區考察記〉、馬子華〈滇南散記〉等少量資料。

50 年代初，因建立政權、團結民族群眾、進行民族識別等需要，開展了大規模的社會調查。如中央訪問團第二分團《雲南民族情況彙集草稿》，全國人大民委、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學院等單位進行的各民

²⁴ 秦和平，《四川鴉片問題與禁煙運動》（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前言，頁 4-5。

²⁵ 陳文載於《中國農村》，卷 1 期 6；李文載於《東方雜誌》，卷 32 期 14。

族社會調查。內有部分鴉片問題的資料，如白族、彝族、佤族、景頗族等。目前，這批資料編入民族問題五種叢書，正式出版發行，容易找到。

還需指出的有，在西南地區的鴉片資料中，我認為歌謠（含竹枝詞）未能引起重視，其教化作用長期被忽視，更談不上利用問題。詩言志，歌永言。詩歌表現了個人的志向追求、民眾輿論等，亦針對社會弊病，有的放矢，起到教化作用。「洋煙開花一朵朵，教哥莫把洋煙學；吃壞多少好小夥，玩壞多少少年婆。」²⁶故欲略加介紹，擴展史料的內容，更說明其利用價值。

二、有關鴉片歌謠的認識

「天上大星對小星，地下南京對北京。獅子對著九江口，漢口對著重慶城。洋煙出在雲南省，帶回四川害人民。好人吃了昏昏醉，胖子吃了瘦筋筋。爹媽為我僵起病，哥嫂為我把家分。為吃洋煙上大癮，自家妻子嫁別人。朋友勸我早歸正，免得後來成孤人。」²⁷這民謠概括了鴉片傳入四川的經過及其惡劣危害。

「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民謠既是民間輿論的載體，亦是社會生活的反映，通過膚淺文句、簡潔說理，形象地概括鴉片的惡劣危害，折射民眾的仇視心理。「洋煙開花口朝天，悖時倒運吹洋煙；吹了洋煙學狗叫，睡在床上學狗蜷。」

眾所周知，鴉片係毒品，其慢性危害基本上人人皆知。「鴉片煙來花朵朵，十個吹來九個著；十個吹來九個病，等不到老見閻羅。」然而，為什麼一些人貪戀於此，熱衷於此？原因是鴉片內的嗎啡等成份能刺激吸食者的中樞神經，加快血脈運行，振奮精神。「打個呵欠煙癮發，四肢無力難掙扎；三口洋煙吃下肚，抵得蜜蜂採鮮花。」當精神振奮後，激勵表露的情緒，打開癮民的話匣子。於是，煙館成為交談話語、增進情感和拉攏關係的場所，故煙館又被稱為「談心處」。

固然，鴉片有著強烈的興奮作用，但也具有特殊的成癮性，吸煙者長

²⁶ 劉永吉，《西南采風錄》（商務印書館，1946），頁183。文中引用的詩歌若不注明出處者，均引自此書。

²⁷ 《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墊江卷》（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頁226。

期吸食，在身體和精神兩方面產生強烈的依賴，俗稱為「癮」。「洋煙開花一朵朵，生在雲南大坡腳；不吃之時倒好耍，吃到之時丟不脫。」解癮須吸煙，吸煙會增癮……在這互動循環中，不斷地擴張煙癮，鴉片成爲癮民生活中須與不能缺少的物品。

煙癮危害是可怕的、災難性的，後者是看得見、摸得著的。「鴉片煙來沾朵朵，老的吹煙小的學；學來學去學上癮，自搬石頭打自腳。」無論官方告示，或者民間勸喻文，都曾猛烈地抨擊鴉片的危害，揭示其惡劣的連鎖反應，但收效不能盡如人意。其中原因，既有強烈成癮性的困擾，還因戒煙手段簡單、時間較短，一些癮民便放鬆警惕，忽視其危害。如「豌豆花開角對角，我勸小妹裹小腳；妹的小腳裹得好，哥的洋煙斷的脫。」²⁸從側面印證戒煙的相對容易，以及附著其上的輕視心理。

鴉片具有強烈的成癮性，一當上癮，煙土就成爲癮民的第一需要，寧可一日無飯，不可一日無煙。這些消費特點決定鴉片的需要量是擴大的，其銷路往往不成其問題，於是利用鴉片橫徵暴斂成爲軍閥劣紳的共同手段。「禁煙罰款正森嚴，未完旋派煙土捐。會須每兩給三角，暫累吾民一二年。」²⁹還美其名曰「寓禁於徵」。

在未禁煙時，或許「寓禁於徵」具有存在的某些理由。事實上，在禁煙期間統治者更是濫用這一手段。實施禁煙，供需失衡，煙價飛漲，一些當權者憑藉權力，伺機搭售，牟取厚利。「十月裏來十月到，政府主義打得高。在把洋煙來斷掉，斷了洋煙加公膏。公膏每月加一次，敲得人民好悲淒。那個不叫苦中苦，那個人民不再吸。」還有採取強迫作法，鼓勵甚至強迫民眾吸食，致使禁煙法令形同具文，煙毒長期禁而不絕。「靈苗毒草貴如珠，法令重申弭得無；掩目捕蟬等兒戲，逢人說鬼笑師巫。罰金寓禁陰謀巧；繼晷焚膏氣概粗；如此劣根除未盡，反教煙癖滿鄉閭。」³⁰

儘管存在種種弊病，應該看到清政府及國民政府曾多次開展禁煙運動。其間，爲了將禁煙要求、意義等傳遞基層社會，爲民眾所認識所接受，化爲實際行動，地方政府多利用歌謠等形式，宣傳禁煙，啓發覺悟。「鴉片煙，害人王，未曾得病先倒床。吃得快戒莫躲藏，免得賣田賣地賣婆娘。

²⁸ 姚靈犀，《采菲錄》，曾收錄此詩，但個別字略有不同。

²⁹ 雷夢水等，《中華竹枝詞》（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第5冊，頁3594。

³⁰ 賴佐唐等，《敘永縣誌》，1935年鉛印本，卷8，文徵。

開煙館，賣土膏，偷著種，害人害己無天良，一經捉住了，綁去上法場，乒乓一炮，要見閻王。奉勸大家，切莫試嘗！」³¹

爲什麼採用歌謠的形式呢？或者說歌謠對於宣傳禁政具有什麼作用呢？當年癮民以勞苦民眾，俗稱肩挑背負者爲多。這些民眾基本上係文盲，斗大的字識不到一筐，要其直接閱讀公文、法律來認識禁煙似不可能。如何做到有效宣傳，並化爲其行動呢？

接受者的現狀決定了傳播的手段與方式。因底層民眾多是文盲，資訊傳遞往往依靠口頭承傳，在互動中傳播影響，得到接受；這需要內容淺顯、說理明白、如話家常的說教方式。從形式上講，便是文句短小、韻角音律俱全、琅琅上口、方便吟頌、利於口傳。在各種文學形式中，以絕句形式的歌謠最爲適用。它短小精煉，運用靈活；信息量大，快捷有效；通俗易懂，說理明白；韻律分明，節奏感強；抑揚頓挫，富於感染，既有利於吸收消化，更方便輾轉傳唱，起到教育民眾、鼓動人心的實效。茲舉〈勸同胞戒煙抗戰歌〉，予以說明：

眾同胞，聽我說，日本鬼子真可惡！打硬仗，打不贏，就想法子害我們！他曉得，我同胞，筋骨強健身體好！便不惜，大本錢，到處販賣鴉片煙！他希望，中國人，中了煙毒沒精神！夫然後，再進兵，滅國亡種好開心！那知道，委員長，眼睛猶如神一樣！早看出，這手段，要把同胞毒死完！便下令，要禁煙，這事早在六年前！種煙的，要鏟了，一根煙苗命不保！辦煙的，要停止，若不停止就該死！賣煙的，要改行，你不改行見閻王！吃煙的，要戒除，絲毫不許再含糊！到而今，六年了，到處找煙找不倒！燒的燒，毀的毀，煙犯都成刀下鬼！這本是，好辦法，明白的人好通達！偏有等，愚蠢輩，悄悄要吃不怕貴！也有人，沒良心，偷偷賣煙給別人！他們都，全不想，暗中幫了鬼子忙！這等於，當漢奸，論理真該殺萬千！是痛心，下力人，也把煙癮纏上身！一天裏，費多錢，瘦骨伶仃最可憐！何不如，下決心，一刀斬斷害人精！到醫院，去戒煙，一個毛錢也不出！有飯吃，有衣穿，樣樣辦得很完善！過此時，脫了癮，包你做事很得行！就下力，也更好，個個客人把你找！他還要，多出錢，說你腳快不吃煙！

³¹ 楊化育等，《沿河縣誌》，1943年鉛印本，卷10，學校。

既保家，又保國，禁煙抗戰是國策！精神好，做事多，趕走鬼子好快活！³²

通過歌謠的反覆傳唱，輔以標語、漫畫等直觀形象，各級政府將禁政的要求傳遞至底層社會，為民眾認識、理解與接受，收到積極成效。

目前，收集歌謠（含竹枝詞）較為全面的有林孔翼《成都竹枝詞》，林孔翼、沙銘璞《四川竹枝詞》、劉兆吉《西南采風錄》、雷夢水等《中華竹枝詞》，以及部分縣誌、藝文志和文史資料。此外，還有 80 年代收集整理《民間文學集成》等叢書。這套叢書，大陸每個縣份都有，數量不一，內容涉及歌謠、故事、歇後語、音樂及舞蹈等；有油印和鉛體兩種形式。因多數《集成》未公開發行，在各省文藝聯合會（簡稱文聯）資料室都能查閱，只是要付費。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稿約

- (1)本通訊蒐集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各項資料，俾供研究參考，園地公開，歡迎各界惠賜未出版之稿件，中、英文不拘。
- (2)本通訊為半年刊，每年三、九月各出刊一期，一、七月底截稿。
- (3)來稿除特約者外，以不超過五千字為宜，請以 Word 文書處理軟體打字後，併同 3.5 吋磁碟片送交本所通訊編輯委員會。
- (4)來稿請署真實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稱、詳細地址和聯絡電話。
- (5)本通訊編輯委員會對於來稿文字有酌改之權。
- (6)採用之稿件，致贈作者當期通訊五份。
- (7)來稿請寄臺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收。

³² 前人，〈勸同胞戒煙抗戰歌〉，《西康省民教季刊》，卷 1 期 2。



舊學新思

敘事、論述與歷史：胡適與近代中國 知識結構的轉型

沈松橋*

在近代中國學術研究典範轉移的過程中，胡適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突破性的貢獻，大體已成學界無可爭議的定論。¹不過，如果我們將目光轉移到更為寬廣的知識結構層面，從認知主體的建構、知識正當性(legitimacy)的基礎，乃至「知識類型」(episteme)的斷裂與變易等問題重加省思，那麼，胡適的學術功業，是不是還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鄙人不學，於「胡學」素鮮涉獵，對於這項牽涉多端、頭緒紛繁的複雜問題，自無綜覈百家、細加分梳的能力，只能違逆適之先生「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訓示告誡，端就胡適早年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特別是《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一書，針對其所蘊涵的敘事模式與論述型構(discursive formation)在近代中國知識結構變化過程中的歷史意義，提出個人一點管窺臆測之辭。

必須說明，這項嘗試，爲了彰顯不同知識類型的分野，刻意採取非歷史(ahistorical)乃至反歷史(anti-historical)的取徑，將曲折繁複的歷史實像高度化約，其目的並不在解決具體的歷史問題，而在探索思考歷史問題的另類可能方向。野人獻曝，誠難入方家法眼；引玉拋磚，固在促發關於近代中國知識結構之討論耳。

1917年9月，27歲的青年胡適受聘爲北大教授，擔任「中國古代哲學史」的課程；1919年2月，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聲譽鵲起，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¹ 對這一論點，最具代表性的論著，允爲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奠定了他的宗師地位，也引發了當時學術界「一項小小的革命」。²

關於青年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有過一些膾炙人口、流傳甚廣的故事。

第一樁故事，來自顧頡剛的回憶。顧在〈古史辨自序〉中返顧他在北大課堂初聽胡適講授「中國哲學史」所受震撼時，說道：

哲學系中講中國哲學史一課的，第一年是陳伯弢先生(漢章)，……他從伏羲講起，講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範〉。……第二年，改請胡適之先生來教。……他不管以前的課業，重編講義，開頭一章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舌橋而不能下。許多同學都不以為然；只因班中沒有激烈分子，還沒有鬧風潮。³

看到這一段跡近神話的誇張敘述，後世之人不免會懷疑：胡適對中國哲學史的「再現」(representation)方式，究竟與當時人對「歷史」作為一項知識門類，所抱持的基本假定與價值，構成了多大的牴牾與挑戰，以致斯說一出，彷彿平地驚雷，幾幾乎釀為學潮？

從第二樁故事中，我們或許可以找到一些解釋的線索。據說，《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後，陳漢章曾在課堂上對學生公開嘲諷：

我說胡適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哲學史本來就是哲學的大綱；說中國哲學史大綱，豈不成了大綱的大綱了嗎？⁴

Hayden White 在討論西方中世紀的「年表體」(annals)歷史書寫與近代「敘事體」歷史編纂學的分野時，特別指出兩者在敘事模式與時間概念上

² 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頁216。《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後，不及兩月，即告再版，至1922年8月，已刊行第八版，「購者爭先，瞬息即罄」，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冊2，頁353；〈熊克武致胡適函〉(1919年9月10日)，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冊上，頁71。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所以「能夠震動一世的視聽」，余英時從史學新「典範」之建立的角度，作過詳盡而深入的分梳，見余英時，〈《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收於《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附錄一。

³ 顧頡剛，〈自序〉，《古史辨》(臺北影印本，無出版年)，冊1，頁36。

⁴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頁202。

的差異。年表與敘事歷史，所再現的都是一套由特定情節所構成的故事。所異者，後者是透過「事件」本身的秩序，來建構歷史的完整性與連續性；而前者所依據的，卻僅僅是年代的序列。⁵從這種角度來理解，陳漢章把「中國哲學史」當作是中國哲學的「綱要」，也正是把歷史中的行動者(agent)與事件，視為時間序列中的散布；其彼此間的聯繫，端賴其於一套既定時間序列中的對應位置。這樣的歷史時間，猶如源源不絕的河流，可以無限向後推衍，並無明確的終點，甚至乃是一種「無時間性」(timeless)的時間。⁶而賦予這種時間及其所包容之事件以終極意義者，則在於其神聖性的源頭(origin)。換言之，這種歷史敘事，所展現的，無乃是一種反向的「彌賽亞時間圖式」(Messianic time)：歷史事件以單子(monad)的樣態出現，其所構成的結構，有如代表已逝事物等待彌賽亞再臨救贖卻橫遭阻滯的記號。⁷所以，陳漢章講述中國哲學的「歷史」，必得由洪荒初闢的三皇五帝講起。此後中國哲學的發展，也只能是對此「源頭」的不斷指涉與回歸。而胡適「截斷眾流」，把三代以上全然割捨，徑從西周下手，不啻是對這種以神聖時間為基本內涵的敘事模式的全盤顛覆，也無怪乎滿腦子「三皇五帝」的學生們，震撼狐疑，「舌橋而不能下」了。

可以想見，在陳漢章這種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式「永恆再現」(eternal recurrence)的敘事模式下，中國哲學史作為一門「知識」，其正當性的基礎，顯然只能是出自神聖源頭的普遍性永恆「真理」。這種衡量知識價值的標準，也不是陳漢章所獨具。即使是胡適本人推崇備至，視為「科學方法」之模範的清代考證之學，恐怕也無以逾越此一矩矱。如余英時所論，清代考證之學的基本典範在於「通經明道」，也就是通過訓詁考訂的綿密工夫，探求六經孔孟所保存的三代以上的義理。⁸自顧炎武以降，「音韻明而後訓詁明，訓詁明而後義理明」，可謂有清一代二百年間學者治學

⁵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9.

⁶ 參看梁其姿對《三字經》所蘊涵之歷史時間概念的討論，見梁其姿，〈《三字經》裡歷史時間的問題〉，收於黃應貴主編，《時間、歷史與記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

⁷ Walter Benjamin,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ed., by Hannah Arendt, tr. by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8), pp.262-264. 不過，Benjamin 所謂「彌賽亞式時間」的模範乃是「現在」，這和陳漢章以一個神聖過去作為歷史源頭的時間圖式，正好是背道而馳。

⁸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頁 84。

的不二圭臬。甚至清代季葉，此一固有典範已遭逢「技術崩潰」的內在危機與外在時勢的嚴重衝擊，這一套構成知識正當性基礎的「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⁹依然深入人心，屹立不搖。即使氣象閎肆，已非乾嘉所能範圍的王國維，在裁斷戴震的學術成就時，恰恰仍是以其是否契合「孔孟大義」，而非戴著本身的義蘊，作為評騭去取的準據：

東原學問才力，固自橫絕一時，……其一生心力專注於聲韻、訓詁、名物、象數，而於六經大義所得頗淺。晚年欲奪朱子之席，乃撰《孟子字義疏證》等書。……顧其書雖力與程朱異，而未嘗與孔孟合。¹⁰

既然知識生產的最終指歸在於「孔孟大義」，音韻、考訂、訓詁、校勘等技術性操作的終極目標自然也只能是如何獲致最符聖人原意的「本真」(authentic)文本。如果用 Michel Foucault 對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知識類型」所作分類，我們或許可以把這一套由特定後設敘事與價值關懷所構成的知識結構，看作是以類似性(resemblance)為原則的「知識類型」。在這種知識系統中，詞(words)與物(things)透過終極真理所賦予的「印記」(signature)，被統一起來。知識作為對此神秘印記的揭示，既非觀察，也不是論證，而是對原初文本無窮無盡的「注釋」。¹¹

相對於以上的討論，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所構築的，無乃是一套迥然異趨的知識圖景。

蔡元培在為《中國哲學史大綱》所寫的序文中，曾舉出該書的四大「特長」：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與系統的研究。¹²姑不論其是否有過譽之虞，端就我們所關懷的近代中國知識結構轉型而言，蔡元培

⁹ 這裡借用的是 Lyotard 的概念。見 Jean 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6).

¹⁰ 王國維，〈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觀堂集林》，卷 13，《王觀堂先生全集》（臺北：文華出版公司，1968），冊 2，頁 562。

¹¹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rch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 Chapter 2, pp. 17-44. Timothy Mitchell 曾借用 Foucault (與 Derrida) 的概念討論伊斯蘭學者注疏《可蘭經》的知識傳統，頗有可與中國傳統經傳注疏相發明者。見 Timothy Mitchell, *Colonising Egyp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 82-85, 146-153.

¹² 蔡元培，〈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序〉，收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

的這項評斷，確有探驪得珠，直指問題核心之妙。

如前所述，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所以在當時激起軒然大波，正在於其「截斷眾流」，把三代以上全然割除，徑從老子、孔子講起的「扼要手段」。胡適這樣的做法，其實正是取消了中國哲學的神聖源頭，而代之以一個人為的「開端」(beginning)。由此開端所推展出的歷史時間，自然也不再是一套向神聖源頭永恆回歸的「彌賽亞時間」，而是一套「同質、空洞的時間」(homogeneous, empty time)。這種時間所提供的，只是一個本身並無意義的框架；構成「歷史」之實質者，乃是被填塞進這個「容器」的無數「事件」。¹³如此一來，「歷史」的意義根源，遂發生重大的位移。Hayden White 便指出，現代史學得以成立的一大要件，端在於其所再現的過往事件，不但應該正確地置放於其原初發生時的年代框架中，更應被賦予一套明確的敘事結構——一套由開端、發展與結尾的完整情節所構成的「意義秩序」。¹⁴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導言中，便明白指出哲學史的書寫有「明變」、「求因」與「評判」等三項目的：

……須把各家的學說，攙統研究一番，依時代的先後，看他們傳授的淵源、交互的影響、變遷的次第，這便叫做「明變」；然後研究各家學派興廢沿革變遷的原故，這便叫做「求因」；然後用完全中立的眼光、歷史的觀念，一一尋求各家學說的效果、影響，再用這種影響效果來批評各家學說的價值，這便叫做「評判」。¹⁵

透過這種蔡元培所謂的「系統的研究」，胡適所建構的「中國哲學史」，便不再是以朝代遞嬗之時間序列為唯一參照架構的「哲學綱要」，而是由事件的因果關係等內在法則所推動，不斷演進發展的「有機體」。¹⁶

當然，在現代史學體制的「默會」(doxa)規訓中，認知主體於闡發歷史事件內在的意義秩序，進而建構一套完整的歷史敘事之前，必須先對其所面對的歷史材料，進行縝密細緻的考辨，以確保其所處理的事件，乃是

¹³ Walter Benjamin,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p.262.

¹⁴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pp.4-5.

¹⁵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頁32-33。

¹⁶ 陳平原討論胡適在研究中國文學史時所創立的「雙線文學觀念」於中國文學史書寫上的歷史意義時，即已提出類似看法，甚至視之為「本世紀中國學界影響最為深遠的『文學史假設』」。見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頁196-197。

「真實」(real)，而非「想像」(imaginary) 的事件。¹⁷所以胡適在「明變」、
「求因」與「評判」之前，便用了極大力氣闡述其「述學」的工夫，強調
史料搜集、辨偽、取捨與整理等技術操作層面與歷史知識生產的密切關
係。¹⁸正是在這個層面上，胡適有意識地將其哲學史研究與乾嘉考據傳統
聯繫起來；而梁啟超之將胡適視為清代漢學的殿軍，也正是就此意義而
發。¹⁹

雖然，如果從知識正當性的基礎而論，梁啟超的論斷，蓋不免稍有誤
導之嫌。胡適對乾嘉漢學傳統的汲引，與其說是自覺的承襲關係，毋寧乃
是將之納入一套全然不同之「論述規則」(discursive regularity)的「奪佔」
(appropriation)過程。胡適解釋其哲學史的「述學」工夫，便說：

述學是用正確的手段、科學的方法、精密的心思，從所有的史料
裏面，求出各位思想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淵源沿革、和學說的真
面目。²⁰

由此可見，胡適從清代漢學所借來的訓詁考訂工夫，其最終指涉，並不在
於「通經明道」，回歸到一切價值的終極源頭。他所追尋的，僅止是古人
「學說的真面目」。從這種「平等的眼光」出發，先秦諸子固無高下優劣
之別，而哲學史知識之所以可能，便完全繫諸認知主體，如何經由理性的
思辨程序，客觀地「再現」歷史的「真實」。換言之，這種歷史知識的正
當性乃是建立在關於「客觀真實」的後設敘事之上。

奠立在迥然不同的知識正當性基礎之上，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事
實上顯示了近代中國知識類型的斷裂。如果再度借用 Foucault 的概念，我
們或許可以將胡適對中國哲學史的論述型構，當作是一種「再現」的知識
類型。在這個新的知識類型中，「相似性」的原則徹底瓦解，詞的秩序與
物的秩序，兩相分離，並行不悖。而在知識的建構過程裏，分析取代了類
比，徹底的歸納取代了無限的相似性遊戲，確定的知識取代了可能的關
係，對特性(identities)與差異(differences)的強調取代了相似性的聚合。²¹由

¹⁷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pp.4-5.

¹⁸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頁 10-32。

¹⁹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中華書局，1980），頁 6。

²⁰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頁 10。

²¹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rch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Chapter 3, pp. 46-76.

此而言，周予同認為胡適使中國史學完全脫離經學的羈絆而獨立，²²如果從近代中國知識結構的轉型來看，確實是深中肯綮的不刊之論。²³

Foucault 在論及論述實踐的知識建構作用時，指出：「論述實踐的特質在於其釐畫出知識對象的範圍，界定了知識主體的正當視野，確立了概念與理論闡述的固定規範。因此，每一項論述實踐都涵蘊著一套規訓的遊戲，標明了其拒斥與選擇的界線。」²⁴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同樣也為當時及此後中國哲學史的書寫，設下了一套知識生產的軌範與標準。1919年，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點名批判謝無量《中國哲學史》的缺失，所依據的是這一套知識規訓；²⁵而當1930年，金岳霖譏嘲《中國哲學史大綱》「牽強附會」，太具成見時，²⁶他所依據的，也還是同一套知識規訓。由是以言，金岳霖其實是站在胡適所建立的知識結構之內與胡適進行知識的交鋒；他的批判，其實正是對胡適的無上頌揚。

²² 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收於杜維運、陳錦忠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冊3，頁396。

²³ 當然，近代中國知識的轉型絕非成於胡適一人之手，這個過程與傳統學術也仍有千絲萬縷的複雜牽連。我們在這裏只是採用「知識考古學」的辦法，把胡適及其中國哲學史研究當作是此一歷史過程的特定「時刻」(moment)，藉之以進行初步的觀察。這項論點的成立與否，仍有待於長期而細緻的深入研究。

²⁴ Michel Foucault, "History of Systems of Thought,"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ed. by Donald Bouchard, tr. by Donald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77), pp. 52-53.

²⁵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頁23。

²⁶ 金岳霖，〈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收於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臺北影印本，無出版年），附錄二，頁7。

中國大陸批判胡適運動脛說

黎漢基*

—

現代中國沒有多少個讀書人具備與胡適相同的分量，可以成爲五億人民的公敵。早年公開抗拒馬克思主義，中年以降死忠於蔣中正政權，離開大陸後還跑到「美帝」懷抱當「白華」；要在學術界中，找出比胡適更「反動」的人，著實不易。中共建國後，在宣傳戰上絲毫不敢放鬆與胡適的鬥爭，解放初期陳垣和胡思杜的兩封公開信，即其顯例。在 1951-52 年的思想改造運動中，胡適思想更一度被列爲批判的項目，但由於當時運動的重點是放在知識分子的自我檢討，批判的火力有所分散。爲了矯正過去的失誤，自 1954 年底迄至 1956 年初的批判胡適運動，就完全聚焦到胡適身上，所以運動沒有停留在對俞平伯紅學的批判，也沒有糾纏在馮雪峰等人的清算。與同一時期被批的梁漱溟和胡風相比，胡適所承受的誣讒和謾罵，有過之而無不及；舉凡學術、道德、人格、政治立場等各個方面，都有人用顯微鏡放大觀察，批得一無是處，臭氣熏天。

動員龐大的人力和物力，來鬥臭一個已經「落了伍」的老人，真的是值得嗎？早在內戰期間，全國思想界黨派化爲左右兩極，胡適已不見得能吸引追求「進步」的知識青年。¹ 在中共密不透風的出版審查制度下，胡適的著作遭到禁售禁印，毫無傳播的空間和機會。難怪有些參與批胡的知識分子警告說，不要以爲胡適是「死狗」；² 這可以反面證明，在時人心目中，胡適在中國大陸的實際影響已經微不足道，用不著大驚小怪來口誅筆伐。

*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¹ 朱正，《小書生大時代：朱正口述自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49。

² 翦伯贊的發言，〈批判胡適主觀唯心論的歷史觀與方法論——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師座談會發言摘要〉，《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北京：三聯書店，1955），卷 2，頁 182。

那麼，發起批胡運動的毛澤東，是如何看待胡適的影響力呢？他的心態，毋寧是當權者恐懼敵人「復辟」的心態。他之所以決定批胡，與後來發起批林批孔的態度，如出一轍。孔子和胡適，曾經是毛心目中的思想權威。孔子是他自少背誦《四書》、《五經》時的聖人；而胡適則是少年時認同新文化運動的楷模。在心底裡，毛澤東也知道孔子和胡適有一定的道理，在理性上認同他們的若干想法。例如有關《紅樓夢》的觀點，他在1964年8月18日的一場私人談話，就不諱言地指出胡適考證派的看法比蔡元培的索隱派「比較對一點」。³ 毛革命立場最為堅定，尚且不能免俗，如何能不教他防範胡適思想的復辟呢？

二

如所周知，毛澤東是讀了李希凡、藍翎批評俞平伯的文章，質疑當時負責《文藝報》的馮雪峰為何不登載他們的文章，遂發起批判胡適運動。在此之前，李、藍二人只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年紀既輕，學歷不高，⁴ 立言平平無奇，⁵ 連毛本人也不見得完全同意他們文章的意見；⁶ 說到底，這兩人之所以冒起，祇不過是時來運到，小人得志而已。怪不得當時不少人也掩不住他們的不服、羨慕和嫉妒了。⁷

³ 龔育之、宋貴崙，〈「紅學」一家言〉，《毛澤東的讀書生活》（北京：三聯書店，1996），頁217。

⁴ 李希凡和藍翎都是山東濟南市的華東大學出身。這不是正規大學，而是中共中央山東局於解放戰爭期間在沂蒙山區創辦的幹部學校。1951年3月15日，華大併入青島的山東大學，他們纔成為山大的畢業生。參閱藍翎，《龍捲風》（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頁14-19。

⁵ 韋君宜就這麼說：「李希凡和藍翎批評俞平伯的文章，我看見了。按我當時『馬列主義水平』來說，我不但是完全贊成的，而且也是完全講得出、寫得出來，那是極其平常的馬列主義初學者對一個老『紅學家』的看法嘛！〔……〕我只覺得李、藍兩位真是運氣好。他們二位只是把這人人都能看到、人人都寫得出的問題寫了一下。別人之所以不寫，有的是覺得俞平伯反正是資產階級人物，不值得跟他講馬列主義。有的人是覺得俞的著作只是解放前留下來的幾個小冊子，如寶玉愛喝湯之類，並非在解放後向共產黨大張旗鼓地挑戰，何必那樣對待人家？他兩位年輕，不考慮這些因素，寫篇文章一碰，一下子就成了名。真碰巧，運氣好！」參閱《思痛錄》（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頁25-26。

⁶ 毛澤東在閱讀李、藍二人的〈評《紅樓夢研究》〉一文時，在賈府衰敗的分析部分，作了「這一點講得有缺點」的批注。參閱前揭〈「紅學」一家言〉，頁229。

⁷ 北大出身的作家馬嘶，就這樣記錄當時北大學生對李、藍二人在1955年春講話時的反應：「他

毛澤東偏偏看中李、藍二人作為「小人物」這一點。他就是要用「小人物」，來對照作為「大人物」的俞平伯和馮雪峰。⁸ 通過「小人物」打倒「大人物」的例子，更加能夠突顯馬克思主義是「絕對真理」。試看，李、藍本來毫無突出之處，就是因為黨性堅定，運用馬列主義的思想武器，就一舉撼倒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這還不證明馬列主義戰無不勝、攻無不取嗎？⁹

三

當時最無辜的人，首推被點名批判的俞平伯。他的冤屈和不幸，是源於「胡適派」的標籤。

無可否認，俞平伯的紅學研究，曾經得力於胡適的啓發。他在 1922 年發表的《紅樓夢辨》，就是宗奉胡適所鼓吹的「自傳說」；而在解放後出版的《紅樓夢研究》，不少內容也是沿襲《紅樓夢辨》的。按照當時中共官方的思想定性，沒有應用馬列主義，或者應用的不足，或者只是隨便運用馬、列、毛的一些詞語作為裝飾，而實際內容卻與之無關，都有可能被指為「胡適派」的流毒；¹⁰ 以俞平伯這樣的學術背景，當然是千夫所指，無可抵賴了。

們的傲慢之氣是使聽者一下子就感覺出的。藍翎講話時說：「考大學時，我也是報考北大的，沒有考取，到了山大。」言外之意是：北大也不見得怎麼樣，山大不是出了我們這樣的人物嗎？這些話使北大學生聽著很覺不是滋味，因而對他們的講話也就表示了冷淡。」參閱《負笈燕園》（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頁 153-154。

⁸ 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5 冊，頁 134。

⁹ 周揚在 1959 年 1 月 20 日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便這麼說：「前幾年出了一個李希凡，主席很高興，去年出了許多個李希凡，而且比李還要高明。一個李希凡，批判了俞平伯。現在許多個李希凡，批判許多個俞平伯，年輕人起來，使人看出希望，這是好事情，使人高興。」轉引自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 275-276。值得注意的是，那時候另一位作者藍翎已被打成右派，所以他的名字在中共官方的宣傳中已經消音；而李希凡也死不認賬，一直強調批判俞氏的文章是由他自己寫的，沒有與藍翎合作。因為這個緣故，藍翎感到極不服氣，在回憶錄中不時口誅筆伐（參閱《龍捲風》，頁 1-6、28-33）。

¹⁰ 〈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關於文化學術界應開展反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鬥爭〉，《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卷 1，頁 4-5；陳煒謨，〈論考據學在文學研究中的作用——兼評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考據學及其毒害〉，《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卷 8，頁 97-101。

許多人似乎沒有注意到，俞平伯一直都在撇清他與胡適的關係。在出版《紅樓夢研究》時，他就把原來提到的胡適的名字都去掉了，還刪除「把曹雪芹的生平跟書中賈家的事情攪在一起」的〈《紅樓夢》年表〉。這樣的做法，不完全是爲了政治原因，還在於俞氏本人對「自傳說」的不滿。

「自傳說」其實違犯了一個簡單不過的常識：小說就是小說，小說容許虛構和想像，與現實的世界總是有些距離的；硬要把曹雪芹的生平套在《紅樓夢》書中的情節，結果勢必牽強附會，於理不合。俞平伯很早就有這種覺悟。早在《紅樓夢辨》出版後的第三年(1925)，他公開發表〈《紅樓夢辨》的修正〉一文，檢討己非，改而主張《紅樓夢》不是曹雪芹自傳，說這部小說頂多算是自傳的、寫實的文學；並且承認考證有時而窮，不能每事必考。¹¹ 可以說，俞平伯是經過切身研究的體會，比任何人更加清楚地知道胡適紅學見解之不通所在；而今卻把他與胡適綁在一起挨罵，怎能不教他感到萬分的委屈呢！明乎此，就不難理解他後來伏罪檢討時，還要婉轉地辯明自己與胡適在紅學見解上的不同了。¹²

好在真正要打倒的是另有其人，當時中共的基本方針是「思想批判從嚴，處理從寬」，俞氏經過一輪折騰之後，僥倖地順利過關。

四

批判胡適運動到底對其他知識分子構成多大的衝擊呢？這顯然不能與後來的肅反、反右、向黨交心、拔白旗、反右傾等運動相比的。在上述的運動中，知識分子必須接受批判和自我批判，面對領導和群眾的嚴苛糾察。由始至終，批胡運動的任務和基調，都沒有越出「思想鬥爭」的範疇。¹³ 知識分子要批判的是別人而不是自己，不必深入挖到自己的歷史，心理

¹¹ 例如考證派曾討論過大觀園在南抑或在北的問題，這就被俞平伯這麼批評：「大觀園即太虛幻境。果真如此，我們要去考證大觀園的地點，在北京的某某街巷，豈非太癡了麼？」參閱〈讀《紅樓夢》隨筆〉，《俞平伯論紅樓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 783。

¹² 俞平伯這樣檢討說：「當《紅樓夢辨》出版不久，我就懷疑胡適的作者自傳說了，因為在《紅樓夢》裡有許多講不通的所在。」參閱〈堅決與反動的胡適思想劃清界限——關於有關個人《紅樓夢》研究的初步檢討〉，《新華月報》（1955年），第4號，頁 271。

¹³ 陸定一於 1954 年 10 月 27 日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信，轉引自陳清泉、宋廣潤，《陸定一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頁 391。

壓力自是輕得多了。¹⁴

話雖如此，我們也不能過於低估批胡運動給學術界所造成的震撼。回想三年前的思想改造運動，其前奏曲就是對《武訓傳》的批判。武訓的影響和名氣，遠遠不如胡適，居然也被毛澤東小題大做的無限上綱；誰知道對胡適的批判，會不會演變成新一輪的審查和清算？及早的與胡適劃清界線，以防萬一，就成為不可不作的自保策略。那些曾與胡適有親密的關係（例如羅爾綱、吳景超等），或過去歷史太過「反動」的人（例如馮友蘭、賀麟等），作為「待罪之身」，就公開表態自我懺悔。其他學者也戰戰兢兢的，不可終日。據透露，當時北京師範大學語言組一教員就說：「這回『搞』俞平伯，下回不知該『搞』誰哩！」不少教授因為害怕「整」到自己身上，所以搶先發表意見，批判俞平伯，以便爭取主動，以攻為守。

那個時候，也有一些學者嘗試堅持自己的意見，不願隨官方的指揮棒而起舞。例如在廣州中山大學，不少老教授就表現出質疑和抗拒的態度。態度最激烈的，莫如歷史系教授陳寅恪。他說：「人人都罵俞平伯，我不同意。過去你們都看過他的文章，並沒有發言，今天你們都做了共產黨的應聲蟲，正所謂『一犬吠影，百犬吠聲』。」此外，歷史系另一位教授梁方仲說：俞平伯研究《紅樓夢》三十年，畢竟是有成就的；而李、藍雖會批判人，但自己無底。中文系教授容庚、王季子、吳重翰等人，就堅持把胡適的政治態度和治學觀點割裂開來，認為他在政治上是改良主義者，是唯心的，但在治學方面卻有其唯物的一面；有時甚至大罵俞平伯而捧胡適。容庚在古典文學教研組的座談會上發言時，一面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為「枉費精力的廢物」，說這是俞氏完全拋棄了功用的標準的結果；一面卻頌揚胡適的「治學態度是嚴肅的，值得學習的」。在另一場合上，容庚更主張「還胡適以真面目」，說：「胡適尊重證據，主張凡評定事物要『拿出證據來』，這和毛主席所提倡的『實事求是』精神是一樣的。」在當時中共要求全面抹黑胡適的滔天壓力下，容庚等人的言論不啻是公然與官方欽定的基調立異，其表現出來的道德勇氣，殊非常人可比。

¹⁴ 後來哲學家鄭昕就這樣說：「黨號召對胡適、胡風和梁漱溟先生的思想進行批判，於是大家找他們的書，分析、批判他們的唯心主義，也都沒有必要碰到自己的唯心主義。隱藏著的唯心主義思想和公開的政治熱情，『兩峰對峙，雙水分流』，各不相攪。」參閱〈開放唯心主義〉，《人民日報》，1956年10月18日，第7版。

五

批判胡適運動不只牽涉到中共意識形態政策的操作，也關係著晚年胡適如何自我定位，以及其他學者對胡適的真實評價。然而，若要處理這個課題，單是在資料上的蒐集和整理，便叫人頭疼不已。一來是當時發表的文章多不勝數，光明日報社所編的《胡適思想批判》八大輯雖然逾百萬字，但許多登載在地方報刊的文章還是沒有收錄在內。二來是中共的檔案材料還沒有徹底公布，使我們對於運動推行的過程、動員的規模和對各個組織單位的衝擊等問題，都不能有深入的了解。三來是批胡運動對知識分子的衝擊，不如其他政治運動之酷烈；事後許多人也把當年所寫的左腔左調的批胡文章視同兒戲鬧劇，羞於啓齒，所以很多回憶錄對之也缺乏詳盡的記載。如何大量蒐證，如何推進這個領域的研究，茲事體大，亟須更多的人力參與和支援。限於時間和篇幅，這裡我僅僅作了綱目式的描述，願以此與其他胡適研究者共勉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45)

袁氏家藏近代名人手書

王爾敏編

620頁

精裝 3500元

此書之內容，全在收載前清兩廣總督袁樹勳及其長子思亮兩代所收輯清末民初之名人手書，俱未嘗公之於世。而其書牘之可貴，多涉及民國肇始之際之政壇珍聞，若民元北京兵變後都城之荒亂寫實，袁世凱之操縱大局，袁世凱之結納前朝遺老引進參議院之布局，黃興在民元為革命軍乞借軍餉，張君勱、張嘉璈、楊度、湯覺頓、范源濂等四小黨籌謀合併之密計，以及迎接梁啟超擔任黨魁等事皆向無人知之政黨史料，參考價值極高。

胡適的「整理國故」在 20—30 年代 學術界的反響

陳以愛*

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胡適從來就是一位眾議紛紜的人物。在今日學界對其歷史地位深感興趣，有意作深入的探討之際，一個值得從事的研究取徑，就是把胡適放到原初的歷史脈絡中，也就是憑藉著近代豐富無比的學術史材料，來考察 20-30 年代中國學術界對胡適究竟有甚麼樣的看法和評價。

本文所以提到「整理國故」，是因為這句話不僅為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出的一句口號，它也可以用來涵蓋胡適一生的學術工作。不但如此，在胡適極力倡導下，20-30 年代，中國有許多學者都投入到「整理國故」的行列中去。錢穆在 1961 年曾撰〈五十年代中之中國思想界〉，論析辛亥以後中國學術思想在五十年間的流變發展，認為可以把多數學者劃歸兩大系統之下，其一就是新文化運動所帶動的標榜「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學術研究潮流。錢氏指出，當時學者如非共產主義運動的追隨者，則多集結在這面「整理國故」的旗幟下努力。

關於胡適個人及其推動的整理國故事業，其用意和方法，散見於胡適在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發表的眾多論著中，且不時出現前後異辭的情形。綜合來看，胡適所提倡的整理國故，以基本精神言，它是與新文化運動意氣相通的，其對傳統的態度，可以「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一句話概括之。以內涵言，這項工作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提出要對舊學作系統的整理（以西學部勒中學）；二是要以考證來尋求歷史的真相，還古人以本來面目；三是要評判古人的是非，一面「清除舊污」，一面「變異端為正統」。

在胡適倡導下，中國知識界從 20 年代起開始有許多人投入整理國故的事業中去。當時這些工作，又可以分從兩個面向來看：一是「普及」，在新文化陣營運用報刊雜誌廣泛的宣傳下，整理國故迅速成為一場新的文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化運動，從北京擴展到上海及其他地區，聲勢十分浩大；惟到了1928年前後，這場文化運動卻因倡導者的主動喊停而大致落幕。二是「提高」，這方面的工作，以大學和研究機構為重心，20-30年代主要集中在北京（平），抗戰爆發後則轉移到西南地區。

本文要談的是「學術界」對胡適本人整理國故的著作及其推動之整理國故事業的反應。對於哪些人可以劃入「學術界」的範圍，在現代學院尚未普遍建立之前，確實不太容易界定。本文主要指的是那些在大學、研究機構中任職者，以及一些在學院之外學有專精的人。論到這些學者對胡適的看法，主要見諸以下三種材料中：一、報刊雜誌上的評論文字；二、傳記資料：包括書信、日記、自傳和回憶錄；三、相關的學術論著。下面在大略介紹這三種材料所透露出的當時學者對胡適的評價時（尤側重介紹向來較受研究者忽略的材料），也一併說明使用這些材料會遇到甚麼樣的困難，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法，以就正於學者方家。

一、報刊雜誌上的評論文字，包括 20 年代以後日漸普遍的書評，是迄今尚未得到研究者充分利用的大宗學術史材料。舉例來說：20 年代南方有章太炎主辦的《華國》月刊，曾刊載章氏的〈教學弊論〉（1924）諸文。1928-1933 年間，北方有吳宓主辦的《（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總共 313 期），這份被胡適罵為《學衡》雜誌「餘孽」的期刊，曾刊登了大量抨擊新文化派的書評文字，其中包括陳寅恪好幾篇針對「整理國故」而發的文章，如〈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1930）、〈與劉文典教授論國文試題書〉（1932）、以及〈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1933）等。以報紙副刊這種長期受到研究者忽視的材料，如能善加利用，必將大大豐富近代中國學術史的面貌，甚至改寫其中的部份篇章，這是在此斷言的。

二、傳記資料也是近年層出不窮，亟待研究者善加利用的學術史材料。若要妥善運用這類材料，「通語境」顯然是一個首須具備的基本工夫。也就是研究者先得了解學者之間的親疏關係，略悉各人的學術思想背景，否則極易將一些客套門面語當真，甚至在不乏「證據」支持下，最終得出一個與信史杆格不入的結論。舉例來說：傅斯年是胡適的學生兼諍友，他在私函（1926）中對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及其小說考證的一抑一揚，就十分值得重視，且亦對胡適後來的治學路向產生影響。至於 20-30 年代與胡適頗有往來的陳寅恪、湯用彤、錢穆、孟森、余嘉錫、陳垣等，其見諸

文字及口頭上的評語，則須經過謹慎的過濾和解析。

三、相關的學術論著，自然更是極其豐富、有待研究者深入挖掘的學術批評材料。中國學者一向不願指名道姓，作公開的學術批評，大部份評論多隱藏在學術論著的字裏行間。如何讀出這些著作的言外之意，而又不致流於穿鑿附會，的確不太容易。但也有一些相當顯豁易知的批評，如呂思勉的《經子解題》（1926年出版）、余嘉錫的《古書通例》（原名《古籍校讀法》，為作者30年代執教北平各大學時所用講義），其中談到古人著書體例的部份，顯然都是針對胡適和梁啟超的相關論著、以及二氏所引發的古書考辨風氣而發。此外，還有一種較為迂迴的學術批評。舉例來說：像余嘉錫對胡適及「古史辨」派所作的隱曲的批評，曾大量見諸他的考證學鉅著《四庫提要辨證》中。余氏弟子牟潤孫曾寫〈學兼漢宋的余季豫先生〉一短文，將余氏書中的「微言大義」稍事勾勒，非常值得參考。

總之，研究者倘要真正「讀懂」上述所提及的這些學術史材料，了解學者筆下所指涉的對象及其所批評之事，既不致對論者的「微言大義」視若無睹，亦不致對文獻作超出作者本意的曲解誤讀，或只有朝儘可能博採綜覽不同性質的史料，予以參照對讀這一方面努力，且須恪遵古人「闕疑」之教，審慎從事。

從上面簡略的介紹可以了解到，假如有人想要寫一部「近代中國學術批評史」的話，材料方面實在是豐富異常。而在這個龐大課題下，「近代中國學術批評史上的胡適」，則又必然佔據著一個特別重要的位置。因為僅以筆者孤陋所及，就已發現這樣一項事實：那就是幾乎所有重要的近代學者，都曾對胡適及其推動的整理國故事業，以各種各樣的方式發表過或隱或顯的評價。這是因為當胡適所倡導的「整理國故」在學界已經形成熱潮，甚至於成爲一個時代的風氣後，贊成者固是積極響應和追隨胡適所指示的治學途轍，反對者往往也不能避開胡適所造成的風氣，當然他們乃是以針砭、批評的方式來對這個學風作出回應的。

在初步考察過上述史料後，以下擬將20-30年代學術界對胡適的評價，大致說明如下：

一般人在回顧20世紀中國學術的發展時，多肯定戰前十年的北平學界，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黃金十年。在那十年間，正是北平學者有意在中國北方打造一個學術社會，以考據學的造詣來論定學者高下，而漸置學人的思想傾向於不論的時期。在學風由虛入實，學者對晚清以來長期盛行

的「概括論斷」多表輕藐之際，北平學界的「公論」與五四時期已不太相同。也就是說，在當日北平學者的眼光中，五四後的胡適在青年學子中雖然一度「光芒萬丈」，惟在他們看來：胡適整理國故的論著，就其中運用新材料寫成的小說考證來說，固然頗有新發現（這一點連對胡氏抱反感者亦加以肯定）；然其出版後被許多青年學子奉為經典著作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卻被學者們從基本意趣、材料考訂、寫作手法、具體觀點各個方面，一一批評得體無完膚，以致胡適在 30 年代即對外宣稱：自己對於這部舊作的見解，已經「全部推翻」了。

當胡適在北平學界的聲光已大不如前之際，五四期間被認為思想落伍的王國維，卻得到學者的普遍推崇。在北平（京）交遊頗廣的倫明，在 30 年代嘗稱：「十餘年來，故都言國學者，靡不曰王靜安，幾如言漢學者之尊鄭康成，言宋學者之稱朱子也。」（《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王國維」條下）其言相當扼要地說出當時學術界的一般意見。此外則「史學二陳」（陳垣、陳寅恪）在學界亦得到普遍的推重。

戰前十年北平學者對胡適的看法既如上述，以之與 80 年代以後海內外學界對胡適著作的評價，兩者顯然存在著相當落差。這一落差所反映的問題及其所蘊含的意義，似乎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省思。在此僅提出個人對這一問題的兩點思考如下：

首先，這一落差的存在，是不是因為學術評價的標準在這大半個世紀間出現了轉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或是部份肯定的，那麼在學術史經常伴隨著學術評價標準的改易而不斷重寫之際，是否有一些經得起時間考驗而總是站得住腳的「標準」存在？如果研究者能夠回答這個問題，且亦提出一個較為客觀的「標準」來，那麼或許以後當學界再來討論「胡適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時，將會得到一個較為確當的評價。其次，如果我們承認：當年學術界對胡適的評價，是一切關心胡適及近代中國學術史的人所不應忽略的意見，那麼學界過去在討論到「胡適與近代中國學術」這一議題時，甚少觸及這些材料（其中大部份是早已刊佈的舊材料），且亦絕少提及這些學者的看法，或許顯示出向來在這個研究的領域中，我們在材料的運用、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各方面，都存在著一些有待研究者在今後力加改進的不足之處。

以上兩點思考，或許已軼出本題之外，但似乎仍值得關心過去及當代學術史的學者專家們一起來考慮的。



新書評介

《李鴻章與北洋艦隊——近代中國創建海軍的失敗與教訓》。王家儉著。臺北：國立編譯館，2000年4月，674頁。

姜鳴*

許多年前，當我開始研究中國近代海軍史的時候，就讀到臺灣師範大學王家儉教授的《中國近代海軍史論集》（1984年12月臺灣文史哲出版社出版），王家儉教授在中國近代海軍史領域所作的極為認真細緻的開拓工作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些年，王家儉教授退休，他克服了眼疾帶來的諸多不便，依然孜孜不倦地致力於學術研究，終於將其積四十餘年專研海軍史課題的深厚心得，著成《李鴻章與北洋艦隊——近代中國創建海軍的失敗與教訓》（2000年4月臺灣國立編譯館出版），這是他奉獻給學術界的最新成果，值得引起研究者的關注。

王家儉教授出生於皖北農村，50年代畢業於臺灣師大，曾在中學任教。1960年考入臺灣大學史研所，師從郭廷以先生。研究方向先為魏源及明清思想史，後又轉向中國近代海軍史。王家儉教授因成長於抗戰時期，且曾參與對日軍作戰，耳聞目睹日軍種種暴行，胸臆中充滿無限的憤懣，進而追思近代中國積弱之源，深感甲午戰爭海軍的敗績，海權的淪喪，誠為關係其後歷史發展的一大樞紐。海防、海軍與海權三者實為一體，海洋與民族的生存、國家的發展關係至深且巨。因此乃下決心研究海軍史，以期喚起國人的海洋意識和對發展海軍的重視。

中國近代海軍史的研究，廣義上說，可以從甲午中日戰爭失敗後算起。甲午戰後，北洋海軍全軍覆滅，對國人產生極大刺激，遂有姚錫光著《甲午兵事紀略》、羅惇勳著《中日兵事本末》、林樂知口譯、蔡爾康輯《中東戰紀本末》等書籍行世，記錄了甲午戰爭中的文件、事件和中外評論。從今天看來，這些作品更接近於史料而非研究專著。民國年間，始有研究性著述問世。池仲祐先後著有《海軍大事記》、《海軍實紀·造艦篇》、

* 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海軍實紀·購艦篇》、《甲申戰事紀》、《甲午戰事紀》，郝培藝著有《中國海軍史》（1929年），但都失於簡略。1949年以後，大陸學者的研究重點，先是集中於中日甲午戰爭、中法戰爭和洋務運動，除50年代以「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為合集出版的《甲午戰爭》（7卷本）、《中法戰爭》（7卷本）、《洋務運動》（8卷本）等史料匯集外，先後有戴逸著《北洋海軍》（1963年中華書局出版）、戚其章著《北洋艦隊》（1981年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孫克復、關捷著《甲午中日海戰史》（1981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陳旭麓等主編的《甲午中日戰爭（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三）》（1980、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及一批重要論文發表，尤其是張俠、楊志本等主編的《清末海軍史料》（1982年海洋出版社出版），打破以往以戰爭和洋務運動等課題的機械式分割，預示了此後以海軍史為專題進行綜合研究的時代即將到來。果然不久，張墨、程嘉禾著《中國近代海軍史略》（1989年6月海軍出版社出版）、吳傑章、蘇小東、程志發主編《中國近代海軍史》（1989年7月解放軍出版社出版）、胡立人等主編《中國近代海軍史》（1990年大連出版社出版）、姜鳴著《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1991年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姜鳴編著《中國近代海軍史事編年》（1991年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出版）、海軍司令部《近代中國海軍》編輯部編著《近代中國海軍》（1994年海潮出版社出版）、姜鳴編著《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日誌(1860-1911)》（1994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戚其章著《晚清海軍興衰史》（199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戚俊傑、劉玉明主編《北洋海軍研究》（1999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先後問世。至於以甲午戰爭、中法戰爭、中國近代造船工業等題目出版的專著和論文，數量更是繁多。與此同時，在海峽對岸，中研院近史所刊布了《海防檔》（1957年），包遵彭發表《中國海軍史》（1957年出版1卷本，1970年出版2卷本）、《清季海軍教育史》（1969年臺灣國防研究院出版部出版），鄭天傑、趙梅卿著《中日甲午海戰與李鴻章》（1979年臺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出版）。在美國，約翰·羅林森撰寫了《中國發展海軍的奮鬥，1839-1895》（John L. 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Nave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蘇小東、于世敬譯，1993年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出版）。近三十年裡，中國近代海軍史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在上述研究者中，王家儉教授的獨到貢獻是引人注目的。早在本書出版之前，他就對近代海軍史作了許多紮實的研究。諸如清末海軍留學生，過去只能從中文資料中知道其派遣時的籌劃，而缺乏對其在英國留學情況的詳細了解。王家儉教授在〈清末海軍留英學生的派遣及其影響〉¹一文中，通過對英國海軍部檔案的研究，搞清楚了前後三屆學生在英國留學和實習的基本狀況，從而大大拓展了研究視野；又如 1886 年北洋海軍訪日期間發生的「長崎事件」，經王家儉教授在〈中日「長崎事件」之交涉(1886-1887)〉²一文中廣博徵引中、日、英文原始資料，條分縷析地將事件的前因後果論述得極為清晰，中日甲午戰爭之前，日本朝野人士對中國的複雜心態也就躍然紙上。中國近代海軍，是中國人引進西方現代軍事技術的產物，作為新式軍港，在旅順港的營建過程中，既有中國洋務官員的策劃和各項施工組織工作，又有德、英、法國各種勢力的介入和先進技術及理念的引進；王家儉教授在〈旅順建港始末(1880-1890)〉³一文中，以豐富的中外史料為基礎，從建港背景、建港決策、工程實施過程、中外人士對於旅順建港的評價等角度，將這個近代中國海軍建設中的重要課題予以闡述，尤其是深入開掘並高度評價了過去不太為史學界關注的總辦旅順營務處道員袁保齡的功績。至於海軍衙門這一清末海軍的最高指揮機構，由於不是傳統常設機構，前後僅存在了十年，以往人們對其組織結構、分工執掌幾無所知。王家儉教授通過仔細發掘史料，不僅搞清了海軍衙門的組織結構和沿革脈絡，甚至連總辦、幫辦及各部門的管股章京名單也考證得一應俱全，使我們了解到掌管近代海軍最高決策機構的，全是一批從未接觸過海軍的旗人，或為紈袴子弟，或為候補官僚，或為貪官污吏，根本不知其所司何事，僅把海署當作鑽營獎敘、爭權奪利的場所，從而對探索近代海軍的失敗有了更深切的認識。⁴王家儉教授所作的研究不僅具有開創性，而且也是他為完成本書所作的前期研究。可以說，任何一部有質量的學術專著都是在紮實研究的基礎上形成的，王家儉教授的這部專著，又

¹ 王家儉，〈清末海軍留英學生的派遣及其影響〉，《中國近代海軍史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頁 27-93。

² 王家儉，〈中日「長崎事件」之交涉(1886-1887)〉，《中國近代海軍史論集》，頁 147-198。

³ 王家儉，〈旅順建港始末(1880-1890)〉，《中國近代海軍史論集》，頁 95-146。

⁴ 王家儉，〈清季的海軍衙門(1885-1895)〉，《中國近代海軍史論集》，頁 199-238。

一次爲我們提供了生動的實例。

王家儉教授的新著成書於 1998 年，出版於 2000 年。在其之前，雖早已有多種研究專著面世，但王著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學術地位。這固然同王家儉教授廣博精深的學術根底以及他在這部新著裡充分吸收並發揮了以往的研究成果有關，更同他近年來新的思考直接相連。在《李鴻章與北洋艦隊》中，王家儉教授的研究領域不僅深入到北洋海軍的裝備、人員培訓、大沽、旅順口和威海衛基地的布置、海軍章程的制定、海軍衙門的機構設置、俸餉制度和獎懲制度、海軍的訓練和各項特別活動、經費收支及與頤和園工程的關係、中日甲午之戰以及福建艦隊與江蘇艦隊的發展，使我們對於中國近代海軍發展過程中的諸多細節獲得更爲翔實的了解，還深入探討了海權問題和李鴻章與北洋艦隊的關係，使得研究達到更爲深刻的境界。

通讀全書，我覺得本書在以下三個方面的論述是很有特色的。

一是海權思想同國家戰略的關係。海權是海軍史研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王家儉教授早於 1978 年就在〈近代中國海權意識的覺醒〉⁵一文中予以闡述，1992 年又發表論文〈魏默深的海權思想——近代中國倡導海權的先驅〉，⁶在《李鴻章與北洋艦隊》中，王家儉教授更是加以深入地討論。在開卷之處，他援引美國著名海軍戰略學家馬漢的名言：「歷史學家一般都不大熟悉海洋的情形，對之既無特別的興趣，亦無特別的知識。而於海洋力量對於重大歷史事件之深遠決定性的影響，遂因此而予以忽視，尤以海權史的研究更爲如是。如所周知，利用及統治海洋，在世界史上實爲一重大因素，但若尋求與展現其在某一時機的正確方向，亦屬不易。」馬漢的名著《制海權對 1660-1783 年歷史的影響》和《制海權對法國革命和法帝國 1793-1812 年歷史的影響》出版於 1890 年前後，馬漢的學說當時就震動了世界。制海權第一次被提高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來認識。英國人爲之傾倒，法國人把馬漢的著作印發給海軍的每一艘艦艇，日本也很快出了譯本，用作軍事院校和軍艦艦長的必讀書。惟在中國，則無人問津。直到二次世界大戰時方有節譯本，甚至到了 1997 年，國內出版的《海

⁵ 王家儉，〈中國近代海權意識的覺醒〉，《中國近代海軍史論集》，頁 307-317。

⁶ 王家儉，〈魏默深的海權思想——近代中國倡導海權的先驅〉，《清史研究論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 235-251。

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出版，蕭偉中、梅然譯）仍是一個選編本。關於馬漢的研究，成爲一個巨大的空白。王家儉教授寫道：「所謂『海權』，並非僅指海軍一端而言，而實有其複雜的內涵。除馬漢所說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領土大小、人口數量、國民性格和國家政策六大要素外，還可以包括商業生產、海外航運、殖民基地、國際市場、強大海軍與有效的制海權等因素在內。換言之，海權思想乃是一種西方海洋文化的整體叢結 (integrated complexity)，決非僅以海軍爲限。」他還進一步指出：「中日兩國同因西方海權國家之挑戰，而以建設海軍作爲回應，但其結果卻使中日的國勢爲之全面的改觀，種下其後日軍屢次侵華的悲劇。撫今追昔，亦可憮然海權觀念的強弱，影響國家者是何等的深遠。」⁷這一觀點，與他早就提出的：「李鴻章的海軍思想侷限於自我防守的戰略。他沒有積極進取的海權觀念。雖然他設想訓練一支有鐵甲艦裝備的強大海軍，……但是他的主要目的在於防禦，而不是進攻。」「日本最初也和中國一樣，只注意海防，隨後，部分由於美國海軍戰略家馬漢的影響，日本人的海權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日本政府向人民灌輸重視海權的思想，同時作出向海外擴展的緊迫計劃。」「中國和日本地理和歷史上的差異導致兩國態度的不同。不同的觀念導致中國和日本海軍的不同發展」⁸的批評是一脈相傳的。以一個大學歷史教授的眼光審視歷史，王家儉對海軍史的研究已經進入國家戰略的高度，這是他給人們留下極爲深刻的印象之處。所以王爾敏先生認爲：「家儉此作，即足以提示往時建立海軍之必要，以及經營運用之疏失，正予後世用作檢討參考，取法取戒，以策將來，……此家儉用心宗旨所在，冀希望我全國上下警惕反省，勿使國家再次沉淪。」⁹海峽兩岸，當同此心。

二是全面論述了李鴻章與北洋艦隊建設的關係。王家儉教授的這部新著，本名《清季的北洋海軍》，嗣爲凸顯李鴻章與北洋海軍的關係而易名爲《李鴻章與北洋艦隊——近代中國創建海軍的失敗與教訓》。書中在論述海軍建設的各個方面時均談到李鴻章的謀劃、構想及運作過程。在書之

⁷ 王家儉，《李鴻章與北洋艦隊》（臺北：國立編譯館，2000），頁2。

⁸ 王家儉，《李鴻章對於中國海軍近代化的貢獻》，輯入劉廣京、朱昌峻編，陳絳譯，《李鴻章評傳——中國近代化的起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307。

⁹ 王爾敏，《李鴻章與北洋艦隊》，「序」。

末尾又作第十一章「結論」，對李鴻章與北洋海軍的關係及北洋海軍的失敗教訓進行專門的討論。如同時下大部分研究洋務運動的學者一樣，在回顧中國走向現代化的艱難曲折的道路時，人們越來越多地對於這位筭路藍縷的開拓者表示出敬意。王家儉認為：「在國際形勢上，他（李鴻章）已認識到中國正面臨一個『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和『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在中外關係上，他以為應當明守和局，陰為戰備，力破成見，以求實際。在自強方針上，他主張改變科學，變通舊章，採借西法，製造輪船火器。在國防政策上，他力主充實武備，以防不虞，並且以為古今異勢，應當分別緩急。當前形勢東南重於西北，海防尤為堪虞；而東南海疆萬里，勢難處處宿以重兵，惟有就北洋之京畿門戶及南洋之財富奧區二處擇要設防。識見的卓越，器局的闊偉，目光的遠大，在當時朝野大吏中，無一人可以望其項背。他「以創建北洋一軍為己任，購船置砲，選將練兵，設立海軍學堂，派遣海軍留學，興建船塢基地，修築砲臺營壘。從其奏稿與函稿之內，即可知此一系列的措施是何等的繁難，耗費了多少的心血，歷經了多少挫折。」¹⁰

三是全方位思考北洋艦隊失敗的原因。以往的研究，大多數集中在李鴻章避戰保艦方針及海軍腐敗等原因上，在本書中，王家儉通過詳盡的分析，認為一是李鴻章個人的條件和處境限制。李鴻章以淮軍統帥轉入仕途，雖周咨博訪，親自觀察，但終究並非海軍出身，治軍知識有限。且海軍建設是洋務運動中之一環，其他如軍事、外交、開礦、築路無不經李鴻章之手，任重事繁，其精力和時間自不能全力以赴；在政治地位上，李鴻章畢竟是地方長官，因而時常受到部臣的掣肘、保守派的嫉妒、地方派系的傾軋。二是制度層面的問題。洋務運動之所以無成，是不知從法律制度著手，即令偶而創立若干法規制度，也因用非其人，執行不當，形同具文。創立海軍與其他洋務事業一樣，凡事皆由各地督撫分別辦理，權力邊緣的推動，而非由權力樞紐的中央領導統籌，是以紛歧錯亂，毫無成效可言。清季創辦海軍，二十餘年裡朝廷竟無專職大臣負責，常為外人傳為笑柄。中法戰爭後，雖經朝野上下不斷呼籲而設立海軍衙門，可是由於滿人把持，只不過增添了一個新的官僚機構而已。相比之下，日本於明治維新後，即以中央的權力推動一切現代化的建設，所以取得較高的成就。故由「中

¹⁰ 王家儉，《李鴻章與北洋艦隊》，頁 597。

樞邊緣」的觀點考察中日現代化的成敗，實為明顯。三是經費問題。中國以農業經濟和地方協餉來維持海軍，本來就是一件荒唐之事，加上慈禧太后的昏庸和挪用海軍經費，致使海軍得不到必要的資金支持。四是中國工業和科技教育的落後造成的種種困難。科技的轉移需經長期的培訓，並非可以一蹴而幾。高級海軍將領的難求，迫使李鴻章派遣陸軍將領丁汝昌統領北洋海軍，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五是國民的海洋意識，對海軍的發展也有相當影響。中國由於傳統上是一個大陸國家，僅有陸權思想而缺乏海洋精神，絕大多數國民視海洋為畏途，只有少數遠見的知識份子和開明的政治家了解海軍的重要性，其他人不是懵然無知，即是極端的冷漠。保守派的大臣時加阻撓反對，國家的最高當局，也對海洋毫無認知，更不會做出大力的支持。凡此種種，最終造成北洋海軍的全軍覆滅。這些歷史的教訓值得後人深刻總結和認真取取。

我本人研究中國近代海軍史前後已近二十年，細讀《李鴻章與北洋艦隊》，自然體會得出作者著述中的甘苦和獨到的學術貢獻。近年來，通過海內外學者的共同努力，中國近代海軍史的研究成果斐然，這是極為可喜的，但研究如何進一步深入下去，需要認真思考。記得我剛開始涉足這一領域時，沈渭濱師指導我從靜態研究入手，認真做好大事記和各個專題，諸如海軍購艦、經費、教育、訓練、基地建設、海軍章程，進而研究海軍人物和戰爭，最後再寫作專著。這種方式，與王家儉教授所採取的治學方法極為相似，他的成果，對我啓迪良多。目前，當學術界從一個個具體的小專題走向海軍史的大專題並出版了十餘部專著後，我們固然還應當加深對海軍建設的各個自身專題的深入研究，但也應嘗試將中國近代海軍史放到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中去考察。

比如，我們在評論清朝中央政府對海軍建設的態度時，應該注意李鴻章與朝廷各種政治勢力集團的關係與溝通渠道；《李文忠公全書》、《李文忠公尺牘》中有他同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以及軍機處樞臣、各地封疆大吏的通信。目前正在整理李鴻章全集的過程中，也發掘出許多新的史料，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李鴻章在官場交往中為發展北洋海軍所作的縱橫捭闔。過去我們注意到「清流」對洋務事業和洋務官員的批評，卻很少關注李鴻章在中法戰爭前通過淮軍故舊張樹聲之子張華奎同「清流」健將張佩綸等人建立的特殊交往渠道、張佩倫對海軍建設的思考和貢獻，以及此中所反映的「清流」人物期待與實力派官員聯手做一番事業的抱負，而這些

對於加深海軍史的研究無疑是有極大幫助的。

又如我們在進行海軍人物研究和評價的時候，應該擺脫簡單地以最後的結局加以「愛國」和「賣國」標籤，深入到他們平常的思想狀態和生活方式中去，注意觀察留學生們回國後居然也是妻妾成群，依然嚮往科學及第的保守價值觀念。前些年發現的方伯謙自訂《益堂年譜》、盧毓英《甲午前後雜記》，僅僅被用作為方伯謙翻案的旁證似嫌不夠有力，但卻為我們打開了一扇近距離觀察北洋海軍的窗口。去年孔祥吉在〈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上層人物的心態——營務處總辦羅豐祿家書解讀〉¹¹一文中，提到了北洋水師營務處總辦羅豐祿的函稿中，有許多對北洋上層、海軍內部的紀錄，這些史料都有助於我們拓展視野，從而更好地總結中國近代海軍失敗的歷史教訓。

再如，北洋海軍的發展與清政府經營朝鮮戰略有著極大的關係。我們在評論清政府介入朝鮮「壬午之變」、「甲申政變」、「甲午東學黨起義」之時，還應該注意朝鮮內部在西方思潮影響下的現代化進程，以及這種進程與清政府將朝鮮作為東北地區戰略屏障政策的衝突。不僅從中國的角度討論朝鮮的這幾次重大事件，還應該從朝鮮近代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介入。在此基礎上，再來評價日本的朝鮮政策，中日兩國的海軍發展戰略，以及甲午戰爭中雙方在朝鮮的軍事行動，我們的視野就會更加拓展和開闊。

總之，當我們把整個海軍建設放到晚清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去，用我們今天積累的社會生活經驗細心地體會前人所走過的道路，就會發現中國近代海軍的發展竟是這麼的艱難曲折，尚待深入研究的課題還有那麼的多，而對於海軍建設中碰到的各種問題，也就有了更為全面準確的把握。從這樣的角度來研究，我們就能克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毛病，克服諸多研究著作從編撰方法到敘述體系都大致雷同的毛病，使得研究向更為縱深的目標拓展。當然，這也對新一代的史學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¹¹ 孔祥吉，〈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上層人物的心態——營務處總辦羅豐祿家書解讀〉，《近代史研究》，期6（2000），頁140-160。

《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石泉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11月，282頁。

林文仁*

近年來，因研究面向的多元化，及來自歐美學界結合文化研究理論路徑之流風所被，久踞中國傳統史學主流地位的政治史領域，似乎在中國近代史研究圈子裡，面臨被邊緣化的危機。長期以降，政治史領域之研究成果，確實在中國近代史研究裡，佔了相當大比例。這些圍繞近代中國內外政治形勢變化的描述，幾乎構成我們對於中國近代史理解的基本內容。然而，在汗牛充棟的政治史論著裡，有關晚清政治派系的研究成果，卻頗為稀少。對既有的研究成果略做檢列，這分書單並不算長，如郝延平〈同光新政中所謂「清議」〉、查時傑〈清光緒朝前期的幾個政治集團〉、丁名楠〈十九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清朝統治集團最高層內部鬥爭概述〉，¹及長期投入晚清政治史研究之吳相湘、沈雲龍，與孔祥吉三氏之論著，²至今仍具一定之啓引作用。但是，這些成果之共同點，殆皆為單一問題之基本論述，稍涉即止，且其中多數學者非以此為學術工作之重心，遂少有後續發展延伸。如此而欲形成一體系性理解，並不容易。所以，當易勞逸(Lloyd E. Eastman)的 *Throne and Mandarins: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cy during the*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¹ 郝延平，〈同光新政中所謂「清議」〉（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論文，1958年4月）；查時傑，〈清光緒朝前期的幾個政治集團〉，《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報》，期1（1974年5月）；丁名楠，〈十九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清朝統治集團最高層內部鬥爭概述〉，《近代史研究》，期1（1982）。

² 如吳相湘，《晚清宮庭實紀》（臺北：正中書局，1961）；吳相湘，《晚清宮廷與人物》（臺北：文星書店，1967）；沈雲龍，《近代史事與人物》（臺北：台海出版社，1971）；沈雲龍，《康有為評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再版）；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議研究》（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孔祥吉，《戊戌維新運動新探》（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其實，上述三位學者相關著述仍多，此處僅各舉與本文關係較切者各兩本，以供參考。

Sino-French Controversy, 1880-1885 一書問世，³其以中法越南衝突期間，清廷內部政治勢力分合與外交決策之牽扯為觀察核心，論說明快，迅即引起中外學界之高度重視，認為是重大突破。只是，易著的好評，也正反襯晚清派系研究長期面臨低度開發的事實。因此，當 1997 年，石泉（以下簡稱作者）的《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以下簡稱本書）面世時，其引人注目，遂不僅在其堪稱良史之內容，更在於此書深具「研究史」的意義。

二

本書其實成文早在 1948 年，乃作者就學於燕京大學研究院時之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即陳寅恪。陳氏畢生所指導之論文，亦唯作者此作屬中國近代史領域。據作者自陳，其始乃源於王信忠《中日甲午戰爭之外交背景》的啓發，而欲就導致甲午戰爭中國慘敗之內政因素，進行探索，加以陳寅恪對此甚表肯定，乃有此作之完成（頁 1）。惟論文撰就之際，作者即因參加學運而被國民黨點名拘捕，逃離北京，此後經內戰及文革，原書之清繕本及底稿一一蕩然無存。作者原以為此書之作就此空留追憶，詎料彼於 1991 年獲悉北京大學圖書館接收燕大圖書館之資料中，竟存有此篇，乃於 1993 年複印全文，失而復得，且得於 1997 年付梓。二十世紀以來，在中國人承受的無數悲劇歷程裡，本書的面世，當可算是史學界裡一齣稍可慰人的傳奇。

本書共計六章，以二至五章為核心，專論甲午戰爭期間政局之演變，及與和戰決策之互動。作者將甲午期間之政治情勢起伏，分為「自發端至宣戰」、「戰爭初期——一意作戰時期」、「和戰並進時期」、與「和議之成與主戰派之掙扎」四個階段，各以一章析論；由此中心論述，上承第一章「甲午以前政局概觀」，下啓第六章「戰後政局新形勢」，而成完整架構。在此一佈局下，自 1860 年代以迄 19 世紀末造之晚清政局發展，遂形成一濃淡有別，線條相連之構圖。即此一點，本書之成績，已可凌駕前後期同類型之作品。

³ Lloyd E. Eastman, *Throne and Mandarins: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cy during the Sino-French Controversy, 1880-188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首先，作者以「甲午以前政局概觀」一章，為將進入甲午期間政局演變觀察之讀者，先就前此自晚清政治結構與運作方向產生重大調整之1860年代以降之政治情勢，作一番回顧，並以洋務運動與守舊勢力，及滿清統治對漢人新興勢力兩項新現之對立元素，引入甲午之前，宮廷矛盾與朝臣黨爭之觀察脈絡。展現作者既欲理出甲午前三十年政局發展線索，又期能在理解上取得制高點的用心。在朝臣黨爭之介紹上，尤為銜接第二章做出準備。

自第二章起，已進入甲午初期階段，亦最終不免一戰之關鍵期。其間，淮系北洋與圍繞德宗，而以乃師翁同龢為首之主戰派間觀點之落差，及不利協調之矛盾，實他日先機盡失之起點。作者仍以李鴻章與主戰派觀點之展現為前導，引入中樞態度之轉變，與影響北洋基本立場之實際內情的觀照。

本書自第三章起，循外戰之升沉變異，帶出朝廷內部政治形勢流動之脈絡。其中，以集帝師、戶部尚書、樞臣於一身之翁同龢，領導「南派」士大夫而成之主戰派，與李鴻章為首之淮系北洋，及支持合肥之樞臣孫毓汶、徐用儀間所進行之和戰拉鋸，做為觀察之核心；而兩方陣營背後，隱然浮現德宗與慈禧之巨大身影，更令甲午戰爭期間之政局變動，沾染濃厚之帝后權力抗衡色彩。複雜動因之摻和，使本書自第三至第五章，由戰和變議到新式陸軍應運創設種種，都在派系傾軋分合之線索下，連成一氣；政治鬥爭之瞬息萬變，令讀者亦感目不暇給。

第六章則論述甲午一役之後，所呈現之政治形勢與此後自戊戌，經庚子，至辛亥之相關發展，有何聯繫；並由討論戰後北洋新局，及中樞在經甲午一役後，權力結構之調整與對新資源之競爭，而帶入對新興勢力之崛起與影響之觀察，為全書之主脈絡，指出未來流動的方向。整體而言，完整與穩妥，是本書在架構上應可獲得的基本評價。

三

本書之觀察重點在晚清政局，政局演變在各方政治勢力之分合消長。雖因創作年代學術語言之使用條件，作者並未在行文裡使用「派系」一詞，而代之以「黨爭」，但就本質而言，並無二致。既以黨爭或云派系為重心，則一般視為相關研究基本史料之官檔或官書，便很難提供充分資源，而需

更大地依靠私人日記及筆記著作，為點睛之資。日記與私家筆記運用之首要功夫，在排比與解讀，期賴以建構官檔、官書所呈現各種表面現象背後之繁複脈絡，及彼此間之有機聯繫。作者在撰作本書之過程中，所參考之日記及私家著作，約六十餘種，數量不可謂多，其中《李文忠公全集》與《翁文恭公日記》之徵引比重尤大，其餘史料、著作之排比參合，基本圍繞翁、李二氏之手筆運作。作者在參引材料上的克簡，除反映其撰作態度之嚴謹，當然亦有其時搜羅條件上之限制。惟就作者在本書中基於其運用之材料，對甲午前後政局變化所作之描繪與解析，筆者認為堪稱穩健妥切。

其實，無論就政治派系運作之解讀，或對日記及私家著作之理解引用，最容易發生的，莫如 *over stand* 之弊。在一種既定認知之下，將史料當中對此認知有強化作用之段落，削足適履地塞入行文中，再漠視其原有邏輯，無限上綱的例子，在與本書性質相類的著作裡並不難見到，否則也不會有什麼「抵抗派——投降派」、「洋務派——頑固派」、「革新派——守舊派」等一翻兩瞪眼之論述方式，到二十世紀八、九〇年代，猶能大刺刺地說長道短，且自認言之有據的現象。這類著作，在史料徵引上常有之通病，除前述之削足適履外，解讀失誤的情況更是普遍。需知在理解私家材料，尤其日記的過程中，對記撰者「筆法」之掌握，是一大關鍵。此須賴徵引者長期潛浸其中，一絲不苟地與撰者建立起「對話」關係，庶幾得見其記言之肌理，聽聞其意在言外的隻掌之聲，而非如電腦系統搜尋關鍵字符合即用。作者在本書中，便能相當程度地達到此種要求，並進一步深化其論述之合理性，比起習於將結論當前提地自詡為歷史裁判者流，自有天壤之別。而不能不令人感嘆者，本書之脫稿，至今已逾半世紀矣。

作者之穩健妥切，做為指導教授之陳寅恪自然發揮重要之助成作用。依作者自述，論文撰寫過程中，陳氏對其在史料蒐羅、核實、鑑定，及必以史實為立論基礎等方面之要求，極為嚴格，且各章皆須經乃師在前述標準下，一一檢證，方允定稿。得到如陳寅恪這樣的嚴格要求，本書有此水平，實非意外。不過，本書更能反映陳寅恪之影響者，當為全書之內在理路。儘管作者於政局演變——包括甲午期間，主戰與主和兩派抗衡爭議一之論證中，刻意地減低對各政治勢力之價值判斷，甚且對彼等亦以「門戶黨援」一詞名之。但陳氏於其《寒柳堂集》中，所謂「清代同光朝士大夫

有清流濁流之分」的說法，⁴實仍可見於作者行文之中。而主戰、主和陣營，與陳氏清流、濁流之分法的差合符節，也使作者在行文中相當程度忽視主戰與主和勢力在現實政治利益爭奪上之長期糾葛，而傾向謹守觀點差異之路線以陳。論述過程中，在價值判斷上的自制，或許一定程度表現作者對乃師清濁二分之說的反省，惟就整體內容而言，仍令筆者感見陳寅老以家世、聞見而成之思路的延續。就此一層看，則作者對影響政局走勢至鉅之「門戶黨援」一端所能闡明者，便不能不受到相當侷限。以作者之選材及其運用史料之能力，筆者以為侷限似非源自於此。若然，則陳寅恪「知我罪我，任之而已」一語，於作者或亦有余與恩師共任之慨也。循此話頭，筆者願以戶牖管窺之隅見，略述所思。

四

首先，就本書以政局演變為觀察中心之路線，則派系或黨爭之論析，必為凸顯前述路線之重點。作者自亦明此要旨，故於首章之末節，即對甲午前之官僚黨結與彼此關係，甚有著墨。自 1860 年代，兩宮垂簾，恭王領樞之格局確立後，至 1884 年「甲申易樞」，恭王軍機全班被黜為止，朝廷內部之政治黨結對峙，基本分為兩條主線，即滿洲親貴陣營中的「恭醇之爭」，與漢官僚體系中的「南北之爭」，此二者間之逐漸合流，終成慈禧操弄之資，乃有 1884 年，借中法戰爭決策之矛盾，結合醇系人馬，一舉達到瓦解恭王勢力之政潮，亦下開自 1885 年起之新權力格局。關於前述種種，作者非無述及，儘管彼將以李鴻藻為首之北派，與先後經沈桂芬、王文韶、翁同龢執魁首之南派，混一為自同治初年以來興起之清流勢力，而忽視兩派間之對抗性，及所謂「清流」勢力集結背後強大之政治動因，但至少已有討論，且堪稱清楚。然自進入第二章後，第一章所述及之種種，似斷若存；派系互動必有之連貫性，於本書中變得極為模糊，在銜接上遂形成極大困難。第一章之功能，原應為進入作為主體的二至五章之準備與基本認識之建立，惟以第二章後之談法，第一章遂近乎獨立個體，於中心架構亦成可有可無，極為可惜。直接之影響，即於甲午期間影響政局起伏之各主要政治勢力間，何以各持異議，且攻訐甚烈，進而牽動對外

⁴ 陳寅恪，《寒柳堂集》，《陳寅恪先生文集》（臺北：里仁書局，1981），冊一，頁 170。

決策，無法深入分析。

如甲午期間，兩個最主要之政治對手與派系：翁同龢為首之南派與李鴻章之淮系北洋，何以於甲午期間嚴重對抗，終致勢同水火，聯帶涉及各派系間之勢力分合重組，其根源實來自 1885 年後，新權力格局中，翁系南派與李系北洋在政治資源與權力分配上之長期緊張，遂令甲午之役成為雙方十年來一決戰點；尤其翁系南派對北洋形同迫戰之強大攻勢，也令此役一定程度變質為終結淮系對北洋控制權的內鬥。與此同時，打擊面亦擴大至樞臣中與李鴻章主和路線唱和，而立場長期親后之孫毓汶與徐用儀。孫、徐二人政治地位之嚴重動搖，遂又觸動自德宗親政以來，即時湧暗潮之帝后權力矛盾的敏感神經。在對德宗意圖透過主導甲午以後之決策，以達擴大權力基礎之疑慮下，終有慈禧之重出預政，且吸引備受主戰派攻訐之李鴻章等向西后進一步靠攏，於是甲午之役，乃升高成帝后黨結白熱化之平臺。一般總謂慈禧對甲午之役自始即全力主和，然依相關史料檢證，未必如此。事實上，正是在警覺力倡強硬之派系有可能將此推向削弱親后勢力之途，才造成西后強力介入，且立場明確向「和」之一道傾斜。凡此，實有自 1885 年以降，權力格局變化中一以貫之發展線索。本書所掌握之史料，及討論方式，應足見此，而終未能有效觸及，深化論析，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究其本由，筆者仍不能不以為乃因陳寅恪思路之影響，使作者更願由士大夫在理念與思惟上之差異，解釋甲午一役中之門戶黨援，而避免由政治權力與資源競爭之赤裸現實上去提出說法。惟如此一來，全書之連貫性與論析力道，遂難免壓縮矣；相對地，於晚清政局之描述，亦難盡云完整也。此或為本書最足供後日有志於此領域的後繼研究者之具體參省。

對諱莫如深之政局發展進行理解的難度，今昔皆爾。此不只在資料來源之不易，更在資料內容之難解。難解又有兩層，一在不盡明撰留者之「筆法」；另一層則多見困於資料原主之刻意隱飾，既欲瞞過多數時人，亦平添後人理解的難度，其中，又以私人函件最常見此情況。當然，若其時讀此信者能瞭然於心，則今人細心推求，參照其餘史料，未必無重現原貌之日；或許在關鍵點上，研究者再多些自信與膽識，更利突破。以下舉作者第三章第一節中，引用《翁松禪報張沓庵手書》之內容為例。

在作者所引之各組短箋中，有兩箋隱詞最多，亦與人事牽連最深。蓋此中涉及南派圖以湘軍北調，防制淮軍，並藉此打擊李鴻章的「根本之

計」。先是甲午（1894）七月十四日（8月14日）之一函：

米北開南禁，且欲開南禁，南未之許也。封豕誠可以易長庚，但恐此星照別處，范公堤一時辦不到，兩函奉繳。童昏可憎，不一。

次日，（8月15日）又有一函：

童再任不佳，隔江亦聞之，大堤未知能辦否？江防極要，聞布置尚從容。津不戢奸，大奇！楚南不至，此丁安能拔！前日報歸威，抄件遲日再繳。（頁97）

依作者云，此二函之「封豕」與「楚南」當指劉坤一，此無爭議；「長庚」則影射李姓，自指李鴻章無疑。以劉代李，此誠甲午（1894）期間，南派原力促其成者。惟其時倒李尚不易成，南派精英乃力攻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楚南不至，此丁安能拔」，則意自明矣。問題在「童」與「范公堤」、「大堤」何指？作者云已不可考。惟就「童昏可憎」及「童再任不佳」二語，考於其時之人事調度，係指與翁同龢互動不佳，但可能因劉坤一北上，再度署理江督之張之洞，此點後來亦有學者指出。⁵至於「范公堤」、「大堤」則尙闕其解。其實二「堤」係指同一人。依筆者之見，「范公堤」取北宋名臣范仲淹，蓋切其江蘇吳縣之籍，而所指應即於此日請旨帶兵北上，並得南派全力助成之翁氏至友，湖南巡撫吳大澂，蓋吳氏即江蘇吳縣人也。在其時布局考量中，清流耆宿吳大澂誠一活棋也，既可於劉坤一取代李鴻章前，扮演制衡合肥之角色，亦可於必要時代南派填住北洋，進退可取。翁氏致張謇兩函中所交換之意見，意即在此。劉坤一固為首選，但一方面恐其不到，另一方面又恐其一旦駐北，張之洞又踞江督，乃有「范公堤一時辦不到」，「大堤未知能辦否」之商榷。本書於同一頁即言及吳氏北上之事，應不難弄清此中之人脈關聯與權謀，惟作者卻未能深究，與其言書未盡意，毋寧云此正反映作者為學之風格。

五

自中國近代史成爲一門學科以來，有關晚清政治派系的官檔私著，幾乎便大率得見。試觀晚清及民初重要之日記或私家筆記中，對派系互動分

⁵ 如翦伯贊即持此說，見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冊四，頁573。

合，與晚清政治發展之相關記述，即佔有相當篇幅，且多被視為此類史料裡最具討論價值的部分。然而，研究晚清派系所要求的工夫，側重的是對晚清政治史發展線條的深一層解讀，挑戰性甚高；時至今日，關於晚清派系的觀察或討論，歸入於「掌故」者，比比皆是，或曰豈其然哉，實是良有以也。但是，研究中國近代政治史，若未補足從政治派系切入的觀察角度，勢必難能求得完整的認識和理解。

因是，總體而言，縱使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已有蓬勃發展，筆者以為，本書仍可居一極具代表性之傑作而無愧焉。當諸多學者寧視晚清政治樣貌已蓋棺論定，而無願於再做探索之時，五十餘載之先，已有人見逾此限，並努力提出可能問題，識量畢竟可許。筆者只為一入門不久，視角極狹，亦受限於學養不固之史門生徒，數年沉潛，每覺近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事業中，欲得一大開大闢，力圖於高點一錘定音，構建理論之作或易，忠實於史學次第，默潛於浩繁卷帙，爬梳條理，以供智者立其所以定論，而不失於史料資源之作難見。實則戮力於後項事業者，錙銖於字裡行間之際，又豈無其春秋之抱？《論語·子張》，子貢嘗有「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之語，願於文末遙誦於先進尊前，亦與誠者互勉。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六期

論 文

297 頁

平裝 250 元

黃克武

洪溫臨：悲劇的歷史拼圖——金山鄉二二八事件之探析

林滿紅：日本殖民時期臺灣與香港經濟關係的變化——亞洲與世界關係調動中之一發展

張建偉：抗戰時期戰地救護體系的建構及其運作——以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為中心的探討

翟志成：西南聯大校歌歌詞作者考辨

張淑雅：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

《近代的初曙：18 世紀中國觀念變遷與社會發展》。高翔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 12 月，630 頁。

張維屏*

—

清朝歷史文物資料豐富。¹ 學者因此得以悠遊在浩瀚史料中搜尋各類議題進行探討。有關清史的論著涵蓋範圍幅度既廣泛且細緻，率多畫分政治、社會、經濟、學術思想、文化、宗教、文學等領域發展各具觀點的研究主題。就選題的時代間距而言，學者多少或仍依循傳統上先行丈量帝王在位年月的身影，再做為自我商定研究主題時間斷限的參照座標。相形之下，高翔（以下簡稱作者）的《近代的初曙：18 世紀中國觀念變遷與社會發展》（以下簡稱本書）則另闢蹊徑，以「觀念史」的角度研究 18 世紀這個時代的總體精神風貌。作者特別採用「世紀」做為時間刻度，檢視分析 18 世紀文化士人倫理觀念、學術觀念與政治觀念的變遷；並從時代精神的視野，將關於政治層面的康雍乾三朝盛世的討論，和分析乾嘉考證學者著述理路等面向有機地結合起來，闡發歷史演變的基本脈絡與潛在規律（頁 2-3）。

觀察作者的研究路徑，可以明顯地看出，他意欲承繼前輩學者的路數，如侯外廬將思想史與社會史結合的途徑研究中國早期啓蒙思想，以及尙鉞以資本主義萌芽的角度，分析明清中國社會出現新的歷史因素等等成果，是他的企圖，因此不免帶有落入以往歷史研究方法窠臼的時代印記（頁 4-5）。但是，不可否認的，作者另一方面也深深受到近二十多年來大陸學界樹立起多元化發展史學研究的思潮影響，漸漸拋棄了以往唯物史觀的理論包袱。² 加強往昔較為薄弱的，針對意識形態與社會觀念的領域進行探索（頁 6）。其中衍釋而生若干頗具新意的見解，或許可以為清史研究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¹ 馮爾康，《清史史料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頁 8-22。

² 相關理論分析與研究論著的介紹，參閱蔣大椿，〈當代中國史學思潮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發展〉，《歷史研究》，期 4（北京，2001 年 8 月），頁 3-21。

提供另一層面的思考。

二

整體而言，本書重點集中在研究 18 世紀的知識界，力圖從知識界觀念變遷的角度，揭示 18 世紀中國的時代精神，探尋中國近代化的內在動因。

本書第一章主要分析 18 世紀中國知識界身處的歷史環境，包括了 17 世紀精神遺產、康雍乾盛世以及清廷和士人關係三大部分。作者說明在清朝前期由上而下形成了一套重視知識教育，致力文化建設的政策。同時，統一的大帝國加上社會財富積聚、物質待遇改善、「稽古右文」盛舉和仕進之途廣開等舉措再再加強了知識階層對朝廷的向心力。緩和了彼此之間的緊張關係，並促進了學術繁榮。而另一方面文字獄頻興，以及禁燬政策等文化禁治措施的加強，亦從不同側面加深了知識界的困惑和疑慮。

考察 18 世紀倫理觀念的變遷和知識界對個性自由的追求，是本書第二章的主旨。作者認為 18 世紀倫理觀念的變遷和士林生活方式的轉變，是對明清以降傳統道德束縛與生活方式的否定。反映出人們欲衝破繃縛，追求生活自由的強烈要求。並舉例說明戴震(1723-1777)對理欲關係的看法或袁枚(1716-1798)主張的性情說和倫理觀皆可視為是基植於商品經濟生活繁榮的社會環境掩映下，對享逸生活的一種積極倡導。作者並推崇戴震、袁枚二人都是具有新觀念的士林領袖人物。

一般而言，以往研究討論盛行於清代中葉的考證學風，人們多從古文獻學與學術史或個別考證學者的著作切入。³ 本書第三章的重點則在於討論 18 世紀的學術觀念問題。除了對當時主流學術漢學考證和理學的相互關係進行考察外，作者更著重對反傳統學術思潮內涵與影響的探討。並且專門對學術觀念的多元化趨勢進行了分析，認為求實、多元、經世是 18 世紀學術最顯著的特徵。此外，由於全盛時期經世思潮的開展，知識界除了醉心於鑽研古代學術文化系統的整理和研究之外，更在時空推移的因素驅動下，慢慢開始把目光轉向域外邊疆和國計民生等問題上面。因此，知

³ 有關於對清乾嘉學術進行系統研究的專著，參閱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識界與社會變遷和時代脈動的接觸也更加緊密了。

幾乎綿延整個 18 世紀的康、雍、乾三朝治道，各有異同。總體而言，三帝在整飭吏治、社會改進與民生顧惜等方面的治績是頗有可觀的。⁴ 作者本人也曾對康雍乾三帝的統治思想做過廣泛而深入的研究。⁵ 本書第四章則透過極端君主專制理論的形成及其實踐，知識界對君主專斷的反應，行政管理理論的發展及其意義，危機意識、漢族知識界的民族意識與反清潛流，對 18 世紀政治觀念的基本評估等五個議題，綜論 18 世紀中國的政治觀念。作者指出，知識階層菁英如汪輝祖(1730-1807)等人對於行政管理理論與實踐的高度重視，以及朝廷加強各級政權建設的舉措，饒富時代意義；另一方面，知識界的反專制思想相對貧乏。

作者認為，18 世紀中國知識界的觀念形態，就其分布、表現來看是多元的。但其前提是一元的，即求實的價值取向。因此本書第五章經由 18 世紀的時代精神最基本的特徵是求實，從求實精神向經世變革精神的轉變，以及對 18 世紀中國社會發展與近代化問題的估計等三個層面，討論與士林觀念密切相關的社會發展問題。作者點出 18 世紀中國知識界出現了觀念多，理論少，學術分化迅速而體系創新遲緩的奇特現象。而實際上當時的社會已經處於動態的發展過程之中，開始了由傳統向近代轉型的歷史嘗試。

三

本書討論的重心在 18 世紀，實際上涉及的議題前後貫穿了三個世

⁴ 陳捷先，《明清史》（臺北：三民書局，1990），頁 281-282。另外，有關於清乾隆帝在意識形態領域、財政經濟政策、處置政爭重案受株連人員、權力運作機制以及整飭吏治、嚴懲貪墨等方面與雍正帝治道異同的討論，參閱韋慶遠，〈論雍乾交替與治道異同〉，收入氏著，《明清史新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 195-241。

⁵ 參閱高翔，《康雍乾三帝統治思想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該書依據大量第一手史料，對康雍乾三帝（在位紀元期間：西元 1662-1795 年）統治思想之主要層面進行了分析比較，並探索其形成之原因。此外，作者對於清朝中央權力分配體制以及身處君主極端專制淫威下仍勇於疏諫的名士言行等問題皆曾詳加討論。請參閱高翔，〈略論清朝中央權力分配體制——對內閣、軍機處和皇權關係的再認識〉，《中國史研究》，期 4（北京，1997 年 11 月），頁 145-155。高翔，〈謝濟世散論〉，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論叢》（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頁 107-122。

紀。作者也針對清朝的時代精神，定下了一個基調，即 17 世紀是經世，18 世紀是求實，19 世紀是變革。他並認為時代精神通過觀念變遷得到體現，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頁 543）。如果我們以 18 世紀為中心，繼續向上游溯源，或者順勢就下，將作者的論點放入時間更為長遠的歷史脈絡裡進行觀察，當可更為精確地明瞭作者的關注重心所在。

例如，在本書論及學術觀念的多元化趨勢裡漢學的興起及其反理學傾向一節的敘述裡，作者著墨最多的是主張漢、宋學者彼此間個人意見的異同（頁 219-264）。若上由 17 世紀中葉拉近來看，降至 19 世紀中葉的近二百年中，學術思想史彷彿處在一個漫長而又平靜的狀態下。清帝國知識、思想和信仰表面呈現的同一性，恰恰遮掩了差異性。在文化認同中掩蓋著思想分歧，公／私領域適用的話語迥異。而當公眾話語被權力強制壟斷的情形下，人們常常必須尋找另類知識以表現自身才能，因此導致了智力領域的分裂。其中「義理」與「考據」的對立最為明顯。⁶ 透過運用歷史長河裡的必要元素所搭建的時代布景，讀者將可以更迅速地掌握作者長篇敘述漢、宋之爭各抒己見的諸家學說幕後投映出來的深刻意涵。

另一個例子是，作者所言袁枚主張奢侈可以由人，倡議若使天下之人從儉，則更悖乎人情的說法（頁 139-140）。其實如果溯源到更早，從明清儒學轉向的歷史脈絡來觀察，可以知道「奢」的社會功用在 16 世紀被發現以後，一直傳衍至 18 世紀未曾中斷。以「奢侈」維持社會就業的情況，在 18 世紀下半葉不僅限於儒生之間的議論，而且逐漸影響到地方以至中央的社會政策。從清乾隆三十年(1765)皇帝第四次南巡駐蹕揚州時題詩的自注裡也透露出，就連高高在上的一國之君也和袁枚等人一樣懂得「禁奢」不可行的道理了。⁷

本書敘述的 18 世紀湧現的若干理論現象，在進入 19 世紀下半葉的時代衝擊裡，也紛紛面臨了更為嚴峻的現實考驗。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時間

⁶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頁 499-501。

⁷ 余英時，〈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一面相〉，收入郝延平、魏秀梅主編，《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上冊，頁 33-34。

因素的縱向影響之外，橫剖層面各地理區域之間對新時代風潮的反應，也存在著若干差異。例如，18世紀的士人雖然普遍地接受了西洋器物與天文曆算的知識，但仍對西學學科分類與知識體系多所誤解，同時對西洋地理學知識也採取否定的態度（頁400-413）。不過當中國文化結構在近代不得不全面接受西學的情況下，地域因素決定了當地知識群體所能吸納西學中異質文化成分的範圍與程度。因此，相對而言，清季江浙學人比其他地區的知識份子更容易吸收西學裡的「科學」內容。⁸另一方面，雖然自王陽明以降的中國知識階層菁英，已經放棄了「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線影響，⁹但是通過科舉考試取得功名資格的晉身之階，仍是每個傳統讀書人的最大願望。18世紀出現的厭惡科舉，指斥其中空虛無用的所謂「反科舉傾向」（頁346-358），多屬於個人情緒激憤之言，實際上發揮作用有限，也得不到普遍的認同。直到滿清末年在客觀現實環境的驅使下，才開始採取了廢科舉、興學堂的調整措施。此舉不僅打破傳統形式上「陛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也從根本上切斷了「士大夫」的社會來源。¹⁰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這段時期裡也開始進行了由傳統耕讀仕進之途向近代知識份子轉化的過程。¹¹由於各地區域文化與自然環境的制約，使得士人面臨新舊交替時採行的步調紛雜不一。¹²因此，我們可以理解，身處內陸腹地的讀書人也遠較沿海各省士子更為憂心如何儘快適應去學習新學書籍內容的問題。¹³讀者若把作者描摹18世紀的理論觀念與19世紀末葉中國士大夫實際面臨的時局處境連結起來觀察，配合地域差異等其他因素的考量，將可以更清楚地體會時代變遷中的轉化趨向和演進軌跡所展

⁸ 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頁309。

⁹ 余英時，〈戊戌變法今讀〉，《二十一世紀》，期4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8年2月），頁9。

¹⁰ 羅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國：清末民初思想權勢與社會權勢的轉移及其互動關係〉，收入氏著，《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155。

¹¹ 羅志田，〈引論：清季社會變遷與民國政治——科舉制改革的影響〉，氏著，《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1-2。

¹² 應星，〈社會支配關係與科舉場域的變遷——1895-1913年的湖南社會〉，收入楊念群主編，《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頁208-221。

¹³ 劉大鵬遺著，喬志強標注，《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頁62-73。

現的歷史意義。

四

本書以超過三分之一的篇幅討論有關清中葉漢學考證與學術觀念多元化的趨勢問題。可見作者對此主題甚為重視，並由宏觀的視野體認到 18 世紀學者對古代學術文化系統的整理和研究，實際上標誌著 18 世紀的中國學術在整個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具有集大成的獨特地位（頁 423）。如果我們由外向內，透過細緻的微觀角度剖析清代考證學的發展理路，應當可以更為清晰地理解清盛世考證學的發展面貌。

作者認為，在 18 世紀的中葉，經長期醞釀的考據、訓詁風氣逐漸形成了獨立的學術風格和理論體系，漢學考證學風於焉興起（頁 236-237）。然而，究其實際，當時在唯六經三史是尚的研究典範下，清儒所用的方法及材料是內循環式的。基本上從文字到文字，從文獻到文獻。注重的是功力，而非理解。¹⁴ 作者相當推重的袁枚或許認為具備如此特質的漢學實有礙思想自由，迫人不能獨抒己見，而對之大加抨擊（頁 273-276）。同時，袁枚頗不同意當時漢學家之輕薄宋儒，認為漢學家欲以經學代理學的做法，其意仍不脫以往宋儒道統觀念之宿障。¹⁵ 這類觀點是我們在深入檢視袁枚的立論基礎時，未可輕忽的一項重要因素。

此外，作者認為凌廷堪(1755-1809)「以禮代理」的主張是 18 世紀學術觀念多元化的顯著趨勢之一。他說明凌廷堪對宋儒的批判不同於戴震，在批駁理學體用觀的基礎上明確地提出：道是禮而非理，主張以禮代理（頁 343-344）。如果再予深究，可以發現凌廷堪的主張在 18 至 19 世紀的清代學術思想界影響甚大。兼具徽州理學和乾嘉考證學，尤其是禮學的雙重背景的凌廷堪，他主張的「以禮代理」是直接指向宋明理學的一項挑戰。他建立了鼓動嘉慶、道光年間(1796-1850)學界捨理言禮的風氣，也直接帶起晚清的重禮思想。¹⁶ 通過對學者個人學術歷程的細部塑模，應更有助於

¹⁴ 王汎森，〈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念的衝突〉，《新史學》，卷 8 期 2（1997 年 6 月），頁 96-97。

¹⁵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頁 434。

¹⁶ 張壽安，《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 6。

讓讀者涵泳於清朝中葉學術思想風潮所形成的時代氛圍之中。

五

作者透過了大量史料，針對 18 世紀中國觀念變遷和社會發展的時代精神進行了深入而專業的探討。但是，如果能夠結合當代社會史家對於清朝中期浮現的各種現象，如農村人口急遽增加、單位面積農業生產力提高、西北疆域的開拓、區域商業交易逐漸發展成全國市場以及與東南亞各地貿易額持續增長等等問題的研究成果，再加以綜合整理析論，將更容易讓讀者深入理解 18 世紀東亞這個和平穩定的社會何以在 19 世紀片刻間就被扭轉，以致於淪落到了一個左支右絀、分崩離析的局面。¹⁷ 例如，作者特加垂青的汪輝祖的行政管理理論，以實現官僚政治規範化運行爲主要內容，其基本旨趣不在宣揚君威，而在突顯法治的權威（頁 502）。實質上，汪輝祖的仕宦生涯面對的是一部已經呈現腐朽狀態的官僚機器。沿至 18 世紀末葉，滿清朝廷的運作機制開始渙散遲鈍；官僚之間彼此結黨謀私的歪風成習，憑權納賄的弊端嚴重。¹⁸ 官僚機器本身顛預遲緩的工作方式，已經趕不上時代脈動的需求，從根本上徹底喪失了處置緊急事件的應變能力。¹⁹ 由此觀之，運用綜觀全局的恢宏視野，愈深一層地明瞭清朝中期士人官僚身處的時局困境，方能更進一步地體會汪氏在 18 世紀末葉的大清盛世何以能凝斂出如此發人深省的空谷足音。

本書立足於豐瞻詳密的史料基礎，徵引的「主要參考書目」多達 230 種（頁 613-621）。可能因爲資料文獻繁多，立論亦不免稍有疏失。例如，作者指出紀昀(1724-1805)的倫理觀，以他對理學的批判爲基礎，並受到了好友戴震影響的說法（頁 174），就有可再商榷之處。根據筆者的理解，紀昀雖曾資助戴震刊刻其漢學考證專著《考工記圖》，並爲之作序，後來

¹⁷ 胡明輝，〈十八世紀在近現代中國史的樞紐位置〉，《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32（臺北，2001 年 9 月），頁 126-127。

¹⁸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原著，溫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1），上冊，頁 124。

¹⁹ 孔復禮（Philip Kuhn）原著，陳兼、劉昶譯，《叫魂：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臺北：時英出版社，2000），頁 294-296。

甚且推薦戴震進入四庫全書館擔任纂修的職務。²⁰但是，依照現有史料分析，紀昀與戴震的交誼幾皆建立在熱衷漢學考證的志業上面，絲毫看不出來紀昀的倫理觀或是對於理學的批判想法曾經受到戴震的影響或啓發。再者，作者雖然瞭解《四庫全書總目》帶有官方立場，只有《閱微草堂筆記》才能真正反映紀昀的學術傾向（頁256-258）；不過他直接將《四庫全書總目》的內容轉換為紀昀個人意見表白的這種推論方式（頁174），尙有待斟酌。事實上，四庫全書館的眾館臣們，包括紀昀在內，都只是皇帝的代言人。他們在《四庫全書總目》的纂修過程裡只能算是「代工」的角色。²¹因此，作者的說法未免稍欠嚴謹。

總之，藉由本書以18世紀為重心所刻劃的清代觀念變遷與社會發展過程軌跡的論述，讓我們在面對近代急遽世變來臨前的一段中國歷史時，得以開啓另一面向的思考空間。同時，對於清朝歷史呈現的時代精神與複雜的多樣內涵也有更為深入的體會與認識。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1 年出版之名人日記

王子壯日記（一）～（十）

5178 頁 平裝 3000 元

「王子壯日記」涵蓋時間為民國十年至三十七年，有關北大學風、校園動態、政治牽動學術的案件，均有記載；抗戰前有關黨政問題，包括地方軍人異動，黨內蔣胡派系、山東黨務等，不論親自與聞或品評之辭，均是過去難能獲知的資料。抗戰八年完整的日記中，一個文人對抗日時期中央政治變遷、地方與中央關係、社會變化、物價波動、黨團糾紛、黨內派系糾葛、蔣宋關係的批評與認識、戰後接收與時局等，著墨極多，係研究抗戰時期黨政、社會、文化等問題的珍貴史料。

²⁰ 參閱張維屏，《紀昀與乾嘉學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98），頁19-25。

²¹ 楊晉龍，〈「四庫學」研究的反思〉，《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期4（臺北，1994年3月），頁22-23。

《北一輝的革命情結：在中日兩國從事革命的歷程》。黃自進著。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90 年 1 月，350 頁。

李朝津*

本書主題是北一輝革命思想之發展，而焦點則集中在北一輝與中國的關係，特別是對中國之認識，故可以說是兼具日本政治思想史及中日關係史兩個範疇，亦是從事中日關係一個重要但常受忽視之角度。因為向來研究中日關係之中日著作，多半著重兩國間之互動，少有談及兩國各自之國內背景。事實上中日兩國關係十分複雜，用侵略與被侵略的模式很容易簡化雙方之關係，要了解其複雜性，必須深入探討中日兩國之國內脈絡。北一輝在近代日本中是一個爭議性很強的歷史人物，他與中國的關係亦十分密切，以北一輝作為主題，是了解近代中日關係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北一輝在日本近代史上的爭議性有兩點。在中日關係中，他是能直接參與辛亥革命少數日本人之一，與中國之革命領袖亦建立真正密切的關係。然而北一輝在 1919 年回日本後，卻成為主張侵略中國之軍人的精神領袖。北一輝如何從親華立場走上侵華的立場，這是中日關係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其次是北一輝與二·二六事件的關係，他究竟扮演何種角色？到今天仍無定論。戰後學者均視北一輝為大正時期以來日本法西斯之鼻祖，因為他主張國家至上，把天皇體制建構為一個超越國內各團體的仲裁者，並以天皇為核心，推動改革。他的天皇理論及改造日本方案，成為日後軍人發動二·二六事件的行動指南，他個人也因此一事件的牽連而被判死刑。不過近來學者則認為北一輝不是一個完全負面人物，他主張日本政府改革及亞細亞解放，具有一定進步意義（頁 8）。這些爭議其實都反映出中日關係及近代日本的複雜性，必須抽絲剝繭，才能掌握歷史的發展過程。在這意義下，本書之出版，實有助中日關係之了解。

本書共分五章，除前言及結論外，其餘三章是第一章之「奔走於中日兩國革命時代的背景」，第二章之「投身中國革命的經驗」，第三章之「轉入日本革命的心路」。第一章是介紹北一輝三本著作成書的背景，這三本

*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

著作分別是《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1906)、《支那革命外史》(1916)及《日本改造法案大綱》(1919)。三本書均是北一輝的代表作，亦分別代表其三個不同時期之思想。《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是其處女作，當時日本已實行議會政治，但國家主權應在天皇手中或是在議會手中，卻紛擾未決；不但在理論上成爲思想界之爭端，在現實政治中亦導致主張民主者與主張天皇論者的對立，北一輝之國體論即於此時出現。國體是當時爭論的一個重點，保守者主張天皇統治日本源於神代，爲日本獨有國體之象徵，主權當亦歸之於他。但北一輝卻反對日本國體之獨特性，認爲天皇原來只不過是日本遠古各個部落之共主，此現象在世界各地皆然，天皇並非獨特，更非神性。天皇之成爲集權式君主，是因爲仿效中國政治制度，但由平安時期以後，天皇之權力均有名無實，直到明治維新方再次親政。明治憲法頒佈後，在法律上天皇之權力是與國會共享，但在實際上則由薩長等藩閥專制（頁 25-40）。故北一輝在本書接受西方之歷史自然主義，打破天皇神性，並提出社會主義民主以取代藩閥，是其革命性地方，但北一輝強調國家在改革中的作用，並且仍尊重天皇之象徵性，他在二十年代轉向天皇制，是其來有自。

第二章則談北一輝參加辛亥革命之經歷，重點則在其撰寫《支那革命外史》之來龍去脈。1900年至1911年被稱爲中日近代關係中之「黃金十年」，因爲不但清政府以日本爲新政之模仿對象，革命活動亦與日本息息相關，北一輝是在此情況下參加辛亥革命。北一輝之與革命人士接近，是在不經意下出現，但一經介入，便十分熱衷。在武昌首義後，他是少數親臨戰場的日本人，並參與南京臨時政府之組成。因此北所著之《支那革命外史》便是一本有關辛亥革命之直接史料，特別是他與中部同盟會的關係，書中可以反映出宋教仁等人之部分觀點。

第三章則有關北一輝所撰寫之《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及其與二·二六事件之關係。《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在二、三十年代被當時日本之下級軍官奉爲聖經，認爲是改革日本之方向所在。《大綱》強調日本已爲少數的軍閥、財閥及黨閥把持，必須天皇親政，由國家掌握各種社會及經濟資源，並由其分配處理，以避免壟斷及少數人漁利。北一輝在1919年返國，即積極組織下級軍官，在基層軍人不滿情緒的瀰漫下，終於在1936年爆發了二·二六事件，北一輝亦因此被捕。雖然陸軍當局掌握不到明顯證據證明北一輝指揮事變（頁 288），爲免除後患，終於決定判處北一輝死刑，

並在 1937 年 8 月 17 日執行。

由於本書是以近代中日關係為主軸，故個人亦以此為重點，申述讀後的一些意見。本書最重要的一個貢獻是指出中日關係之多樣性。多樣性之一是辛亥革命對日本之影響。研究中日關係，大多著眼於日本對中國之影響。然辛亥革命在二十世紀初是一場世界性的變革，對亞洲各國是有一定衝擊，這是學術界研究辛亥革命之盲點。就日本而言，本書指出辛亥革命對北一輝之影響有三點（頁 77）：首先是辛亥革命之成功模式啓發了北一輝的革命方式。武昌起義之發難者是新軍，其後各省之光復亦是以新軍為主，對尋求日本革命力量的北一輝是一個重要啓示，亦成爲他日後致力組織下級軍官的一個重要來源。其次是議會政治並不可靠，革命必需由一個先覺精英組成的團體領導。作者以湖南都督焦達峰爲例，焦達峰在起義時事事尊重省參事會，結果爲亂兵所殺。北一輝有鑑於此，故日後強調軍事革命團體的重要性。第三是革命後建立新國家，需要一對外戰爭，以培養國民統一意志。北一輝認爲辛亥後中國紛亂原因之一是沒有對俄宣戰，若以俄爲敵，對內可以掃除舊勢力，對外則可以團結國民。作者指出《支那革命外史》所談之革命藍圖，已與《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有所不同，他的「天皇論」在本質上已有根本改變，「威信也是來自於他參與中國革命的親身體驗」（頁 79），這是的論。

多樣性之二是中日關係並非完全是國家與國家間的接觸，亦有其他層次的接觸。以譚人鳳之孫譚瀛生爲例，他於 1915 年生於日本長崎，翌年在上海入籍北一輝家，原因是譚人鳳「爲中日兩國未來之計」，希望譚瀛生能繼承之（頁 183）。譚瀛生此後便一直以北一輝身分長大，從不知其中國人之本來面目，直到 1938 年北一輝去世後，北一輝妻子北鈴子才透露他的身世。據北鈴子給張群的一封信中，在 1939 年至 40 年間，譚瀛生便努力學習中國歷史及現狀，並經常往返東北、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書中並未詳談譚瀛生之活動，但此時正是中日戰爭高潮，其心境是不言而喻。而當戰爭在 8 月結束時，譚瀛生卻在同月逝於上海。此種個人際遇，非限於譚瀛生一人，當時比比皆是。廖承志生長於日本，郁達夫、郭沫若等留學日本，這些經驗都很容易爲國家間的關係所淹沒。正如薩伊德 (Edward Said) 所提出的「差異經驗」(discrepant experience) 概念，人類經

驗是無法由整體論述所涵蓋，亦不能用教義或民族來標誌和限制。¹本書提出北一輝另一個面相，若僅以法西斯主義者或非法西斯主義者來評價北一輝，很難說明他游走在中日之間的經驗。

本書另一個貢獻是利用《支那革命外史》重新評估辛亥革命。作者認為北一輝對辛亥革命有三點新的認知，首先是否定孫中山在革命陣營之領導地位；其次是強調東洋式共和政體；第三是建立一個中日軍事同盟（頁165）。其實北一輝是主張亞洲門羅主義，藉此排拒西方（頁43）。這些認識無疑帶有北一輝強烈之個人主觀企圖，書中曾一一加以批判。但無可否認，由於北一輝介入革命甚深，他的觀點仍會反映出辛亥革命一些實況，或是革命中某一派系之看法。

首先，北一輝為何反對孫中山？他認為孫中山之推翻滿清，完全是以美國獨立革命為藍本，希望建立一美式民主的中國，同時更希望仿效美國革命，向外求取援助，北一輝是反對孫中山這種世界主義。北一輝把革命分為兩種，一種是殖民地脫離母國，建國獨立，美國是其例子，但它的模式不應用於中國革命；另一種革命是由反對舊有制度出發，由此復興故國，中國革命即屬此。北一輝認為兩個模式截然對立，孫中山過於空想，不問實際，無法成功領導中國革命。作者認為北一輝大肆攻擊孫中山原因，是他與譚人鳳之親近關係，當時他正要爭取大隈重信支持譚人鳳，故反對孫中山是必然的（頁179）。上述看法雖不無道理，但北一輝之觀點，仍反映出過去研究辛亥革命忽略之處，如光復會、華興會及興中會間的矛盾，除在人事上有糾葛外，在革命路線上是有基本分別的。

第二點有關東洋式之共和政體。北一輝認為中國沒有民主自由之傳統，辛亥革命時各省之代議機關，均成為保守者之據點，故他主張中國應維持一個絕對專制政體，由少數精英投票產生，以維持安定（頁163）。北一輝之看法與孫中山籌組中華革命黨時的意見不謀而合，但向來談辛亥革命者，多以為孫中山之中華革命黨過份獨裁，由於大部分革命黨人反感，故無法成為反袁力量。若如北一輝在《支那革命外史》所言，譚人鳳、范鴻仙等革命黨員其實都認為中國人民仍缺乏民主素養，則歐事研究會與中華革命黨之分歧，並不是黨的組成方法問題，他們間的差異應從另一方面

¹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3), Chapter 1.4 'Discrepant Experiences'.

思考，才能總結黨人對辛亥革命之真正認識。

下面是個人對本書的一些看法。首先是結構上如果能調整，或可避免割裂及重複。本書之第一章名為「奔走於中日兩國革命時代的背景」，主要目的是為北一輝三本書：《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支那革命外史》及《日本改造法案大綱》的成書背景作一介紹，但由於其後兩章會談及《支那革命外史》及《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故第二章及第三章的完整性便受到破壞。舉例而言，第一章第二節介紹了《支那革命外史》中有關北一輝的亞洲門羅主義，為北一輝世界觀的重要構成部分，但由於第一章已有介紹，在第二章只能從略，有礙讀者了解北一輝在辛亥革命成功後其思想的整體發展。因此每一章若以北一輝一本著作為核心，則本書之結構會更完整，亦更能深入討論北一輝思想之發展。

其次是本書未從亞細亞主義角度切入，聯繫北一輝之亞洲觀及中國觀。北一輝與中國之關係密切，在 1912 年後，其生活作風華化，甚至連名字亦放棄「輝次郎」，改用中國氣息甚濃之「一輝」，²然而北一輝為何與中國產生如此密切之關係？作者之解釋是時勢所造成。其所謂時勢是指：第一為解決生活困境；第二為迴避日本政府壓迫；第三為實踐兩國社會主義理想（頁 107）。故北一輝之接近中國是帶有偶然性，然此種偶然性亦有其必然性在內。日本人對亞洲之認識——所謂亞細亞主義——是驅使北一輝投身中國革命的一個重要動力。亞細亞主義是近代日本一個重要問題，日本在一個西方主導的世界中，它是如何處理其亞洲關係，甚或如何進入亞洲，到今天仍是日本要面臨的命題。但書中對此處理並不足夠。作者在第二章曾提及北一輝之亞洲門羅主義，它在《支那革命外史》中是一個重要構成，亦是北一輝一個重要轉變，然北一輝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究竟如何看待亞洲？在《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北一輝受到自然進步主義影響，相信民主自由是全人類所共有，亞洲並非是一個排他性的區域主義。北一輝為何會提出一個獨特性的亞洲，是有進一步討論空間的。

在第三章中，作者亦過份集中在北一輝之日本改革方案，忽略他對亞洲以至中國的看法。無可否認，北一輝由上海回日本後，其目標是日本國內革命，國際問題已非其關注重心所在，故亦較少論及中國與亞洲。然北一輝不可能完全忽視中日關係，特別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如何解決中國問

² 田中惣五郎，《北一輝·增訂版》（東京：三一書房，1971），頁 147。

題成爲日本最重要之國策。在日趨激烈的中日衝突裡，北一輝究竟如何調整他對中國以至整個亞洲的看法，是具有一定代表性。據野村浩一指出，北一輝與傳統右翼並不一樣，傳統右翼雖然反對西方，其實是仍未能擺脫西方之意識，只不過在西方秩序下建立一個亞洲霸權；而北一輝對中國仍抱有同情心，其最終目的是要推翻整個西方國際體制的。³本書未能就此深入探討，頗爲可惜。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77)

九二一震災口述訪問紀錄(上、下篇)

訪問：陳儀深等 7 人 紀錄：林東璟等 9 人 991 頁 平裝 450 元

1999 年 9 月 21 日的集集大地震，對臺灣影響甚鉅。災變發生後，不論是死傷的搶救、災民的安置、公共工程復建、校園重建、產業復甦、住宅重建、土石流整治、古蹟修復，甚至生活重建、心靈重建，都考驗著臺灣整體社會。在重建過程中，除了顯示政府重建的能力，民間社團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本書經由口述訪問，除收集保存百年僅見的震災事實，並容納不同角度的評價。全書分上、下篇，上篇政府部門，包括重建委員會執行長、副執行長，受災或協助重建的縣市鄉鎮地方首長，共有 37 篇；下篇民間部門，以投入救災、重建的宗教團體、醫療機構、公益社團、建築專業團隊、社區文化工作者爲主，計有 35 篇。全書紀錄了震災事實，救災、重建的成果與難題，檢調單位查察地方政府重建「弊端」的影響，不僅提供臺灣災害史、地方史等研究素材，也將對政府救災、重建政策的改進有一定的助益。

³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の中國認識》（東京：研文出版，1981），頁 86。

評介翟新《東亞同文會與中國：近代日本的對外理念及其實踐》

林志宏*

《東亞同文會と中國：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對外理念とその實踐》。
翟新著。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1年1月。348頁。

中日關係史的研究，長期以來是學界焦點之一。特別關於鴉片戰後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課題，美國與日本學界始終抱著極強烈的研究興趣。¹在中文著作方面，臺港地區除了零星的論文以外，能夠形成有系統的專書，大致只有1970年代以降黃福慶、譚汝謙等先生初步的成果而已。²整體來說，這個領域的空間仍有許多亟待開展之處。

在中國大陸學界方面，隨著1980年代「改革開放」的腳步，猶如美國加州大學 Joshua A. Fogel 教授討論崔述如何「進入」學術史一樣，他們也「重新發現」(rediscovery)了近代中日關係這段歷史的重要性。³不僅在北京、杭州陸續成立了日本文化研究所，整理或出版相關史料及著作，⁴值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¹ 這方面的研究著作很多，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考下列兩本工具書：山根幸夫編，《增補近代日中關係史研究入門》（東京：研文出版，1996）；Christopher Howe ed., *China and Japan: History, Trend, and Prospec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²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譚汝謙，《近代中日文化關係研究》（香港：香港日本研究所，1988）。黃福慶的《清末留日學生》一書，曾被翻譯成日文、英文等形式；而譚則曾與林啓彥合譯日本學者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

³ Joshua A. Fogel,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Essays o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Armonk, N.Y.: M.E. Sharpe, 1995), pp.3-21.

⁴ 史料的編纂如：嚴修著，武安隆、劉玉敏校注，《嚴修東游日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近年來，王寶平、呂順長等以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為班底，開始編纂《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系列叢書，目前已經出版的有收集晚清多種文獻匯為一編的《教育考察記》

得一提的是，90 年先後前往日本留學並取得博士學位的學者，如汪婉、熊達雲等人，最近幾年來也紛紛出版日文專著，⁵他們對於近代中日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備受關注。

本書作者翟新（以下簡稱作者）也是這群類似背景學人隊伍裡的一員。作者係武漢大學歷史學士與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碩士，受過傳統的史學訓練；1998 年在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研究科獲得博士學位，研究的專業領域為東亞國際關係史。早自碩士修業期間，作者便曾翻譯日人關於中日近代化的研究著作，⁶對於以中華帝國為主體的東亞世界秩序有著濃厚的興趣。這部《東亞同文會と中國：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對外理念とその實踐》（《東亞同文會與中國：近代日本的對外理念及其實踐》，以下簡稱本書），即是以東亞同文會為主軸，分析 1890 年代至 1930 年代中日政治與外交關係的專書，係依據作者的博士論文修改而成，也是他個人長期關懷下所衍生的作品。

有關東亞同文會的研究，無論在資料的編纂與二手討論著作方面，事實上已經是汗牛充棟。然而作者認為，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上，還是存在著可以進一步探討的空間：第一、他認為目前學界尙未有以東亞同文會的對外活動及認識做為範疇來探討的成果。也就是說，以具有組織性的團體的研究尙鮮，而研究的結果也多半只是停留在針對幾位著名的個別成員，如荒尾精、近衛篤磨及根津一等人的中國觀進行分析而已，並未觸及本書所要處理的問題核心；第二、有關東亞同文會的角色，作者指稱，過去並沒有將它置於東亞國際政治舞臺上來考量，並釐清其思想背景，特別係就其對華的認識和展開作用加以檢討，他認為這正是值得努力的方向；最後，作者提到要掌握東亞同文會研究，資料的收集和克服語言障礙等問題，仍舊是處理此一課題時最關鍵的因素（頁 16-7）。

本書包括前言與結論，共分為十章。在篇幅僅三百多頁的書裡，其中

（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上、下兩冊，及黃遵憲《日本國志》（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2001）。著作方面則有王曉秋，《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呂順長，《清末浙江與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等。

⁵ 汪婉，《清末中國對日教育視察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8）；熊達雲，《近代中國官民日本の視察》（東京：成文堂，1998）。

⁶ 依田喜家著，孫志民、翟新編譯，《中日近代化比較研究》（上海：三聯書店，1988）。

有絕大部分的章節已先行在各刊物或論文集內發表（見頁 313-4）。書末另附有「事項」和「人名」的索引，以及東亞同文會與中國關係年表和《同文滬報》論說一覽表。

本書處理問題的方式，就時間斷限而言，大致可區分為 19 世紀末、20 世紀最初十年以及辛亥革命以後三階段³。這是作者獨具慧眼來看待日本對華政策階段性的看法，也是本書重點所在。眾所週知，東亞同文會是在 19 世紀末葉中國面臨西方列強瓜分危機，以及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由日人所組成的國際團體。它最初的構想是日人基於重視中國能夠提供工業原料和市場，因而提出中日合作的主張，以「同文同種」作為口號，企圖「保全支那」、促成中國改革為目標。第二、三章企圖說明該會在 19 世紀末觀點的形成及活動。第二章「對外理念及其實踐的原型」，即從荒尾精的中國觀出發，探討甲午戰爭前後，如何以軍人角色的立場提出「商權競爭」的看法；透過設立日清貿易研究所，扶植親日勢力，並反對日本戰後對華進行領土割讓與鉅額賠款，目的在防止中國人對日情感的惡化。後來，這些主張進而影響到荒尾精的親友及門生，並促使他們組成東亞同文會，繼承了此一理念。第三章「19 世紀末葉中國改革運動的對應」，著重在東亞同文會對清季「戊戌變法」的態度及肆應。作者指出，儘管原先東亞同文會的理念係協助中國的改革，尤其是應該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以明治維新君主立憲為傾向的改革理念，然而近衛篤磨因康、梁放棄日本國力伸張至中國的觀點，加上他與南方總督張之洞、劉坤一等在後來互動關係密切，並寄予期待之現實因素考量下，終於與最初的理念相左，不再支持維新變法。足見東亞同文會的行動方針，其實隨著時勢的動向而有所更替。

另一方面，隨著 20 世紀初日本逐漸涉入遠東國際問題，東亞同文會的對外理念也時有轉變。接下來的兩章處理的便是以清末最後十年的兩件重大事件——庚子事變和日俄戰爭——為例，探討有關東亞同文會的態度以及日本當局所受的影響。第四章「義和團事變期間的『聯邦保全』構想」談的是事變期間日本加入八國聯軍陣營，東亞同文會的領導人之一根津一便提出了「聯邦保全」的因應策略，響應支持南方總督「東南互保」主張（頁 108-110）。不過，由於事變之後，俄國在滿洲地區的勢力日益擴張，近衛篤磨於是因應配合日本政府的外交策略，改變了「聯邦保全」的地方分權主張，轉為支持中央集權，開始回歸到「保全支那」的理念。第五章

「中國的輿論形成活動」部分，則以 1900 年在上海創刊的《同文滙報》的政論內容為例，討論東亞同文會對於「保全支那」的輿論宣傳。從《同文滙報》的政論可知，東亞同文會積極批判清廷對俄外交政策，指責俄國在滿洲地區的諸多行動。不惟如此，該報並提供解決中國改革之道：即模仿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甚至由日本提供合作的管道。

1911 年辛亥革命的發生，遂使中日兩國關係產生變化。本書第六章「辛亥革命及初期共和國家的認識」指出，原先東亞同文會希冀透過日本的影響而促使中國形成中央集權國家，結果轉向支持革命派。在民國建立的最初幾年間，東亞同文會非常注意列強在中國的動向，特別是支持袁世凱政權的英、美等國。民間團體的看法或許也印證了日本當局的策略：一方面反對袁氏恢復帝制的企圖，另一方面也積極地強調日本對於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支配與控制。二十一條要求的提出，便是以日本政府「優先在華權益」作為基礎的中日同盟論（頁 205）。然而，東亞同文會會員犬養毅和柏原文太郎卻認為，日本此舉似乎形成了兩國關係的障礙，他們則提出「平和同盟」、「經濟同盟」與「精神同盟」三方案，以促進兩國的外交關係（頁 208-9）。

第八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日中共存論」和第九章「滿州（滿洲）事變期間的時局觀」，則就二、三〇年代的中國情勢來分析中日問題。作者推論，有幾項因素改變了兩國從友好到敵對的外交關係：其一，由於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巴黎和會召開，因為「山東問題」而促成的五四運動，讓中日兩國關係蒙上一層陰影；其二，隨著收復利權政策的展開，中國境內高唱廢除治外法權等各種不平等條約，都獲得了英、美國家的支持，與日本當局意圖強化在華的利益衝突，促使排日風潮日盛；其三，滿洲事變發生後，為了正當化日軍的軍事活動，強調「亞洲人的亞洲」主張，組織「亞洲聯盟」的構想，成為日本意圖脫離在國際孤立情況的原則。東亞同文會的立場也反映出日本當局的基調，由「保全支那」理念轉換為近衛篤磨最初所謂的「東洋門羅主義」。也就是說，東亞同文會認為日本當局和列強的中國政策應有所不同，鼓勵亞洲民族聯合對抗歐美列強；至於實際的行動方面，也和民國初立期間因俄國策動滿蒙獨立而持反對態度有所不同，反倒積極地「擁護」滿蒙權益，甚至主張滿洲國的成立。

大體而言，本書在資料的蒐集方面，鉅細靡遺。作者非特掌握了東亞

同文會重要成員已經出版的日記、書信，並且還爬梳了該會相關的機關出版刊物、報紙與書籍，像是《支那》、《同文滬報》、《東亞同文會報告》等，甚至包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檔案；也充分地注意到中日其他相關方面的資料。顯然，作者克服了資料蒐集與語言障礙的問題。

可惜的是，作者似乎忽略了西方研究的努力，使得對現有的基礎成果並沒有進一步發揮。第五章裡關於《同文滬報》政論的分析，便是一例。其實本書正提供了 Douglas R. Reynolds 教授研究清季中日關係時所謂「黃金十年」(golden decade)的一項佐證。根據 Reynolds 教授的說法，中國的傳統帝制政治雖歷經辛亥革命而推翻，然而實際上清朝最後十年的新政推行，為此後提供了持續改革的基礎，故他稱之為「新政革命」。⁷這當中最耐人尋味的便是中國全面地學習與改良日本政經制度，可以說，整套思想資源和概念工具是建立在日本人的協助之上。這項說法儘管受到了強烈的質疑，⁸本書作者卻從非官方團體的刊物討論裡，分析庚子事變後遠東國際的政治外交關係，對於日本對華的積極態度，給予我們類似的解釋。

另一例是關於袁世凱稱帝的問題，據過去的討論指出，日本的反對後來形成極為關鍵的因素。⁹作者即以東亞同文會的看法來進行討論，進而在政府政策和非官方團體的外交認識之間，釐清其中的相互關係。

從篇幅結構來說，全書的方法係以運用年代和事件為軸，藉此窺覘東亞同文會在每段時期所呈現的不同主張。據此，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作者如何描繪同文會在日本對華政策的影響，尤其以辛亥革命做為分界，中日關係特別是日本民間方面對華態度的轉變。簡單地說，民國的成立以及初期政局的混亂，作者給我們的印象是日人態度是由合作轉為控制，行動則明顯趨於侵略。這樣的看法，其實也與作者在第一章意欲分析研究的「亞洲主義」的進展相互呼應（頁19）。同時，本書還涉及到輿論與政府政策、輿論如何形成和傳播等問題，這些複雜的討論，書中各章也都分別顧及，可以說是最為精彩的部分。尤其第四章關於「聯邦保全」構想的討

⁷ Douglas R. Reynolds, *China, 1898-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中譯本參閱任達著，雷頤譯，《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年》（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尤其是第一章的說明。

⁸ 對 Reynolds 一書的評論，可參照 *Journals of Asian Studies*, Vol. 53 (1994), pp.174-75.

⁹ Kwanha Yim, "Yuan Shih-k'ai and the Japanese." *Journals of Asian Studies*, Vol. 24 (1964), pp.63-73.

論，不惟過去缺乏討論，亦是全書主要貢獻之一。

然而，本書所呈現的課題，尚可再行深化與討論。首先，作者過於偏重東京的東亞同文會本部及上海地區相關的組織，沒有顧及其他的相關支部的討論。例如，漢口發行的《漢報》，福州的東文學堂和《閩報》，廣州的東文學堂與時敏學堂，甚至南京、天津、漢口同文書院等，均未深入探討。推究其因，可能因為資料分散所致。但此一問題涉及有二：其一為各地域與東亞同文會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各地區內中國教師與學生如何與東亞同文會的互動；其二為地方性同文書院與親日報紙的創辦，究竟怎樣來影響東亞同文會的態度，乃至日本對華的外交政策，故仍值進一步追索。¹⁰

其次，有關第七章「在中國的調查活動」討論的是東亞同文會在華的教育事業，亦即東亞同文書院的實地調查活動。筆者認為，作者僅分析目的與功能，不惟不足，而且和全書探討的方向迥異，顯得略有突兀之處。究實而論，這方面的研究甚夥，必須指出的是：東亞同文書院大規模的調查活動固然受到普遍重視，卻無法忽視日人長期以來透過旅行遊記對於中國的瞭解，¹¹兩者之間其實有著深切的關係。作者的分析，只著眼在東亞同文會所進行的調查活動上，並沒有投射到過去的歷史淵源，不能說是沒有遺憾。再者，其中雖已涉及了外交、經濟與文化面向的討論，卻忽略了中國和其他外國人的輿論。在這一方面，薄井由已經有相關研究，¹²可供參考。

整體而言，翟新先生的這部《東亞同文會與中國》，嘗試解答中日兩國政治、外交的方向和努力，是足以令我們讚賞的；而全書遺留下來的問題，不但可供吾人深省，也是值得進一步繼續探索之處。

¹⁰ 細野浩二對此已進行了初步相關的討論，見氏著，〈東亞同文會的對外認識と文化工作の構圖：歐米列強と清末民初中國のはざままで〉，收入阿部洋編，《日中關係と文化摩擦》（東京：巖南堂書店，1984），頁101-58。

¹¹ Joshua A. Fogel, *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 1862-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1996).

¹² 薄井由，《東亞同文書院大旅行研究》（上海：上海書院，2001），頁232-4。

《雷震與臺灣民主憲政的發展》。任育德著。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年5月，381頁。

蘇瑞鏘*

—

回顧近百年臺灣民主運動的發展，其理念與主張有兩條主要脈絡：一條是日治時期臺灣民權運動的「縱向傳承」，另一條則是「五四」以降中國自由主義的「橫向移植」。後者以50年代《自由中國》集團為代表，經過許多自由主義者的努力，自由民主理念逐漸沉澱、內化而為臺灣重要的生命質素，且再進一步「縱向傳承」給日後的民主運動者。

在這些「五四」以降的自由主義者裡，雷震(1897-1979)是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雷震早年赴日修習憲法學，壯年參與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中年來臺創辦《自由中國》半月刊，鼓吹民主自由，並參與籌組「中國民主黨」，晚年則因組黨而招致十年的牢獄之災。然而，身陷囹圄的雷震仍持續思考國家的民主發展。出獄後，更基於「我輩今日與國民黨雖不能共享安樂，但卻須共患難」的責任感，洋洋灑灑寫了一大篇「救亡圖存獻議」給一個讓他嚐受十年苦牢滋味的統治集團，只求「至少從頭到尾細看二遍，不要丟在字紙簍裡」，至於「囚我戮我，在所不顧」。¹

雷震的這般學識、見識與膽識，近年來吸引不少人加入「雷震研究」的行列，也出現不少傑出的作品；任育德（以下簡稱作者）撰著的《雷震與臺灣民主憲政的發展》一書（以下簡稱本書），乃緊扣「民主憲政」的主題，全面檢視雷震一生主要志業的研究，正是其中之一。

作者畢業於政治大學政治系，再進入政大歷史所深造，1997年6月以〈雷震與臺灣民主憲政的發展〉為題的碩士論文²獲得學位，即本書的前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本文的寫作，承陳君愷教授、薛化元教授和潘光哲教授先後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謹致謝忱。

¹ 雷震，〈雷震給蔣氏父子等五人的「救亡圖存獻議」〉，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27)》（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年9月15日初版一刷），頁73-75。

² 任育德，〈雷震與臺灣民主憲政的發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身；作者目前就讀於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求學之餘，不斷發表論文，多集中在 1950、60 年代臺灣政治發展的探討，³已然為戰後臺灣史研究領域的新秀。

二

作者自述，本書寫作之源起，緣於大學時代受業於劉義周教授的「中國憲法與政府」課程，劉教授將雷震的《制憲述要》、《監察院的將來》與《自由中國》「今日的問題」系列等作品列入參考資料當中，以令學生瞭解憲政諸爭議處，作者自此對雷震與《自由中國》感到興趣（作者序，頁 V）。

本書共六章。作者在第一章「緒論」裡說明研究動機，並回顧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書雖未特別強調獨特的研究方法，然而，作者在本章裡指出，本書「在寫作上是以個人環境和歷史背景為考量」（頁 4）、「將以人物為中心，……以明瞭其（按：雷震）與彼時政治環境間的互動，並自宣揚民主憲政理念到以組黨實踐理念的變化」（頁 9），綜觀全書，可看出其研究路徑應近似於布林頓(Crane Brinton)等人所倡之「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研究法。⁴

在以下的篇幅裡，作者將雷震民主憲政思想的發展，分成幾個階段加以討論。在 1949 年之前，雷震的民主憲政思想，乃本書第二章「民主憲政思想的醞釀」探究的重點。作者首先從雷震早年政治意識的啟蒙及其後接受日本教育的薰陶，析論其「不屈服於權威的個性」與「憲政主義者的面貌」之形塑過程。接著探討雷震在 1949 年之前的政治活動，對其任職國民參政會與政治協商會議及其參與制憲的角色著墨甚多；並另闢專節討

年 6 月)。

³ 如任育德，〈1950 年代雷震憲政思想的發展——以「中央政體」與「反對黨」為例〉，《思與言》，卷 37 期 1（1999 年 3 月）、任育德，〈1960 年〈「中國民主黨」創立宣言〉之初探〉，《臺灣風物》，卷 49 期 2（1999 年 6 月）、任育德，〈1950-70 年代初中央民意機構選舉論述初探〉，《臺灣風物》，卷 51 期 1（2001 年 3 月）等等。

⁴ 側重「思想與環境兩者間之交互關係」，有別於側重「思想系統內部觀念與觀念間之結構關係」的「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研究法。參閱黃俊傑，〈思想史方法論的兩個側面〉，收入杜維運、黃俊傑編，《史學方法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版社，民國 69 年 10 月增訂 1 版），頁 469-515。

論雷震「早年的民主憲政觀」。

1949年，雷震來臺並創辦《自由中國》半月刊，欲「以自由民主對抗共產極權」，並參與隔年國民黨的「改造」，此時雷震「擁蔣反共」的態度十分明顯。然而，接下來的四、五年間，雷震與統治當局的關係卻逐漸惡化、乃至決裂。雷震與統治當局由合而分的轉變，向來是研究雷震者所關注的焦點，本書第三章「民主憲政思想的轉變」對此一現象有深入的探討。作者首先指出，1955年之前的臺灣政治，處於「階段性開明與個人威權政體建構」兩條路線交織的局面。統治當局在50年代初期為了爭取美國支持而建構若干「開明」的形象，隨著臺灣安全日漸穩固與蔣介石個人威權體制的建立，當局遂逐漸拋棄此一形象而改採緊縮政策，導致原本被當局重用的雷震（及其他國民黨內若干開明派人士）逐漸遠離權力核心。其次討論《自由中國》的創刊與這段期間言論的變化，接著深入分析此一時期雷震「以自由民主對抗共產極權」的思想內涵和「對民主憲政體制與輿論的詮釋」。

50年代中期開始，遠離統治核心的雷震展開了人生的新階段。本書第四章「民主憲政思想的闡揚」清楚地描述「獨尊威權政體路線」已然確立之時「雷震的政治選擇」：以自由民主對抗個人威權。1956年，《自由中國》推出了「祝壽專號」，觸怒了統治當局，成為雙方全面決裂之始。《自由中國》在1957年更推出「今日的問題」一系列社論，全面檢討並批判統治當局的作為，更將雙方的衝突推向另一高峰。在本章後兩節裡，作者透過幾個主題的探討，呈現出雷震與環境的互動過程當中，深刻反思「民主政治與憲政體制」和「重視個人權利」的思想特色。

1950年代後期，雷震最重要的「事業」是籌組反對黨。配合《自由中國》多篇文章的鼓吹，雷震和若干臺籍菁英展開了「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1960年9月4日，雷震遭統治當局逮捕，組黨運動胎死腹中，《自由中國》也隨之停刊。關於組黨運動，近年來已有不少相關的研究，對於其中若干關鍵問題的探討已有相當的成果。本書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則有更進一步的補充，本書第五章「以組黨落實民主憲政」的前兩節，即是作者提出的更新的研究成果。

面對1970年代初期臺灣遭逢的外交鉅變，出獄後的雷震，在1972年向統治當局提出十條「救亡圖存獻議」。本書第五章第三節「困厄中對民主憲政的堅持」當中有深入的分析，並將此「獻議」視為雷震晚年政治思

想、政治藍圖與憂國憂時的結晶。

第六章「結論」，作者從臺灣民主憲政發展的歷程來說明雷震具有「承先」與「啓後」兩個面向。此外，作者在給雷震高度評價之餘，也點出雷震思想若干的侷限性。

三

通覽全書，筆者認為，本書有以下三項特色：

（一）大量使用檔案資料

1990年代之前欲研究雷震者，使用的史料主要為《自由中國》半月刊。1989-1990年間，桂冠圖書公司出版了47冊的《雷震全集》，其中包含雷震大量的著作、日記與書信，雷震研究於是邁入新的里程碑。然而，這套《全集》實則不全，尚遺漏不少資料，例如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近史所）的檔案館即收藏有相當數量雷震未出版的手稿。

本書在史料運用方面最大的特色，便是使用不少近史所檔案館收藏的「雷震、傅正檔案」，包括「《中華民國制憲史》手稿」、「雷震個人檔案」、⁵「雷震、傅正信函檔」以及「傅正剪報」等等（頁325-327）。例如，本書第二章即徵引不少「《中華民國制憲史》手稿」。另外，1950年代雷震與王紀五有大量的書信往返，均收藏在「雷震、傅正信函檔」裡，作者也使用這批信函說明這段期間雷震思想的特質與變化。

（二）深刻的法政學理分析

本書「緒論」指出，在當時關於雷震的研究成果裡，「自民主憲政發展角度對雷震個人進行檢討之研究，亦尚未出現」（頁9），作者即以「民主憲政」作為研究雷震的主題。

由於作者畢業於政大政治系，自有其專業的法政學養，本書析論雷震民主憲政思想的段落，正是其法政學理分析長才的展現。作者不僅扣緊立憲主義(constitutionalism)以及自由主義(liberalism)等主軸來探索雷震一生的思想特質，還從保護性民主(protective democracy)、依恃主義(clientism)、封閉的霸道政權(closed hegemony)、競爭性寡頭政治

⁵ 據近史所檔案館「雷震、傅正檔案總目錄」，本書「徵引書目」引用的「雷震個人檔案」一項，應為「自由中國始末」。

(competitive oligarchies)、威權體制的傘狀結構……等角度，針對她所收集到的大批史料進行分析，而提出更深刻的意涵。

本書雖然運用若干法政學理來分析雷震思想及其時代環境，但能謹守歷史研究以史料為大根大本的原則，未見史學研究頗忌諱的「意識先行」、「硬套理論」等弊病，既有堅實的史料基礎，復見深刻的學理縱深。

(三) 始末詳備

以往研究雷震的焦點多集中在 1950 年代《自由中國》的言論和「中國民主黨」的籌組，「著重在討論群體現象，對於個人（按：指雷震）在辦刊物之前與組黨失敗之後的個人處境轉變、發展，則有所不及」（頁 9）。為彌補這些缺失，作者在本書二、五兩章裡，以相當的篇幅介紹雷震早年的生命經驗及其晚年的處境；並還編撰了一份長達二十一頁的〈雷震先生年譜簡編〉，可謂首尾兼顧，始末詳備。

透過雷震早年生命史的重建，了解他早年特殊的歷史經驗所形塑的思想和人格特質，對於解釋 1950 年代以後雷震許多重大的轉折，極有助益。例如，原本屬於統治集團成員的雷震，在 1950 年代中期之後，卻逐漸走向統治集團的對立面，此一轉折究竟原本是「保守的國民黨舊官僚雷震」的「覺醒」和「從良」？抑或原本是「自由主義者雷震」其自由主義精神的「復甦」與「重現」？透過雷震早年歷史經驗的了解，能得到較合理的詮釋。⁶

又如，1950 年代中期開始，有愈來愈多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大陸籍人士大力鼓吹籌組反對黨，雷震是其一。然而，到了 1960 年正式開始籌組「中國民主黨」時，卻出現「鼓吹者眾、參與者寡」的現象，⁷ 雷震卻是

⁶ 筆者曾引用李澤厚「救亡壓倒啟蒙」一說來解釋雷震與統治當局的合與分：「……雷震早年留學日本，受到森口繁治等民主主義學者的影響，早已深具自由民主的思想。然在 50 年代初期，由於眼見臺灣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因而不得不暫斂其自由主義者批判專制政治的性格，與統治當局維持一定的和諧關係，……50 年代中期以後，臺灣由於美國的支持而轉危為安，雷震暫抑的自由主義精神極可能因「救亡」壓力的銳減而復甦」。參閱蘇瑞鏘，〈雷震與國民黨的離合往事——為雷震先生百歲冥誕紀念而作〉，收入《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紀念雷震先生百歲冥誕暨傅正先生逝世五週年》（臺北：財團法人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1996），頁 45-46。本書出版之後，透過該書對雷震早年經驗的敘述（頁 17-23），筆者更加相信雷震與當局的決裂乃其自由主義精神的「復甦」與「重現」。

⁷ 蘇瑞鏘，〈「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6 月），頁 97-98。

少數能跨越這道障礙的大陸籍人士。透過對雷震早年歷史經驗的理解，可為吾人解此疑惑（可參考本書，頁 272）。不過，本書的寫作重點集中在 50 年代，就全書的比例而言，雷震早年及晚年的討論仍相對偏低，或有更進一步補充的空間。如此，對了解雷震不同歷史階段的轉折而言應有更大的助益。

四

本書的學術業績，固已超越前人，然尚有若干可再商榷之處。

（一）關於史料的搜集

本書使用不少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收藏的「雷震、傅正檔案」，自有其先驅性的貢獻。然而，本書似未充分使用該檔案，⁸ 其實，在這些未被使用的檔案裡，即有若干頗具史料價值。例如：本書在「籌組反對黨」一節（頁 247-274）的討論裡，使用最多的原始史料為雷震已出版的日記。然而，「雷震、傅正檔案」裡的「中國民主黨資料（一）~（五）」（編號 F01~F05）包括大量關於組黨運動的內部重要文件，⁹ 其重要性當不在雷震日記之下，不知何故，卻未見本書引用。

其次，1997 年 2 月 27 日，《聯合報》首度披露一封胡適在 1951 年寫給蔣介石的信函，其中有許多關於民主憲政（特別是政黨政治方面）的重要建議。¹⁰ 不知何故，本書並未引用這封信。鄙意以為，本函對理解 1950

⁸ 比較本書的「徵引書目」與近史所「雷震、傅正檔案總目錄」，可以看出：「雷震、傅正檔案」共分十幾大類，本書只徵引其中的「《中華民國制憲史》」、「自由中國始末」、「雷震、傅正信函檔」以及「傅正剪報」等四大類。且「《中華民國制憲史》」計有 60 個檔案（D01~D60），本書只徵引 15 個；「自由中國始末」計有 17 個檔案（E01~E17），本書只徵引 1 個；「雷震、傅正信函檔」計有 53 個檔案（H01~H53），本書只徵引 7 個；「傅正剪報」計有 159 個檔案（N01~N159），本書只徵引 1 個。本書並未說明徵引／不徵引此一檔案的標準與限制。

⁹ 例如，多次「選舉檢討會」與「選舉改進座談會」的會議資料、「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的申請書及詳細名冊、雷震與多位臺籍組黨人士之間往來的書信、乃至多份警備總部調查組黨人士「秘密集會」的公文等等。

¹⁰ 例如，胡適在此函謂：「今日宜由立法院與監察院聯合妥商一個憲法上規定的總統、副總統選舉方法的緊急補救條款」、「今日似可提倡實行多黨的民主憲政，其下手方法，似可由國民黨自由分化」、「蔣公辭去國民黨總裁的職務」、「我沒有精力與勇氣，出來自己組黨，我也不同情於張君勱、曾慕韓諸友的組黨工作」等等，參閱〈民主發展的艱難見證——胡適與蔣總統

年代的憲政問題、胡蔣關係，乃至於胡適對組黨的態度等等，史料價值頗高，值得參考。

最近中研院近史所出版了《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一書，¹¹收錄大量原本收藏在近史所「胡適紀念館」內胡、雷二人的書信，其中有不少頗具史料價值者，然亦未見本書徵引。例如，胡適起初並不滿意為《自由中國》所寫的〈宗旨〉，¹²也一直不願意擔任《自由中國》的發行人，¹³其想法與態度頗耐人尋味，值得深入探討。本書當時既使用近史所「檔案館」的資料，然不知是否受限於主客觀因素，而未使用近史所「胡適紀念館」的資料。

再者，本書雖引用不少他人採訪的口述史資料，然似乎未見作者本人親自採訪者（至少未見本書徵引）。撰寫本書之時，雷震已過世多年，然其親友如宋英、馬之驩、宋文明、胡虛一等人仍應可提供不少珍貴的回憶。此等口述史資料之有無，不必然會左右全書的論證，但多少有補強論證的價值。特別是人物史的研究，透過口述歷史，採訪所得，往往有助於了解被研究對象的私人生活的面向。不知因何緣由，作者並未加採錄。或許日

論政書札》，《聯合報》，1997年2月27日，37版。

¹¹ 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¹² 即如潘光哲指出：「……胡適為《自由中國》所寫的〈自由中國的宗旨〉一文脫稿後，他不滿意，先後在1949年4月16日、1950年1月9日分別致函王世杰、雷震等人，要求朋友群再行討論。這兩封信，目前可能保存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雷震檔案」裡；然而，任育德《雷震與臺灣民主憲政的發展》一書雖大量引用〈雷震檔案〉，但卻也未見徵引這兩封信……」。參閱潘光哲，〈張忠棟教授與現代中國／臺灣自由主義人物的研究〉，《臺灣歷史學會通訊》期9（1999年9月），頁33-34。這兩封信原來都是中研院近史所胡適紀念館的「雷震持贈本」，今皆收入萬麗鵬編註，《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頁1-3、頁9-10。

¹³ 本書指出：「遠在美國的胡適，是在號召作用下成為《自由中國》的發行人」（頁87-88）。然而，以1950年1月9日這封信為例，胡適致雷震：「我最不高興的是你用我的姓名為「發行人」。這是作偽，不是發起一個救國運動的好榜樣。我想請你老兄考慮，另請一人為發行人」（參閱萬麗鵬編註，《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頁9-10）。從這一段史料可以看出，胡適恐怕打從一開始就不願擔任《自由中國》的發行人。如此一來，胡適最後又是在何種「號召作用」下成為發行人？實有更進一步探究的必要。又，萬麗鵬分析過這批書信裡關於「發行人」問題的爭議，指出胡、雷「二人因接觸與了解有限，以致在觀念上有所歧異，即在爭取自由民主的過程裏，目標原則雖同，然而在手段技巧上則頗有出入」（參閱萬麗鵬編註，《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導言」，頁xi）。由此皆可看出這批書信的重要性。

後本書再版時，應考慮另行增補。

從事史學研究，必不可忽視史料的重要性，然史料浩瀚，原為史家所難。前者所評，只是責備求全，盼精益求精耳。

（二）關於臺灣民主運動歷史脈絡的論斷

本書「前言」指出：

臺灣在日治時期自由民主理念的傳承，在光復後已因多項社會政治的變動（按：根據任書，此處指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土地改革等等），出現了斷裂現象。雷震與《自由中國》作為 1950 至 1960 年代初期臺灣自由主義的代表，其發展與主張則與日後臺灣民主運動政治與思想面的主張，一脈相承（頁 2-3）。

由此可看出，本書的兩個論斷：第一，雷震等自由主義者對臺灣日後民主運動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作者舉出許多例證（頁 320-322）加以說明，此一論斷並無疑義。第二，戰後臺灣民主運動的主張「一脈相承」自雷震與《自由中國》，關於此一論斷，鄙意以為，尚有可再商榷之處。

如前所述，近百年臺灣民主運動的發展，其理念與主張，有日治以來的脈絡，也有「五四」以降的脈絡。日治以來的脈絡，在戰後初期受到「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等影響，隱為「伏流」，然在 1950 年代末期則又一度「浮現」。比如 1960 年籌組「中國民主黨」的核心人士裡，即有不少「曾經直接或間接受過日據時代臺灣的政治文化抗日運動之洗禮的本土政治人物」，包括李萬居、吳三連、楊金虎、郭國基、石錫勳等人。¹⁴ 作者在本書也曾討論「五龍一鳳」等臺籍政治菁英在 1950 年代的政治角色（頁 154），特別是第五章「以組黨落實民主憲政」對臺籍菁英在組黨過程當中的活動著墨甚多，甚至還指出「臺籍人士已成為此波籌備反對黨之主力」（頁 271）。因此，作者提出的「一脈論」的論斷，似有可再斟酌之必要。

籌組「中國民主黨」失敗之後，日治以來的脈絡再度「隱伏」，直到日後黨外運動崛起，這股「伏流」方又再現。本書指出，雷震去世後，《八十年代》、《亞洲人》等刊物刊載不少紀念雷震的文章（頁 5），也提到李鴻禧等人強調《自由中國》對後世民主運動的重要性（頁 320-322），

¹⁴ 李筱峰，〈知識份子與政治革新運動〉，《中國論壇》，卷 23 期 1（1986 年 10 月 10 日），頁 80。

可見雷震等人的理念對日後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士確有相當的影響。然而，從《八十年代》、《亞洲人》乃至於其後黨外雜誌的內容來看，同樣也可看到不少關於日治時期民權運動的介紹。茲就 1982 年初《八十年代》與《亞洲人》雜誌社舉辦的「民主的香火（臺灣部分）」座談會為例，會中有黃煌雄主講的「日據時期臺灣民族運動發展概論」，也有傅正主講的『自由中國』與中國民主黨」，¹⁵並由李鴻禧主講「在野勢力的展望」，他認為：

今天在野勢力能夠形成，確實有他歷史的條件。第一個是源於戰前臺灣的民主先烈，對抗異族所做的努力，特別是到了日本統治臺灣的末期，文化協會或其他先輩，到處做民主的演講，給臺灣居民傳播了很多近代的民主思想。第二個非常重要的是，中國大陸淪陷後，大陸上民主憲政方面很有研究的精英，渡海來臺，像雷震先生、殷海光先生，對戰後臺灣的民主運動，提供了非常紮實的和理念基礎，……¹⁶

由此可見，在李鴻禧的詮釋裡，黨外運動的理念與主張也是承繼上述兩個脈絡，而非「一脈」。

胡適、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義者對戰後臺灣民主政治的發展有著極其感人的貢獻，後人當感恩戴德，不應或忘。然而，若要將戰後臺灣的民主運動的思想淵源簡化成「一脈論」，則恐需斟酌再三。

五

近年來有不少人加入 50 年代臺灣自由主義研究的行列，雷震是被研究的焦點人物之一。透過這些研究者的努力，雷震的歷史圖像逐漸清晰。本書的出現，雖未對此一圖像有出人意表的改繪，然作者憑藉過人的努力，則使此一圖像更為清晰，本書實屬希有難逢之作。日後欲深入了解雷震、《自由中國》、「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乃至於 1949 年前後中國／臺灣之憲政問題者，不讀此書，恐為識者所笑。

¹⁵ 〈民主的香火：中國民主運動發展史（二）——臺灣部分（1946-81）〉，《八十年代》，卷 4 期 1（1982 年 2 月），頁 10-12、頁 21-25。

¹⁶ 同上，頁 33。

構建中華兩岸秩序：全球化現象與 本土化發展之省思

朱景鵬*

張啓雄，〈海峽兩岸在亞洲開發銀行的中國代表權之爭：名分秩序論觀點的分析〉，臺北：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2001年12月，188頁。

自 90 年代國際社會進入後冷戰時期以來，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區域化(regionalization)之現象即受到全球的關注。全球化不僅反映在領土國家與全球政治之關聯性（政治全球化、國際化與跨國化，多層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與政治權威之擴散等），國際軍事秩序與軍事全球化（地緣政治與地緣治理模式之出現，如國際安全機制之建構等），經濟全球化與國際貿易、金融秩序之興起（全球自由貿易之發展、全球生產網絡與無約束的跨國公司等），移民、民族國家與全球化、環境全球化等現象，亦且甚至在當代文化全球化方面，更藉由科技之更新與創造，使得文化流動與文化自主，大眾文化與民族認同之議題均受到廣泛的討論。至於區域化的浪潮，更由於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前身稱歐洲共同體）之締建，由神話、虛無(shadow)向實質(substance)之跨國家道路邁進；單一市場化之實現與歐元(EURO)之誕生，使得主權民族國家(sovereign nation-state)之傳統思維，可以透過超國家(supranational)的框架設計以及政府間(intergovernmental)之合作機制，打破傳統的意識迷思。也因為如此，區域主義(regionalism)亦迅即成爲全球化現象衝擊下的新的治理概念。除歐盟之外，北美地區的 NAFTA、亞太地區的 APEC、東南亞地區的 ASEAN、南美地區的 Mercosur、阿拉伯回教世界體系中的海灣合作理事會(GCC)等，甚至在亞加太地區、非洲地區、南半球國家亦均有程度不一

* 東華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的區域主義之鑄印。不過，若反思當代對全球化之議論，赫德(David Held)的表述，值得現階段立基於本土化為主軸思潮的臺灣有更多的反思空間。赫氏謂全球化應被視為：

一個(或一組)體現社會關係和交易的空間組織變革的過程——可以根據他們的廣度、強度、速度以及影響來加以衡量——產生了跨大陸或區域間之流動以及活動、交往，以及權力實施的網絡。¹

赫氏之定義有助於釐清全球化與本土化(或稱國家化/nationalization)、區域化以及國際化的界限。亦即本土化係指特定地方之流動與網絡之加強，國家化是社會關係和交易在有固定疆域框架內之發展過程，區域化為在國家或社會之功能性或者地緣性團體之間的交易、流動、網絡以及交往，國際化則指任何地方進行多個民族國家之間的交往和相互聯繫之模式。赫氏的目的係在於表述「沒有理由認為本土化或區域化與全球化是對立或矛盾的關係」，相反地，其彼此之間是一種複合與動態的關係。

不過，即使如此，現實的國際社會雖有更多的依賴要素，卻也同時潛藏更多的衝突與危機因子。雖有全球化作為融合之護身符，卻也無法脫離傳統之國家角色。實力政治(Realpolitik)與現實主義(realism)造就了民族國家無限擴張的生存空間(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等)，更增添了許多文明國家的衝突。世界政治的秩序，自歷史比較觀點視之，14-18世紀期間之帝國(Empire)、城市——國家(city-state)之權力形式，其全球政治秩序觀點即是歐洲帝國主義之擴張；19-20世紀中葉期間，民族——國家之建立孳衍了自由民主政體，但造就了民族主義之擴張，導致全球政治之交換；自1945年迄今，不僅民族國家形式愈趨鞏固，非殖民化、多邊外交、區域主義之興起，導致聯合國全球政治體系秩序之形成，並進一步形成多層治理之國際結構，政府間(IGOs)與非政府間(NGOs)之國際組織不斷發展，不同形式之規範體制(regime)亦迅速成長，國際法之形式、範疇與主體結構也不斷變化，凡此均顯示國際秩序之變遷。對於此一軌跡，凱米萊里(J. A. Camilleri)以及霍爾克(Jim Falk)認為需要一種歷史觀點的詮釋。

張啓雄教授所撰之《海峽兩岸在亞洲開發銀行的中國代表權之爭》乙書，係以「名分秩序論」觀點加以分析。無疑的，本書首先從中國歷史上

¹ David Held, *Global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6.

之王朝正統之爭作為問題意識之剖陳，建構「中華世界帝國」之概念，歸納 17 類之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並以名分秩序之中國傳統價值觀闡釋當代一個中華民族兩個不同政治實體在一個共同參與的國際組織舞臺——亞洲開發銀行(ADB)之交手過程，企圖架設出名分秩序在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之合理性與實然性的價值。自中國政治歷史觀點檢視，孔子的政治指導原則即是「為政必先正名」，並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為政以德」，基本上反映出不論任一社會階層應依一定名分行事，始能「天下有道」。此一價值取向在西方的柏拉圖而言，即是踐履「正義的理想國」。作為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與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上是 40 年代國共內戰的結果。漢賊不兩立的時空環境雖與時俱移，但「一個中國」的正統爭論至今仍是甚囂不歇，即便是全球化與區域化的國際發展趨勢，卻絲毫無法改變兩岸互為主體以及建構為單一主體的思潮。正如本書指陳：「戰後海峽兩岸的名分論爭，約有國號、年號、帝號（領袖稱號）、政府名義、國旗、國徽、國際機構、國際會議、區域組織、奧林匹克代表權、領袖互訪、姐妹市締結、定點直航等諸多問題」，確均與本書論述之核心「名分秩序論」息息相關。作者在書中詳剖此論述之構造概念，對前項兩岸名分論爭作了經驗性的論證，不僅在學術上具創見，並在以 ADB 為經驗檢定的對象分析方面亦頗具匠心獨到之處。

本書立論於傳統的中華世界秩序，以歷史鋪敘兩岸正名之爭，並以國際政治現實主義之框架概念，自改名抗爭、正名交涉、勇入虎穴、苦撐待變、香港模式，乃至窮則變之過程，皆有精彩而詳實之描述。其結論正如作者所言：「由名分秩序論的觀點來看，北京方面確實已經成功地將臺北的亞銀會籍名稱矮化成香港般的地方政府名義，所剩的是如何依名定分，依分定序地推動秩序安排。」作為一位關注兩岸關係發展與國際互動格局的研究者，我們發現，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參與國際事務與各類型國際政府間與非政府間國際組織，雖都以主體主權、尊嚴對待、堅持國格為最高優先考量，然而交涉之結果往往均非「最佳化選擇」，而受迫於北京一個合法中國代表之國際認知現實環境，最終在以「對等參與」為最高戰略原則之下妥協。亞銀如此，奧會模式如此，即便是 APEC 以及 WTO 等亦分別是以「經濟體」(economies)或「獨立關稅領域」名稱才得以參與，此一結果並不令人訝異。在本文前述全球化、區域化、民族——國家、主權論爭之國際秩序變遷環境中，國族認知、民族意識、正統法理以及當家作主之

思維仍然主導著各個國家；傳統的國家利益以及國家主體為上之觀念，未來仍無法輕易被全球化或區域化之浪潮所淹沒。關鍵是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要思考的將是如何以「最大化利益」為國家之發展「定名、定格、定性、定位」，最終為國家獲取最佳化的「定分」。

作者近年來致力於開拓「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之學術研究領域，以嚴謹史學之觀點，進行經驗之反覆論證，極具深思反饋意義。本書以兩岸為主體，以正統、爭天下為啓點，正如作者所言：「名分秩序論之要，首在名實合一。爭名乃為了取實，實至則名歸。唯有實至則名歸，才能名實合一，唯有名實合一，秩序始能井然運行。」確實，臺灣政局之變遷，時空環境之轉換，兩岸紛爭確已呈現出由「爭對等」向「爭主權獨立」的過渡趨勢，爭意識認同也爭本土認同。就政治構面言之，兩岸似漸行漸遠。就經濟構面而言，兩岸經濟互賴格局已經由十餘年之交往經驗積累而成，互補要素亦日趨成熟，國際大環境交往機制亦已構建，互利雙贏局面已然成形。接下來，即端視兩岸政府運用政治智慧構築未來交往之「新秩序」，若果，則本書確可提供為政者更宏觀之思維視角，不復重蹈歷史覆轍，並進一步構建兩岸新秩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46)

胡炎漢回憶錄

胡炎漢著

311頁

平裝 250元

胡炎漢先生(1924-)江西省修水縣人。作者生逢當年內戰頻仍與八年抗日戰爭之亂世，其求學過程係在顛沛流離與半饑餓狀態下完成，但亦因而養成堅忍不拔、樂觀進取之性格，勇於面對逆境。民國三十七年(1948)作者自江西南昌國立中正大學森林系畢業，經校方推薦進入臺灣省林產管理局(現稱「林務局」)服務，前後十數年，對臺灣林業經營具有深切體驗，經常發表有關臺灣林業興革建言。民國五十三年(1964)作者以林業專家身分應聘赴馬來西亞任職，翌年約滿返臺，受邀轉入行政院退輔會森林開發處任職技師兼廠長，並先後奉派赴美、加、日、澳、紐、馬與印尼諸國考察林業。民國六十一年(1972)作者因受正大校友「涉嫌匪諜」乙案之牽連而下獄，但其在獄中一面潛心鑽研學問，一面刻苦鍛鍊身體，從未虛度時光。民國六十七年(1978)刑滿出獄，時臺灣尚處戒嚴，致具有「特殊身分」的作者，求職無門，只有隱名從事筆耕以維一家生計，並策勵子女奮發上進(如今，其兩位公子分別在美國矽谷科技界與國內營造工程界卓有成就)。作者十數年來已出版譯、著作十二冊，雖年近八旬，仍為國內報刊撰寫專欄，未嘗中輟。



大事紀要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2001.10-2002.3)

張珍琳*輯

2001.10.02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研討會，邀請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 Prof. Michael Share 主講：“Soviet Relation with Taiwan”。

10.02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學員陳家倫先生主講：〈新時代運動的社會學意涵及其在臺灣的發展〉。

10.0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北京中國史學會會長金沖及教授主講：〈中華民族之形成〉。

10.06 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近代史學會等五個單位舉辦之「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假臺北市圓山飯店舉行三天，邀請學者專家共發表論文六十二篇。

10.07 由臺灣科技與社會網路跨領域計畫、教育部顧問室主辦之 David Arnold 殖民醫學工作坊，假清大月涵堂舉行學術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共發表論文六篇。

10.0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講論會，由副研究員祝平一先生主講：〈知識與社群：明清之際曆算與醫學之比較〉。

10.0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圖象研究室舉辦座談會，由研究員林富士先生及韓國忠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寅成先生主講：〈巫者的面貌：臺灣童乩與韓國巫堂的遭遇〉。

10.10 由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泰州市政府、泰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主辦的「泰州學派國際學術研討會」，假泰州舉行三天，邀請學者專家共發表論文三十九篇。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

10.1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林滿紅女士主講：〈日本殖民時期臺灣與香港經濟關係的變化——亞洲與世界關係變動中之一發展〉。

10.11 大陸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主辦「辛亥革命九十周年」青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為期三天，邀請學者專家共發表論文五十四篇。

10.13 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主辦，國立臺南社會教育館、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協辦之「荷蘭時期臺灣圖像」國際研討會，假臺南社教館舉行兩天，邀請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講及發表論文十四篇。

10.16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四個單位主辦之「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假湖北武漢舉行四天，臺灣有十餘位學者與會發表論文。

10.1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講論會，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納日碧力戈先生主講：〈現代背景下的中國民族與族群〉。

10.19 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主辦之「20世紀臺灣『新文化運動』與國家建構」學術研討會，假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三天，邀請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講及發表論文十七篇。

10.23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學術研討會，由研究員徐火炎先生主講：〈臺灣政黨版圖的重劃：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的「民」基比較〉。

10.2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歷史民族誌」研討會，為期三天，主題分為史學與人類學的族群研究、中國史學與人類學的發展、中國歷史民族誌研究——個案報告，邀請十一位專家學者擔任引言人，參與討論。

10.23 由國史館主辦、國家圖書館協辦之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六屆討論會——「20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假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兩天，邀請學者專家共發表論文四十七篇。

10.24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語言雙週會，邀請東吳大學英語系教授魏美瑤女士主講：〈臺灣政治論述中的隱喻及典故使用〉。

10.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張寧女士主講：〈中西貿易與飲食變化：中國蛋品工業的興起，1890-1930〉。

10.25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舉辦「殖民醫學」國際工作

研討會，為期兩天，邀請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講及發表論文八篇。

10.26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舉辦「二十世紀之美國史」學術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共發表論文六篇。

10.26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學術演講，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學員胡正恆先生主講：〈蘭嶼的地景再分化與外來宗教、國家制度的轉化〉。

10.26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舉辦「人類學與漢人宗教研究」中型研討會，為期兩天，邀請學者專家共發表論文十一篇。

10.2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外交史組與東北亞區域研究合辦學術演講，邀請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吳景平先生主講：〈南京政府時期美國對華借款〉。

10.30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與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合辦「殖民歷史、土著地權與經濟發展：臺灣與砂勞越的比較」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共發表論文六篇。

11.01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學術研討會，由研究員張彬村先生主講：“The Rise of Chinese Mercantile Power in Maritime Southeast Asia, ca. 1400-1700”。

11.03 由蒙藏委員會主辦、臺灣宗教學會協辦之「藏傳佛教在臺灣」學術研討會，假中研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行兩天，邀請學者專家共發表論文八篇。

11.07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語言雙週會，由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蔡淑鈴女士主講：〈語言使用與職業階層化的關係：比較臺灣男性的族群差異〉。

11.0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潘光哲先生主講：〈《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與晚清士人「認識世界」的「知識基礎」〉。

11.09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學術演講，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學員古明君小姐主講：“Tourism, Self-Orientalization, and Cultural Globalization: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Tourism in China after 1978”。

11.09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會 2001 年第四次聚會，邀請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鄭毓瑜女士主講：〈傳統典律與移民論述——以夏完淳〈大哀賦〉為端緒的討論〉。

11.10 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主辦、林本源中華文教基金會贊助之「曹永和先生的學術世界」講論會，假臺大思亮館國際會議廳舉行，議程包括「曹永和先生的學術世界」座談會、「曹永和老师與臺灣史研究」講論會、「林本源基金會獎助博士班研究生」研究成果發表會（有關臺灣史研究之論文兩篇）。

11.11 由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研究中心、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鵝湖雜誌社主辦之第六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當代新儒學與人文精神重建」，邀請專家學者發表論文共四十四篇。

11.12 由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等五個單位合辦之「辛亥革命、孫中山與廿一世紀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假香港浸會大學舉行三天，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及發表論文七十餘篇。

11.16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學術演講，由研究員張香芬女士主講：〈臺灣公營事業民營化：經濟迷思的批判〉。

11.17 由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贊助之「張學良與西安事變」學術座談會，假中研院歐美所會議廳舉行，計有 120 人出席，與會者共同觀賞《世紀行過：張學良傳》紀錄片之精華篇，並請學者專家針對主題深入探討。

11.2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專題演講，邀請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朱維錚先生主講：〈明清之際的中外文化問題〉。

11.21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語言雙週會，邀請清華大學博士候選人吳中杰先生主講：〈描繪臺灣客家地圖〉。

11.22 由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國立國父紀念館與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主辦之「東北亞僑社網絡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假國父紀念館舉行兩天，邀請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講及發表論文十一篇。

11.22 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之「清代乾嘉學者的治經貢獻」第二次學術研討會，假該籌備處舉行兩天，邀請專家學者發表論文共十四篇。

11.22 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純智文教基金會贊助之「2001 蕭公權學術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何炳棣教授主講：〈中國思想史上一項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辯證思維源於《孫子兵法》的論

證)。

11.23 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合辦，純智文教基金會贊助之「2001 蕭公權學術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何炳棣教授主講：〈我的治史經驗談〉。

11.2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主辦「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中國經濟，1918-1937」學術研討會，企望從區域經濟、經濟思潮、財經政策、對外貿易、景氣循環等各層面探討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經濟變動的因素、過程與影響，進一步觀察這二十年中國經濟在歷史演變中的定位與意義，邀請學者專家共發表論文十一篇。

11.2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後現代理論與史學研究」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共發表論文五篇。

11.25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主辦「宋明理學中的關學研究」學術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共發表論文六篇。

11.2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戰爭與社會研究群學術演講，邀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研究員馬振犢先生主講：〈檔案資料與民國情報史研究〉。

11.28 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及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外交史組主辦學術演講，邀請日本國立大阪外國語大學教授西村成雄先生主講：〈中國近現代東北史研究在日本的現狀及其課題〉。

11.28 由日本 20 世紀中國研究會主辦，縣立長崎 Siebold 大學和對馬芳洲會協辦之「從周邊看到的 20 世紀中國」學術研討會，假日本對馬島舉行三天，邀請五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者共發表論文十餘篇。

11.30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學術演講，邀請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歷史系教授 Prof. Donald S. Sutton 主講：“Researching the Bajiajiang (八家將) and its History in Southern Taiwan”。

11.3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族群研究工作坊第七次讀書討論會，邀請社會所研究員柯志明先生主講：〈清代臺灣族群政治〉。

12.03 由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主辦之「義民信仰與客家社會」兩岸三地學術研討會，假該校文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行兩天，邀請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講及發表論文十五篇。

12.0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日本京都大學東方學研究部主任森時彥教授主講：〈中國棉業近代化的動態結構〉。

12.06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學術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歷史系教授林毓生先生主講：〈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兩個基本問題〉。

12.07 由私立淡江大學歷史系主辦之「2001 淡水學：歷史、生態、人文」學術研討會，假該校舉行兩天，邀請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講及發表論文十六篇。

12.08 由國立臺灣文學館、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主辦之「櫟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假臺灣省諮議會議事堂舉行兩天，邀請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講及發表論文六篇。

12.08 由中華歐亞教育基金會、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主辦之「俄羅斯與兩岸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假政大國際會議廳舉行兩天，邀請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講及發表論文十五篇。

12.08 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承辦之「臺灣與南島文化」國際研討會，假中研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行四天，針對臺灣與整個南島民族的「基本文化分類概念」、「臺灣地區考古學的新發展」、「南島語與臺灣南島語的語言關係」等議題，發表論文二十三篇；並請目前從事「從遺傳基因探討南島民族起源」、「南島民族的製陶傳統」及「南島語言之比較類型學」等尖端研究的學者作成果報告與座談。

12.1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座談會，邀請日本京都大學東方學研究部主任森時彥教授主講：〈京都大學「研究群」運作的經驗談〉。

12.10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座談會，邀請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金觀濤先生、劉青峰女士主講：〈從中日氣論之異同看近代儒學之轉型〉。

12.1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群及中華科際整合研究會合辦演講座談會，主題包括「海華研究書目新分類法」、「海華研究書目的國際化與數位化」、「法輪功與東南亞華人」。

12.11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金燦榮博士主講：〈冷戰後的中美關係〉。

12.1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明清文化研究群學術討論會，邀請香港理工大學副教授區志堅先生主講：〈學風的形成與學系之建立——南高史學系與「保守主義」〉。

12.13 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東臺灣研究會協辦之「國家與東臺灣」區域發展史研討會，假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舉行兩天，邀請學者專家共發表論文十四篇。

12.1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學術演講，邀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教授王國斌先生主講：〈經濟史研究概況〉。

12.1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物質文化的歷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假該所舉行兩天，邀請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講及發表論文十四篇。

12.14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學員王曉丹小姐主講：〈婦女運動在臺灣，1980s~1990s：抽象主體的建構〉。

12.17 中央研究院舉辦胡故院長適之先生一一一歲誕辰紀念演講會，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先生主講：〈回教世界、歐洲與中國間的三角互動〉。

12.1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胡適與近代中國學術之建立與轉型」學術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發表論文五篇並舉辦綜合座談。

12.18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研討會，邀請韓國延世大學白永瑞教授主講：〈從東亞視角看二十世紀國民國家史——論韓國歷史研究之新趨勢〉。

12.18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辦「西方宗教在臺灣」專題演講，邀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陳梅卿女士主講：〈英國長老教會在臺的傳教活動〉。

12.19 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暨南大學歷史系合辦之「中國的城市生活：十四世紀至二十世紀」學術研討會，假暨南大學舉行三天，邀請學者專家共發表論文十九篇。

12.2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般近代史組主辦「1950年代的海峽兩岸」國際學術研討會，假中研院歐美所會議廳舉行兩天，邀請學者專家共發表論文十九篇。

12.24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座談會，邀請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先生主講：〈晚清人眼中的西學東漸——以《點石齋畫報》為中心〉。

12.2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題演講，邀請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振忠先生主講：〈新近發現的徽州文書與「徽州學」

研究)。

12.2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座談會，邀請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先生主講：〈江蘇地方檔案與 1950 年代歷史研究〉。

12.27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主辦「臺灣資本主義發展」學術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共發表論文十二篇。

12.28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會主辦「情欲明清」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共發表論文十三篇。

2002.01.03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討論會，邀請日本愛知大學副教授安部悟先生主講：〈魯迅與張愛玲——月的聯想〉。

01.0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講論會，由副研究員范毅軍先生主講：〈地理資訊系統(GIS)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應用——以語言學為重點〉。

01.08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兼主任劉翠溶女士主講：“Labor-intensive Industrialization: The Case of Taiwan”。

01.1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朱維錚先生主講：〈晚清「借權」思想〉。

01.11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政治大學社會系教授顧忠華先生主講：〈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臺灣的本土經驗與理論探討〉。

01.14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座談會，由該處博士後研究何乏筆先生主講：〈創造性的另類系譜學——王夫之與「資本主義萌芽」〉。

01.1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座談會，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張盛發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李嘉谷先生主講：〈中俄關係與蘇聯問題研究〉。

01.15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討論會，邀請該處訪問學人 Prof. Robert Eskilds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Smith College)主講：“Foreign Views of Southern Taiwan in the 1860s-1870s”。

01.1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生活、知識與中國現代性」系列演講，邀請歐美研究所研究員黃瑞琪先生主講：〈從西方現代性到全球現代性〉。

01.1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研究群」第一次小型研討會，報告人及題目如下，副研究員翟志成先生：〈儒學資料的現代轉化——熊十力與胡適的分歧〉、助研究員葉其忠先生：〈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論爭平議〉、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後研究黎漢基先生：〈胡適與徐復觀〉。

01.2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講論會，由助研究員李尙仁先生主講：〈種族、性別與疾病：十九世紀英國醫學對中國的癩瘋病問題之研究〉。

01.24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座談會，邀請紐西蘭 Massey 大學副教授哈玫麗(Rosemary Haddon)女士主講：〈20-90 年代的臺灣文學〉。

01.3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玉法教授榮退演講會」，邀請張玉法院士主講：〈我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些回憶〉。

02.04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胡台麗女士主講：〈從情感與美感出發：排灣文化的新視野〉。

02.04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座談會，邀請國科會訪問學人 Linnart Mäll 教授(Head of the Center for Oriental Studies, senior research fellow, University of Tartu Estonia)主講：“Chinese, Indian and Tibetan Studies in Estonia: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e”。

02.05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陳秋坤先生主講：〈清代搭樓社人社餉負擔與產權變遷(1710-1890)〉。

02.06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語言雙週會，邀請高雄醫學大學講師鄭詩宗先生主講：〈歷史上有關皮膚疾病的臺語文文件——文獻調查及古今比較〉。

02.06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會 2002 年第一次聚會，邀請國立新加坡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沈安德先生主講：〈「他們也有正義的觀念嗎？」——早期歐洲對中國刑案文獻的翻譯〉。

02.07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座談會，邀請國立新加坡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沈安德先生主講：“Picturing Judge Bao in Ming Shangtu xiawen Fiction”。

02.07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湯熙勇先生主講：〈徘徊返鄉路：戰後初期在臺灣的日本人之遺返〉。

02.1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講論會，由研究員黃進興先生主講：〈「文本」(text)與「事實」(truth)的概念：試論德希達(Derrida)對傳統史學的沖擊〉。

02.2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趙岡先生主講：〈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

02.2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組學術演講，邀請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栗山茂久先生主講：〈「緊張」——一種身體感的歷史〉。

02.23 由臺灣法律史學會、思與言雜誌社、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與社會研究中心合辦「臺灣法律與臺灣社會」研討會，假臺大法律學院舉行，邀請學者專家發表論文五篇。

03.01 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合辦的「文化差異與社會科學通則：紀念張光直先生」學術研討會，假史語所舉行兩天，議程分為「中國歷史與考古組」與「臺灣史與人類學組」兩組，邀請學者專家進行紀念演講及發表論文十七篇。

03.04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座談會，由訪問學員、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宋安德先生(Andrew Schonebaum)主講：〈白話醫學——看從《金瓶梅》、《紅樓夢》到魯迅小說中醫學的運用〉。

03.07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劉序楓先生主講：〈近代日本華僑社會的形成——以開港前後(1850-60年代)的長崎為中心〉。

03.0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王正華女士主講：〈過眼繁華：十七、十八世紀中國都市圖的研究〉。

03.08 中央研究院舉辦王故院長世杰先生一一二歲誕辰紀念演講會，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歷史系教授林毓生先生主講：〈民主的條件〉。

03.12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討論會，由訪問學員、政治大學歷史所博士候選人林蘭芳女士主講：〈日治時期在臺日人之「殖產興業觀」〉。

03.13 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九十年度東南亞暨東北亞區域研究成果發表會，假社會所舉行，邀請學者專家共發表論文二十一篇。



2001年12月17日胡適紀念館陳列室重新開展



2002年2月23日臺灣績溪同鄉會參觀胡適紀念館

本期要目

- 「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紀要
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述要
「辛亥革命、孫中山與廿一世紀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紀要
我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些回憶
學人簡介——張玉法
關於大陸中蘇（俄）關係和蘇聯、俄羅斯問題研究的介紹
《莊農雜字》所反映的農民生業生活
有關近代西南地區鴉片史料的種類與存藏情況介紹
敘事、論述與歷史：胡適與近代中國知識結構的轉型
中國大陸批判胡適運動臆說
胡適的「整理國故」在20-30年代學術界的反響
新書評介七本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2001.10-2002.3)

